

臺北市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首座附第45號
寄

李澤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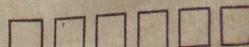


台共黨人的悲歌

——張志忠、季澐與楊揚

藍博洲 著

江蘇省南通縣西門道郵局



從「楊揚之死」的悲劇根源開始說起，

藍博洲再以報導文學之筆，從歷史的積土中，

挖掘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群像，訴說一個時代悲悽恨然。

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
黑暗歷史侵奪下，一家三口的悲劇故事



藍博洲

一九六〇年生於台灣苗栗。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一九八三年開始寫小說，一九八五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二〇〇二年出版長篇小說《藤纏樹》，獲《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

著有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報導文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幌馬車之歌》等，歷史報導《紅色客家人》、《台灣好女人》、《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沉屍、流亡、二二八》、《紅色客家庄》、《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尋找祖國三千里》，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

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整整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關於張志忠的傳奇及其妻兒季濤與小羊的悲劇故事，從「楊揚之死」一封留予柏楊的遺書開始說起……

張志忠與季濤一家三口被捕的經過，官方檔案有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相互矛盾的說法，兩人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也一直有著那樣不切實際的傳說，要理解小羊自殺的真正原因，歷史的澄清顯然還需要一段時間……

ISBN 978-986-86339-1-9



9 789868 633919

00399

台灣人民出版社

Taiw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嘉南平原的野風繼續吹著，火紅的落日已經掛在遙遠的西邊田野的地平線上了，寂寞荒塚裡一家三口長埋地下竟至教世人所遺忘了。紀錄這個故事，為了忘卻的紀念，只盼將來總有人記起他們吧！

藍博洲——在台灣人民出版社的作品

尋找祖國三千里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
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 300

百姓叢書——②

台共黨人的悲歌

——張志忠、季澐與楊揚

藍博洲 / 著

目次

第一章 張志忠 ······	015
序曲 楊揚之死 ······	005
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	
第二章 季 澄 ······	103

張志忠從上海帶回來的新娘名叫季澄。從季澄的生命史來看，她後來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跟整個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的。

地下黨的工作行蹤不定，張志忠與季澑只能透過與家人書信往來得知彼此下落，一家三口被捕的經過，官方檔案卻有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相互矛盾的說法。

第四章 小羊 361

季澑與張志忠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卻一直有著那樣不切實際的傳說。

尾聲 為了忘卻紀念 377

張志忠與季澑的歷史固然長久被湮滅，紀錄這個故事，只盼將來總會有人記起他們，說起他們吧！

大事年表 382

〔序曲〕

楊揚之死

一九六八年元月廿六、廿七、廿八日，柏楊在《自立晚報》「挑燈

雜記」專欄，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詳述楊揚自殺事件的處理經過。

一九六八年。

陽曆元旦，大概是上午十點半左右，柏楊家裡忽然來了一通電話。

「檢察官找你去驗屍，」柏楊的妻子一面摀著話筒，一面顫聲告訴他說：「檢察官找你去驗屍，說有人自殺在旅社裡，留有一張遺書給你。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我怎能預卜先知？」當時在《自立晚報》「挑燈雜記」寫專欄，深受讀者歡迎的柏楊心裡納悶著，從老妻手裡接過話筒。在電話中，檢察官指示他到台北市長沙街二段星光旅社報到。放下電話，他隨即趕往星光旅社。到了旅社，他便向檢察官張承謨先生一鞠躬。

「我們已從遺物中查出死者名叫楊揚，台灣省嘉義縣人。」張承謨手裡拿著遺書，告訴柏楊。「這是死者留的唯一遺書，指名給你。所以就麻煩你來一趟了。」

楊揚在白紙黑字的遺書上頭寫道：

柏老：

以你老的蓋【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啓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一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

獎券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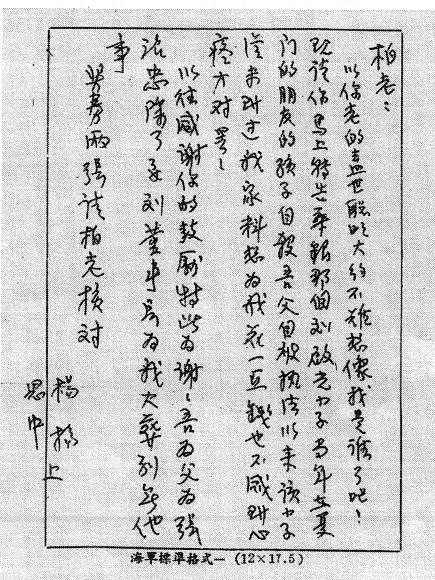
「楊揚？」柏楊努力回想著自己是否認得死者。終於，他想起來了。楊揚是他的讀者，去年十月間，曾經寫了一封信給他；通訊處是：「屏東縣枋寮鄉加祿村會社路二十五號之二」。

在信上，楊揚說，他是江蘇南通人，自幼隨父來台；然後問了柏楊兩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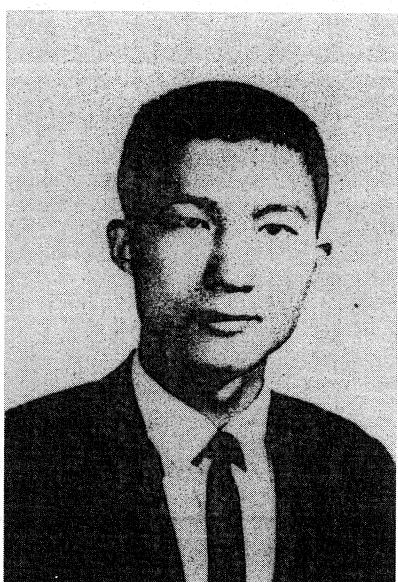
- 一、是不是沒有同父母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
- 二、如現役中，有下列事項，是否可申請退役？要如何辦理？

柏楊對兵役問題一竅不通，當即回信建議

楊揚：



楊揚給柏楊的遺書（張再添提供）



楊揚（1947-1968）（張再添提供）

一、直接向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去信請教，蓋新聞處有一個「省政信箱」，辦理的有色有形，是國民與政府間溝通的最有效機構。他們會很耐心的一一答覆。

二、當兵不但是義務，也是權利，更是光榮，一個年輕人要受得了苦才算英雄，否則只能算是狗熊，同時不能太嫉世憤俗。

柏楊想著：遺書中說到「感謝你的鼓勵」，大概就是指第二點而言吧！可我和他之間的最初一次通信，想不到也成了最後一次通訊。

在檢察官指領下，柏楊心情沉重地登上了二樓，進入一個一床、一桌的小房間。他看到：楊揚的屍體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臘，約二十一、二歲年紀。

「我們只是心交，想不到第一次謀面，卻已陰陽兩途，生死相隔矣。」望著眼前安靜地躺著的年輕的死屍，柏楊感慨地想著。

桌上有半杯開水，床頭有半個芭拉。

「這個可能就是毒藥，」檢察官取出一個像小型肥皂一樣的白色東西，推測說：「至於是什麼毒藥，必須等待化驗後才能決定。」

柏楊黯然辭出旅社房間。一時之間，不知應如何是好？他想：楊揚臨時決定服毒時，並未給家屬留下一紙一字，卻全部信託給我這個陌生的作者；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家屬？如無家屬，掩埋的手續又是如何？而死者既然委託我轉告華銀的劉董事長，我至少應該把這件事做到。

因此，儘管一開始就直覺的懷疑會有什麼結果，柏楊還是決定設法找到劉董事長。他首先翻查電話簿，可

對方卻沒有登記。柏楊猜想：「他大概就在預防這種事情臨頭吧。」最後，他還是通過檢察官協助，向台北市警察局聯絡中心詢問，總算查出劉董事長的住址。他於是在檢察官陪同下，立即前往泰山街，拜訪劉董事長。

「董事長不在，」劉家傭人讓柏楊和檢察官進門後隨即告知：「夫人正在睡午覺，不便見客。」

聽到劉家傭人這樣說，檢察官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柏楊腦筋轉得快，應變說：「請上稟夫人，我們既不是來借錢，也不是來找事，只是出了人命，需要面談，你要不信，檢察官在此。」

傭人於是入內請示。

二十分鐘後，劉夫人出來了。柏楊和檢察官說明了

來意，並把遺書呈上。劉夫人看了半天，搖頭說：「不認識，不認識。」一會又說：「這不像他的筆跡呀！」

「夫人，」柏楊機警地反問道：「你怎的知道不像他的筆跡？」



劉 啓 光 明 達

臺灣華南銀行董事長

本省臺南縣人 現年四十三歲 原名陳朝宗 世代務農 早歲參加反日運動 與魏滬、雷吉二先生 共同領導臺灣農民組合 一時有三大農民領袖之稱 經營出入於全省荷蘭所及監獄 民國十七年 受日當局以叛亂國憲罪 被拘處判徒刑 純灑海逃回祖國 繼續在上海福州廈門等地 稍集營生 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及收復臺灣之活動 日領館警探 對氏之活動 備極注意 造籍甚嚴 故改名易姓 至於遷居隱居 已成常事 劉啓光三字 即七七事變後 延用之化名 抗戰

期間 訓習服裝於前方 徐州空園 帶受重傷 約半年 始愈 後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主持對敵宣傳工作 一面發動臺灣革命團體統一運動 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 並推動中央 成立臺灣民主黨派聯合會 建立本省黨務基礎 關務 萬元席命令 擔任軍事委員會臺灣工作團主 任訓練臺灣革命青年 準備配合聯軍登陸 光復後返臺 出任新竹縣長 以公正 誠實 廉潔 親民 自矢 並勤勉僚屬 深得民心 政聲斐然

劉夫人想了一想，隨便說了此話應付；接著又嘲諷地說：現在上門「打秋風」的窮人那麼多，簡直就無法應付。柏楊和檢察官始終問不出道理，只好告辭。臨走時，柏楊刻意留下一個電話號碼，狀似懇求地說：「希望劉先生回來後，能賜給一個電話。我想，老爺社會上的朋友，太太不見得都認識吧！」

柏楊和檢察官悵惘然回到星光旅社。

「可以收屍了。」檢察官吩咐柏楊。

「收屍？」柏楊一聽，兩眼漆黑，不知如何進行這事。

檢察官於是點他說：「你可以找市立殯儀館來處理。」

柏楊當即打電話到市立殯儀館。不到二十分鐘，殯儀館的板車就來到旅社門前。因為這樣，旅社門口立刻就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柏楊和旅社老闆各買了一疊紙錢，在屍前焚化；然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把屍體抬上擔架，下了樓梯，穿過門前的人群。群眾一個個木然的注視著擔架上的死者被抬上板車，逐漸遠離。

柏楊和檢察官跟隨板車之後也到了殯儀館。繳了訂金，辦完規定的手續之後，檢察官吩咐柏楊：「你可以走了。」

回到柏府，柏楊及時的接到劉啓光的電話。劉啓光說，他過去是在廈門住過，但不認識張志忠先生，更不知道楊揚是何許人也。

「他既姓楊，」劉啓光進一步問道：「父親怎的姓張？」

柏楊所知不多，只好支吾其詞。

「這種事我遇多啦，不勝其煩。」劉啓光不屑的說：「窮苦之人，天下多的是，如果火葬需要錢的話，我站在同情立場，倒可捐助幾個？」

「您這美意，非常感激。」柏楊說：「從死者信上的語氣看，我們當初以為您老人家定跟死者之父，有相當關係，所以他才那麼寫，則賜予幫忙，存歿均感，如果只是死者異想天開打秋風，則先生也不必破鉢，火葬要不了幾個錢，我足可負擔啦。」

到了晚上，柏楊的老妻又接到劉啓光打來的電話。這時，柏楊正在巷口跟丁老漢下棋。等到柏楊回家後，老妻「口齒不清」地告訴他這事，卻說不清楚具體的內容。

「他只說他表示關切之意。」老妻告訴柏楊，「可我提議，等你回來再打電話過去請示時，他卻說不必啦。」

元月二日上午，檢察官通知柏楊到殯儀館問口供。當柏楊趕到殯儀館時，楊揚的叔父張再添先生和服役單位的首長，已從嘉義和高雄分別趕來。這時，柏楊第一個就向張再添先生請教姓氏的問題。

「楊揚是從他祖父的姓，」張再添告訴柏楊：「祖父是入贅張家的。」

柏楊猜想，楊揚說他是江蘇南通人，大概祖父是江蘇南通人也。

楊揚的父親自廈門回來後，就一直在台北，很少回嘉義。」張再添先生又說：「偶爾回嘉義，弟兄們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台北做貿易生意，楊揚跟他的妹妹，從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時，他的祖母去世，楊揚回來奔喪，也沒有什麼異狀。」

元月三日，楊揚在殯儀館火葬。

柏楊畢竟不是研究台灣現當代史之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也不可能理解張志忠作為台灣歷

我想，理解了這些歷史問題，我們應該也就可以理解一個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竟會「如此的不開而「一死了之」的悲劇根源吧！

張志忠與當時的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啓光的關係？

個問題：

楊揚的父親張志忠究竟是怎樣的人？

通讀柏楊的這三篇專欄文章，我們發現：柏楊始終未曾瞭解，也沒有交代楊揚的遺書所透露的幾

的追女朋友矣。

二十幾歲的生命，這麼無聲無息的自己毀滅，越想越感慨叢生，楊揚先生死矣，哀痛之餘，實在還可說，而一個正青春年少的小夥，前途充滿了希望，有啥過不去的事，竟這麼也一死了之，怎麼如此的不開竅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楊先生聯繫聯繫，聽聽我吹吹大牛，或許現在正活蹦亂跳

最後，柏楊感慨地寫道：

元月廿六、廿七、廿八日，柏楊在《自立晚報》「挑燈雜記」專欄，連續發表了〈楊揚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時想不開〉三篇文章，詳述楊揚自殺事件的處理經過。在〈一時想不開〉的文章

易生先生在小院中住着，他和太太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所以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古文古诗方面的书籍。易生先生每天除了研究他的学问外，还喜欢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在花园里种花。他的太太则喜欢在厨房里忙活，或者在花园里种花。易生先生对他的太太非常疼爱，常常夸奖她的厨艺。易生先生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在国外读书，所以易生先生和太太经常感到寂寞。易生先生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在国外读书，所以易生先生和太太经常感到寂寞。

死之揚揚

卷一百一十五

柏楊有關楊揚之死的三篇文章（謝常彰提供）

史人物的重要性如何？

歷史的澄清顯然還需要一段時間。

張志忠

〔第一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筆者在宣信街一條僻靜巷弄裡一棟有寬廣庭院的民宅，見到了長期隱居的張志忠的弟弟張再添先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李敖出版社翻印出版了國家安全局一九五九年四月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二輯。其中，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了台灣光復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活動與潰敗過程：

共匪中央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派【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匪於同年九月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匪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匪率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匪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首批幹部先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匪於同年七月，始潛台領導組織。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頁十二】

這裡所說的「匪幹」張志忠，就是楊揚的父親。

事實上，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的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台灣戰後史上的重要人物，有關他的記載卻是驚人的稀少！

貧農之子

歷來，關於張志忠的出身背景，除了官方資料所說是「嘉義朴子人」以外，其他所知不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歷經多年尋訪之後，我終於在張志忠的老同志辜金良先生及其夫人許金玉女士的專程陪同下，從屏東市包車來到嘉義市，在宣信街一條僻靜巷弄裡一棟有寬廣庭院的民宅，見到了長期隱居的張志忠的弟弟張再添先生，並向他採集了有關張志忠出身背景的第一手資料。

張再添先生說：「張志忠是我二哥，他的本名叫作張梗。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廿六日，出生於日據台灣台南州新巷莊新巷（今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二六七番地的赤貧農家。我父親名叫張禮，是個老實的農民；母親張林氏廳，育有三男三女。二哥上頭還有大姊和大哥，大哥叫張棟，沒讀到書，以駛牛車為業；下頭有兩個妹妹及一個弟弟，我叫張再添，小名豆芽菜。」

一九九五年二月，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了一本張炎憲等採訪紀錄，有關嘉義、雲林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嘉雲平野二二八》，其中幾個新港鄉民的口述紀錄也提到了有關張梗少年時期的一些斷片。

首先，一九一一年出生，新港（巷）公學校第二十一回畢業的陳天送說：

張梗小時候住新港，是新港公學校第二十二回畢業生，不太讀書，整天在玩，卻總是第一名，



張志忠僅有的年輕時候的肖像。
(張再添提供)

用錢很省儉。他的父親叫張

禮，在溪邊種菜維生。張梗畢

業後到合隆商號工作……。【頁

二二八、二三一】

因為家境的關係，張梗在公學校畢業後暫時終止了學業；這是事實。雖然如此，他並沒有就此放棄繼續上學的意願。

張再添先生說：「後來，二哥到

了大陸，並且進入廈門的集美中學就讀。以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條件來說，我父母親不太可能有辦法拿錢給他去大陸讀書；據我所知，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維朝非常疼惜二哥，所以有可能是得到他的資助。」

林維朝（一八六八—一九三四），是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曾祖父。據說，他七歲開始讀孝經、論語，八歲讀毛詩，九歲讀易經，二十歲考取嘉義縣學生員。新港人因此稱他為「前清秀才」。在日據下，工音律的他開私塾、組詩社，延續新港的漢文化傳統。

《嘉雲平野二二八》還收錄了一個從警界退休的新港鄉民林玉鏡的口述歷史，其中也提到有關張梗歷史的某些碎片。他狀似權威地說：

張梗，假名叫張忠信，這人的履歷我都知道。我常聽老輩講起，特別是一位老保正「陳麗川」說的。張梗是新港人，老輩說他少年時去廈門讀集美中學，又讀集美大學，這是華僑回國辦的學校。有人在學校裡面宣傳共產思想，他就接受了共產主義。【頁二六八】

一九一三年，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一八七四—一九六一）在故鄉集美首先創辦集美小學，奠定了他開辦新學的第一塊基石；隨後他又在集美陸續創辦了女子小學、師範、中學、幼稚園、水產航海、商業、農林、女子師範、鄉村師範、國學專門學校等等，總稱為集美學校。

根據《集美學校沿革大事年表》所載，張再添和林

玉鏡所說的集美中學的前身是創辦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的師範、中學兩部。一九二七年三月，集美全校變更組織，改部為校。原師範部改為高級中學，附設前期師範及後期師範；中學部改為初級中學。五月，遵照陳嘉庚先生函囑，高級中學稱為師範學校，初級中學稱為中學校。但是，集美學校並沒有林玉鏡所說的「集美大學」；只有

一九二六年六月，師範學校和中學校合併為中學校。但是一九二七年九月移併廈門

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		偵破時間	三月十八日至三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地點	台北、台中、高雄、基隆等地
姓名	年齡	審實處刑	姓名	年齡	審實處刑
謝天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	楊克明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富四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	四七台北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志忠	嘉義死刑十五年	楊克村	三八彰化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謝富四	台中死	林坤西	西四台中死刑三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陳克鳴	七七廣東自新	林青	二六廣東死刑十五年
謝行三	廣東自新	張世海	二九廣東死刑十五年	李振芳</td	

大學。^①

因此，林玉鏡所言，除了「集美大學」是明顯與事實不符之處外，其他部分在沒有確切的史料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就此說它絕對不是事實。因此不妨「存此一說」。

主編《共鳴》雜誌

有關張梗在廈門求學時期的活動事蹟，一九三九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輯出版的內部機密資料——《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有關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六年

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有這樣一則相關的記載：

自一九二一年前後，台灣人留學中國的人數大增，其中大部分又都在廈門一地。依據一九二三年七月的調查，其總數已達一百九十五名之多。此後，由於受到當時中國學生運動勃興的影響，在廈學生間，也有人倡議組成學生聯合會。於是，以廈門大學李思禎（嘉義人）、……集美中學翁澤生（台北人）及洪朝宗（台北人）……等人为中心，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廿五、廿六兩日，召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在廈門的台籍學生幾乎全部參加了大會。

此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一直維持相當活潑的行動。

一九二四年五月，該會創設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共鳴社，策劃刊行機關雜誌《共鳴》，以嘉義籍的莊泗川與張梗為主持人，進行募稿。^②

莊泗川（一九〇五一？），就讀嘉義公學校時與劉啟光（一九〇五一九六八）是最要好的朋友；公學校

六年畢業後，考進台南商業專門學校，讀到三年級時，因被老師察覺閱讀「對中國的安危憂心如焚」的父母訂購的《申報》而遭到當面辱罵，當時才十六歲的他於是決心離鄉背井，去廈門留學，並順利考入集美中學三年級；畢業後又被保送廈門大學。^③

就年紀而言，當時負責主持《共鳴》雜誌的莊泗川應該是十九歲；而張梗不過才十四歲而已。

張梗與莊泗川主持的《共鳴》創刊號在首頁通過幾行醒目的口號，宣示了這分刊物的宗旨：

同胞們，覺醒吧。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多位會員已被宣告徒刑。

打破陋習大演講會的多位青年已被收押了。

台灣同胞，覺醒吧！

以諸位的血淚，換取諸位的自由吧。

^① 紀念陳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校七十週年籌備委員會校史編寫組編《集美學校七十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頁一九八、一九九。

^② 《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版（台北：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冊：文化運動，頁一二二—一三一。

^③ 許雪姬、黃美滋〈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編印，二〇〇三年十二月），頁一三一一三四、二〇七。

中華同胞，覺醒吧，覺醒吧！
不要被日人的離間之計所欺蒙。

《共鳴》創刊號同時刊載了兩篇以「台灣學生血淚團宣傳部」名義於十一月廿八日寄來的「台灣通信」，報導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台灣青年的反抗行動。

第一篇「台灣通信」指出：台灣有志青年為了不再讓同胞的血白流，從武裝抗日改而文化抗日，並以「設置台灣民選議會」作為具體的運動方式，卻遭到殖民當局嚴厲的壓制。它寫道：

四、五年來，一部分有志青年認為，台灣孤懸海外，內外無援，若非先倡導文化，養成實力，則雖急躁起事，亦將重蹈覆轍，重演往日慘劇，同胞的血，難免又白流。因此，忍辱一時，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台灣民選議會，藉此稍微抑制台灣總督的淫威，恢復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以實行遠大的計畫。……

但，日人狼心狗肺，以為非把從事議會運動的諸位同仁一網打盡，則不能再進行恣意的劫掠搶奪，是故，在去年冬天，非法拘禁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諸位會員。直到今年，由於島民反抗更加熾烈，宛若野火燎原，幾有不可遏止之勢，狼狽之餘，乃將被捕者宣告無罪。又，此次再審期間被釋的這些青年，始終不屈不撓，各種活動更形加劇，而同胞的反日情緒亦日見高亢。鑑於懷柔政策不克奏效，因而，他們已宣布將判處蔣渭水以徒刑之罪，且決定併用壓制手段，干涉同胞的政治運動……。^④

這段文字所說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的具體內容大致如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殖民地台灣的一部分有志之士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第一次請願書，要求設置台灣民選議會，展開了台灣民選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年十月十七日，一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組織了台灣人抗日運動最初的全島規模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畫地推行文化、思想的啟蒙運動。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第二次請願要求設置台灣民選議會之後，籌組以此請願運動為直接目的的團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總幹事石煥長及蔣渭水向北警察署提出組織申請書，預定於二月四日在台北江山樓舉行成立大會，但二月二日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卻「依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禁止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二月廿一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東京重建；十二月廿二日，台灣總督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由檢舉了廿九名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幹部，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之後拘留於台北監獄。

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三好檢察官對蔣渭水等十八人提出預審請求，另對賴和等十一人付不起訴處分。二月廿九日，在獄中的十八人預審終結，決定將蔣渭水等十四人交付台北地方法院公審，

^④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頁一三一一三二。

王敏川等四人免訴。四月十日，王敏川等四人因三好檢察官抗告而再審理，結果取消原判，決定交付台北地方法院公審。歷經七月廿五日至八月七日期間的八次公審之後，八月十八日，所有十八名被告皆以無犯罪證明為理由，宣告無罪。次日，檢察官不服控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一連四天，第二審在高等法院複審部開庭，並於廿九日宣判，結果，蔣渭水等七人判決禁錮四個月或三個月；蔡式穀等六人判罰「罪金百圓」；王敏川等五人無罪。除了被宣告無罪者外，蔣渭水等十三人都提出申告上訴。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第三審判決：上訴駁回。^⑤

《共鳴》創刊號刊載的第二篇「台灣通信」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自然資源與商業利益盡歸日人強占。在這樣的經濟壓迫之下，台灣的經濟蕭條，時起恐慌；台人除二、三富豪及一部分腐敗仕紳極盡奢華之能事外，不為衣食所苦者幾稀！但台北有志青年起而反對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卻遭到無情的鎮壓。它控訴道：

台北有志青年齊起反對，組織無產青年會，在大稻埕文化講座上，大舉進行打破陋習演講會，以滿腔熱血，滔滔辯論奢侈之非，連夜喊得聲嘶力竭，只冀望解放同胞，免受他日經濟壓迫之苦而已。但為什麼日本政府竟出而干涉，橫施毒手，禁止開會，且當場逮捕高君兩貴、黃君成枝、胡君柳生等三名，並將其帶回警所收押。壓迫手段之惡劣，莫此為甚。日本政府的狼心狗肺，愚民政策的真面目，已赤裸裸地呈現在眼前了。島內外的同胞還能不奮發而前進乎？……^⑥

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廈門集美學校留學生翁澤生

(一九〇三—一九三九)、洪朝宗等十數人，在台北市江山樓與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王敏川等會商青年會組織事宜，草擬台北青年會宗旨書與會則，預定於八月十二日舉行創會式，同時接受文化協會幹部指導，進行青年會的籌組工作。當局認為台北青年會的成立「顯然是以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宣傳為目的」，於是拘留翁澤生等人加以偵訊，並於八月十一日以台北青年會「恐有誤導青年前途之虞」的理由，依照治安警察法，禁止台北青年會的結社。

台北青年會被禁止結社後，翁澤生等主要會員先是在蔣渭水、王敏川等指導下，聲稱「除提高體育之外別無他意」而組織了台北青年體育會，在文化協會讀報社內設置事務所，仍舊在連溫卿、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幹部指導下進行活動。與此同時，翁澤生等同時籌組以台北青年會宗旨之一的「會員的敦睦，互相研究切磋」為目的的台北青年讀書會，並於九月廿五日完成該會組織。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認為，「本質上，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乃是承襲台北青年會的組織，其初期尚在文化協會左翼的思想影響下，團體的活動中心以社會思想的研究討論為主，爾後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漸增。當時，內地的狀態亦是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尚未有明顯的分別，因此，在本島受到其影響的這些團體亦缺乏明顯的色彩。只是一面進行理論鬥爭，一面進行共同運動。」它們的主要實踐活動包括：購讀《前進》及《無產者新聞》，計畫舉辦列寧追悼會，計畫

^⑤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頁三六、五三一五五、五八一六一。

^⑥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頁一三一一三三。

五一勞動節示威運動，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推展反對始政紀念日運動等等。^⑦

「台灣通信」所揭露的打破陋習演講會，也是這些所謂台北「無產青年」們的實踐活動之一。

因此，張梗與莊泗川在「台灣通信」的「編輯按語」中極力呼籲：

有血有淚的人們，讀了這兩篇台灣通信，難道還能不猛醒奮進嗎？

最後，他們還在「附記」中強調：「以後台灣如發生特殊事情，將由我們全體學生擔任宣傳的專責，但我們只不過是一介學生而已，能力有限，冀求台廈各位同志盡力賜予支援。」

但是，後來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卻由於學生離散與情勢變遷而變得有名無實。先前和中國方面的學生聯合會發生關聯而共同活動的部分成員，一九二五年後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取得聯絡，在明顯的共產主義影響下，顯有策動東山再起的活動，但並沒有進展到確立組織的地步，便消失無形了。^⑧

《共鳴》雜誌的主持人莊泗川在二〇〇二年接受訪談時說，他在初進大學時因為參加了全校師生為紀念「五·九國恥」而發動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罷課遊行而被日本偵探照了相，於是倉卒的逃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學。^⑨

至於張梗，日本警察的檔案並沒有他後來的行蹤紀錄，我們只能從「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由於學生離散與情勢變遷而變得有名無實」的記載，據而猜測張梗有很大的可能是離開了閩南吧！

黑色青年或是新文協的左傾青年

根據同樣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檔案所載，所謂「無產青年」團體，自一九二三年左右在本島各地抬頭，並成為本島無政府主義運動母體。它認為，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始於東京留學生因民族覺醒而結成的台灣青年會，在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熱的勃興過程中受到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諸團體及其刊物的影響，逐漸顯出抬頭的機運，並和東京及中國的各無政府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團體聯絡而發展起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島內知識青年在東京黑色青年聯盟成員之一的小澤一指導之下，組織了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整合散布全島的無產青年團體（文化協會系的左翼青年），謀求運動的發展。

為了宣傳黑色青年聯盟，與全島無政府主義者聯絡，擴大黑色青年聯盟以及無產青年會的組織；黑色青年聯盟成員王萬得、周和成、黃白成枝做了一次全島演講旅行。……十二月五日，他們三人夜宿嘉義；翌日（六日）到北港，集合該地文協系青年演講，並分發《告青年》、《革命的研究》等小

^⑦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頁一三三—一三三；第二冊：政治運動，頁三六、五三—五五、五八—六一。

^⑧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頁一三一、一三三。

^⑨ 前引許雪姬、黃美滋〈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頁一三四。

冊子；八日晚上，在朴子進行戶外演講；九日，在東石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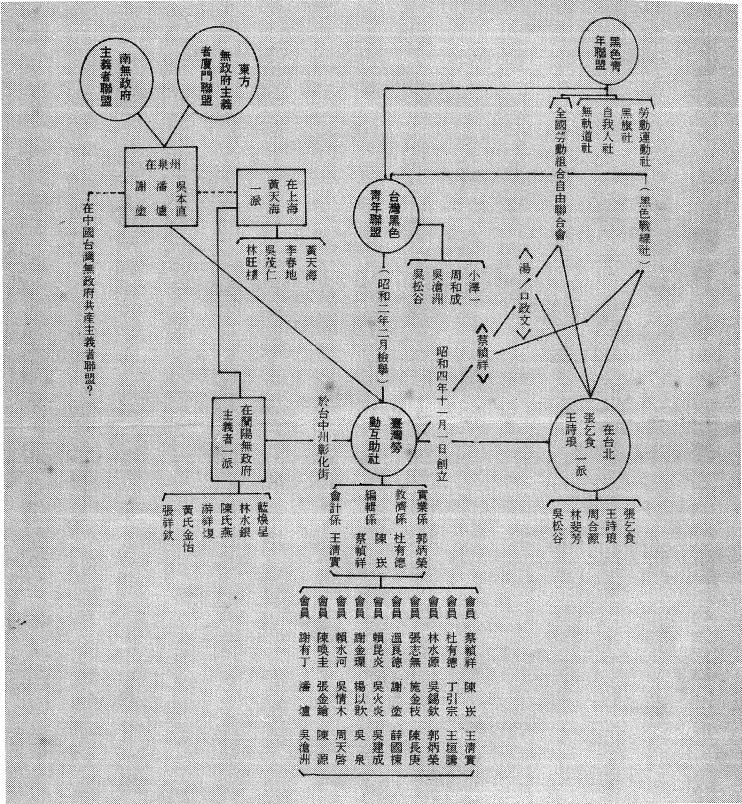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王萬得、蔡孝乾等人在彰化倡組「台灣無產青年會」，張棟和《共鳴》雜誌另一主持人莊泗川也被推舉為嘉義地方的負責人。

二月一日起，一連十幾天，日警當局突然在台北、通霄、苑裡、彰化、大肚、嘉義、鳳山等地全面檢舉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逮捕了四十四名有關人員，其中「豫審請求者」包括張棟在內的二十一名；同年十月廿九日，豫審終結，張棟等十七人判決「豫審免訴」，其他王詩琅等四人於隔年二月公判。^⑩

這裡，根據張再添先生所說「大哥叫張棟，沒讀到書，以駛牛車為業」的說法，我們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張梗的大哥張棟不太可能就是這個參與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張棟。但是，在日據時期無政府主義乃至其他思想運動系譜上，我們既未曾見過也不曾聽過有一個名叫「張棟」的人物。那麼，「張棟」究竟會是誰呢？

首先，張再添先生回憶說：「我正要上公學校的時候，二哥曾經從廈門回來；我記得，他還買了一籃荔枝。」這點，可以說明張志忠在那段期間應該是在台灣的。這樣，基於地緣以及與台北青年會的人脈關係，他應該參與了這幾場嘉義地區的演講活動。

其次，根據張梗和莊泗川曾經在閩南《共鳴》雜誌共事的關係，我們大可認為和莊泗川一起被「台灣無產青年會」推舉為嘉義地方負責人的「張棟」，應該就是張梗。只是因為手民誤植，或張梗



日本警察繪製的台灣無政府主義團體關係圖

¹⁰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四冊：無政府主義運動，頁一、十八—廿一；《台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一號（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頁三。

故意以大哥之名活動，於是就出現了這個需要解釋的檔案紀錄。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說，就在閩南地區台灣學生的反日運動處於低潮的那段期間，張志忠一度回到台灣，並在故鄉嘉義地區從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運動。

然而，日本警察的檔案紀錄與事件當事人的說法還是有所出入的。

根據莊泗川晚年接受訪談時的說法，他並沒有參加台北的「黑色聯盟」。他說，他是「在上海大學唸書時」，通過「以前台灣同學的關係」，「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屬於分裂後的左傾的新文協）；他說，「我們都是一群熱愛中國的知識分子」。一九二五年，他參加抗議「五卅慘案」的遊行演講之後逃回台灣，然後為了「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邀了兩、三個文化協會的同志」，在嘉義地區，「每晚到處演講」。結果就被懷疑參加台北的「黑色聯盟」而被捕，並「被關了十一個月」後才「無罪釋放」。^⑪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張梗也可能和莊泗川一樣，並沒有參加「台灣無產青年會」，而是那群「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的「熱愛中國的知識分子」之一吧！

研究共產主義理論

一九二七年，無論是台灣島內、祖國大陸或是殖民母國日本的政治經濟形勢都有巨大的變動。在日本，三月有金融大恐慌。在祖國大陸，四月十一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在台灣島內，年初，文化協會因為「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路線不同而演變為左右分裂，以解放台灣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為目的的左派取得領導權。台灣共產黨也隨之登上歷史舞台。四月十一月，日共渡邊政之輔（一八九九—一九二八）由莫斯科帶回「台灣建黨」指令及佐野學（一八九二—一九五三）的「日共台灣民族支部」政治綱領，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工作進入實踐階段。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共遭到檢舉破壞。儘管如此，四月十五日，台共還是在中共的協助下，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在上海成立。^⑫

一九二九年年底，具有中共與台共黨員身分的上海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台共候補中央委員、上海駐在員、中國共產黨聯絡員），為了在全中國的台灣學生間廣泛地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特別派遣幹部侯朝宗（劉啟光）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詹以昌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學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這樣，閩南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又再度集結起來，開展潑辣的反帝運動。

張梗也在此時回到閩南，並參加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檔案記載：

廈門地方的留集台灣學生會（集美學校）、同文台灣學生會，漳州的留漳台灣學生會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陳新春……等人的指導，以及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聯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朝鮮人學生之擴大組織為契機，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以學生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樸、王溪森等人為中

^⑪ 前引許雪姬、黃美滋〈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頁一三九—一四一。

^⑫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頁十、十三、三五四、三五九—三六三、三七二—三七三。

心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六月九日，在廈門中學的禮堂祕密舉行成立儀式。……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

閩南學生聯合會自創立以來極重視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各地開研究會致力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研究。……一九三〇年九月，利用每週的星期六下午，在董文霖（集美中學學生）的住處，由侯朝宗主持，講解楊明山（蔡孝乾）著的《新興經濟學》及《進化論》。會員有董文霖、張梗、王燈財、王天強……等人。……十一月，擁護霧社番人暴動蜂起運動後，又在廈門集美學校英語教師中國人陳天弼的居室，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會員分成陳天弼的班（包括：侯朝宗、王燈財、董文霖、張梗、王天強……等）與集美學校學寮的班，大家集合後由侯朝宗指導研究。^⑯

詹以昌（一九〇七），彰化永靖人；一九二七年九月，藉著去廈門南普陀佛學研究院深造為名，從台灣來到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大陸解放後易名為曾明如的詹以昌老先生，在天津家裡為我口述了這段歷史的親身證言：

我到集美師範學校（原師範部）就讀之前，集美已有旅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此時已不怎麼活動。所以，我和同校的施懷清、王溪森、莊松林、王文德（飛龍）等台灣同學為了籌組留集台灣學生會而常在一起。

施懷清的父親施至善先生是文化協會的前輩，住在漳州，蔡孝乾來漳州就住施家。一九二八年秋，通過施懷清的介紹，我認識了潘欽信（中共廈門市委委員）。那時，他化名為黃仲川、潘文川，與謝玉葉在鷓江小學當教員。不久，我就知道他是共產黨，但一直要到一九三一年「台共事件」發生，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潘欽信。他到集美以後，就有意識地培養王溪森和我為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在還沒有到集美之前，我雖已具有初步的民族主義愛國思想，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是一片空白；通過潘欽信的刻意幫助和教導，我才慢慢認識到：在中國的革命問題上，共產黨是正確、進步的；蔣介石則是錯誤、反動的。

當時，除了潘欽信之外，廈門、漳州一帶還有許伯哲（許乃河）、陳新春、盧丙丁（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等許多台灣抗日革命青年在活動。他們都非常關心集美的學生會，常常分別到集美找我們做工作。

留集台灣學生會成員大多繼承旅集台灣同鄉會的成員，起初包括左、中、右各派學生，但隨著反日鬥爭運動的展開，右傾的學生就漸漸脫離，不再參加活動，僅剩下中間派和左派，最後由左派取得主導權。

一九二九年初，我利用集美學校放寒假期間，前往上海，報考暨南大學高師部。通過潘欽信的事前安排，我在暨南大學台灣學生的宿舍，跟翁澤生同志談話數小時。因為暨大高師部該季不招生，不久，我又返回廈門集美。

經過翁澤生的啟發後，我的思想覺悟有所提高，於是比以前更積極地從事學生會的工作。當

^⑯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頁十、十三、三五四、三五九—三六三、三七二—三七三。

時，在集美的台灣學生盛極一時；因為一股祖國熱而來集美求學、或暫住再他往的台灣青年學生很多，如：在台中一中中途輟學前來的曹炯樸（改名曹鴻跳）；集美師範學校校長張燦特別為他們開辦補習班。我記得，王燈財、董文霖和張梗……等人都曾入學集美師範學校補習班。後來，有些人轉入集美中學校，有的則轉入廈門中華中學、雙十商業或漳州八中。

日本警察的檔案資料與詹以昌的口述證言雖然略有不同，但，我們至少釐清了楊揚遺書中所提劉啟光（侯朝宗）與張志忠（張梗）在廈門的交往情形。

回台重建台灣共產黨

根據當時曾經與張梗共同研究社會科學的王燈財的口述證言，張梗在理論的學習之後又更進一步地展開了實際的革命行動。

王燈財，原籍台中豐原，王溪森的胞弟，當時也是集美中學學生。

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大陸解放後易名為王碧光的王燈財老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受採訪時告訴我說：

一九三一年，以台共黨員趙港被捕的三月二十四日為始，日本當局針對台共黨員展開了全面性的檢舉，謝雪紅、王萬得、潘欽信、蘇新等領導幹部陸續被捕；台共組織遭到全面破壞。為了重建台共組織，翁澤生於五月份從上海來到廈門。他指派同時具有共青團與中國革命互濟會（赤色救援國際的中國支部）身分的我，在廈門負責訓練台灣青年，準備日後回台，重建台共黨組與共青團組織。

就在這段期間，從集美中學校轉到漳州八中就讀的張梗來廈門找我。張梗來到廈門以後就跟我住在一起。他向我表示想要回台參加實際工作的心願，並且強調他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回去。後來，我就安排他，通過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並經由我的介紹，加入共青團（CY）。當時，廈門的共青團負責人是董文霖。

後來，我考慮到，張梗的年紀比一般學生大，又有回台工作的決心，於是讓他「升大學」（入黨），並參加（中共）廈門市委黨的訓練班。當我把張梗的情況跟翁澤生報告時，翁澤生很高興，並在親自同他談話後，決定派他回台，重建台共黨組。張梗回台後，隨即寫了一封信給我，向組織報平安。我於是把信交給黨組織，再由組織轉交給在上海的翁澤生。以後，翁澤生就另外安排他跟張梗的聯絡。

王燈財老先生所說的共青團，原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也就是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誕生一〇四週年紀念日，正式在廣州成立，並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青年團；是中國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助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改組青年團，使之成為更為廣泛的群眾性抗日救國組織；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重新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九五七年五月再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至今。另外，中國革命互濟會，原稱中國濟難會，是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群眾性救濟組織，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由共產黨人惲代英、沈澤民、張聞天聯合各界名流楊杏佛、鄭振鐸、于右任等共同發起成立於上海，主要任務是通過宣傳、募捐等各種方法，救濟那些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迫害或被捕入獄的革命者、愛國者及其家屬，總會設於上海，部分省市設有分會；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改稱中國革命互濟會，由於受到王明（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原名陳紹禹）「左」傾錯誤的影響，遭到反動派嚴重破壞；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遷往蘇區後停止活動。

被捕與脫逃的傳奇

據日本警察廳檔案所載，張梗回台以後便因為受到「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檢舉事件的牽連而被捕。

一九三一年四月，翁澤生、林木順等人提議將上海台灣青年團改稱為「旅滬台灣反帝青年同盟」——通稱為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自成立到被檢舉只不過歷時三個月。其間，有機關報《反帝報》的出刊，針對第二霧社事件的鬥爭，六·一七台灣施政紀念日鬥爭，六·二三沙市慘案紀念鬥爭等積極地展開活動。

與此同時，作為九·一八事變序曲的「萬寶山事件」爆發了。

四月，東北長春縣長、農稻田公司經理、漢奸郝永德將萬寶山地區生熟荒地三千五百畝轉租給朝鮮農民耕種。五月，郝永德未經立案擅自引朝鮮農民入境，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開溝挖渠，引伊通河灌溉土地，毀掉土地四百餘畝，並建水堰橫阻伊通河，致使上游低地被淹沒。七月一日，中國農民在向當局提出抗議無效的情況下，憤而毀壩、填溝、驅逐朝鮮農民。日本領事館派日警鎮壓中國農民，打死打傷數十人。日本政府利用種種手段激化中朝人民矛盾，在日本和朝鮮報紙上發表大量歪曲事實的文章。七月三日起，朝鮮仁川、漢城、平壤等地相繼發生排華事件，中國僑民在朝鮮死一百多人，傷三百多人。日本政府藉此大造侵華輿論。

七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指導各大眾團體，針對萬寶山事件，於上海日本電信局附近舉行聯合示威活動。在示威運動中，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盟員陳炳譽與董文霖兩人因分發傳單被租借工部局警察檢舉，調查結果判明為台灣籍民而引渡到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署。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署調查發現，他們已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的指導下成立了上海台灣反帝同盟。九月十四日，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署逮捕了大夏大學台籍學生高水生，然後將本案移送台灣總督府。九月十四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根據上海領事館的搜查內容，並參考以往的內偵事項，一齊檢舉了當時歸返台灣的與本案有關的王溪森等十三人。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搜查告一段落。關係者達六十三名，三十名附有罪意見移送，其餘三十三名滯留上海等地未遭檢舉，附上中止意見後送交檢察局。張梗也隨著後來的逮捕行動，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被移送檢察局……。

但是，張梗後來卻在「保釋中逃走」了。¹⁴

¹⁴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頁三三一、三三四、三五〇、三八一。

1. 老同志的「假自首」說

關於張梗的被捕與逃走，有幾種傳奇的說法，至今仍留傳在他的故鄉新港與老同志之間。首先，當年介紹張梗加入共青團的王碧光老先生認為，張梗之所以能在「保釋中逃走」，是因為他辦了「假自首」的緣故！

王碧光老先生審慎的推測說：

如果他是真自首的話，他和我的關係應該會暴露才對。但是，事實是，他只暴露廈門的台灣學生運動，黨的身分都沒暴露。在這次大逮捕中，翁澤生跟我哥哥王溪森也同時被捕；張梗還跟我哥哥王溪森關同房。我後來聽我哥哥說，公判時，張梗與翁澤生及趙清雲（農民運動領袖趙港之弟）三人一起。當我哥哥被起訴「猶疑（緩刑）三年」回到押房時，張梗還對他說：「很便宜！很方便！」

一直要到後來，我把翁澤生派張梗回台重建黨組織的事告訴我哥哥時，他才知道張梗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個人認為，當時人不在台灣的王碧光老先生以「假自首」來推測張梗之所以能在「保釋中逃走」，應該是合理的政治判斷。

2. 新港鄉民耳聞、目睹的傳奇

當時的新港鄉民耳聞、目睹了張梗在「保釋中逃走」的傳奇。

首先，那個自稱「常聽老輩講起」張梗事蹟的林玉鏡在前引張炎憲等採訪紀錄的《嘉雲平野二三八》中是這樣說的：

他回台灣後開始發動共產主義的活動，被日本政府抓到，判他死刑，在台中監獄時，他就在身上塗屎，使皮膚發爛，裝瘋。日本人見他意識不清，不能執行死刑，就叫保正陳麗川先生去帶他回家，陳麗川是老醫生。……張梗被帶回來後，他母親為他脫衣服要洗時，他打他媽媽；走到街上，看到豬屎、牛屎就捧起來吃。日本當局派一個警部來監視他，看到這情形都大為吃驚。回新港後，他都是帶著草席到處睡，有一次三、四天都看不到他的人，他母親才去找保正說：「麗川仔！麗川仔！我們阿梗三、四天沒看到人呢！」保正才趕快報告駐所（警察派出所）。日本的通緝網是很嚴密的，網一撒下去很難逃得過，但他卻逃過了，沒被抓到。原來他已跑到大陸好幾天了。後來有風聲傳來說他當共產黨的少將。【頁二七〇】

其次，新港鄉民鄭坤霖也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一日脫稿的題為〈此生死而無悔的張志忠〉的未刊稿中寫下他目睹的情景：

日治時代，張梗接受層峰指派，回返台灣本島，從事共產思想傳播扎根工作，事跡不密在外地被捕。於獄中張梗開始裝瘋，常鬧得同牢囚犯的精神不寧，日本政府束手無策，特將張梗遣送回本鄉張梗原居地，責令巡查與壯丁輪流看管監視。張梗每常跑到距離他家不遠處的舊學校（今新港農會），這片舊教室的地面上狂癱嘯亂，叱腰叱陸（台語），兩眼的眼珠宛如患狂犬病的猶狗目（台語），有時蹲在地下喃喃自語，有時臥流嘴涎波，有時袒臥比手畫腳，親人熟人一概不認得。

舊學校在張梗未遣送回來之前，我有數次跟先父前去看搭台上的相撲演習。有一天，我跟先父再度到達舊學校，遠遠望去，見到張梗蹲在地面上做著狂態動作。走廊上的通巷口有四五個人在議論，其中一名婦女竟說出張梗是假瘋，另一人走近張梗身邊要跟張梗玩把戲，只見該名男子取起自轉車車輪框的廢鐵線，做勢要刺張梗的眼珠，張梗的兩眼直視未稍眨眼一下。這名男子放下鐵線的當兒，張梗抓起地面上的狗屎、雞屎膏往他自己嘴內嚼吞。

約在此刻，先父帶我緩步走近他的面前。先父與他是同期同學，在此之前，他們才開過一次同窗會，由先父做主催者（發起人），張梗曾來家裡與先父坐談。怎料到，這時候的張梗完全將先父當作陌生人。……

張梗的狂癱嘯亂難倒日本政府，鄉親亦為其憐憫，大為歎息！日警巡查與壯丁見其狂亂喪失心神，約近十日間稍為鬆懈監視。後來，基隆海關查獲一封張梗從天津寄發的報平安的家書，報請警視廳會同台南州嘉義郡警部派員前來新巷瞭解，證實張梗失蹤……。

不管是耳聞抑或目睹張梗「裝瘋」的情景，新港鄉民林玉鏡與鄭坤霖都聽說，張梗後來就逃到海峽對岸的祖國大陸去了。

新港鄉民陳天送在《嘉雲平野二二八》收錄的口述證言也說：

張梗偷渡到中國大陸後，日本人抓他媽媽在街上跪，說張梗去大陸的路費是她提供的。【頁二三一】

3. 弟弟與妻子的說法

關於上述流傳於新港鄉間的種種傳說，張梗的弟弟張再添先生不置可否地說：「我以前就聽別人說過，二哥被日本警察抓去後，因為精神分裂而假釋出來。可我那時候年紀還小，詳細的究竟，也很清楚。我只記得，一段時間後，他就突然失蹤了。因為這樣，我媽還經常被叫去刑問，吃了很多苦。後來，他從青島寫過幾封信回家報平安。好笑的是，每次，信還沒送到家，日本警察就已經來我家等候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某日，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在向江蘇南通的父母稟報她與楊春霖（張志忠當時的化名）的結婚日期的家書中，順帶提到了張梗當年逃離台灣偷渡大陸以後的行蹤：

春霖……當年離家，從日本逃往大連，大連至青島，處於日本警察監視之下，是九死一生。十年未和家中通訊，他母親逢年過節都哭哭啼啼紀念他，全家以為他被祕密處死，……。

從抗大到劉伯承部

新港鄉民林玉鏡後來會聽到張梗「當共產黨的少將」的「風聲」，即便是「以訛傳訛」，也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張志忠被捕後，台北《中央日報》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頭版所刊〈破獲四匪首簡歷〉中提到，張志忠「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年）加入十八集團軍」。

一九五四年四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的調查局內部「機密」資料——郭乾輝的《台共叛亂史》則說：

張梗，日據時代化名為鹿某，後在中共匪區改名為張志忠，曾在抗大受訓，並在劉伯承部工作過。【頁五七】

這裡，我們有必要就上述兩份官方資料所指涉的歷史背景做一定的理解。

1. 十八集團軍

首先，台北《中央日報》所指的「十八集團軍」，其實就是簡稱「八路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為蘆溝橋事變發表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七月十日，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增兵。

七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中國國民黨，要求立即公布。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表明中國已到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周恩來等人再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

八月六日，南京政府召開國防會議。紅軍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及國民黨各省軍政長官出席會議。會議決定「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國防方針。¹⁵

¹⁵解力夫《抗日戰爭實錄——抗日戰爭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八九八—八九九。

至此，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八月廿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的命令。

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軍委根據國共兩黨所達成的協議，發布命令，將駐陝甘寧邊區的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和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劉伯承的一二九師為其中之一）。

九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按照抗戰的戰鬥序列改稱八路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朱德、彭德懷改稱正、副總司令。以後仍習慣稱八路軍。

也就在八月廿二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間，八路軍主力先後東渡黃河、挺進華北前線；而後，八路軍以主力於日軍的側翼和後方積極作戰，一部兵力則分散發動群眾，著手創建抗日根據地，並陸續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和山東民主根據地。^⑯

2. 抗大

其次，所謂「抗大」，是「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簡稱。

一九三一年秋，中國共產黨首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紅軍學校」，培養營團級以上幹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央紅軍學校改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

一九三六年六月，「長征」陝北後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又於瓦窯堡改名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

學」。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在延安；林彪任校長兼政委，副校長劉伯承；學員以從部隊抽調的幹部為主，並招收從全國各地到延安的愛國知識青年。

毛澤東親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他和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共領導人都曾親自到抗大講課。學員的學習內容包括馬列主義基礎理論、中國革命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爭和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和軍事常識等；特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此外，抗大採用啟發式、研究式和實驗式的教學方法，要求理論聯繫實際，邊學習、邊戰鬥、邊生產。

隨著抗日戰爭發展的需要，抗戰八年期間，抗大先後在晉冀魯豫、晉察冀、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創辦了十二所分校，一共培養了十幾萬紅軍各級軍政領導幹部。^⑰

^⑯ 劉和平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三二三。

^⑰ 袁競主編《毛澤東著作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五五五—五五七。

3. 劉伯承部

劉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開縣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一九一三年，參加四川討袁軍。一九一四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十二月，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一九二七年八月，參加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後，赴蘇聯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一九三〇年回國，歷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長江局軍委書記、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軍委總參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參加創建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⑯

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幹事

根據多方的調查，抗戰期間，張志忠應該是在「劉伯承部」的冀南軍區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八路軍一二九師東進縱隊進軍冀南。五月，該師主力進入冀南，建立冀南抗日根據地，控制範圍以南宮為中心，西起平漢鐵路，東至津浦鐵路，北起滄石公路，南跨漳河、衛河。八月一日，冀南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一八九七—一九八三）和東進縱隊政委宋任窮（一九〇九—一〇〇五）分任正副主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冀南軍區成立，宋任窮任司令員，轄五個軍分區。^⑰

歷經多年的尋訪之後，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我終於通過台籍左翼前輩吳克泰先生的協助，在北京採訪了原籍大連的前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張茂林先生，初步理解了可能是張志忠在大陸的行蹤。

解放後改名為張有軒的張茂林先生告訴我說：「當時，八路軍一二九師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魯豫四個軍區。冀南軍區成立後不久，有一個延安抗大畢業，化名張光熙的台灣青年，從延安來到冀南軍區，擔任敵工部日軍工作科幹事。印象中，他的身材較一般人高，長臉，膚色較黑。他的話不多，是個正派人物；但他向我談過，他從台灣回到大陸時，因為與組織失去聯繫，曾經四處流浪過一段時日。」

通過張茂林先生的介紹，兩天後，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十日，我又在北京採訪了當年曾經與張光熙在冀南軍區實際共事的黃景深先生。黃景深在寓所接受訪問時回憶說：「一九四二年，我在冀南軍區教導隊第四隊。因為在分區的敵工科工作的關係，我和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幹事張光熙經常有業務聯繫。當年，我才十七歲。我記得，張光熙看起來大概是三十幾歲，他曾經告訴我，他是台灣人。抗戰勝利後，他要離開時，也曾向我透露，他將經由香港回去台灣……。」

^⑯ 前引袁競主編《毛澤東著作大辭典》，頁四三一。

^⑰ 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委會《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二刷），頁五四一六三。

問題是，張光熙是否就是張志忠呢？

針對這點，我和吳克泰先生一直在不同的面向分別做了反覆的核實工作，一直到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吳克泰先生才在致筆者的信函中做了肯定的判斷：「戰後，我曾經跟張志忠密切來往。所以，從張茂林和黃景深描述的內容來看，我認為，張光熙不但有極大的可能，而且無疑就是張志忠。」

如果張光熙的確就是張志忠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根據上述國民黨的有限資料，以及季漢所云張志忠「當年離家，從日本逃往大連，大連至青島」的事實，大膽推測張志忠當年的腳蹤：

一九三九年，在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加入十八集團軍」，然後前往劉伯承擔任副校長的延安抗大，接受專業的軍政訓練，再前往「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擔任幹事。

在華日人的反戰組織及中共中央對待日軍俘虜的政策

為了理解張志忠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擔任幹事時期的具體工作，我們有必要先瞭解在華日人的反戰歷史及中共中央對待日軍俘虜的政策。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川合貞吉等人在上海成立日中鬥爭同盟，拉開了日本人民在中國展開反對日軍侵華活動的序幕。

一九三七年：

九月五日，東方弱小民族聯盟駐滬支社發表〈告日本士兵書〉，號召進攻上海的日軍士兵，反對

侵華戰爭。

九月廿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告日本海陸空軍宣言〉，號召日本士兵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部。²⁰

十月廿五日，八路軍總指揮部發布了關於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命令要求：

- 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
- 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
- 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
- 四、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²¹

同日，毛澤東在回答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訪談時，再度闡明中共優待日本戰俘、瓦解敵軍的政策。²²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抗戰政治工作綱領》小冊子刊載了周恩來的〈抗戰軍隊的政治工作〉一

²⁰ 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頁四四七—四四八。

²¹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三六年五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頁三六三。

²² 前引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頁三一一三一。

文；他在「抗戰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與內容」一節指出：

對敵軍的工作，也應當進行：

- 一、經常地對敵軍宣傳煽動，抓住敵軍中每一個可能利用的機會，使敵軍瓦解和潰散，因而減弱敵人的戰鬥力量。
- 二、在火線上，即在戰鬥中，也要進行對敵軍的喊話或散放傳單，使敵軍動搖。
- 三、應當極力禁止虐待俘虜，經過優待、教育、解釋後，立即把他們放回去。²⁴

五月廿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時再度指出：

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行之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²⁵

針對對敵軍工作的問題，張志忠所屬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也具體指出：

與敵打政治戰，就是要瓦解敵人，促其反戰。敵人進行的是侵略戰爭，是非正義之師，內部存在著許多問題，有虐待士兵，思念家鄉，厭倦打仗等等。抓俘虜是件好事。如果我們能把他教育好，感化過來，那麼，他們回去後，就能替我們做有力的宣傳，而這種宣傳是我們力不能及的。

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共產黨的力量足以使他們改造成新人。²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紀念日那天，在華日人在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野戰總部，召開了「日軍士兵覺醒聯盟」成立大會，成為在華日本人反戰組織之一。它的宗旨是：呼喚廣大日軍士兵覺醒，起來反對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反對做日本軍閥、財閥的砲灰，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壞和平與侵略中國的本質和罪惡。學習馬列主義，學習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寶貴革命經驗，研究日本革命問題。號召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來，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在中共的各個抗日根據地都設有支部。²⁷

日本反戰士兵秋山良照的回憶

可以想像，一九三九年從延安抗大來到冀南軍區，擔任敵工部日軍工作科幹事的張志忠就是遵從這樣的指導原則，認真而積極地進行著對敵軍的統戰工作。

²³ 《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二刷），頁九八—九九。

²⁴ 《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七月），頁四七九。

²⁵ 楊國宇〈放下武器，就是兄弟〉；前引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頁三三。

²⁶ 小林清《在華日人反戰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一一。

黃景深先生說：「當時，敵工科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對日軍、偽軍和友軍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通常，一天要行軍八十里以上，一個月往往跨了好幾個縣。在敵工部，只有我和張光熙兩人懂日文。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張茂林說：『他的業務能力較強，個性頑強，不怕困苦，曾經帶領日軍俘虜秋山良照，冒險靠近敵人的碉堡下，從事對敵宣傳喊話。』」

除了口述證言之外，結束採訪的同時，張茂林先生還提供給我日本反戰士兵秋山良照所寫的〈西瓜與燒餅〉與〈冀南平原〉日文資料。透過這兩篇當年曾經與張光熙（張志忠）實際接觸過的日本俘虜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從側面大致瞭解當年張志忠在冀南平原從事對敵統一戰線的實際工作情形。

根據秋山良照的自述，他原是被派去大陸戰場參戰的日軍士兵，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山東省堂邑縣大李莊與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新編七旅二〇團作戰中成為八路軍的俘虜。

秋山良照的回憶文章〈西瓜與燒餅〉寫道：

在八路軍的俘虜生活中，我跟張茂林和張光熙等會日語的人學習到列寧的國家論、唯物史觀（史的唯物論）、社會發展史、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共產黨宣言等許多理論。可是當時我並沒有全盤接受。因為，那時候，我還經常擔心著會不會被利用，而對八路軍的待遇保持警戒和懷疑。

但是，隨著跟八路軍的相處愈久，秋山良照也逐漸在實際的生活體驗中，因為被八路軍的行為感動而徹底覺醒。

有一天，秋山良照碰到一個被他的槍打落耳朵的年輕傷兵。

「我並不恨你！」這名傷兵跟秋山良照說：「因為，我知道真正發動戰爭的是日本軍閥。我希望能夠和你做朋友……。」

面對這名八路軍傷兵豁達的態度，秋山良照卻實在無法理解那名傷兵的心情了。他於是向張茂林和張光熙提出內心的疑問。

秋山良照寫道：

兩位張先生就耐心地詳細向我說明。他們說，日本軍方用各種藉口在中國發動戰爭，然後告訴你們說是中國「排日」或「抗日」。然而，日本軍在中國的各種蹂躪，換個立場的話，日本人一定也受不了！其實，日本人民跟日本軍方有別，你們也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所說的話終於使我瞭解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

這樣，經過張茂林和張光熙長期而細緻的工作，當了六個月的俘虜之後，秋山良照的感情心結和思想疑問也一個一個地解開了。因為這樣，他對理論的學習也就更加主動而積極了。

秋山良照說：

因為當時沒有日語教材，所以在學習的時候，我就一邊發問一邊拚命作筆記；後來我也把〈共產黨宣言〉全文翻譯成日文，提供其他被俘日軍來學習。^{②7}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日軍在華北加緊推行「肅正建設計畫」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分割封鎖各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為打擊日軍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以影響全國抗戰形勢，八路軍以一百零五個團約四十萬人的兵力，在人民群眾的配合下，以正太鐵路為重點，同時向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鐵路線上的日軍及沿線兩側據點發動攻擊。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部署下，一二九師參加了這場著名的「百團大戰」。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秋山良照與水原健次、成楊鬼彥三人在八路軍冀南軍區發起、組織了「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冀南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不久，支部盟員就增添了七位同志。他們在秋山良照領導下，積極展開了反戰工作；組織發展很快，到同年十月，支部盟員已達廿四名。^{②7}

就在一九四一年，秋山良照也因為在冀南平原反戰工作的出色表現，被冀南地區人民選為地區參議員，直接參與了中國的政權工作。

一九四二年，日軍對八路軍先前發動的百團大戰展開報復行動。

四月廿九日早晨，在中國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的侵華日軍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集中大量日本陸軍、空軍，對冀南軍區部隊「大掃蕩」。在戰鬥的生死關頭，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的盟員們不但毫不動搖地經住了槍林彈雨的考驗，而且在戰鬥中以編寫、印刷、散發傳單，刷寫反戰標語，到敵軍碉堡前喊話，或在電話裡和日軍士兵談話等等多種形式，展開反戰活動。

八月七日，覺醒聯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給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發來了祝賀

電報，高度肯定他們在反戰宣傳上的重大貢獻：

在这一年裡，你們在冀南前線，協助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宣傳活動，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奮鬥……

八月十一日，《解放日報》報導：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盟員能夠根據當地日軍內部的一些具體情況，及時編寫、印刷日文宣傳品，向日軍進行宣傳。在對日軍宣傳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這是其他支部所不及的。特別是支部書記秋山良照，能畫善寫。他寫的文章經常能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因為這樣，他接到的日本士兵的來信，竟累積有一尺多高。

正因為秋山良照在冀南日軍士兵中有很高的威信，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水原部隊）曾下令通緝秋山良照，並以連升兩級作為懸賞。

覺醒聯盟冀南支部還組織了劇團，排演秋山良照編寫的話劇《活路》。《活路》表現了日本人民被軍閥政府殘酷壓迫和剝削的情況，以及日本士兵在戰地痛苦的生活。透過觀賞戲劇演出，邊區的中

^{②7} 吉積清等編《反戰士兵的故事》（新日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九月第一版），頁五〇、五一及五四。馮守娥女士代為中譯，謹此致謝。

^{②8} 前引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頁四七。小林清《在華日人反戰史話》，頁一七。

國軍民對日本勞苦大眾有了比較具體的瞭解與同情，同時也讓盟員自身受到了教育。²⁹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劉伯承在太行《新華日報》發表〈勉國際友人〉一文，熱情讚揚秋山良照就是其中一個優秀的國際友人的代表。

時間又過了近半個世紀後的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次出版的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委會編寫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對秋山良照領導的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做出了這樣高度的評價：

這些日俘經教育後成為與八路軍並肩戰鬥的積極分子，他們反戰情緒很高，工作積極，教八路軍戰士使用日本造的武器、刺殺、打棒球，在敵軍工作訓練班擔任教員，用日本流行歌曲填寫反戰歌詞，製作日文反戰宣傳品，還自編自演反戰話劇，出版反戰刊物，向日軍據點散發傳單、電話、打電話，有的還直接參加對日偽軍作戰。【頁二六五—二六六】

秋山良照自己則在近三十年前的一九六三年，藉著題為〈冀南平原〉的回憶文章充滿感情地寫道：

我在反戰同盟（覺醒聯盟）冀南支部所做的工作是：在牆上刷寫反戰標語，印寫並散發傳單，到敵軍碉堡前喊話，或用電話和日軍士兵談話等等。這些工作都是在張茂林和張光熙【張志忠】……等許多中國同志的幫助下進行的。³⁰

抗戰勝利後從大陸返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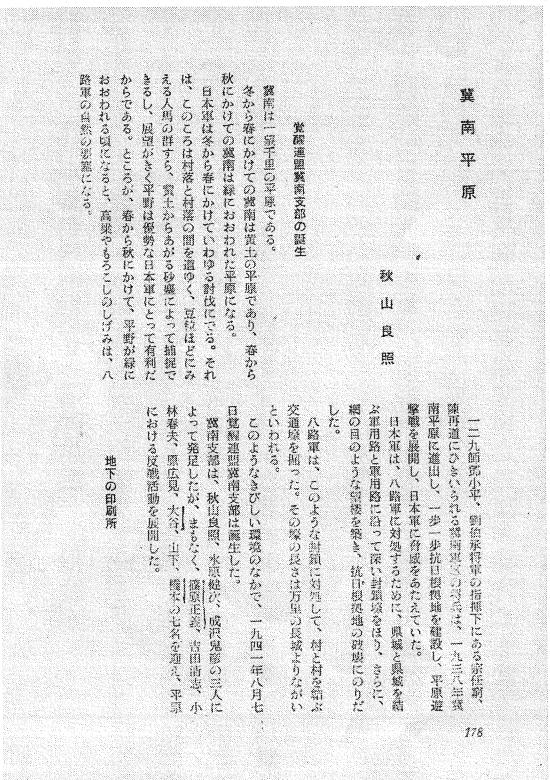
種種口述證言、官方

檔案與鄉里傳說都確切地指出：抗戰勝利後，張志忠又從大陸回到台灣。

如同一九三一年台共大

檢舉以後，這次，張志忠仍然銜負著回台建黨的重任。

然而，由於地下工作的要求，張志忠回台以後的行蹤一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因為這樣，時隔多年之



秋山良照的回憶文章〈冀南平原〉。

²⁹ 前引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頁四八—五〇；小林清《在華日人反戰史話》，頁一七一一八。
³⁰ 前引吉積清等編《反戰士兵的故事》，頁一八五。馮守娥女士代為中譯，謹此致謝。

後，關於張志忠返台的時間，不管是官方情治單位的檔案、或是相關歷史人物的口述證言，乃至於新港鄉民的傳說，仍然「莫衷一是」而顯得撲朔迷離。

1. 新港鄉民流傳的「道聽途說」

多年以後，在家鄉新港，人們對張志忠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道聽途說」的程度。

首先，在《嘉雲平野二二八》中，那個以前任職警察機關的林玉鏡說：

戰爭結束後，新港人都知道這人【張志忠】以前是【日本】政府要抓的人，跑去大陸，都認為他回來會做大官。我們當時也不知道什麼國民黨或共產黨。戰後經過一段時間他才回來，沒讓人知道他回來。〔頁二七〇—二七二〕

另外，鄉民鄭坤霖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一日的〈此生死而無悔的張志忠〉寫道：

終戰後，張志忠以中國軍人將校身分回鄉，大興村的何石池曾與他過從，據何石池說：他與張志忠同往訪東興米工廠尋林清泉的時候，曾瞥見張志忠皮包裡有國際貿易通行匯票。

新港鄉民的傳說顯然距離事實很遠，可它也再次說明張志忠的傳奇性。

2. 關於返台時間的幾種說法

在沒有任何直接紀錄可查的情況下，那些曾經與張志忠接觸的歷史人物的證言，不管是口述紀錄抑或文字回憶，就是值得我們從側面理解張志忠返台建黨活動的參考史料了。

就目前所見的官方檔案、口述證言與傳說，關於張志忠的返台建黨，時間最早的應是謝雪紅的愛人同志楊克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五日起在北京起筆的回憶錄所寫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31〕

在楊克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說之後，就是當時擔任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醫師所說的「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設法送張志忠等人回台工作」。〔32〕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九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2）審三字第十九十八號判決書根據張志忠被捕後的「口供」的記載與李偉光醫師的自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間與自首匪謀分子蔡孝乾由匪華東局城工部派來台灣」。

〔31〕 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整理出版，二〇〇五年二月廿八日初版），頁二四一。

〔32〕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下）〉（北京：《台聲》雜誌，總第廿八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頁四五。

一九五九年四月，國家安全局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的記載則是「一九四六年四月」。

當時曾經跟張志忠密切來往，並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由張志忠親自吸收入黨的吳克泰認為，張志忠進入台灣的時間應該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左右。^{③3}

另外，在「宗派」上屬於謝雪紅、楊克煌系統的古瑞雲在回憶錄中先後提到：張志忠「和蔡孝乾同時回到家鄉」及「一九四六年帶著中共使命回家鄉」。^{③4}

因此，在不能證明張志忠返台的確切時間的情況下，我們只有透過兼聽各種說法來認識張志忠的建黨活動了。由於古瑞雲和張志忠並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他的說法也就比較沒有參考的價值，因此就不必多費筆墨來討論了。

就張志忠返台的時間而言，上述五種說法裡頭，除了楊克煌的回憶之外，大體上是一致的。如果楊克煌的說法確是事實的話，那麼，其他說法的確實性就有它的問題了。反之亦然。

問題是，楊克煌的回憶為什麼會與包括張志忠自己在內的說法不同呢？我們能夠因為這樣而懷疑楊克煌回憶錄所言的真實性嗎？

如果楊克煌的回憶的確與事實不符的話，那麼，我們應該還要進一步探究：楊克煌為何會出現這種錯誤？僅僅是因為年代久遠而記憶有誤嗎？還是另有原因呢？

除非楊克煌的回憶確是事實，否則，就我個人對這段歷史的理解，我很難認為楊克煌的回憶僅僅是因為年代久遠而記憶有誤的。

例如，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在提到舊台共王萬得時還特別用充滿情緒的字眼加注寫道：

謝！三十多年來你決意要活到看王萬得的最後結果，現在還不知道，你怎麼就死了呢？【頁二四八】

如果不瞭解日據時期老台共內部的宗派矛盾，以及一九四九年後流亡大陸的台共黨人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內部的政治恩怨，我們恐怕很難理解：為什麼兩個想要改造舊世界的共產黨人之間竟然會有這種「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

恰恰是這種無法徹底自我改造的個人恩怨，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為什麼楊克煌的回憶錄之所以在張志忠返台建黨的時間上會出現與眾不同的說法的問題癥結吧！

然而，因為那是一段日據以來台共黨人之間夾纏不清的宗派恩怨，也不是三五千字的篇幅就可以說得清楚的，這裡就暫且不再細說了。

讓我們還是把故事的焦點回到主角張志忠的身上吧！

^{③3}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初版二刷），頁二四七。

^{③4} 古瑞雲《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初版），頁三五、五三。

關於張志忠與謝雪紅的初步接觸

為了判讀楊克煌所寫有關張志忠與謝雪紅初步接觸時間的準確性，首先，我們得先大致瞭解楊克煌的背景，以及他和謝雪紅在張志忠來訪之前的重要活動。

根據楊克煌《我的回憶》的附錄「楊克煌生平重要記事」所載：楊克煌（一九〇八—一九七八），台灣彰化人；彰化第一公學校、台中商業學校畢業；一九二九年進入謝雪紅主持的國際書局工作，從此與謝雪紅結下一生的「革命情緣」；同年五月加入台灣共產黨；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因「台共事件」被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判處三年徒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出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因為空襲，搬進頭汴坑避難。【頁三五三—三四】

楊克煌的回憶錄寫道：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他和謝雪紅離開頭汴坑山區。八月十八日，他們出來台中，隨即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台中地區的抗日老同志謝富、林兌、李喬松等，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八月廿五日前後，他們起草了〈告台灣青年書〉，宣稱：「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已告結束，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將在台灣施政。台灣人民將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如果今後我們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們還要進行鬥爭。」然後油印十份，寄給各地朋友。

八月底或九月初，老台共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樑材】和工人群眾阿忠【王忠賢】，以及農民組合幹部陳王癸等人，分別從台北和高雄來到台中，與謝雪紅、楊克煌、謝富等人開會，討論如何開展群眾運動的問題，醞釀組織一個群眾團體。

九月初，謝雪紅與楊克煌召集了包括楊達在內的台中群眾一、三十人，提出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構想；儘管楊達「提出不同的意見」，會後，謝雪紅、楊克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人隨即分頭向群眾進行宣傳，並招募會員。

九月二十日下午，台灣人民協會會員六、七十人在台中女中集會，會中宣布成立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以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為宗旨。

九月三十日上午，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為了擴大宣傳以爭取更多的會員，於台中座（台中戲院）舉行講演會，控訴日寇法西斯獨裁統治，號召人民群眾爭取民主政治，並將台灣人民協會的存在公開出去。

十月五日下午，台灣人民協會召開成立大會，一、兩百名會員出席；會上通過了〈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宣言〉和〈台灣人民協會章程〉，並選舉了謝雪紅、楊克煌、林兌、謝富、李喬松、王天強等十一、二名中央委員。

十月六日上午，台灣人民協會召開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上推選林兌為委員長，謝富為組織部部長，楊克煌為教育部部長，李喬松為宣傳部部長。【頁二三一二九】

大約在十月十日，台灣人民協會教育部負責編印的機關刊物《人民公報》開始發行。

十月十九日晚上，台灣人民協會舉行了以原台灣農民組合為中心的抗日烈士追悼會。

十月二十日上午，台灣「農民協會」在台灣人民協會會址舉行成立大會，宣稱將「繼承農民組合革命傳統」；與此同時，「台灣總工會籌備會」也在人民協會會址成立了。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駐台日軍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頁二二五—二六】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台灣人民協會台北市支部在台北成立；謝雪紅和楊克煌都在大會發表演談話活動」並按照規定辦法「重新登記」。

十一月十九日，台灣人民協會中央委員會決定：人民協會提出重新登記，不管批准不批准；同時成立一個「善後委員會」，繼續進行活動；《人民公報》停刊。【頁二三三—二三六】

十二月下旬，就在台灣人民協會的核心成員認為「公開合法的鬥爭已不可能，決定開展祕密非合法的鬥爭」之時，張志忠來找謝雪紅了。【頁二三八、二四一】

關於張志忠與謝雪紅初次接觸的具體情況，楊克煌的《我的回憶》繼續寫道：

張說他是最近才由大陸回台灣的；他聽了謝雪紅談我們【台灣人民協會】在終戰【這應該不是楊克煌的原始用詞】後的一些活動後，就回去了。

當時，謝雪紅對那些來訪者的政治面目還不瞭解的人，即叫我迴避，不要參加談話；所以，第一次之後，張志中【忠】再來過一、兩次，我也都沒有參加他和謝的談話。

我們當時急著要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人接觸，當時對有幾個由大陸回來找謝雪紅的人，我

們都反來覆去地分析他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

一九四六年元月間，張志中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我們的情況已基本瞭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我們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中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且在互相瞭解政治身分後，張志中來找謝雪紅時，我大都在場參加談話了。

這時，謝也把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樸材】、楊克村等介紹給張志中。……

台南的陳雲錦也是在這個時候被介紹給張志中的。【頁二四一—二四二】

張志忠透過誰的介紹來找謝雪紅？

楊克煌的回憶透露了許多中共系統的台籍共產黨人與原日共系統的台籍共產黨人在光復初期初步接觸時的祕辛，但是，他沒有交代的是：張志忠究竟是透過誰的介紹來找謝雪紅的？

關於這點，《吳克泰回憶錄》從另一個側面提供了幫助我們瞭解歷史真相的說法：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張志忠首先進入台灣。他首先去員林永靖找王天強，然後到台北找林樸才【材】，到中南部跑了一趟又一趟，開展地下黨的組建工作。據王天強說，他曾領張志忠去找了謝雪紅。……

王天強和張志忠（原名張梗）都是陳嘉庚辦的廈門集美學校的同學，也都曾是共青團員。本

來要被派去莫斯科留學，但打住了。因為王天強出發前先回台灣度暑假，卻因上海台灣人反帝同盟案被捕被判刑，以致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廿九日張志忠因同案被捕。【頁二三八、二四一、二四七】

二四八】

看，吳克泰所寫「王天強領張志忠去找謝雪紅」，應該是合理的說法。問題是，事實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楊克煌為什麼不提呢？是不知道？還是刻意的？

楊克煌的回憶所引起的有關張志忠確切的返台時間的問題關鍵恐怕就在這裡吧！

當然，楊克煌的《我的回憶》也不是完全沒有提到王天強和張志忠的關係的。

楊克煌寫道：

一九四六年元月間，大肚鄉溪仔兄來告訴我們說，他於去年十一月間被通知去南部某地參加一次會議，會議的主持人是劉啟光，參加者有張行【日據時期農民組合幹部】、王天強等。劉啟光在會上說：「你們不要搞農民協會，只要來組織『農會』，按照國民黨人民團體組織法做，就能夠掌握供應農民的化學肥料的銷售權。」與會者有些人就動搖了，跟劉啟光去了。【頁二四〇】

楊克煌認為，劉啟光「當時是軍統的一個小頭目」。因為有這樣一段「不點名」的伏筆，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於是就接著展開了這段有關張志忠對王天強看法的描述：

又有一天張志中【忠】来找謝雪紅時，談到王天強的問題；這時，謝雪紅提到王天強曾去參加劉啟光召開的會，和劉有勾搭的情況，張吃了一驚，說：「糟了，你早一點說就好了，我已經去找過王天強了，……。」張志中說他是在上海時和王天強一起因反帝國同盟事件被捕過的；出獄後，王即到大陸參加革命，在新四軍工作過，曾任新四軍的團長；終戰後在蘇北某地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成員中有蔡【孝】乾、張志中、洪幼樵（汕頭人）。張說因這個關係，不久前他到永靖去找過王天強。他又說：「那不要緊，我們暫且不要一下子同他切斷關係，應慢慢地同他疏遠，……。」【頁二四二—二四三】

楊克煌的這段回憶裡頭所轉述張志忠的話的黑體字是筆者刻意處理的。就內容而言，它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說是「出獄後，張即到大陸參加革命……」，那還說得通；再者，不論是當時的張志忠或是寫回憶錄當時的楊克煌應該都不會使用「終戰」這樣的名詞吧！由於楊克煌的這份遺稿是由他在台灣的女兒整理出版的，我們很有理由認為它是「手民誤植」而出現的錯誤吧！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這種小地方的差錯；問題的關鍵在於張志忠，或者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乃至於謝雪紅是否就這樣「慢慢地同王天強疏遠」了。

事實顯然又不是這樣！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的：

首先，根據《吳克泰回憶錄》所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二、二八後流亡上海的吳克泰被台灣地下黨調回台灣之後，經由組織安排潛入中部農村員林王天強家住下，跟隨當時身分是「台中縣工委書記」的王天強，領導農民，按國民黨早已提倡的「三七五減租」的辦法，提出減租要求，進行合法鬥爭，向鄉裡的地主交涉。【頁三九】

其次，根據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所屬台海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台盟史略編委會編《臺盟史略》一書所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流亡的謝雪紅、楊克煌和蘇新等人「徵得台灣島內中共地下黨的同意，並得到大陸的台灣籍革命人士李偉光等同志的支持」於香港正式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王天強與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等五人作為民主黨派之一的台盟正式代表，一起參加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十月，台盟總部成立理事會，謝雪紅為主席，楊克煌為秘書長，王天強又為四名理事之一。

一九五七年六月，台盟福建省支部籌委會成立，王天強任主任委員。

一九五九年四月，王天強為台盟推薦的八名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之一。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文化大革命期間，王天強在台盟福建省主委任內病逝。【頁三、九、十二、廿五、廿八、卅七】

根據楊克煌《我的回憶》所述，就在王天強病逝七個月後的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謝雪紅也病逝北京。然後，從十一月廿五日起，他開始「一點、一點」寫謝雪紅和他的歷史。【頁三五六、三】

如果王天強的上述經歷就是楊克煌筆下張志忠說的「應慢慢地同他疏遠」，恐怕是沒有人會相信

的吧！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懷疑楊克煌有關王天強與張志忠的關係的敘述是「別有用心」的吧！

再者，就張志忠返台的時間而言，如果吳克泰轉述的王天強的說法是正確的話，楊克煌的回憶就是錯誤的了。那麼，如果以應該是根據張志忠口供而筆錄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九日（42）審三字第九十八號判決書的記載——「卅五年三月間與自首匪諜分子蔡孝乾由匪華東局城工部派來台灣」為準的話，王天強的說法就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的吧！同樣的邏輯只能說，楊克煌的回憶如果不是因為年代久遠而記憶有誤的話，恐怕就有不為人知的用意了吧！

問題恐怕還是牽涉到楊克煌與謝雪紅在台盟內部的「宗派問題」吧！而這又不得不聯繫到日據時期老台共內部沒有解決的「宗派」分歧。

日據時期台共產生的背景與因素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產生的背景與因素，歷來有幾種大致相同的說法。

首先，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輯出版的內部機密資料——《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的第三章「共產主義運動」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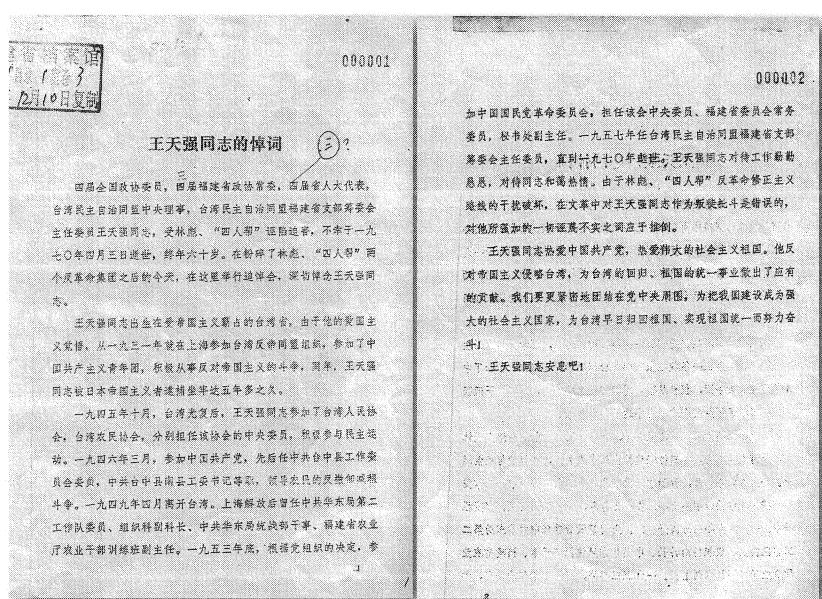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一年前後，共產主義運動是通過兩種途徑「侵入」殖民地台灣的。其一是在東京與日本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的東京留學生，其二是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與吸收的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這些以東京及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為中心的留學生、知識分子的左傾運動，逐漸影響到島內；隨著島內農民運動在台灣農民組合領導下的急遽發展，以及台北、彰化無產青年派奪取了文化協

㊂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頁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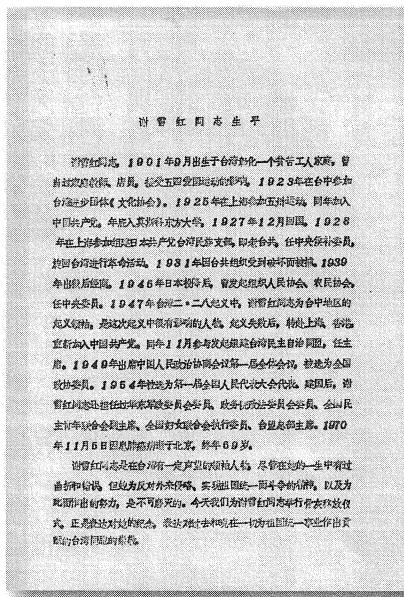
會的領導權，共產主義對島內社會運動戰線的影響逐漸擴大，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終於在上海成立。^⑤

其次，一九五四年四月，調查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郭乾輝【郭華倫】執筆，「限於中上級保防幹部參考研究之用，應編號保存，列入交代」的內部「機密」保防參考叢書之一的《台共叛亂史》，把日據時期台共產生的背景與因素歸納為下列幾點：

- (一) 由於台胞歷次從事反抗異族的武裝鬥爭，在民族運動的迭次遭受失敗後，一部分的激烈分子，開始摸索對於革命道路之新的嘗試，而不知不覺中墮入匪共的歧途。
- (二) 台灣同胞在反抗異族欺凌與壓迫之下，發生爭取民族的獨立運動，在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過程中，由於政治的認識與社會階層基礎的不同，發生革命形式的分歧，因此在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基礎上，分裂為穩健派、急進派、民族主義派、國際主義派等類別，因而有台共的孕育。
- (三) 由於國內五四運動後的影響，在「反帝」「反封建」與提倡「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之下，反抗現實政治的意識與面對舊教條挑戰的勇氣，油然倍增。加以各種新思潮新學說如春雨，洪流激蕩，給予台灣同胞激昂的民族意識與急於要求革命的熱潮，刺激很深。在這



王天強檔案。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謝雪紅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儀式上正式印發的〈生平〉簡介。

種偏激的革命熱情之下，附有煽惑性與報復性的馬克思學說，自很易為急進的分子所接受而走上蹈空炫奇，自取敗亡之路。

(四) 如果說，台共產生的背景與因素，在歷史的根源上是出於內發的，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其在社會的基礎上，外鑠的成分絕不亞於內發的力量。而事實上，歷史與社會的發展，是無法機械地予以劃分何者為內發，何者為外鑠，這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台共產生的背景與因素亦可作如是觀。【頁卅六】

另外，二二八事件後被迫流亡祖國大陸的老台共蘇新（一九〇七—一九八一）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開始撰寫的題為〈台灣共產黨的歷史〉的未完成的遺稿中，也針對台灣共產黨成立的歷史背景強調指出：「台灣共產黨的成立、發展以至消亡，始終與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民的殘酷統治和台灣人民的頑強反抗連在一起的。」但是，也因為它在組織上的「三不像」，他同時認為：「台灣共產黨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到三〇年代初，在台灣出現的怪物。」

蘇新關於台共的「三不像」論的具體說法是這樣的：

第一，它成立時，是作為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叫「台灣民族支部」），組織上（名義上）屬於日共，但是，日共從來就沒有有效地領導過它。

第二，它成立後，由於日共遭到大破壞（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分別叫做「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台共與日共的關係被切斷，因此，台共的領導

機構，不得不通過台胞的中共黨員（翁澤生等），求助於中共中央。因此，台共雖然與中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領導。

第三，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人到台灣，召開台灣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台共就名義上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的支部，但是，實際上是透過中共中央，接受東方局的領導的，因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是瞿秋白，第三國際東方局負責人也是瞿秋白。

總之，台灣共產黨，成立當時是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的影響較大。說它是日共的一個支部，不像；說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不像；說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⑥

一句話，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儘管在實際的組成工作上多由當時在上海的中共協助，但在第三國際「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上，先是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其後又在名義上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

^⑥ 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初版一刷），頁一二八—一三〇。

老台共內部的分歧與解決

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後，一共召開過七次代表大會，領導過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為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而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各國內部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複雜變化，原有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鬥爭需要，經各國共產黨一致同意，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宣告解散。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

在這樣的客觀局勢下，按理，原先在組織上「三不像」，而且早已在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之後徹底被破壞的日據時期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即便要在舊有的組織基礎上重建的話，應該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共組織的一部分吧！

然而，客觀道理上如此，個別的人的主觀意願上卻不一定如此！因此，台灣光復、回歸中國後，如何解決日據時期老台共因為所謂「改革同盟派」與「謝雪紅派」的分裂而造成的內部分歧以及舊台共與中共的組織關係，恐怕就是中共要在台灣建立黨組織時首先要處理的棘手的歷史問題吧！

我們不妨先從第三者的側面觀察來切入問題。

1. 重慶《大公報》記者李純青的考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一個重霧輕寒的早晨，三架美國運輸機從重慶九龍坡起飛，中途在上海稍停，下午五時抵達台北松山機場。三架運輸機運載了到台灣接受日本投降的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還有由重慶各報社派出的首批記者。重慶《大公報》記者李純青也因為與台灣的關係，參加了這次採訪。

李純青（一九〇八—一九九〇），台北人，出生於福建省安溪縣，福建、台灣兩地都有家；祖父、伯父、叔父和父親都是台灣籍，家住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町朝東街。一家三代做茶葉生意。他因為不願做日本臣民，拒絕申請台灣籍。

李純青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望台灣》「緒言」寫道：

當年，我在台灣見到各界人士，走在群眾中間，沿西海岸由台北到東港，訪問全島。我也與老台共——即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重要人物，多次接觸。我曾告訴他們：台灣光復了，目前大家興高采烈，但在國民黨統治下，很快地便會失望，從台灣歷史和人民性格推斷，接下去人民將起來反抗。……【頁二一三】

二〇〇二年八月由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吳克泰回憶錄》透露了李純青當年訪台的真正目的：

近年，我才知道，台灣光復之初，周恩來就透過許滌新叫《大公報》的李純青（當時尚未恢復黨籍）去台灣，找過去的老台共及進步人士，說明國民黨的專制腐敗，指出三青團是特務組織，說明我們黨及進步勢力的情況和政策主張。【頁一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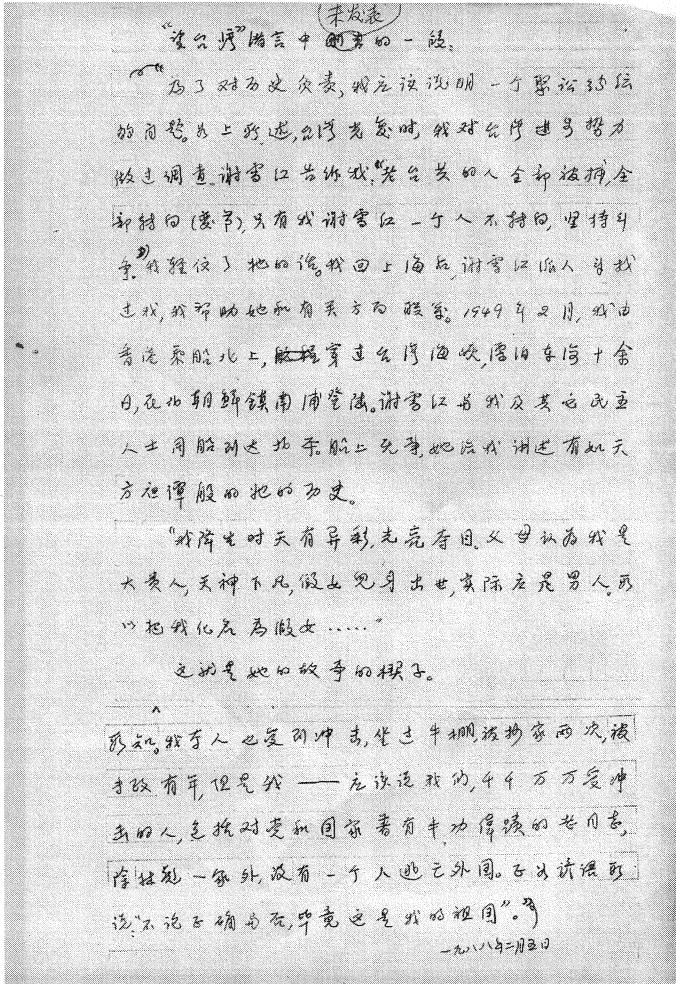
許滌新（一九〇六—一九八八），廣東揭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參與創辦《群眾》週刊和《新華日報》；歷任《群眾》週刊副總編，《新華日報》編委和黨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祕書和經濟組組長。◎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指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李純青在大華酒家見到了謝雪紅和楊克煌：

【李純青】對我們說：「『中央通訊社』的台灣負責人葉明勳到台中來接管原日本人的通訊社。」又對我說：「你可以去爭取安插進去，……；但葉明勳這個人很反動，如知道你的歷史和政治面目，那就不可能進去了。」【頁二三三】

雖然如此，楊克煌並沒有交代：他們還和李純青談到有關日據時期台共人物的歷史問題。是因為年紀大了而遺忘？還是刻意遺忘呢？

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我在北京拜訪了李純青的遺孀談家芳女士。透過她所提供的李純青不曾對外發表的題為〈《望台灣》緒言中未發表的一段〉手稿，我才大概能夠瞭解事情的究竟。



談家芳女士手抄李純青寫於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的「《望台灣》緒言中未發表的一段」，透露了謝雪紅性格的另一面。

李純青在這篇寫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的未刊稿寫道：

我對台灣進步勢力做過調查。

謝雪紅告訴我：「老台共的人全部被捕，全部轉向（變節），只有我謝雪紅一個人不轉向，堅持鬥爭。」

我輕信了她的話。

藉由上述內容來看，光復初期的那趟台灣之行，李純青確實祕密擔負著中共如何看待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人，並據以作為在台灣建立黨組織的調查研究的任務吧！

再者，謝雪紅跟李純青說的是一九三一年台共遭受全面檢舉的歷史。如果謝雪紅的確如李純青所言曾經對他說過只有她「不轉向，堅持鬥爭」的話，那就說明謝雪紅有意欺騙李純青。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謝雪紅刻意這樣說顯然是有不為人知的特別用意吧！

至少，張志忠的看法就與她不同。《吳克泰回憶錄》在不同的地方分別轉述了張志忠同他說過的對老台共領導人物的評價：

老台共裡面最優秀、最堅強的是翁澤生，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轉向」【投降】，日寇在他病危時才放他出來，很可惜沒有幾天就去世了。

劉啟光【原名侯朝宗，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幹部】，這個人很壞。他跑到大陸後投降

國民黨，當了軍統特務，曾被派去延安進抗大，後被我們發覺，被驅逐。他回台後擔任新竹縣縣長，正在蒐集台灣革命烈士名單，把老台共的人都稱為「黑色聯盟」【無政府主義者】，其實是在調查日據時期進步人士的家屬及其周圍群眾的動靜。【頁一五八】

【他】也談到蘇新，說他很聰明，文章寫得不錯，也談到王萬得，說他很熱情。但蘇、王兩位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還不能吸收入黨。什麼原因我沒有問，……老台共時期的內部分歧，當時我還不知道。【頁一六六】

2. 謝雪紅是否信任張志忠？

透過李純青訪台之行與謝雪紅談話的內容，以及吳克泰轉述張志忠對老台共領導人物的評價來看，我們就不難想像，張志忠返台當初，那些日據時期的老台共應該也是他最早接觸的對象。那麼，如何解決老台共內部的歷史分歧，應該就是擔負著建黨任務的他首先要解決的歷史包袱吧！尤其困難的是，他該如何處理謝雪紅這個資歷比他還久的老台共創黨人之一呢？

這裡，我們只能不再追究張志忠返台的確切時間，暫且就以耳聞眼見的史料為根據，按照編年順序，逐步拼湊張志忠返台建黨的歷史輪廓了。

首先，《吳克泰回憶錄》轉引的王天強的說法提到了一個最最關鍵的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是這樣說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在原人民協會的地址正式開會，出席者有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樸材】、謝富、王天強等。

會上討論後決定：

1. 由於當時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均不瞭解，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
2. 全體出席者分別去吸收籌備會成員；
3. 筹備會的任務是：為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打下一個基礎；
4. 不成立領導機構，指定謝雪紅作對中共方面和各成員的聯繫；
5. 如有必要時，可加入國民黨以作掩護。【頁二三八】

一九四六年元月間，張志中【忠】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我們的情況已基本瞭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我們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中商量，聽取他的意見……【頁二四一】

五月初，張志中來找謝雪紅和我，說為了向我們證實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本人的身分，要我們派一個人去上海正式取得介紹。張問我派誰去適當，謝雪紅和我商量後決定派楊來傳去，張即赴台北打發楊來傳出發去了。【頁二四八】

針對此事，《吳克泰回憶錄》批判地寫道：

謝雪紅在一九四六年初就醞釀並組織了建黨籌備會（成員後來發展到數十名，還在觀音山的寺院開過會），要求集體加入中共；謝雪紅並不信任張志忠。無奈，張志忠只好到上海聽候華東局的決定。謝雪紅則派了台北市郊的老農民楊來傳由謝爽秋（赴台時負有如同光復之初李純青的任務）帶路去上海找華東局。楊來傳曾在李純青家住了一段時間。【頁一六四】

謝爽秋是通過張志忠的介紹而和謝雪紅、楊克煌接觸的。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

大約在【一九四六年】元月下旬，張志中【忠】告訴謝雪紅，謝爽秋最近要由上海來台灣，張說：「謝爽秋是黨員，多年來在【軍統】《掃蕩報》社工作，現在上海《新聞報》社工作。他來台北時，妳先和他見一面，談談話。」

不久，林良才【樸材】來通知謝雪紅去台北，謝即時赴台北（這次我沒有同她去。）有一天晚上，謝雪紅在林良才永樂町的新集益商行和謝爽秋見面，互相談了一些情況後，謝爽秋說這次他

帶來了一批書，主要的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但他對謝說：「因為你是做公開工作的，身邊帶這些書危險。」就沒有把書給謝。【頁二四四—二四五】

3. 「華東局」與台灣地下黨的組織關係

這裡，我們有必要先釐清「華東局」與台灣地下黨的組織關係。

關於這點，前述調查局編印的《台共叛亂史》指出：

中共華東局並派劉曉常川駐滬，建有華東局對台聯絡站，專門負責聯繫的工作。【頁四六】

劉曉（一九〇八—一九八八），湖南辰溪人。一九二六年，考入上海國立政治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到達陝北。一九三七年到上海，恢復和重建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上海地下黨的祕密工作，進行長達十二年的地下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華東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組織部長。^{③8}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原籍湖北漢陽的前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幹部張執一（一九二一—一九八三），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的《革命史資料》第五輯，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回憶文章寫道：

一九四六年初，劉曉同志奉黨中央之命從延安出發，經華中解放區回到上海，上海地下黨的工作改由劉曉同志負責主持，……華東局【成立後】，不久，蔣介石部隊重點進攻蘇北解放區，該地為適應戰爭需要，精簡機構，……為了集中和加強領導，劉曉電華東局，建議把華中分局全部工作關係交給上海局。經華東局同意，……在上海局領導下，設有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乾（又名蔡前）……。^{③9}

李偉光醫師的自述〈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也提到：蔡孝乾在返台之前曾經「介紹張執一（解放後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和我聯繫。從此，張執一直領導我在上海的地下黨工作。」

【頁四五】

與李偉光和張執一之間的組織關係分析說：

「據我所知，當年許多從大陸回台灣的人，都是透過上海台灣同鄉會的安排而和島內的地下黨連上線的。所以，在蔡孝乾把李偉光介紹給張執一聯繫以後，上海台灣同鄉會事實上就是中共華東局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間的聯絡站。」

^{③8} 前引劉和平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典》，頁八七一。

^{③9} 轉引《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之三》（香港：阿爾泰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七八、八五、八六。

對此，前述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檔案也這樣記載說：

共匪在上海以「台灣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為其對台工作之「交通聯絡站負責人」，解決匪徒食宿交通等問題；……切合祕密工作之原則。【頁十七—十八】

因此，吳克泰有關上海台灣同鄉會是中共華東局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間的聯絡站的分析，應該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吧。

4. 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張志忠的身分證實了

釐清了中共華東局與台灣地下黨的組織關係之後，我們接著來看看謝雪紅指派的楊來傳去上海找華東局求證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志忠身分的具體情況。對此，楊克煌的《我的回憶》隻字未提；《吳克泰回憶錄》卻透露說：「楊來傳曾在李純青家住了一段時間」。【頁一六四】

關於李純青的身分，張執一的回憶文章指出：李純青從台灣回到上海以後，於一九四六年入黨，在他擔任書記的上海局文化委員會領導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對上海新聞界和台灣上層人士開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頁八九】

李純青寫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的前述未刊稿也透露：「我回上海後，謝雪紅派人來找過我，我

幫助他和有關方面聯繫。……」

那麼，李純青所說的「他」應該就是楊克煌和吳克泰所說的「楊來傳」吧！而所謂的「有關方面」指的也就是「張執一」吧！

《吳克泰回憶錄》進一步寫道：

華東局把楊來傳和張志忠召集在一起，聽了楊來傳的來意後指示，張志忠就是中共台灣省工委的代表，你們回去後要聽張志忠的安排，建黨籌備會要解散，黨章規定不能集體入黨，只能個別審查、個別吸收。【頁一六四】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繼續憶寫了楊來傳回台以後的情況：

六月中旬，張志中【忠】再到台中告訴我們說：楊來傳已由上海回來了，並通知我們最近要在台北召開一個「聯席會議」，因謝雪紅目標大不要去參加，叫我去參加。於是，我於六月十六日就上台北去了。

六月十七日下午，在台北廖瑞發家（在城內，原是日本人的住家），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台工委的僅張志中一人，代表籌備會的有楊克煌（我）、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樸材】四人。

會上楊來傳首先簡單報告他到上海的經過情形，證實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張志中的身分。

然後決定（均由台工委提出的）：

- 「籌備會」即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台工委的領導；
- 籌備會成員今後不再發生組織上的聯繫，但在移交期間，為了移交工作暫可以聯繫；
- 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台工委分別接受之。

會後我立即回台中向謝雪紅匯報。

聯席會議後，張志中再來台中時，我們就向他介紹謝富、林XX、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壠等人，由張直接去同他們聯繫。不久，張來說已先吸收謝富和蔡伯壠為黨員了。

這時，張志中對我們說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因此要我們和做祕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他又說有可能安插黨員進去台灣的中、下層偽政權機關，說這工作很重要；他給我們介紹台南新豐區區長李義成就是黨員，另有一個區長（名字我忘了）也是黨員。【頁二四九—二五〇】

5. 謝雪紅仍然遲遲沒有寫自傳

總之，通過上海之行，張志忠基本上向謝雪紅一派的人證實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他的身分；經過返台以後的「台工委」和以謝雪紅為首的所謂「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張志忠也基本上解決了日據以來老台共內部的組織關係的分歧問題。儘管如此，謝雪紅卻還是「遲遲沒有

寫自傳」。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寫道：

九月間【應該是十二月五日】，臺南新豐區下發生大地震，……

不久，張志中【忠】叫我們提出自傳。

於是，我寫了不到兩張紙很簡單的自傳，由謝雪紅交給張志中，因當時我已在《和平日報》工作，白天上班碰不到張志中。

當時謝雪紅遲遲沒有寫自傳的原因是：

1. 謝認為寫自傳很危險，她曾對張志中說：『我寫自傳給你，你每天東奔西跑，萬一有什麼差錯，那豈不是完了。』
2. 謝以為自己的歷史寫起來很長，現在沒有這個環境（她只有一間房間，接待人均在此房間），也沒有時間寫（因經常有人來找她）。
3. 謝認為張志中看過她寫的《她的半生記》，又把它帶走了，這比自傳更詳細了。
4. 謝不願意她的筆跡讓人家看到。【頁二五一—二五二】

吳克泰對謝雪紅拒寫自傳的作風顯然是非常不以為然的。他在回憶錄中批判地質疑說：

謝雪紅說，在地下狀態下寫自傳有危險，所以不寫自傳，可是與她形影不離的楊克煌卻寫了自

傳，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入黨。據李偉光說，謝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初】去香港之前才寫了自傳，由李偉光當介紹人，送了上去（到了香港後才得到批准）。在上海寫自傳同樣有危險，那麼她在台灣時不寫，而到了上海就寫了，實在令人費解。【頁二三四—二三五】

就謝雪紅遲遲不寫自傳的內容來看，無論是吳克泰或楊克煌的回憶，兩造的說法，除了「原因」之外，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對此，曾經跟謝雪紅一起在二·二八戰鬥過，後來分別在五〇年代與七〇年代兩度入獄的陳明忠先生綜合各種同時代人的看法分析說，謝雪紅之所以遲遲不寫自傳的原因是她堅持黨齡要從一九二五年算起，可張志忠以她在日據時期被捕後有過「轉向」的問題，按照組織規定不能通過。他強調，這點，只要對照後來張志忠吸收簡吉並讓他擔任嘉南縱隊政委的處理方式即可瞭解。

總之，張志忠返台以後基本上解決了日據時期老台共內部分歧所遺留的歷史包袱，為隨後的建黨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對此，前述調查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郭乾輝（郭華倫）執筆的內部「機密」保防參考叢書《台共叛亂史》有關光復以後中共在台灣的組織發展概述，除了時間有待核實之外，大體上已經說明了歷史的事實：

隨著抗戰的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浪潮，使台共從嚴冬的蟄伏中，急速地甦醒過來，積極展開復活的運動。這時，台共的組織系統，已由日共、中共等之多線領導，而變為中共的單線領導。他們利用政府初接收台灣，政治尚未納入正軌的機會，大肆活躍。一面策動外圍組織，成立謝雪紅系統下的台灣人民協會，一面更自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以後，獲得中共的支助與策動，加強其對於台省黨政各部門的滲透；特別是對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文教機關，發展組織的工作，進行得非常快速。因此，在很短的時間以內，便滲透了本省各重要的民眾團體以及一部分新聞事業與出版事業的機構。【頁四四】

楊克煌有關張志忠的其他回憶

我們花了一番心力，就楊克煌回憶所述有關張志忠與謝雪紅初步接觸的說法，加以比較、判讀，無非是為了解決張志忠究竟何時返台建黨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儘管楊克煌的回憶是充滿疑點的，但也並不表示他所述及的有關張志忠的行蹤是完全不可信的。在有關張志忠的資料是如此稀少的客觀限制下，我們不妨暫且不去考慮時間準確與否的問題，繼續看看在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所記下的有關張志忠當年從事地下工作的些許模糊的腳印。

誠如楊克煌前面所說，謝雪紅和他見了張志忠兩三次以後，他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中【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

例如：

張志忠曾經向謝雪紅介紹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主委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友邦的作風正派，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有愛台灣的鄉土觀念，政治傾向是靠攏共產黨的。【頁一四二】

張志忠曾經介紹一個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任職但和地下黨有工作上關係的蔡汝鑫給謝雪紅；蔡汝鑫特地向謝雪紅通報說，有一個特務將會來台中監視她的行動。【頁二四三】

謝雪紅曾經向張志忠表示：她要利用一九二五年在杭州加入國民黨的歷史去申請重新登記，便於模糊政治面目，方便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張志忠回答她說：「去試試看也好，……，但估計他們知道妳的政治歷史，是不會接受妳的，……。」後來，謝雪紅把剛領到的，上面寫著介紹人是陳果夫的國民黨「特別黨員」黨證和資料給張志忠看。張志忠看了以後跟謝雪紅說：「陳果夫是中統的特務頭子之一，妳今後不能去住台北了，如果妳去了，他們會給妳一些任務，妳不去完成它就可能被暗殺。」

【頁二四四、二四七】

謝雪紅曾經向張志忠反映，她在出席台中中、上層人士在大華酒家舉行的歡送某團團長謝懋權的歡送會時，謝懋權瞪著眼睛直望她說：「我們這次回大陸，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滅，……。」讓她有「受到侮辱的感覺」。張志忠聽了以後就勸慰她說：「那不要緊，我們得到了重要的情報，反動派開始從台灣抽掉匪軍回大陸，準備打內戰了，……。妳以後有這樣的機會，就爭取去參加。」

此外，謝雪紅還向張志忠反映：古瑞雲等一批青年想到解放區參加工作；張志忠要她說服他們留在台灣做工作。當謝雪紅又向張志忠反映：李舜雨（李韶東）和師範學校的吳某一定要馬上去解放區時，張志忠就說：「那麼讓他們去碰一碰也好，叫他們到上海台灣同鄉會找李偉光就成了。」【頁二四六】

一九四六年五月，《和平日報》正式創刊。就楊克煌是否進入《和平日報》之事，謝雪紅和楊克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張志忠向他們分析該報的背景與情況之後說：「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他也提醒楊克煌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後來，謝雪紅和楊克煌也介紹了蔡鐵城等一批青年男女直接、間接先後進入《和平日報》工作。【頁二五五—二五六】

因為這樣，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寫道，一九四七年六月初，他和謝雪紅、楊克煌從上海抵達香港。之後，謝雪紅從好的方面評估說：「光復後，幸虧我們很快就和蔡孝乾、張志忠他們取得聯繫，才瞭解國民黨腐敗變質……。」【頁二七八、一八四】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

關於張志忠返台建黨的時間，在楊克煌所說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之後，就是當時擔任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醫師所說的「一九四六年三月」。

李偉光（一八九七—一九五四），原名李應章，生於彰化二林；早年在台灣學醫，是台灣文化協會創始人之一，曾經領導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在蔡子民整理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下）」，他自述說：他於一九三二年一月離開台灣到了廈門；三月，在鼓浪嶼開設神州醫院；四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四年，組織被破壞後逃離廈門，經汕頭、香港，到廣州，最終於年底到了上海，並改名為李偉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英租界勞合路開設診所；年底遷到法租界。一九三七年一月，研究戒鴉片菸的藥品成功，開始作戒菸醫療，並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開設了偉光醫院。抗戰爆發後，團結一批進步的台灣青年同鄉，組織了台灣革命大同盟；不久，

重新找到組織關係。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任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頁四三—四五】

綜合前述各種資料與證言的說法，我個人認為，李偉光醫師的說法的準確度應該是比較高的。如果我們把楊克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說改為「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或「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的話，那麼，楊克煌的回憶所提及的許多關於張志忠與謝雪紅接觸的事蹟，也就有了它在時間邏輯上的合理性。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暫且按照這樣的時間邏輯，試著重建張志忠從大陸返台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的經過。

1. 張志忠見到了蔡孝乾

前面已經說過，一九五九年四月，國家安全局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了台灣光復以後中共在台灣地下黨的組織發展過程：

共匪中央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派【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匪於同年九月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匪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率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頁十二】

根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刊載的中共「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所載：蔡孝乾【一九〇八—一九八二】，又名蔡乾，台灣彰化人，畢業於彰化公學。一九二三年，曾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研讀；一九二五年，在該校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任《台灣大眾時報》社記者。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被選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一九三二年，潛入江西蘇區，擔任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戰士報》編輯。一九三三年，當選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委員。一九三五年，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長。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四〇年，任解放區野戰軍政治部敵工部長。

另據張執一的回憶文章〈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述：

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華中局隨新四軍撤至山東，成為華東局。在華東局領導下，將原山東地區改為山東分局，……。在新四軍原來的地區，即蘇北、安徽、徐州以南，成立了華中分局，……。【頁八五】

前面說過，張志忠所屬的冀南軍區的管轄範圍，北為山東德州至石家莊，東為德州至黃河，西至津浦路；司令部在南宮、威縣一帶。

據此，吳克泰先生在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致筆者的信函中判斷說：

「抗戰期間，冀南軍區是一個鞏固的根據地，也是新四軍與延安之間必經之地。當年，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從蘇北回延安時，經過此地；同理，由延安出來到新四軍的蔡孝乾也必定經過這裡。他把張志忠帶走也是必然的。」

可以想像，就在蔡孝乾接到派令的同時，當時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擔任幹事的張志忠應該也接到了同樣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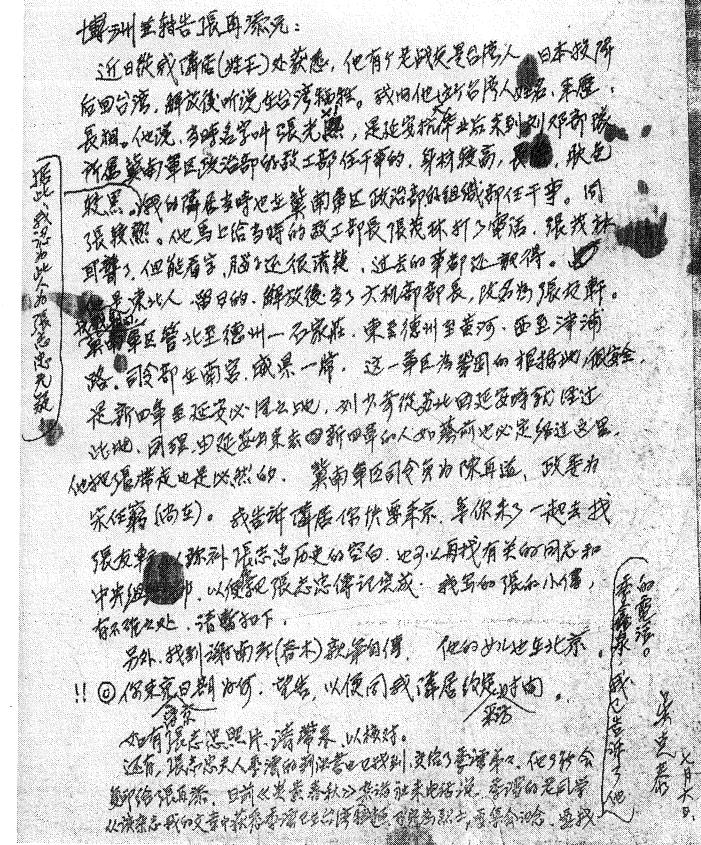
於是，張志忠見到了蔡孝乾。

前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張茂林從側面支持了這種推測的可能性。他回憶說：「一九四三年，我離開冀南軍區，調到太行軍區。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張光熙【張志忠】。一九四五五月，當我調回冀南軍區司令部時，我聽人家說，張光熙已經與蔡前【蔡孝乾】一同派回台灣了。」

張志忠與大他兩歲的蔡孝乾算是老戰友了。

前面提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當蔡孝乾與王萬得等人在彰化倡組台灣無產青年會時，當時年僅十七歲的張志忠就被推舉為嘉義地方負責人。一九三〇年九月，張志忠參加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侯朝宗主持的共產主義理論學習班時，也讀過蔡孝乾以楊明山之名所寫的《新興經濟學》。

這樣，張志忠離開了冀南軍區，經由蘇北，來到上海，然後返回台灣。



吳克泰向筆者確認「張光熙」即為「張志忠」的信函。

2. 張志忠返台的兩種說法

關於張志忠的返台經過也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情況是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醫師口述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下）〉的說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張志忠帶著台灣文協（文化協會）的老朋友蔡乾的介紹信，從新四軍出來，到上海來找我。年底，蔡乾也到了上海。我安排他們兩人住在我【的】療養院，……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設法送張志忠等人回台灣工作，……。【頁四五】

第二種情況是前述安全部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記載：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匪率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匪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首批幹部先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頁十二】

李偉光醫師的自述和安全部機密文件的記載雖然在時間上略有出入，但也不會差距太大。可以確定的是，張志忠應該是在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之間回到台灣的。

另外，根據古瑞雲的《台中的風雷》所載，目前可以知道的是，當時與張志忠同船返台的「首批幹部」，其中一個是嘉義商工專修學校畢業，抗戰時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職的黃文輝。【頁三五】

3. 四月下旬，吳克泰在台北家裡見到了張志忠

除了楊克煌的《我的回憶》之外，親自見到了剛剛回台的張志忠而又留下文字紀錄的就是《吳克泰回憶錄》了。

在回憶錄裡，吳克泰具體交代了自己思想左傾、加入共產黨，以及與張志忠發生組織關係的過程。

吳克泰（一九二五一〇〇四），本名詹世平，生於日據下宜蘭羅東的佃農家庭，經過刻苦勤學，先後進入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與台北高校（今台灣師大）就讀，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為了參加抗戰行列，放棄只唸了一年多的台北高校學業，出走上海，尋找到重慶的路。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考進震旦大學經濟系進修。年底，通過徹夜閱讀在上海的蔣渭水的兒子蔣時欽（一九二〇—一九六八）借給他的《中共二十年史》，系統地認識了中共奮鬥的歷史，也知道了先前聞所未聞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舉，深受感動的同時決心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元旦，他迫不及待地與蔣時欽和另一思想進步的台灣青年周文和（一九二二—一九五三）相約，分頭去找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一起參加共產黨。一直到三月十日左右，他終於透過同班同學介紹，見到當時中共上

海地下黨學委會委員錢李仁，寫了自傳，轉交給上海學委會副書記吳學謙，再上交地下黨上海市工委書記張承宗，最後交由當時在上海的台灣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批准。

後來，周文和經由組織安排，到台灣同鄉會擔任總幹事。吳克泰把台灣的聯絡地址留給錢李仁。後於三月中旬回到台北幸町的家，然後到學籍已經改制為台大醫學院的原台北帝大醫學部念書。為了有更多時間搞社會運動，他隨後又轉到台大校本部原來的文政學部。三月下旬，蔣時欽也回到台北，進入《民報》當記者。因為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他也通過蔣時欽的介紹，到《民報》打工，做校對。然而，他一直掛心的卻是黨什麼時候派人來跟他聯繫呢？大約四月中旬，先後有兩批人到他家來，說是要找「張先生」。他雖然不知道他們所說的「張先生」是什麼人？可他心裡明白，「張先生」應該就是黨派來與他聯繫的人；這些人可能也是來找黨的台灣青年。他於是告訴他們：「張先生還沒有來。」但他心想來聯繫的人就快出現了。【頁一九一一五五】

《吳克泰回憶錄》具體描述了他初見張志忠的情形：

四月下旬某一天晚上，「張先生」終於到我家，並在我家住下。他說，他叫張志忠，從大陸回台灣已有一些時間了，因為去了中南部，所以來晚了。他很嚴明地向我宣布——黨已經批准你入党，再來應當掛黨旗舉行入党宣示儀式，並規定候補期，因為台灣地下黨剛在創建，這些手續都免了。他又說回家去看了家人，大家都喜出望外。他同我談了許多問題，和他經歷過的一些事情。從這些話語裡可以估計他是從新四軍出來的，但我不便問。他還會講流利的日語。父親看見「張先生」很樸實、很正派，也很歡迎。第二天，張志忠讓我帶他去看蔣時欽，我帶他去介紹了

一下就出來了，不知他們談了什麼。下午，張志忠回到家。我同他說，我父親有個好朋友叫李振芳，是老台共的，他很想見我們的人。張志忠同意去見，我便帶他到李振芳家。翌日，張志忠回來說，李振芳不是老台共，是老台共的外圍組織「赤色救援會」的。李很熱情，與他談到夜裡很晚，便留他住了一宵。從此，張志忠常常到我家住，同我保持單線聯繫。【頁一五七】

4. 台灣地下黨的組織正式成立

《吳克泰回憶錄》繼續寫道：

大約是五月底，張志忠到我家來，說要去上海一趟，問我後媽要不要買什麼東西。後媽想了一想說，想要些毛線，好織一件毛衣。大約過了半個月以後，張志忠從上海回來，給我後媽帶回來一堆毛線。後媽很高興。張志忠進了我房間就告訴我，從大陸各地來的黨員都聯繫上了，又發展了一些黨員，島內一些主要地方都指定好負責人，台灣地下黨的組織已經正式成立了。【頁一六三】

這樣，當張志忠把中共台灣地下黨的立足點基本建立起來以後，就像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檔案所載：

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先後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頁十二】

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編印，未標明出版時間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之真相》另載：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間，台匪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與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匪黨幹部，集合原有匪幹簡吉、謝雪紅、陳福星、林梁【樑】材、廖瑞發、張明顯等於台北市永樂町（即今之迪化街）林梁材家，成立省工委會。【頁十七】

《吳克泰回憶錄》也從另一個側面透露了蔡孝乾來到台灣的訊息：

這年【一九四六年】七月月中旬的午後，我正在午睡，有人敲門問這是詹先生家嗎？我開門一看，是個中年人，身材魁梧但有些紳士氣質，他穿著襯衫，白色毛料褲子，我斷定他是從上海回來的，就讓他進屋裡坐。坐定之後，他說姓陳，要找張先生（即張志忠）。我說，張先生有一段時間沒有來了。按黨內規定，我也不好問什麼、談什麼。這樣，他就走了。

不久以後，我在博物館附近街上遇見了張志忠。按規定是不能打招呼的，但我實在忍不住了，附近也沒有什麼人，我湊過去說，你這麼久沒有來聯繫，我等得好苦悶，有一個姓陳的人還到我家找過你呢！他說，最近比較忙改日再來看你，姓陳的也見到了。這樣，我們就分手了。【頁一六五——一六六】

吳克泰所說的這位「姓陳的人」，其實就是化名「陳純真」的蔡孝乾。

這樣，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就在蔡孝乾於一九四六年七月潛返台灣之後正式成立了。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

但是，革命的道路終究是曲折而艱難的。

《吳克泰回憶錄》透露了張志忠當時告訴他的實際情況與心情：

他回台灣以前，以為老台共會掌握一部分武裝，回來一看，什麼也沒有，很遺憾。【頁一五八】

對身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武工部長的張志忠來說，一切都還要從頭做起。

把新娘也帶回來了

按照《吳克泰回憶錄》的說法，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台灣

省委員會籌備會」的組織關係，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左右，張志忠和謝雪紅系統的楊來傳前往上海，並於半個月後回到台灣。回台以後，張志忠除了告訴他：「台灣地下黨的組織已經正式成立」的消息之外，同時也向他透露說，這次，他在上海結了婚，同時把新娘也帶回來了。【頁一六三—一六四】

季 澄

〔第二章〕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二日午後，筆者在上海的一棟老舊公寓見到了與季澄同月同日生但小她五歲的小妹季同老太太，進行了最後一個見證人的採訪。

張志忠從上海帶回來的新娘名叫季澐。

關於季澐，直到一九九五年，張志忠的家鄉新港還流傳著與事實頗有出入的說法。在那本有關嘉義、雲林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嘉雲平野二二八》書中，那個「以前在警察機關」任職的鄉民林玉鏡是這樣說的：

他【張志忠】在中國娶妻，太太是留法的，姓季，名字我忘了，姓名只有兩個字。……他太太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頁二七〇、二七一】

林玉鏡的說法，大體只說到「姓季」和「姓名只有兩個字」的部分事實。這也再度說明張志忠與季澐作為地下工作者的嚴謹態度與傳奇性。

有待確認的問題是：季澐「是留法的」而她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

為了理解季澐的背景，我在海峽兩岸採集張志忠的生命史的同時也託人四處探詢季澐家屬的下落。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透過人在北京的吳克泰先生的多方尋訪，我終於打聽到了季澐的弟弟季鑫泉先生在上海的電話和地址；同年十月，我專程到了上海，想要採訪季鑫泉先生有關他所知道的姊姊季澐的生平事蹟。然而，遺憾的是，季鑫泉先生恰好出國探親，無緣探訪。

「吳克泰先生打來過電話，並留下您的通訊地址。」電話那頭的季太太一再表示抱歉地告訴我說，「可是我愛人已經於八月二日去維也納探親了，大概要到十一月才會回上海。他回來後，我一定向他轉達您的意思。」

到了十一月中旬，我果然收到季鑫泉先生從上海寄來的第一封信。季鑫泉先生在這封寫於十一月七日的信中首先向我表示：「十一月二日回到家中，錯過見面的機會，真是太遺憾了。」然後，他就向我初步介紹了他所知道的季澐生平的一些情況。

後來，我終於在上海見到了季鑫泉先生本人，也安排了未曾謀面的張再添先生與他見面。其後幾年，我又跟季鑫泉先生陸續見了幾次；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也透過書信往來，陸陸續續向我提供有關季澐生平的相關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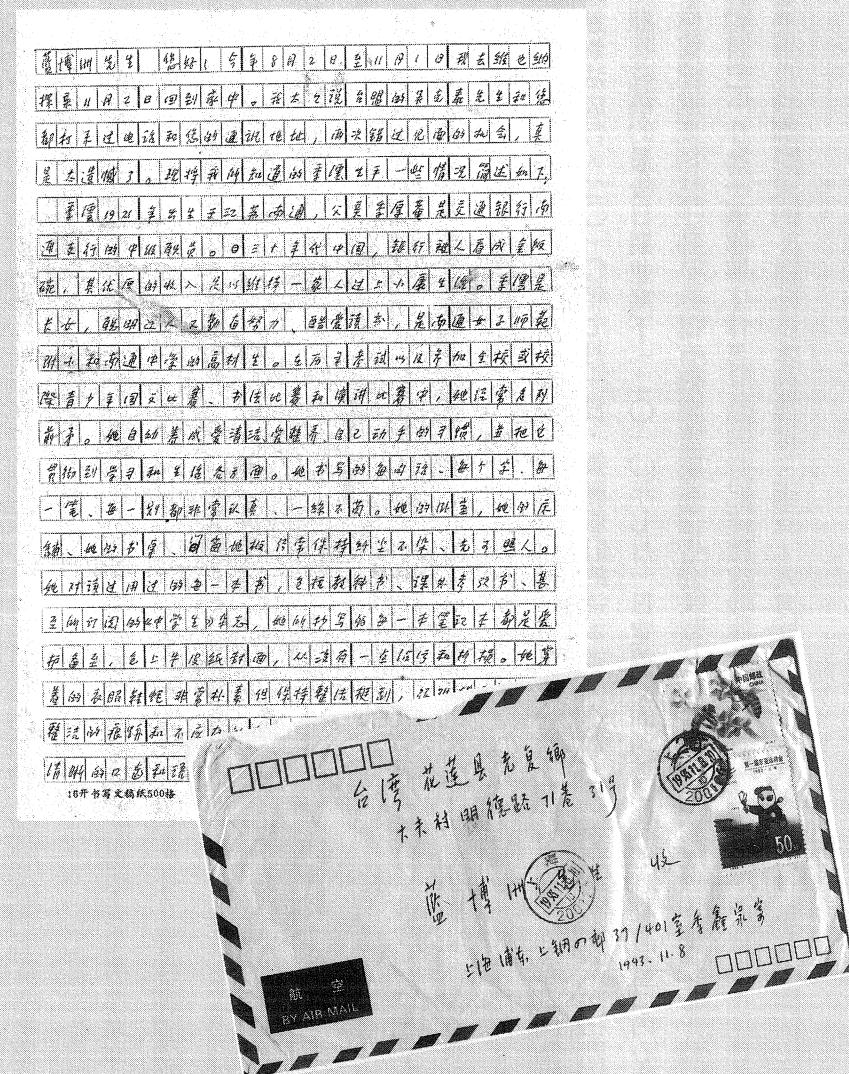
爲了忘卻的紀念

就在書稿已經寫完第二稿的二〇〇九年四月，在北京，我又通過曾經駐台的新華社記者的介紹，認識了同樣任職新華社的季澐的外甥孫王洋。在眾人喝酒閒聊的時候，王洋告訴我，季澐他的大姨婆，現在還在人世的同輩人還有住在江蘇南通家鄉的祖母季容，以及在上海的小姨婆季同；他又說，如果我想去採訪她們可以代為聯繫安排。雖然心中惦記著要跑一趟上海與南通，卻總是因為這樣那樣而遲遲無法成行。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幾經修訂的這本書稿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當我在書稿的最後記下歷次成稿的最後日期並寫下「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定稿」的同時，我聽到來自自己內心的質疑說道：你這樣就要結束了嗎？你還有兩個歷史見證者尚未採訪呢？你還沒有實地到南通走一趟呢？我於是告訴自己，作為一個報導工作者，除非你已經確定找不到可訪之人與可查的材料，否則你的尋訪工作是不可以偷懶結束的；這是基本的態度。因此，八月底，在兩岸作家黑龍江蕭紅之旅的文學交流活

動結束之後，基於「為了忘卻的紀念」的心情，我決心到南通、上海走一趟，讓這段漫長的尋訪張志忠與季澐之旅可以寫下句點。

九月初，在搖晃的夜行火車上的硬臥車廂裡睡了一晚並不安穩的覺後，我在天剛擦亮的清晨時分來到還沒有完全甦醒過來的舊都南京。住進當地文友預先代訂的平價的連鎖酒店之後，隨即展開一連幾天的訪友、喝酒、漫遊與講演活動。九月五日，星期日，通過王洋的居間聯繫，我搭地鐵來到郊區一處花園別墅社區，見到了他的父母親；任職江蘇某工技大學的王先生遺憾地告訴我說，真不巧！他母親在那裡住了一段時日，昨天，剛剛讓他弟弟接回南通。他又說：你要早兩天來，就不用跑南通了。沒關係，我說，南通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們在樓下客廳聊著。我向他報告他已經約略知道的我那尋訪經過，他告訴我他所知的不多的季澐的歷史情況，同時也含蓄地透露：因為有季澐這個說不清楚的「台灣關係」，他們家族大大小小在歷來的運動中都遭遇過程度不同的委屈對待；一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才因為季澐身分的某種澄清而得以通過重新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入大學的曲折歷史……。天氣悶熱。在外旅行了一段時日的我那飲酒過度（無一日間斷）再加睡不好的身體突然感到非常地疲憊竟而不由自己地打起盹來。王先生也許是以為我不愛聽他所敘述的過往，於是就帶我上二樓參觀一件跟季澐相關的僅存的遺物——她小時候睡過的一架紅木眠床。

九月八日，早上九點，我終於輾轉從常州坐大巴前往南通。近午時分，大巴開上一艘渡輪，橫越浩浩蕩蕩的長江，然後駛入南通市區。在汽車轉運站下了車，王先生事先聯絡的弟媳范女士就親自開車把我載到姚港路臨河的一家商務酒店入住。下午三點，我終於見到了年紀比季澐小三歲已經八十六高齡猶然身手靈動、耳聰目明而自願獨居的季容老太太。出乎意料，因為季澐與張志忠的「台灣關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季鑫泉先生寄給筆者第一封信的信封及首頁。

係」，季澐的家人在解放後不但沒有受到可以想像的「烈士」待遇，反而因為一個壞親戚想要霸占季家老屋的私心作祟而向居委會告發他們那種說也說不清楚的「關係」，使得他們從一九五一年肅反運動開始，都要在各種運動展開時遭到這樣那樣的磨難。

歷史總是諷刺的！

歷時一個小時的訪談之後，范女士又開著車帶我在季澐度過一段青春歲月的南通城區走馬觀花地四處瀏覽。晚上，她和先生及其友人熱情地在濠河邊的一家高檔餐廳為我設宴接風；然後又陪著已經有點酒意的我登上遊船，欣賞美麗的濠河夜景。

濠河是後周顯德五年（西元九五八年）南通築城時就有的環繞城區的護城河，形如葫蘆，宛如珠鏈，被譽為南通城的「翡翠項鏈」；目前，是國內僅存的四條古護城河之一，也是國內保留最為完整且位居城市中心的古護城河；周長十公里，水面一〇八〇畝，最寬處二一五米，最窄處僅十米；水清如鏡，風光優美，擁有江鷗、野鴨、魚鷺等自然生態群落；兩岸錯落著各種名勝古跡和名人故居；亭、台、樓、閣、塔、榭、坊等交相輝映，人文景觀與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千百年積累的歷史遺跡、園林藝術、鄉俗風情形成了古樸凝重的文化底蘊。

第二天中午，我自己搭上出租車到汽車轉運站，然後搭上開往上海的大巴，繼續最後的旅程。九月十二日午後，我終於在一棟老舊公寓見到了與季澐同月同日生但小她五歲的小妹季同老太太，進行了我最後一個見證人的採訪。因為季澐與她未曾見過面的張志忠的關係，她也一直遭受著這樣那樣的委屈；儘管如此，她說，她一生最遺憾的事就是不能親自到台灣，給姊姊季澐掃墓。

江蘇南通銀行中級職員的長女

現在，綜合這些來自各方的碎屑的材料，原本一片空白的季澐的面貌，終於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稍稍呈現出模糊而差堪成形的輪廓。

季鑫泉：季澐是我的大姊。一九二二年二月八日，季澐出生於江蘇南通濠河邊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父親季厚庵是交通銀行南通支行的中高級職員。三十年代的中國，銀行被人們看成金飯碗，所以，父親豐厚的收入足以維持一家人過上小康生活。因為這樣，季澐能夠在就學年齡時先後進入南通女子師範附小的幼稚園及南通女子師範附小就讀。

南通女子師範附小，是全國最早的師範附小之一。一九〇六年三月廿五日（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南通出身的清末狀元、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本著「父實業、母教育」和「民智兮國牢」的思想，偕其兄捐資購買城中柳家巷陳氏舊宅，葺為校舍，興辦「通州公立女子學校」，招收卅五名首批女學生，分為高等、初等兩級，聘請「桐城派」文學家姚鼐後裔范姚蘊素為校長。



季澐（1921~1950）。（張再添提供）

十一月，張氏兄弟改女子學校為「女子師範學校」，另外招生，而初、高兩等作為附屬小學（簡稱「女師附小」）。一九〇九年，張謇規劃和建設南通為「中國近代第一城」。由於入學女子較多，舊校舍不敷應用，張氏兄弟又募捐籌款，購買市河岸建於明代的薊遼總督顧養謙珠媚園遺址上的王氏樓房，以及周圍民房，改建為新校舍。次年（一九一〇年）八月，女子師範學校和女師附小師生遷入上課，女師學生即在附小實習。一九一二年，南通縣議會議定撥款給附小，學校亦改稱為「縣立通州女子師範附屬小學」。一九一四年六月，張謇夫人楊氏捐資，在校區開辦了幼稚園。

幼稚園及南通女子師範附小畢業後，季漢又繼續進入張謇於一九〇九年親手創辦的江蘇省立南通中學（簡稱「通中」）初中部就讀。

季漢是家中長女，聰明過人又勤奮努力，酷愛讀書，是南通女子師範附小和南通中學（初中）的高材生。在歷年考試以及參加全校或校際青少年國文、書法和演講比賽中，經常名列前矛。

季容：在我的記憶中，大姊從小就是個能動能靜的人；她常常帶著我們在天井裡踢毽子、跳繩。她喜歡刺繡，也喜歡聽留聲機播放的京劇唱片，尤其愛聽《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曲目；她的口琴、笛子和簫都吹得很好。還有，她喜歡到屋後濠河邊洗自己的抹布等小東西。

季同：沒錯，大姊是很愛乾淨的人；在我看來，她的愛乾淨已經是一種潔癖了。例如，她的床是絕對不讓人碰的。

季鑫泉：季漢從小就養成愛清潔、愛整齊、自己動手的習慣，並把它貫徹到學習和生活各方面。她書寫的每個字，一筆一畫都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她的臥室、床舖、書桌、門窗和地板，經常保持纖塵不染、光可照人。她對讀過用過的每一本書，包括教科書、課外參考書，甚至所訂閱的《中學生》雜誌，以及她所抄寫的每一本筆記本，都愛護備至地包上牛皮紙封面，從沒有一點沾汙和折損。她的穿著非常樸素，但總是保持整潔筆挺，很難找到有一點不整潔的痕跡和不應有的皺折。

敏捷的思維能力，伶俐清晰的口齒和語音，優異的學習成績，以及勤奮的生活作風，使得季漢深得父母師長的鍾愛，兄弟姊妹和同學的信任，就是家中的褓母，學校裡的工友，也沒有人不喜歡她。儘管可惡的天花在她面部留下了令人遺憾的缺陷，可這絲毫不能影響她追求向上的決心和意志。在學校，她是最好的學生；在家裡，她是最好的大姊。我們永遠忘記不了她。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從季漢的生命史來看，她後來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跟整個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季漢個人生命的悲劇性結局，恰恰是歷史決定的宿命吧！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駐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三省。

事變爆發之後，全國各地愛國學生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浪潮很快由北京傳到上海。上海的大學生與中學生隨即先後成立抗日救國聯合會，組織宣傳隊，深入工廠、農村，展開長達將近四個月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這波抗日救亡的愛國浪潮隨即也傳到了南通。

季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徑，南通女子師範附小積極向學生灌輸愛國主義思想，表現出強烈的進步傾向。每日晨會，學生都要齊唱晨會歌，歌詞是：「我們的國家，被人家欺壓，快救

它，快救它！讀書要用心，志氣要高大，養成實力復興中華，愛護我們的國家……」然後由教師談論時事，講述歷史，教育學生認清民族的敵人，激勵學生為復興中華而刻苦學習。那時，還只是是一個十歲大的女學生的季澐，先是如飢似渴地閱讀主張抗日救亡的書報雜誌，然後就以火一般的熱情，投身抗日救亡、抵制日貨的宣傳活動。

季鑫泉：為了轉移世界輿論對九一八事變的關注，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深夜，日軍又突然向上海閘北發起武裝進攻。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違背蔣介石「避免衝突」的指示，奮起反擊。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之後，上海學生又迅速掀起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熱潮。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我國東北以後，又進一步策劃「華北自治」，妄圖囊括平津，席捲華北，進而鯨吞全中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根據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當天，北平學聯發動全市學生，舉行反對「華北自治」、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日本侵略的請願遊行。「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上海，學生界率先響應，從十二月十二日開始，熱烈展開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運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在上海尋釁鬧事；八月十三日凌晨二時，終於挑起了淞滬戰爭。上海學生奮不顧身地投入了保衛大上海運動。就讀南通中學的季澐也參加了由多數中學生組織的戰時青年救達宣傳團，從事寫標語、出牆報、走上大街向市民作演講等宣傳工作，並參加和組織遊行示威活動。

十月廿六日，國軍八十八師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一九〇五—一九四一）指揮一個營，掩護大軍撤退，堅守上海四行倉庫，彈盡糧絕，拒不投降，直到卅一日凌晨才奉令退入租界。這支斐聲中外，大膽向市民主演講等宣傳工作，並參加和組織遊行示威活動。

號稱「八百壯士」的部隊退入租界後，被租借當局解除武裝，關在新加坡路（今膠州路）一處用蘆蓆搭成的「孤軍營」裡，不准他們重返前線。上海各校學生於是輪流在「孤軍營」進行慰問活動。十一月四日，日軍在金山嘴登陸，形成對上海包圍的形勢。十二日，幾十萬國軍從上海全線撤退，上海租界地區淪為「孤島」。日軍長驅直入。十二月，南京陷落，日軍對中國人進行了大屠殺。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日軍侵占南通。我們一家人開始逃難。因為交通銀行總管理處一直設在上海租界沒有內遷，交行職員一般在上海都有親戚可以投奔落腳，所以我們一家和南通交行其他職員家屬一起，幾經周折之後，還是從淪陷區逃到上海租界內。我們兄弟姊妹重新拿起書包，入校求學。季澐也考入上海務本女中。

日軍占領南通後，通中停辦，部分校舍被燒毀，設備被洗劫一空。同年八月至十二月，通中校長馮樾君帶領學生先於余東鎮復課；隨著通中主要教師先後來到上海租界，一九三九年八月，又在上海以「上海通州中學」之名復校。那年秋天，季澐就毅然放棄教學環境及師資條件較好的務本女中，立即轉入通州中學讀書。

陳昌謙：我是季澐在南通中學和「孤島」上海時期通州中學的老同學。由於通州中學師生絕大多數是從淪陷區來的，身受日寇欺凌之苦，懷有強烈的不願作亡國奴的愛國熱情，普遍抗日情緒高漲；因此，通中熱烈展開了各種抗日救亡運動。季澐積極參加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如辦牆報《播種》、開時事座談會、學唱抗日救亡歌曲、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報劇，參加義賣，慰問膠州公園內的孤軍營等。^⑩

入黨

陳昌謙先生當時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可以想見，季漢抗日救亡的熱情與積極表現，勢必引起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注意，乃至於進一步吸收入黨吧。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派劉曉到上海重建上海地下黨。八月，成立了黨的工人運動委員會和群眾工作委員會；群眾工作委員會下設職員、文化、學生和婦女等工作委員會。

十一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設立兩個學生工作機構：學生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學校學生運動委員會。

上海淪為「孤島」後，中共中央鑑於主客觀條件已不允許採用以往抗日救亡運動的鬥爭策略和方式，及時提出了轉變學生運動鬥爭方針的問題。

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五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先後向江蘇省委發出指示，強調指出：在敵人占領的中心城市，應以長期積蓄力量、保存力量、隱蔽力量，準備將來的決戰為主。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公開投敵，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孤島」時期的上海全市性主要學生群眾組織之一「學協」，立即發布反汪宣言，發動全市學生舉行總罷課，並組織宣傳隊，在南京路等主要街道散發反汪傳單，張貼反汪標語、漫畫，高呼「反汪」口號。^①

季漢也積極地投入通州中學反汪偽登台而展開的鬥爭，從而被吸收入黨。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季漢後來就讀的蘇州教院的同學和暨大上海校友會假上海南京飯店舉

行「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暨八十誕辰追思紀念座談會」。當天，季漢在這兩所學校就讀時的同學從四面八方來到會場，並在全體默哀之後，陸續從不同的角度追憶了當年與季漢想處的情況和印象。十二月，蘇州教院上海同學編的《通訊》第五十二期（增刊），以「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為題，收錄了當天的發言紀錄。

季鑫泉先生也出席了這場追思會。當他收到那本薄薄的《通訊》之後，立刻航寄了一份給遠在台灣的我。通過這本「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我在後來介紹季漢入黨的金嬪所寫題為「一生正氣英勇就義——懷念秉性耿直的季漢烈士」【頁八】的回憶文章中讀到了季漢入黨的經過。

金嬪：一九三九年九月，黨組織決定我轉學到通州中學高二讀書，與原在該校的高三地下黨員陳秉儉（現名陳昌謙）接上關係。當時該校僅有我們兩個黨員，季漢是陳的同班同學。據陳介紹，季漢較早接受進步思想，有正義感，她對國民黨腐敗，國土淪陷，十分憤恨與痛心，由於季漢與我兩家住得很近，我們的來往較為密切，雖不在一個班級，但課餘經常在一起參加各種活動，如讀書會、出牆報、義賣捐助、救濟傷病員等。季漢能寫一手好字，並擅於寫作，牆報上經常登載她的稿件。四〇年春她在反汪偽登台、全校組織大罷課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我們黨小組研究，認為發展季漢入黨的條

^① 陳昌謙致季鑫泉函。

^② 上海市青運史研究會、共青團上海市青運史研究室編《上海學生運動史》（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一七六、一八三—一八四、一九一。

件成熟，經報請上級黨組織批准，由我與她聯繫發展入黨，我就成為她的入黨介紹人。季澐同志入黨後，更加積極地深入群眾，耐心做同學的思想工作，並在各種活動中起帶頭作用，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

暨南大學「最後一課」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提出學生工作應遵守的七項原則，其中包括：黨員應首先注意功課、操性，以思想啟發為主爭取大多數同學，指定少數黨員同積極群眾個別聯繫、團結，以環境可能的程度組織學生合法團體，通過一定積極分子參加與領導學生群眾的鬥爭，遵守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等；同時要求「孤島」中的學生工作重點由校外轉入校內，從純政治活動轉向學術性的、福利性的活動，將政治活動與學術性、福利性活動結合起來，強調勤學、勤業、勤交友。^②

入黨後的季澐應該就是按照這樣的指示精神開展工作的吧。

季鑫泉：一九四〇年夏天，季澐高中畢業，考入當時被稱為華僑最高學府的國立暨南大學教育系。暨南大學的前身是一九〇七年創立於南京的國內第一所華僑學府暨南學堂，一九二七年改組為暨南大學；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挑起淞滬戰爭之後，位於上海真如的暨大校園被狂轟濫炸為一片廢墟，被迫遷校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康腦脫路（今康定路）。

季澐進入暨南大學後成為著名教授鄭振鐸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五八）的高足。鄭振鐸先生當時是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史教授，同時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領導人之一，一面從事教

學工作，一面與校內外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一起，冒著被敵人綁架、暗殺的危險，開展著可歌可泣的「救亡」活動。

季容：這年秋天，父親因病帶領全家返回南通；大姊單獨留在上海。我想，我們姊妹後來的人生道路的分歧點就在這裡吧！我和妹妹季同回到南通淪陷區，後來也沒有受到良好的系統教育；她就不一樣，她在上海讀大學，星期天還常到鄭振鐸家學習，後來也在文匯報或大公報發表過文章。放假回來，她就去找南通中學的老師錢素凡談話。錢老師後來【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遭到國民黨特務逮捕暗害。

季同：我們生不逢時，在南通接受的是日本的奴化教育；因為這樣，雖然跟大姊只差五歲，卻沒有共同的語言。她自己一個人留在上海，住在上海青年會吧！他靠著做家教，自立更生。我們很少見面。有時候，她也會在放假期間回到南通。可我總覺得她似乎看不起我們姊妹，她出去和人談話也不讓我們知道；有一次，她帶我們去看電影，卻一直跟其他朋友噓噓唧唧地不知在談什麼？

季鑫泉：據說，她的住處成為暨大地下黨中共學生支部開會、學習、研究工作的祕密基地；她也接任暨南大學地下黨學生支部委員。

金嫄：季澐就讀暨南大學時仍與我經常往來。在一次談到將來時，她充滿信心地認為，將來的社會一定會走向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並充滿信心地嚮往著未來的幸福生活。

^② 前引《上海學生運動史》，頁一八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依照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進入租界。

當日軍進入租界時，暨南大學的全體師生組織了「最後一課」的鬥爭。

鄭振鐸：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裡被電話的鈴聲驚醒。「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裡說。「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聽說日本人占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事實漸漸地明白。……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畫，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于敵手。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地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往，沒有一點異樣。我們依舊地搖鈴上課。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台上可以望得見街。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罷，」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地將學校關閉結束。」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但是我這一門課還要照常地講下去，一分一秒鐘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地講下去。學生們照常地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裡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的士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然而鎮定安詳，

沒有絲毫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著異常地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的有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可聽到。幾分鐘後，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著。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十分。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立了身體，作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道：「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一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哭泣著。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個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哪一個方面走去。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從來沒有那天無紛紜的一致的堅決，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的，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著遷校的工作。^{④3}

插班蘇州汪偽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坐上南下福建建陽的列車。不久，學校裡的課室、

^{④3} 轉引鄭振鐸《蟄居散記》，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

圖書館都封閉了。

季澐也就這樣結束了她在上海暨南大學的求學時期。

根據蘇州教院上海同學編《通訊》第五十二期（增刊）「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的〈季澐烈士生平〉【頁三】所載，在上海的暨南大學關閉後，中共在暨大的黨支部隨之撤銷。季澐改由中共大學區委領導，轉入上海大同大學。半年後，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學委根據工作需要，指派季澐和葉正國、王業康等同志插班蘇州汪偽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開闢工作。一九四二年九月，季澐進入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文史地專修科二年級；在組織上，她仍由學委直接領導，任該校地下黨學生支部書記。

葉正國：我與季澐同時由上海地下黨委從不同的學校調派到蘇州。為了貫徹執行黨在白區「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和地下黨員「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指示，我們的任務是：通過入學考試，打入汪偽新建立的學校，埋伏下來，勤學、勤業、交朋友，逐步開闢蘇州的學生群眾工作，並利用各種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開展活動。^⑭

張克奎：一九四二年暑期後，我班轉來了曹子堅、季澐、鮑寶珍等幾位上海來的插班生，記得季大姊身材不高，微胖短髮，穿著樸素，年齡比我大兩、三歲，但她不多言，給我的印象已相當成熟。我們知道她的情況不多，只曉得她是南通人，父親是上海交通銀行職員，在上海暨南大學已學習了二年，轉學到蘇州，入我班讀書。她在我們班中，平時沉默寡言，不太活動，十分謹慎從事，學習成績出色，擅長英語。平時我們男同學很少跟她接觸，見面僅微笑點頭而已，所以知之甚少。^⑮

鮑寶珍：當年，她孤身一人從南通來到姑蘇謝衙前求學。我們同窗一年。印象中的她，性格內向，很少閒聊、嬉玩。中午休息時總在教室裡埋頭看書。但一旦開會，發起言來有理有據，頭頭是

道，頗得同學們的認可。其實當時她可能就在閱讀進步書籍，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呢！而我們卻茫然無知。^⑯

張韻熙：季澐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給我印象較深的同學之一。記得她是第二學年來的插班生。她常面帶笑容，見同學總先招呼，對我也不例外。講話不緊不慢。她那帶南通口音的上海話聽起來很有親切感。她與她的幾位南通同學有時也有爭論，甚至爭論得很激烈，但從未見她面紅耳赤。第二天來上課仍是和顏悅色，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晚上她有時到我們寢室來玩，隨便得很，還不時看一下手錶，到時候就回自己的寢室去了。^⑰

史旭：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從南京國師轉學來的，和季澐同過一年學，對她的瞭解也不多。季澐同學儘管外貌不算漂亮，但她的儀態卻很大方，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蘇北農村青年老太奶奶。似乎記得她是南通人，既是蘇北大同鄉，彼此就容易接近。加之她的座位，在我背後，談起話來也很方便。她和我談過幾個老師教的國文、中國通史、國學概論和小品文。她的評論頗多獨到之處，和她多談談，自己辨別是非的能力，似乎也有些增強。記得有位同學曾幽默地在我紀念冊上寫過：

^⑭ 葉正國〈無限細懷革命烈士季澐同志——追憶與季澐同志共同戰鬥生涯片段〉，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四一八。下同。

^⑮ 張克奎〈季澐大姊，您安息吧！〉，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二—十三。下同。

^⑯ 鮑寶珍〈遲到的悼念——細懷季澐同學〉，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三。

^⑰ 張韻熙〈思念季澐〉，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三—十四。

「好花欲折君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詩句，看似打趣，也許就是為此而發的弦外之音。其實我們之間，談話的內容，根本沒有涉及過一點男女之間的感情問題。我只覺得她會做人，很懂事，說話有分寸，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灰心喪氣。^{④5}

陸濟民：季漢是我在教院讀書時比較接近的同學之一。入學伊始，她坐在我左邊靠窗的位子上。她是南通人，但說的上海話相當標準。我跟同學們交談也習慣用上海話，減少了彼此間的隔閡。那時老師授課，即席發揮和補充講解的多，大家都做筆記。我每天在晚間自習時加以整理，謄寫在專備的筆記本上。季漢對筆記也是很認真的，她看見了以後，就借去參閱，習以為常。有一次，我在寫日記，她說：「可以給我看嗎？」我一邊把日記遞給她，一邊說：「每天要寫，實在沒什麼好寫的。」其實我寫日記並不偷懶，有時還寫些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報紙上文章的議論。她粗略地翻閱了一下說：「我看還是莫談國事的好。」我認為她講的話有道理，就改而採取了敷衍塞責的態度，加強了在艱難歲月裡政治上的自我防範意識。^{④6}

一個年輕出色的黨的工作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成立敵區工作部（即城市工作部），領導上海以及江蘇敵占城市的地下黨工作。學生工作系統在組織上也作了調整，組成大學工作委員會，要求改變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貫徹執行「勤學、勤業、交朋友」的方針，強調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要學業好，真誠為群眾服務，樹立在群眾中的威信。在緊密團結群眾的基礎上，利用矛盾，打擊敵人，開展天亮運動，迎接織之命，跟同樣隱敝在省立教育學院的同志葉正國聯繫了。

孔令宗：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江蘇省委撤銷。季漢、葉正國和王業康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共蘇州工委，由工委負責人王中一直接聯繫。我是當時的中共蘇州市工委領導人之一。季漢同志等進入江蘇教育學院時，蘇州在敵偽統治下，環境十分險惡。他們根據祕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相結合的原則，從頭做起，在學生群眾中交朋友，加強了日常的群眾工作，經過他們深入細緻的工作，打開了局面，群眾基礎擴大了，黨的組織發展了。當時季漢不僅是一個學習成績優良的好學生，更是一個年輕出色的黨的工作者。^{⑤1}

葉正國：一九四三年初春，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突然看見在教院傳達室窗檯上插著一張折疊的紙條，上書「正國兄收」。我取下打開一看，內寫：「正國兄：上海有個朋友托我帶東西給你，請你明天（星期日）上午九時到獅子林一晤並遊園。」下署：「漢」字。這一紙條上的字跡十分端正清

^{④5} 史旭〈生則偉大，死亦光榮——悼季漢同學〉，前引「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五。

^{④6} 陸濟民〈悼念烈士季漢大姊〉，前引「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四—十五。

^{⑤0} 前引《上海學生運動史》，頁一九四。

^{⑤1} 孔令宗〈緬懷季漢烈士〉，前引「季漢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九。下同。

秀。我當時雖不知「澐」為何人，但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中共地下黨有同志要來接我的組織關係了，我盼望了將近半年的黨內親人，明天即將見面。

星期日早晨，我在預定的時間內，準備赴約。蘇州的社會環境，雖被敵偽所統治，可惡可恨的日本鬼子與偽軍有時還可能在街頭巷尾撞見，沿街煙館、「嚮導社」林立，散發著令人厭惡窒息的烏煙瘴氣；但自然景觀依然保持著姑蘇古城的寧靜，那天清晨的陽光也顯得格外明媚，所以我懷著喜悅興奮的心情，穿過謝衙前，直奔獅子林，急切地要去會見不相識的那個「親人」。當我剛到達獅子林大門口，撲面就迎來了一位女同學找我問話。她已在教院認出了我，所以說：「你是葉正國吧！」我說：「是」。接著我們兩人對了地下黨預先約定的「暗號」，她又拿出一個信物——一支折斷了又用一小段竹筷銜接起來的「派克」鉛筆交給我。我們在這樣準確無誤、確信無疑的情況下，從此接通了組織關係。我們第一次把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初次晤面，她留給我的印象是：親切、隨和、練達而又蘊藏著幾分沉著和冷靜。她的年齡比我大三歲，為了隱蔽在敵偽環境內共同開展地下鬥爭，我們需要確定社會關係時，雙方定位在遠房親戚，以表姐表弟互稱。當時根據地下黨紀律，季澐今後與我只保持與進行單線聯繫，平時在教院互不接觸與來往。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決定我處於第一線，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進行或參與各種活動；季澐處於第二線，以用功好學的學生面貌出現，不參與校內任何活動。

鮑璿：季澐學長當年在教院讀書時，她是文科二年級，我是理科一年級，第一學期女生分住六處，與她並不相識。第二學期女生調整宿舍，文科和教育系同學住在樓上大房間，我住在隔壁的小房間。我每次出入必經大房間。記得她的床位靠近鮑寶珍和任若梅。我不時要找任若梅和鮑寶珍閒談，

這樣也就認識了季澐。她平時舉止言談顯得老練，懂事。我們交談不多，但至今還能回憶她的形貌舉止。記得一次週末，在大樓女廁所旁，聽她講起洗澡不成，一定要擦擦脖子和身子，勸我們要去打水洗擦。顯示了大姊姊關心小妹妹，給我印象很深。⁵²

韓家玉：我和季澐雖然沒有深交，但在蘇州教院她是我們文史地專修科的同班同學，又同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間大房間裡，怎麼能忘懷呢？現在我的眼前還浮現出她的清晰形象：中等身材，梳著齊耳短髮，四方臉上略帶幾點細細的麻點，額頭下面閃著一雙大大的眼睛。

季澐非常健談，在宿舍中她常常給我們介紹她所看過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等蘇聯翻譯小說的內容。講起來眉飛色舞，唾沫飛濺，別人別想插進一句話。那時我們都只有二十上下的年紀，我暗暗佩服她小小年紀竟有如此淵博的知識。

回想自己年輕時，只知埋頭讀書，對於政治懵懂無知，較之季澐可謂幼稚矣。現在想來，她之熟讀蘇聯小說不只是求知識，實與她的政治抱負相一致，她對我們介紹蘇聯小說，或許包含著啟發我們政治覺悟的深意。⁵³

葉正國：當時，教院演劇活動，在同學中有些基礎，各班級愛好話劇的同學都有為數不一的人參加；並且演出的均是左聯作家田漢、洪深等著名劇作家編寫的如《蘇州夜話》、《父歸》、《壓迫》

⁵² 鮑璿〈回憶季澐〉，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一。

⁵³ 韓家玉〈緬懷季澐〉，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四。

等優秀獨幕劇。地下黨經過研究，決定對演劇採取支持和積極參與的態度。由我繼續通過演劇活動廣泛聯繫群眾。後來，教院劇團先後演出《雷雨》、《北京人》、《金銀世界》、《富貴浮雲》等優秀大型多幕話劇，在校內外均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汪偽當局在蘇州大中學校對學生實施軍事教育與軍訓，為敵偽服務。在教院及其附中，專門設有軍事教官，給學生發軍服，進行軍事訓練。軍事教官還和學生住在一個宿舍樓，對學生飲食起居與作息進行管制。最可恨的是每天早晚要集合學生隊伍，進行升降拖著小黃尾巴的，上寫「和平反共建國」的汪偽國旗、唱偽國歌。特別是逢到日寇汪偽舉辦什麼慶典或活動時，汪偽當局即命令教院按軍訓辦法把學生隊伍拉出去參加遊行或集會。教院的同學對此種種舉措，都極為反感和不滿。季澐與我定期聯繫研究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決定針對敵偽這種強制性的法西斯的奴化教育制度，實行堅決反對、盡力設法挫敗、消除其反動政治影響的方針。所以教院在每學期實施軍訓期間，我們與廣大同學總是採取不積極、不合作與種種消極抵制的態度，淡化軍訓意識，渙散學生軍訓隊伍，使其鬆鬆垮垮，名存實亡。……至於遇到把學生拉出去參加什麼遊行或集會，只要隊伍一出校門，我們就趁機設法使其逐步渙散，學生隊伍在中途或到集會場所時，往往已稀稀拉拉，亂成一團，「潰不成軍」，指揮不動了，使汪偽當局達不到預期的反動的政治目的。

季澐和我也針對教院那些仍然忠實於敵偽的奴才與走狗展開鬥爭；其中，軍事教官吳震就是一個典型。他來到教院時，身穿日本皇軍軍服，腰掛日本鬼子的馬刀，手執皮鞭，一對鼠目，一臉橫肉，十分兇狠。他平日舉止粗暴野蠻，行為不端，生活腐化，在校外亂搞女人，在校內對女同學很不嚴肅也很不尊重，劣跡斑斑，影響惡劣。他在校內妄圖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軍訓制度奴役學生，不僅白天強制操練，消耗同學精力，嚴重影響同學按時上課學習做作業，並提出要經常在晚間搞緊急軍事集合突擊訓練，使廣大同學寢食不安，有損體質影響健康。正當吳震躊躇滿志地妄想實施他那一套惡劣行徑時，也是季澐與我約在姑蘇城牆上討論如何對付吳震的時刻。季澐平時討論工作時，總是心平氣和，很沉著冷靜。但這次出乎我的意料，我提到吳震，她就站在城牆上，面對著我，不停地揮著手，激動地對我說：「把他打掉！把他打掉！」並商定回校後廣泛聯繫群眾，發動同學起來反對吳震那一套。此後，我便在各級同學中串聯。……討論如何對付這個惡棍。……多行不義必自斃，吳震迫於群眾的威力，最後灰溜溜地滾出了教院。

為了開展工作，在教院期間，到了暑假，季澐就借住蘇州石庫門內的親戚家，沒有回家探親。她和我定期約在親戚家討論工作或學習，過著有紀律的組織生活。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教院課外業餘劇團的演出活動只能聯繫到一些愛好戲劇活動的同學，有侷限性；並且單純演戲，也不能滿足同學在課外活動中的廣泛興趣與愛好。儘管敵偽政府不准學生成立學生會，但在教院卻可成立學生生活委員會。在第三學期，當季澐與我研究在教院開展學生社團活動時，我們認為，可以通過與利用「學生生活委員會」來開展各項合法的群眾工作，並商定由我出面到各班級去活動，爭取當選為「生委」理事長，以使用合法身分將各項活動開展起來。當我被選為理事長後，季澐與我共同擬定了一份「生委」在一學期內的工作計劃。為了盡可能廣泛聯繫與組織群眾，我們將文藝寫作與探討、圖書流通與閱讀、美術創作與畫展、歌詠、遠足郊遊、同學聯誼等等，都一一列入計劃並上報校方，目的是在校內取得合法活動的地位。……

我們在「生委」的名義下，這學期進一步打開了群眾工作的局面。特別是我們在通過「生委」多

種活動的掩護下，把祕密從上海帶到蘇州的用曾國藩《家書》、曹雪芹《紅樓夢》等等的封面改裝過的革命讀物，如斯諾的《西行漫記》、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節本）、《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以及上海蘇商時代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小說等等，在具有參加革命鬥爭要求，嚮往共產黨與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同學中祕密傳布，組織學習與討論，把這些同學進一步團結在我們周圍。

由於工作已進展到一定程度，上級黨組織便即時通過季漁傳達了培養發展地下黨員、擴大黨組織的指示。因為這項任務的具體工作由我去執行，故季漁和我議定，在下一個學期「生委」選舉時，我應主動從「生委」退出，將主要精力轉到培養發展黨員的工作上來。

季漁與我發展地下黨員，都是嚴格按照地下黨發展工作的特殊要求、步驟與程式，十分認真細緻地個別地一一進行。例如，一個叫邱崇英的女同學，她雖出身於國民黨上層家庭，但本人有正義感，對國民黨的黑暗腐敗深為不滿，也同情貧苦勞動人民的遭遇。她認為真正抗日的主力是新四軍、八路軍，將來要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新社會，只能依靠共產黨。她要求入黨，卻執著地希望黨組織送她到革命聖地——延安。季漁同志在瞭解這一切情況後說，許多地下黨員都嚮往延安，很多黨內外的革命知識分子也紛紛奔赴延安，我自己喜歡文學，也很想到延安「魯藝」去學習，但廣大的淪陷區很需要我們去開闢工作，我們應留下來堅持鬥爭，傳播革命種子，壯大革命力量，去迎接革命勝利的到來。季漁這些話是很樸實的，但她不能出面去找邱崇英談，只好要求我做好她的說服工作。最後，黨終於說服了她；她在入黨後，一直聽從黨的安排，堅持在白區工作……。

一個不可泯滅的青年女教師的形象

一九四三年八月，季漁在教育學院畢業。臨別前，鄰座同學陸濟民請季漁在紀念冊上題字留念。她提起筆，隨手寫了魯迅的兩句詩：

血沃中原肥勁草，
寒凝大地發春華。

畢業後沒有再見過季漁的陸濟民在多年以後的追悼文章中感慨萬千地寫道：

她寫的魯迅詩句，給我印象很深，也給了我更深層次的思考。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這兩句詩恰又應證在她身上。

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是一所師範學校，課程不是教育行政，就是各學科的專業知識。學生畢業後就到中學去教書。季漁在畢業後被分發到蘇州中學一院男生部，任歷史教員；後來又到蘇州中學一院女生部（蘇州女子中學）、省三中等校，擔任歷史和語文教員。這段期間，她一邊教書，一邊繼續她的祕密抗日活動，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儘管時光流逝已近半個世紀了，有不少在那段期間和她共過事的同志或受她教育的學生，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提起季澐，無不稱讚她的工作認真、大膽心細，對學生更是諄諄誘導，對朋友赤誠相待，樂於助人。

一句話，季澐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朋友們的心中塑造了一個不可泯滅的青年女教師的形象。⁶⁴

葉正國：季澐同志從教院畢業到蘇州的中學擔任教師時，上級黨組織決定，她不再擔任教院黨支部書記，而由我繼任。但仍由她負責與我聯繫，繼續共同開展教院的工作。

孔令宗：一九四四年八月，王中一調回上海工作。從這個時候起，我才與季澐同志聯繫。那時她已從江蘇教育學院畢業，在桃花塢顯道中學任語文、史地教師。當時除蘇州工委負責人王中一同志已調回上海外，另一委員也因故離蘇，因此我的工作相應有了增加，季澐同志的到來使我有了一個得力助手。我和她商量後，除江蘇教育學院黨支部仍由她負責聯繫之外，另將絲織業、針織業的幾個工人黨員關係交給她。她面對新的工作，以最飽滿的熱情，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領導他們，為積蓄力量壯大組織，發展了一批黨員，培養了一些積極分子，並先後動員了一批工人去解放區學習與工作。

胡振玉：季澐學長在蘇州教育學院時比我高一屆，在校時我們並不熟悉。一九四四年畢業後，我分配去蘇州第三中學，與季澐同學共事。當時，我們兩人都教語文，她和我的宿舍又僅一牆之隔，於是我們才比較熟悉、親密。

季澐為人耿直，工作認真，平時穿著樸素，寡言少語。我當時剛剛涉足社會，思想比較單純，甚至幼稚。季澐經常告誡我：要慎於交友，不要被有些人的花言巧語所迷惑。有時，她也經常有意無意地用一些民族氣節、國難當頭青年人應如何振作起來等愛國思想開導我。現在回憶起來，記憶猶新。

原來，當時她是以中學教師為掩護，已身負蘇州綱廠中共地下黨工作的重任，我卻全然不知。

我於一九四五年離開三中去上海。在和季澐相處的半年中，她一直像大姊姊那樣呵護著我。我在工作上、思想上遇到什麼困難，也經常和她商量。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短，但在我的一生中卻銘記難忘。^{⑤2}

張克奎：四三年畢業後，我在桃花塢省三中教書，四四年秋與她同事一學期，緣於同事同宿在學校內，彼此比較熟悉起來。我感到她熱情誠懇，和藹可親。由於我當時年青，剛出校門，不識世事，她年紀較大，尊她為大姊。無論課務或生活瑣事，她都能熱心幫助。最為感動的一件事，那時先妣棄養，家中只有老父一人，心情懊喪，彷徨無主，情緒非常低落。她及時伸出援助之手，跟我促膝談心，百般安慰，並給我作媒，介紹一個鐵路職工，希望我節哀順變，挺起胸膛，此事雖未成功，但我一直銘刻在心，終生未忘。抗戰勝利後，勞燕分飛，各奔東西，她返上海後，幾十年來不通音訊，不意從此一別，竟成永訣。

⁶⁴ 胡振玉〈青春獻革命，丹心照千秋——懷念季澐學長〉，前引「季澐烈士就義五十週年特輯」，頁十。

重回上海灘

抗戰勝利後，季漁奉組織之命，由蘇州回到上海。

葉正國：一九四五年暑假開始，我回上海家中，八月十五日深夜，我被爆竹聲驚醒。抗戰勝利了！早晨，我在驚喜中接到季漁從蘇州打來的電報，要我快速趕回蘇州。這年暑假，她仍住在蘇州親戚家裡未回去探親。當我當天趕到蘇州和她取得聯繫後，她向我傳達了黨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對形勢的分析與指示：要求地下黨員盡可能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瞭解當地日寇、汪偽、蔣介石國民黨的動態，特別是軍隊的情況。形勢變化很快，汪偽江蘇省政府的牌子瞬間改成了國民黨江蘇省政府，蘇州仍為省府所在地。原汪偽省保安司令部被改編為南京先遣軍駐蘇州團部，並按國民黨軍隊建制要增設政訓室。當時，該部隊正在尋找人選，我隨即將這一情況和季漁研究並上報黨組織，決定讓我趁機打入該部隊，以政訓室上尉指導員的名義，瞭解與搜集有關部隊的情報。……

不久，季漁同志被上級黨組織調回上海去工作，在她最後一次和我聯繫時，她對我們近三年的共同戰鬥的生涯還是很珍惜的。當她和我握手告別時，她說，國民黨不會要和平，還要打內戰，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她希望我留在蘇州繼續戰鬥。她將我的組織關係轉給中共蘇州工委孔令宗同志以後，我們從此再沒有任何形式的往來，我也一直不知她的行蹤去向。

沒有想到，這最後一次的聯繫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更沒有想到，這次的離別竟成為永別！

孔令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不久，季漁同志因工作需要調至上海。當時我的心情確實希望她

與我們一起仍在蘇州併肩作戰，但從全局出發，只能堅決服從。臨走時，還記得她贈給我一把繪有我大女兒像的絹面團扇，……。我一直沒忘記這種革命情誼，並盼望有機會再見面。哪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抗戰勝利後的中共上海地下黨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華中局城市工作部成立後領導中共上海地下黨以工委、文委、職委、學委、教委等名義，分別在工人、職員、教員、學生等群眾組織中進行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調部長劉曉去延安黨校學習，副部長劉長勝繼任部長。

日本投降消息宣布之當晚，駐在安徽天長縣漢潤鎮附近的中共中央華中局連夜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當會議結束時，華中局代書記兼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宣布：華中局決定派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第二天，新四軍軍部任命劉長勝為上海市長，張執一為副市長，並由新華社華中分社廣播宣布此項任命。另外，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劉長勝任書記，張執一和張承宗等四人為委員。在市委下面仍分學生、工人、職員、教員、員警、科技等系統。

張執一臨行前，饒漱石召集曾山、劉長勝和張執一談話，並當眾宣布，決定作為上海起義的領導機關為上海黨政軍委員會，以張執一為書記；起義成功後，即宣布成立上海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以張執一為總政治委員。

張執一到了上海。正當他和他的同志們做好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的關鍵時刻，忽然接到中共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發出的「停止舉行起義」電令；電令大意是：中央經過仔細考慮結果，認為目前起義對我們和人民是不利的，令即照本日午電停止起義，保存我們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眾中的組織基礎，以便將來能夠進行民主運動。目前應組織工會及其他人民團體，迅速出版《新華日報》上海版及其他進步報紙刊物等。黨的組織盡可能保存祕密狀態，只有站不住腳的黨員才準備撤退。不久，中共中央又來指示，督促他們迅速中止起義；大意是：黨的戰略部署是力爭東北，鞏固華北現有陣地，收縮華中，撤退華南。

八月廿八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由延安飛往重慶談判。

十月，在上海附近的新四軍淞滬支隊奉命隨新四軍浙東縱隊北撤。中共華中局考慮到：為了在上海準備起義，有許多黨員暴露了身分，部分革命群眾也色彩很紅，決定除將少數人調往其他地區或轉移到別的戰線上隱蔽外，大多數人均隨軍撤到華中解放區。

張承宗到達上海的時間和張執一差不多。他最初的任務是協助上海黨政軍委員會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並負責聯繫上海各個系統的地下黨，以統一行動。起義計劃停止後，張承宗就協助劉長勝統一領導上海地下黨工作；張執一則配合劉長勝負責進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並擔任聯繫上層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

一九四六年初，劉曉奉中共中央之命，從延安出發，經華中解放區回到上海，上海地下黨的工作改由劉曉負責，劉長勝協助他。從此，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就在劉曉、劉長勝領導下工作。在這一時期，上海的中共黨員領導機關並無任何名義，只是由二劉為領導核心，向華中局匯報和請示，中共中央有時也直接指示上海的工作。他們一方面繼續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國統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扶日」的鬥爭。^⑯

我要去台灣

根據《季澐烈士生平》所載，季澐到了上海，應該就在組織的安排下，在張承宗領導的上海市委教員系統下工作，然後再調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著手台灣工作。

金嬪：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夏，季澐突然來找我，告訴我她要去台灣。當然這是組織的決定，根據組織原則，她不能告訴我具體去哪裡工作。

季鑫泉：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老家南通。她在離滬赴台前曾專程回了南通一趟，與家人話別。她對赴台工作很有信心。台灣光復不久，中國人都為台灣回歸中國而興高彩烈。作為弟妹，我們也為自己的大姊能去祖國寶島台灣而替她感到高興。她也許諾我們：將來到台灣觀光。可我們萬萬沒想到，這一別竟成為永別。

^⑯ 前引張執一《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頁七六—七八、八六。

金嫄：臨走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人去十六鋪碼頭送她上船。她坐的是底艙統鋪。我們走進底艙，裡面黑乎乎的，只有幾盞微弱的電燈，已有不少旅客領了席子鋪地而臥。

季澑也領了一條席子，笑嘻嘻地輕聲對我說：「不要看現在艱苦，將來革命勝利，我會凱旋回來，日子一定會好起來的。」

就這樣，她單身一人遠離家鄉，遠離親友，帶著明確的目標，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為全人類的幸福而去台灣幹革命。

不曾想到這次竟成為我們的訣別。

〔第三章〕

張志忠與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筆者收到季澑的弟弟季鑫泉從上海的來

信，信中提及季澑與張志忠相識的經過：「我聽人說，季澑是調回上海時，經人介紹，認識了原籍台灣嘉義、化名楊春霖的張志

忠，……」

一九四六年六月，張志忠帶著新娶的愛人同志季澐，搭乘輪船，從上海回到台灣。

「初次看到張志忠夫婦是在抗戰勝利不久，大約四六年，於嘉義。」原籍嘉義，當時的「台北工委」林樑材的妻子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五日致函任職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組織部的季澐二弟季鑫泉時回憶了初見季澐的印象。「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記得，遠遠看見張志忠的妻子時，覺得她長得很美麗；很讚歎！但近看時，發現她臉上有些白麻點。當時，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們的身分，當即分析他們是從大陸來的。因那時的台灣人一出生就得接種『牛痘』，是沒有人患天花的。」

「我聽母親說，當年，為了祈求大姊的天花能夠痊癒，她在菩薩面前跪了幾天幾夜；可她臉上還是留下了患過天花的特徵。」多年以後季同老太太仍然不能釋懷地抱怨說。「因為這樣，我就一直認為她的領導不該派她去台灣做地下工作。」

「關於季澐同志，我沒與她接觸，也不瞭解。」柯秀英的書信繼續寫道，「在那時，只聽過我妹妹說，張志忠同志的妻子是教書的。」

問題是，季澐和張志忠是怎麼認識的？

「我聽人說，季澐是調回上海時，經人介紹，認識了原籍台灣嘉義、化名楊春霖的張志忠，兩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針對我所提的問題，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季鑫泉從上海浦東的來信，盡其所知地回答我說。「關於季澐和張志忠的認識，我們一直未能弄清楚：她究竟是經何人介紹而認識張志忠的？我們也一直未能找到一位在季、張結合前就同時認識他們兩人的人。我想，有這樣可能性的人應該都早已離開人世間了。目前僅僅可以肯定，他們兩人都從事祕密的革命活動，他們是由於共同的革命工作而認識而結合的。我也聽過有人這樣說，他們兩人是出於工作的隱蔽需要，而以夫婦名義結伴由滬赴台的；來台之前，季澐通過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在滬設立的招聘委員會考試，受聘為中學教師，以此職業為掩護。張志忠在台北市車站附近的榮町一丁目開設一藥行，季澐先在嘉義商業職業學校任教，以後轉台北一所學校任教。她和家中還能保持書信聯絡。」

經商的革命者

據我的調查研究所知，楊春霖其實也是張志忠返台以後公開使用的名字。至於季鑫泉信中所說的「台北市車站附近的榮町一丁目」，也就是今天的衡陽路，而那家「藥行」指的應該就是經由吳克泰介紹而與張志忠認識的李振芳開設的生春參藥行。

「李振芳出身羅東書香門第家庭，一九二六年在南京東南大學就讀時因為組織反日團體中台同志會而被檢舉入獄，一九三〇年底出獄後參加文化協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李振芳的老同志，曰據時期因為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抗日活動而遭逮捕入獄，後來也參加了台灣共產黨的郭德金先生，一九九二年十月卅一日下午在台北接受採訪時向我透露說。「台灣光復後，他自掏腰包，在羅東成立蘭陽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因為對接收官員失望，舉家離開蘭陽到台北市，在衡陽路開設一家生春參藥行。張志忠回台後就借住在生春參藥行二樓的一個房間。」

《吳克泰回憶錄》提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張志忠從上海回台以後，除了向他透露，他在上海

結了婚，把新娘帶回來了；同時也向吳克泰表示：「想到你家來住。」吳克泰雖然熱烈表示歡迎，可他卻不知為什麼張志忠和夫人後來一直沒來？一直要到七月下旬，已經進《人民導報》當記者的吳克泰才又見到張志忠時，他才委婉地向吳克泰解釋說，他和季澑沒有到吳家來住，是因為另外找到了地方。【頁一六六】

可以想見，吳克泰所說的那個地方應該就是李振芳開設的「生春藥行」。

根據一九五〇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安澄字第3684號判決書有關李振芳與張志忠關係的檔案記載如下：

一、判決正本

李振芳男年四十七歲台北市人住台北市衡陽路八號開設生春藥房

二、主文

李振芳明知匪謀而縱容之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

三、事實

李振芳與張志忠同為日本時代政治犯尤以張志忠係台共負責人曾同時被捕下獄關於張匪之政治思想李都瞭解光復後又合夥經商交誼頗篤張匪夫婦深知李雖非共黨因其不反對且同情共黨適可利用乃於去年四月向李借屋居住至破案時尚住其家

四、理由

據張志忠在保密局供稱：「李振芳不是黨員是一個同情者，他對我的思想是瞭解的，惟不知道我

的組織關係。」（見本部卷宗第一七四頁）即張匪之妻季澑（業經判死刑確定在案）亦供李振芳與張志忠在日本治時代都是政治犯同坐過監獄因李雖不是共黨以其不反對共黨所以敢在其家居住……足證被告李振芳係明知張志忠為匪謀竟以住宅借匪住居利用自應令負縱容匪謀罪責予以依法論處

在長期尋訪張志忠當年所走過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幾個曾經與張志忠有過組織關係的人的口述證言或文字回憶都指出：作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張志忠除了忙於南北奔波，聯繫抗日的老同志們，發展黨組之外，還要為黨的建設的物質基礎——籌集活動經費——盡心盡力；或者也可以說，以做生意的商人身分四處遊走，對他所從事的地下工作也是一種恰當的掩護吧！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提到，當謝雪紅把他弟弟楊克村介紹給張志忠之後，因為楊克村是個沒有參加政治活動的小攤販商人，張志忠就利用楊克村的台北住所作為聯絡站，並在那裡存放祕密書刊和物質。【頁一四一】

根據一九五〇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安澄字第3684號判決書所載，楊克村當時的社會身分是「被服商」，「住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一三五巷二十號」。他後來被捕並以「明知匪謀而縱容之者」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該判決書的「主文」載稱：

楊克村係在逃匪徒楊克煌之弟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經謝雪紅介紹與張匪志忠認識結交親密張匪曾利用其住所為與在逃匪徒謝雪紅楊克煌廖瑞發等聯絡及通信處所蓋楊克村係同情共黨者且亦瞭解張志忠之思想……

這樣看來，楊克煌的回憶大體與該判決書所載楊克村的涉案內容一致。

此外，楊克煌的《我的回憶》還強調指出，張志忠存放在楊克村台北住所的那些物質是當時上海的組織為供給台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的「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不久，張志忠說這些藥品放久了恐怕會變質，要求謝雪紅協助出售；謝雪紅就介紹張志忠找一個叫陳有傳的人，幫忙處理那些藥品。陳有傳後來還因此自己經營了一家小藥店。【頁二四二】

根據張執一的回憶文章〈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述，為了便於收購藥品，上海局在上海北京西路石門路口開設了一家聯合藥房，店面為藥房，樓上設診所，分請上海當時幾位名醫輪流來應診。【頁八二】

因此，楊克煌所說的「上海的組織」，應該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吧。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又說，後來張志忠恐怕那些賣了藥所賺來的錢會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於是接受謝雪紅的建議，讓謝雪紅和楊克煌介紹謝富去買白糖囤積起來。【頁二四八】

七月間，張志忠又對謝雪紅說：「黨有一批錢，擬買貨囤積起來或參加做什麼生意，以免偽幣貶值。」謝即說：「最近有人家大做飛機的生意，能賺錢，又是現貨，存起來也不怕貨幣貶值。」張志忠表示同意並把錢交給謝雪紅，去買接收官員故意破壞的報銷的飛機。【頁二五〇】

還有，謝雪紅曾經介紹姪女的女婿陳德旺去台中二中賣教科書和學生用品。楊克煌認為，這筆資金可能也是張志忠提供的。【頁二六〇】

《吳克泰回憶錄》也透露了張志忠曾經考慮是否接收《人民導報》的祕辛。事情的背景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人民導報》根據日據時期農運領袖簡吉提供的材料，經由記者實地調查以後，刊登了一篇高雄農民鬥爭的報導；因為這樣，社長王添燈卻被高雄市警察局長控告「誹謗名譽」，惹出所謂的「王添燈筆禍事件」。⑩

王添燈因此辭掉社長職務，《人民導報》也面臨了財務上的困境。

七月下旬，當張志忠見到當時已經進《人民導報》當記者的吳克泰時，除了肯定《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一九〇一—一九四七）的思想很進步之外，同時向他透露說：「《人民導報》經營困難想出售，我們還在研究是否接過來？」【頁一六六】

除此之外，張志忠還跟抗戰時期在大陸待過而且和皖北的新四軍有聯繫的辜金良一起做過木材生意。

為了留下歷史的證言，歷來不輕易談論自己過去的經歷的辜金良先生，終於在病臥床榻多時之後，從一九九四年三月廿四日起，前後幾次，在屏東市的住家向我口述了他個人所走過的革命道路，其中也包括了他和張志忠的組織關係的發展經過。

辜金良（一九一五—一〇〇五），嘉義朴子人。一九三五年，楊達辦《台灣新文學》雜誌時，他和同鄉好友許分曾經幫他募款、打雜。抗戰勝利後，為了等船回台灣，他在上海台灣同鄉會住了一段時間。年底，回到台灣後，他首先到台中找楊達，通過楊達夫婦的介紹，認識了舊農組幹部李喬松。他

⑩ 詳見藍博洲《消逝在三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燈》（台北：印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初版），頁一六六—一八三。

又自己去找謝雪紅。後來，楊達到台北參與《台灣評論》雜誌的編輯工作；他也經常去台北找楊達，因此認識了蘇新、王萬得、廖瑞發……等老台共。除了四處尋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還在全省各地半賣半送從上海帶回來的一批左派書報雜誌，藉此宣傳進步思想，結識同志，並瞭解台灣的社會狀況。通過賣書，他也結識了南北各地許多追求進步的有志青年。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左右，他應老台共王萬得，在台北開設啟蒙書局的吳思漢、朴子後輩李水井、李喬松的兒子李韶東……等人的要求，帶他們到上海找黨。在台灣同鄉會待了一段時間後，李偉光告訴他們，台灣需要人，要他們回台灣。他們於是就從上海回來。

從上海回來後，通過吳思漢介紹，他又認識了當時的學生領袖郭琇琮，並借住郭琇琮在台北雙連建成町的房子。不久，他就通過廖瑞發的安排，在楊克村家跟張志忠碰面。

「張志忠開誠布公的和我談話，經過幾次之後就派我工作。」辜金良含蓄地說。「因為我對做生意比較內行，他就叫我做經濟工作。我於是找來同年好友蔡得虛，一起到宜蘭羅東，做木材買賣生意。後來，我又奉組織之命，往來於上海、基隆之間，利用商人的身分做黨與上海同鄉會之間的聯絡員；木材生意就交給張志忠去和蔡得虛聯繫。」

一九五〇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安潔字第2945號判決書有關辜金良涉案的「主文」寫道：

辜金良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月參加叛亂組織受張志忠領導給予舊台幣十萬元充作資本往

來台滬經商以盈利交張運用嗣改由陳純真【蔡孝乾的化名】領導命渠定購木材二千餘石尚未取貨

這份判決書所記載的只是辜金良被捕以後不得不承認的情治單位原已掌握的情報，但堅決沒有透露他「利用商人的身分做黨與上海同鄉會之間的聯絡員」的事實，從而保護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免於更早被破壞的命運。

季鑫泉一九九三年的第一封來信曾經向我提到，季潭的家人「也曾根據她提供的地址，幾次把她需要的衣鞋物品，託一位住在霞飛路（今淮海路）呂班路（今重慶路）口四明里偉光醫院的台灣籍醫生李偉光先生帶給她們。」

李偉光醫師的回憶指出，抗戰勝利後，他只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回過台灣一次。可以想見，除了那次之外，作為「黨與上海同鄉會之間的聯絡員」的辜金良，應該就是李偉光醫師的轉託之人吧！

歡迎李偉光返台

李偉光醫師在〈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自述說：「抗戰勝利後，多年背井離鄉在大陸的台胞大多回台灣了。在台灣的親戚朋友一再催我回台灣看看。於是，我於九月十二日乘飛機回到閩別十五年的台灣。隨後，張執一也到台灣旅行。……」【頁四五】

李偉光和張執一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灣正式成立後的兩個月內相繼來台，絕對不會是單純的「旅行」或「回台灣看看」而已吧！

張執一的〈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就回憶說：「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到一九四九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灣檢查與布置工作……」【頁八七】可以想像，張執一、李偉光和蔡孝乾、張志忠等一定在這段期間碰過頭，商討了有關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工作的問題，但是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口述證言或文字資料，具體情況也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李偉光醫師的返台行蹤，透過有限的資料，我們能夠知道的大概就是以下的情況了。

首先還是李偉光醫師晚年的自述：〈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

李偉光說，他的飛機票是透過台灣銀行上海分行代訂的。也許是因為這樣，他一下飛機，出乎意料，除了家屬朋友之外，長官公署也派二名官員來迎接他，將他送到勵志社。在那裡，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和處長嚴家淦、包可永等二十多人還為他舉行了歡迎會。第二天，他去長官公署拜訪陳儀並答謝葛、嚴等人後，又在台北見見老朋友和記者。【頁四五】

李偉光見到的「老朋友和記者」應該包括張志忠和當時在《人民導報》當記者的吳克泰。

《吳克泰回憶錄》說，當時，張志忠特地要他和剛剛辭掉《民報》工作，在家專門為《自由報》寫稿的蔣時欽，一起去榮町的旅館採訪李偉光。採訪之後，他寫了長篇訪問記〈莫忘二林蔗農事件〉，介紹李偉光在二林蔗農事件的事蹟，在《人民導報》分兩天連載。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人民導報》實際負責人宋斐如看了很高興，特別嘉許他說：這種文章可以多寫。【頁一七三】

一七四】

第四天，李偉光到了台中，會見老朋友。

李偉光醫師的自述和楊克煌的回憶都提到了台中以後的行程。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雖然把李偉光回台的時間又錯誤地提前到「五、六月間」，但也提供了李偉光在台中會見老朋友的具體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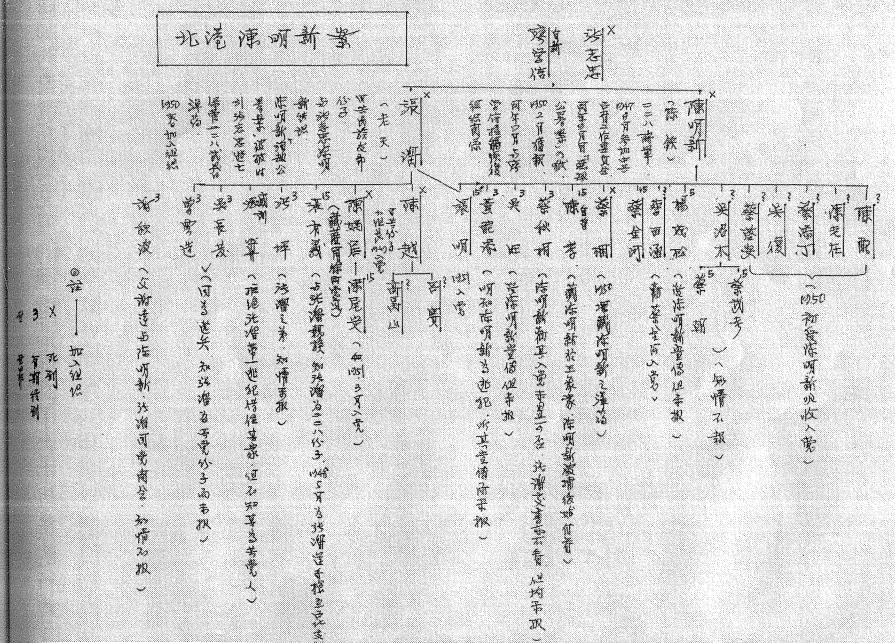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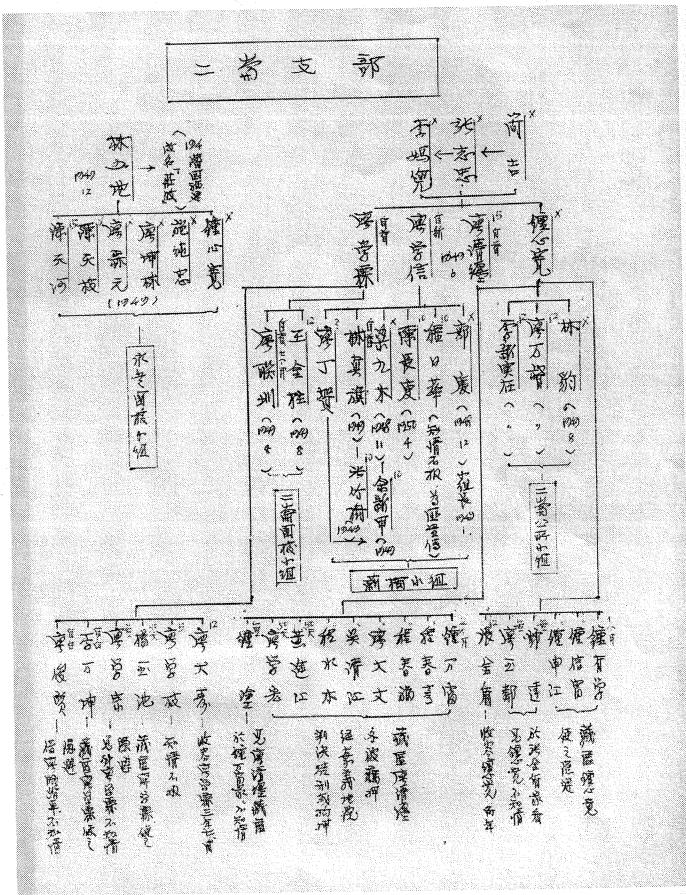
楊克煌指出，李偉光回台之前，張志忠已向謝雪紅透露說李是黨員；為了提高他的聲望，張志忠希望謝雪紅能夠在台中舉行一個歡迎會，並叫楊克煌在《和平日報》上盡量詳細給他做宣傳。李偉光到達台中時，謝雪紅和楊克煌就在中央書局經理莊垂勝當館長的台中圖書館召開了一個五、六十人參加的歡迎會。會上，謝雪紅致了歡迎詞，李偉光也講了話。楊克煌也把會場的情況寫了一篇報導在《和平日報》發表。李偉光然後就回到故鄉二林，舉行蔗農事件遇難志士和故亡同志追悼會，並訪問故舊。楊克煌也派了一個記者隨行採訪，報導了他在家鄉受到群眾歡迎的熱烈情況。【頁二五七】

二五八】

李偉光醫師自述，隨後，他又南下高雄，會友座談。最後，再回到台北。九月底，他在離開台灣返回上海之前，特地去向陳儀辭行；他乘機向陳儀談了失業嚴重、農村疲弊、民怨沸騰等在台期間的所見所聞。陳儀顯然不以為忤。當他離開台北時，嚴家淦還親自到機場送行。【頁四五】

訂婚前後

根據季澐寫給江蘇南通的父母的家書所述，一九四六年九月，她在學校開學前就已經南下，到嘉義商業職業學校任教。與此同時，張志忠與她約定於十月十日國慶日訂婚。



廖清纏手繪張志忠與北港陳明新組織（右）的系統表與「二崙支部」組織系統圖（左）。

官方的檔案記載與相關證人的口述在在顯示著，訂婚之前，張志忠依然四處奔波，進行著繁忙而緊張的地下工作。

首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九月，張志忠持蔡孝乾的介紹函，往晤日據時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一九〇三—一九五二）。簡吉於是與張志忠開始聯絡，並協助他推展嘉義、臺南等地區的群眾工作。【頁七二】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我來到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頂迦塘的廖厝，第一次採訪日據時期擔任過日本赤色救援會殖民地對策部幹部，光復初期被選為台南縣參議員，後來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繫獄十五年的廖清纏先生（一九〇八—一九九五），就在那次的採訪中，當時剛剛年過八十的廖老先生向我透露，當年，台灣地下黨在西螺地區的地方組織就是簡吉帶領張志忠去找他而發展起來的。

「以前，簡吉在農組時，我和他曾有幾面之誼。但是張志忠我卻完全不認識。」廖清纏先生說：「當時，我對國民黨政權十分不滿，又苦惱自己一個人力量單薄，無法有所作為，正苦思要用何名目來對應。因此，簡吉和張志忠的到來，讓我非常高興。我和張志忠談話相當投機；之後，他有時一個月來兩次，或者幾個月來一次。我聽他談起在大陸的生活，覺得大陸的社會情況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張志忠和我談到，他在大陸工作時都用走路，因為交通不發達，地又大，經常都是拿著指南針。我因此注意到他的兩腳的小腿肚圓滾飽滿，像台灣拉人力車的車夫。我知道他是真正想做事的革命者，就介紹在公所任職總幹事的鍾心寬和擔任學校教員的廖學霖與他認識。他們兩位都是光復初期找我共組『二崙三民主義新青年團』的熱血青年。我們於是在他的指導下一同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及研討時事。這之後，我們另起名稱，組了『二崙鄉愛國青年團』。當時正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情勢

非常緊張，我們也小心謹慎地發展組織；一方面加強理論學習，一方面強化組織；我們以三人一小組、三小組一支部的方式來發展組織，組織成員也擴大到在學校、公所、水利會及農會任職的青年。二二八之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我們的組織已經有五、六個小組，於是就從『二崙鄉愛國青年團』易名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二崙支部』，對外活動。一九四八年底，張志忠親自帶李媽兜來我這裡；之後，張志忠的領導工作便由李媽兜接任。」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說，一九四六年九月，張志忠也介紹了後來負責所謂「鹿窟武裝基地」的陳本江到台中找謝雪紅。他又說，在此之前，他曾經主動向張志忠提出他想加入國民黨，以便做中、上層統戰工作的意思；到了九、十月間，張志忠同意了他的想法。【頁二六〇、二六五】

《吳克泰回憶錄》提到，九月底，張志忠批准了他吸收的李登輝入黨，並指定吳同李單線聯繫。

【頁一六八】

這些，僅僅是有跡可循的部分史料而已。

張再添先生保存多年的季滙遺存的最早一封家書，紀錄了張志忠從十月八日到十月十三日的行蹤。信在當年複印條件幾乎沒有的情況下不可能是複印件，看得出來是她為了留底而細心謄寫的。

十月八日，張志忠在生春藥行接到父親病重的電報，立即搭乘約需七小時的快車，從台北趕回嘉義鄉下。

十月九日，張志忠到嘉義商業職業學校，向季滙說明，因為父親病重，訂婚日期必須改期。

日赴台南，舉行訂婚儀式。他同時告訴她，嘉義到台南的火車需要一個半鐘頭。

十月十二日，張志忠和季澑在台南文化街美寶大酒店訂婚。

季澑在家書中向父母親稟報：「介紹人是他帝大兩同學，四桌酒席，全是他的朋友同學，一張訂婚證書，兩只白金戒指，儀式簡單。」

這裡，所謂「帝大兩同學」，應該是她基於工作上的保密需要而說的善意的謊言吧！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指出，自從謝雪紅把台南的陳錦雲介紹給張志忠之後，張即利用位於臺南鬧區一家大酒店附近的陳家作為聯絡站。【頁二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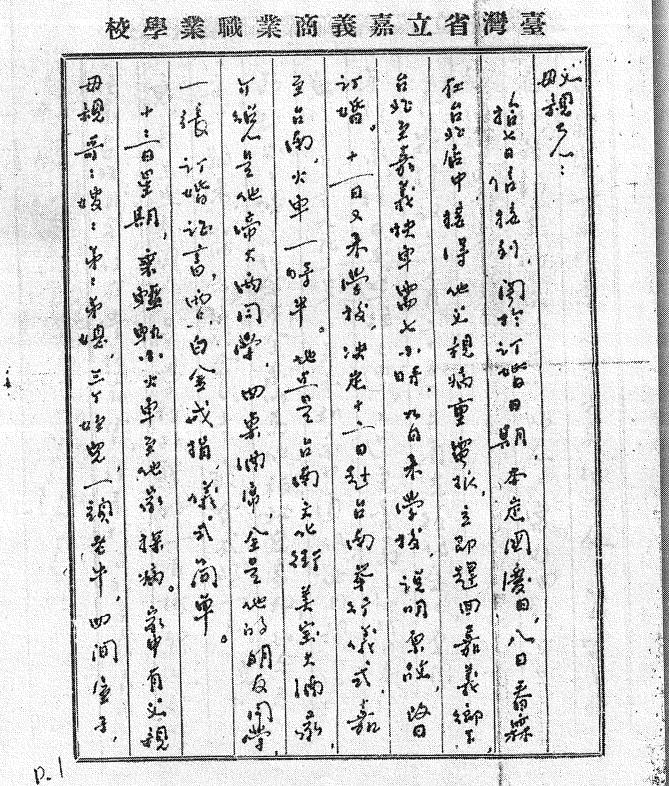
那麼，張志忠和季澑舉行訂婚儀式的美寶大酒店恐怕就是陳錦雲家附近的那家大酒店吧。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季澑跟隨張志忠搭乘輕軌小火車回到嘉義新港，探望生病的公公。她在給父母親的信上詳細報告了當天所見的張家的情景，以及她所受到的對待：

家中有父親、母親、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三個姪兒，一頭老牛，四間屋子，一個倉房，一家均是忠厚老實鄉下人，把我當個洋娃娃看待，殺雞宰鵝，幾乎忘了病人。

當晚，張志忠陪季澑回校；在火車上，張志忠提議十月廿五日台省光復紀念日結婚。季澑向父母親解釋，張志忠的理由是：

當年離家，從日本逃往大連，大連至青島，處於日本警察監視之下，是九死一生。十年未和家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季澑寫給父母親的第一封家書（首頁）。（張再添提供）

通訊，他母親逢年過節都哭哭啼啼紀念他，全家以為他被祕密處死，如今光復，安然歸來，所以光復紀念日是最合適的一天。

但是，基於三點原因，季澐不同意這個日子：

一、學校的聘約一月底終止，如果住家台北，目今住在學校宿舍，往來於台北至嘉義間，通車麻煩。

二、嘉義無冬天，台北氣候寒冷，需穿棉衣。

三、我家屬來台需十一月始能抵達。

兩人辯論很久，沒有結論。最後，兩人同意等季澐的大弟弟季永泉來台後再做決定。

從信的內容來看，季澐的這封家書是在十月十七日接到父母親詢問結婚日期的信之後的回信；除了向父母親稟報從訂婚到結婚日期未定的經過之外，她還說了以下諸事：

楊君希望並歡迎永泉來台旅行一次，上海至基隆，招商局有不定期的海天、海黃、海宇、海宙等萬噸大船，船票通船是八千元，一、二等艙約二、三萬元，膳食自備，船行三十幾小時即可到達。現今基隆、台北多雨，氣候已冷，台灣長衫已絕跡，永泉可帶絨線衫穿在西裝內，帶秋季大衣可以應付至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盼望來時先來信通知我，於上海買得船票時，立即拍電至嘉

義。我可通知春霖，請他由台北至港口接永泉，由北至南，旅行一次……。

春霖已準備好一樟木箱，內裝台省土產，俟有便船赴滬，將奉送二位大人與祖母大人，同妹亦有禮物。永泉倘來代表家長，一定奉送大席一條，待永泉他日結婚時用。

嘉義近日仍似不熱的夏天，文旦、橘子滿街都是，可惜無熟人返滬。鑫泉學工，繪圖儀器是否已買好？倘未買，兒可於舊貨攤上以一二千元買日本儀器奉送。

前次所拍之照片，因天雨關係，沒有一張清楚的，還是永泉當一次欽差大臣，親自來看楊春霖的尊容。台灣山明水秀，處處溫泉，火車四通八達，惟一遺憾是遍地工廠，目今很少冒煙，因而治安不見佳，小偷如毛。

大人曾有信謂兒無恆心，一定指不從事新聞工作又作教書匠，實則當一名官報記者，味同嚼蠟，上司明是處處提拔重用，換句話說就是出賣良心，顛倒是非，還是教書清高。目今結婚日期未定，待永泉來台後再決定。

「從季澐給我父母的信，他們好像是在赴台之後在台灣結婚的，」季鑫泉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的上海浦東來信上談到自己對姊姊與姊夫結婚日期的看法。「但實際上按楊揚出生的年月，大概要早一點。」

根據季澐的家書，楊揚的出生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

南通家裡收到信後，很快又在十一月六日寫了一封信過來；季澐於是在十一月十一日又給父母親寫了回信：

父母親大人：

六日信已收到。關於永泉來台事，大人恐交通不便、言語不通，實則並無多大困難。上海招商局每月約有兩三隻船開基隆，船票不貴，伙食自備，所麻煩的即是須在上海等船，至招商局打聽船期。基隆至台北，每天有二十幾班火車對開，時間只有二、三十分鐘。基隆碼頭離車站不遠。目今在基隆、台北，只會說國語的沒有什麼困難，不然可用筆寫，台灣由於過去教育普遍，不識字的人很少很少。永泉來時只要帶來去旅費十萬元法幣⁵⁷左右或多至二十萬元，（一定要帶關金⁵⁸才不會吃虧）在台旅費兒可承當。現今商校，兒薪金很高，近六千元台幣，每月只用半數左右。台幣與法幣之比例，現官價是一比三十五，暗市一比三十或二九。什麼地方調換，不十分清楚，待寫信給楊問問明白，再行奉告。不過，永泉來時，務必於知道船期後拍電至嘉，我可去台北或基隆接，不然，徒加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台北市榮町一丁目二十七番地（近公園亦近火車站）之生春行，是個很大的進出口貿易行兼藥店，永泉可以找到楊君或是趙尚定君。楊君不在店中的時候多，趙君一定在。永泉可暫打尖在那裡。趙先生人很和氣，一定會好好招待。倘楊、趙二人都不在，可以暫息生春行。

帳子倘帶麻煩，就請大人買珠羅紗和細絨線一磅，用紙包緊，多包幾層，外用一布袋，詳細寫「台灣台北市榮町一段二十七號生春行趙尚定先生收」。倘箱中放不下的被單，也可打包裏，只是不好寄航空，台灣包裹全是郵寄，約半個月可收到。上海偉光醫院的李先生，兒不認識，是趙先生的朋友，所以不便請他多帶東西，能寄包裹的還是寄包裹好。

關於鑫泉，因前日有一朋友自台回北平，那位是北平人，想鑫泉平地生疏，舉目無親，故已寫一名字給那朋友，有空或去清華看伊。望大人寫信與鑫泉，可順便提起：北平市北新橋財神廟甲七號北院，傅春木先生。傅先生為人很厚道，鑫泉可抽空去拜訪一次。多個朋友有益無損。聽說

北平氣候不佳，夏天酷熱，冬天極冷，非穿皮大衣不可。買衣服時可以請之顧問。

今天已是十一日，母親大人想已回家。通地恐已寒冷。嘉市如秋天。聽說台北近日常下雨，永泉必需帶雨衣。寫了許多，倒忘了說，衣服、袍子可照容妹的做，不過要短半寸，身腰略小些，不要做花花綠綠綴邊的。兒不是省工錢，實在台灣女人都是穿洋裝，做長衫的裁縫手藝一點不高明。從前日本人禁長衫，所以台灣男女都是不穿長衫，個個洋氣十足。台北女人愛漂亮，學穿長衫，結果是歪領不計其數，大小長短不一，不敢領教。所以被單、帳子、大衣、皮鞋，盼望大人買時以經用耐久為主，花花綠綠是其次。台灣棉織品之貴，使台灣人望而興嘆，上海來台者不願

⁵⁷ 法幣，即法償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兩個月後加中國農民銀行）的紙幣為法幣。法幣發行後，即逐步貶值。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中央銀行發行的關金券投入流通。同年七月一日，實行統一發行，法幣的發行權集中於中央銀行，除新疆銀行一直繼續發行省鈔外，各省銀行的紙幣限期結束。

⁵⁸ 關金，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政府發行的關金券，以海關金單位為單位，專供繳納關稅之用。大多採用直型形式，正中印有孫中山像，背面印有上海海關大樓圖案。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一關金折合法幣二十元的比價，與法幣同時流通，成為紙幣。一九四八年八月發行金圓券後停止使用。

一九〇〇四年二月九日下午，我在上海浦東季鑫泉先生的家裡跟他見了最後一面。那天，已經罹患癌症多時的季先生告訴我，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在北京清華大學求學的時候父親曾經來信告訴他說，姊姊季澐要結婚了，家裡總得有個人去。季鑫泉先生說，當時，抗戰期間參加新四軍，後來因病在家療養的哥哥季永泉（一九三一—一九八二）於是就奉父母之命，在年底前往台灣。

「隔了幾十年之後，我曾經問永泉哥哥在台灣的情況；」季鑫泉回憶說：「他說，姊姊沒有舉行婚禮，他也只見過姊夫幾次，兩夫妻老是搬家……。」

目前，我們能夠知道的是，簡單的訂婚儀式舉行之後，結婚日期未定，張志忠又忙著展開組織建

二二八前夜

這裡應該注意到，「上海偉光醫院的李先生，兒不認識」，這句話，應該不是事實；季澐之所以這樣寫，恐怕也是地下工作者為了維護組織的安全性而不得不如此之故吧！至於趙尚定與傅春木究竟是誰？或是何人的化名？乃至於他們與季澐和張志忠的關係如何？因為始終找不到可問之人，也就無法瞭解了。

福安！

買。今夏兒做幾件長衫，是價格貴，布質劣，衣領歪，針線細粗不一。

明日校中放假，可以休息一日，至附近溫泉洗澡，餘言續稟。專上敬祝

因人相上人，今日信已收到。關於水泉未回事。上人恐未回。不復言。此空。
通。定期並無多大困難。海陸商船每月約有三隻船回基隆。船
票不貴。少食自備。呼麻鳴的即是。現在上海乘船至基隆的打聽船
期。基隆至台北。每天有二十艘船。大車時間。時間只有三十分鐘。基
隆碼頭離車站不遠。自今在基隆登船。內會往回搭船。由竹圍到
雖。不能不用筆寫。古書由於過高被剪掉。不能寫的人。惟有找
少。水泉未回。需帶來者銀員十萬。法幣。或為多少。一
文。在台旅費。或。承當。現金兩千。新金銀兩。送。十元。當。即
期。用。半數。十。另。半。五。此。則。客。半。此。三。五。賜
市。一。此。三。此。三。半。磨。世。方。調。便。不。分。消。楚。手。寫。信。給。楊。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季澐寄給南通父親的第二封家書（首頁）及信封。（張再添提供）



設的工作。

如果不考慮時間問題上的錯亂，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提供了這樣的訊息：

十月月中旬，張志忠向謝雪紅傳達黨要她到台北參選國大代表的訊息。【頁二六七】

十月三十日，張志忠到台中向楊克煌宣布：黨已批准楊克煌入黨，沒有預備期；並要楊克煌過幾天到台南找他。十一月上旬，楊克煌到臺南陳錦雲家，見了張志忠及其他幾人。【頁二六六】

《吳克泰回憶錄》也提到：

大約在十月中旬，張志忠來通知他說：「省工委要成立直屬的新聞記者小組，並把你編進去，有人會帶我的條子來找你……」幾天後，《台灣新生報》副總編孫萬枝就帶著張志忠的條子來找吳克泰了。孫萬枝告訴吳克泰：「我們新聞記者小組共有三人，另一人是徐淵琛小組長。」由於孫萬枝和徐淵琛都是《自由報》的同仁、老熟人，又是新聞界的的老前輩，所以吳克泰很高興。從此以後，他們就每星期六過一次組織生活，輪流在孫家、徐家和吳家開小組會。【頁一七九】

根據一九四三年三月日據時期的興南新聞社編輯、出版的《台灣人士鑑》所載，孫萬枝，一九〇六年生於臺北州海山郡中和莊，先於日本山口縣就讀中學校和高等學校，然後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一九三四年二月進入興南新聞社，擔任「論說委員」。徐淵琛，一九一二年生於臺北州，一九三一年台北第二中學校畢業，一九三九年七月進入台灣新民報擔任「社會部記者」，一九四二年九月轉任「興南新聞社基隆支局長」（台灣新民報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改為興南新聞）。【頁二二八、一九九】

另外，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諜李媽兜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

十一月，地下黨臺南市工委會成立，李媽兜任書記，陳福星、陳文山分任市委。李媽兜是在本年由崔志信介紹與張志忠而入黨的，張志忠並介紹李媽兜與省委書記蔡孝乾相識。其後，「李匪組織，深入我鄉鎮基層，我主要行政幹部，大部為其吸收……」【頁一三五、一三七】

關於李媽兜（一九〇〇—一九五三）的身份背景，據國史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李媽兜案史料彙編》所載，他出身台南大內鄉窮苦家庭，十八歲從公學校畢業後曾任公學校教員、新化糖廠雇員和新化街役場（鎮公所）巡視員，但總因不滿殖民地的民族歧視而和日本人打架，並且因此去職。二十幾歲結婚後靠岳家資助，在新化營商，不久加入文協並坐過七個月的牢。出獄後，他渡海福建，開西藥房為生。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前往龍岩，參加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派赴廣東抗日。戰後回台，一度靠朋友陳福星等人的幫忙做小生意維生。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間，他透過一位義勇隊員的介紹，認識了張志忠，並在張志忠的介紹下加入共產黨。十月，李媽兜與陳福星、陳文山成立「臺南市工作委員會」，李媽兜任書記，陳福星和陳文山分別負責組織和宣傳，同時通過張志忠聯絡，由蔡孝乾領導。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工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又載，這年（一九四六年）冬天，前東區服務隊隊員、台大法醫室主任蕭道應（一九一六—二〇〇二）與「廣東東江縱隊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志忠。【頁二〇八】

十二月廿四日，北京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

在大陸各大學學生蓬勃展開反美運動的熱潮中時序進入一九四七年。

一月二日，行政院明令禁止大陸各大學學生針對美軍強姦北大女生事件展開反美運動。

雖然如此，《吳克泰回憶錄》指出，台大外省籍同學不但在校園裡張貼上海報紙相關報導的剪報，同時發動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本省學生因不瞭解國內形勢，起先持觀望態度；當時身兼台大學生與《中外日報》外勤記者身分的吳克泰於是居間溝通，雙方便聯合起來，在一月九日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高喊「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等口號。藉由這次遊行，台灣學運終於和大陸學運合流了。

吳克泰特別強調，在遊行之前，他謹記張志忠曾經特別提醒過他：「組織遊行時最重要的是要組織好遊行隊伍兩邊的糾察隊」。另外，當天，他也看見張志忠像路人一般經過新公園會場，從地上撿起一張傳單就走了。第二天上午，他還在酣睡的時候，張志忠來了。他代表省工委給了吳克泰地下黨的最高榮譽——正式口頭表揚。然後，他又交給吳克泰兩項重要任務。一項是成立台北市學委會，由吳克泰任書記。張志忠同時向吳克泰表示：台北市工委書記會帶他的條子來找吳克泰具體談學委組織的事；有些地方的學生代表準備來學習這次學運的經驗；吳克泰原來的任務、職務、單線聯繫對象都不變。……不幾天，台北市工委書記帶張志忠的條子來找吳克泰。吳克泰認得，這人經常到《自由報》來找老台共蕭來福（友山），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那人自我介紹說，他叫廖瑞發，原來是老台共；他又說，台北市委第一任書記是黃石岩，雖然很積極，很勇敢，但開展工作時辦法不多；因此改任他為市工委書記。他又說，張志忠在中南部開展的工作很有進展。

張志忠交給吳克泰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接待、掩護來自延安的長征幹部程浩夫婦，及同來的上海交通員林昆。談完話，張志忠就帶吳克泰到新公園西面的一家旅館，把程浩夫婦和在上海台灣同鄉會當幹事的林昆介紹給他。程浩夫婦還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大兒子。吳克泰就僱了幾輛人力車，把他們帶到家裡，把最好的房間讓他們住。後來，蔡孝乾（化名老陳）常來看望他們，張志忠也來過。

「張志忠並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來幹什麼的。」吳克泰回憶說，「我一直猜想，這麼年輕的長征幹部從延安派到台灣來，一定是要幫助地下黨開展游擊戰的。」【頁一八七—一九七】

關於程浩夫婦的身分，張執一的〈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回憶文章透露：

程浩夫婦是在上海局之下從事祕密機要工作的同志。他們是上海局組織部長——原周總理為首的重慶局（也稱南方局）委員兼組織部長錢瑛同志，由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帶出來搞機要工作的。程浩夫婦初抵滬時，曾由我派他往台灣工作委員會搞機要工作……。【頁八二—一八四】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寫道：二月初，張志忠又到台中找謝雪紅，告知以後由林英傑（廣東揭陽縣人）和他們聯繫。【頁二七六】

關於林英傑的背景，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許振庠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

林匪英傑，係朱毛匪黨台灣省籍幹部，於卅五年由匪華東局選派來台，以教員為掩護，曾在台

中、台南負領導責任，吸收匪徒，發展工作……。【頁四五】

二月二十七日，張志忠南下嘉義。當天，在中山路開了一家一陽書局的許分把寫好的自傳交給他。

「我是透過童年好友辜金良的介紹而認識張志忠的。」一九九三年元月六日，許分老先生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他家樓下的咖啡店向我敘述了他和張志忠認識的經過以及共同戰鬥的歷史。「台灣光復後，我在嘉義中山路開了一家一陽書局。因為販賣進步書報的關係，一些從大陸回來的社會運動家，我指的是像蔡孝乾、張志忠這樣的人物，幾乎都去過書店；可他們並不表明真正的身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最初，張志忠向我表示：他姓吳名梗，叫吳梗。他人長得高壯，看起來是個生意人。後來，跟他熟了後，他才跟我談中共過去的革命如何幹！在談話中，他偶爾會向我透露他在『東海縱隊』做過的工作，並且要我和他一起做點事。我看他做事情俐落，行動敏捷；他走路很快，我跟他一起走，走一走，一轉角，他就不見了；他跟我約會一定守時，非常認真。我想，這個人跟一般台灣人不一樣，不是簡單的人物。後來，我和張志忠有了組織關係。他要我寫自傳，準備入黨。入黨的審查很嚴格，要寫自傳交代過去的歷史。就在舊曆新年過後不久，記得是舊曆二月初七吧，我把自傳交給他。然而，就在我把寫好的自傳交給他的當天晚上，台北延平路發生了緝菸事件的暴動。第二天，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我入黨的事就暫時擱著。我於是跟隨張志忠身邊，全力投入組織群眾武裝鬥爭的工作。」

領導雲嘉南的武裝鬥爭

據香港阿爾泰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所載，情治單位認為「自三十五年四月至三十六年二二八，為中共『省工委』的初期立足時期」，而它們所掌握到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當時的組織發展情況是「只建有『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台中縣工作委員會』，及臺南市、嘉義市、高雄市三個支部，所屬中共黨員僅有七十餘人……。」【頁三三〇、三三一】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僅有「七十餘人」的地下黨，尤其是負責武裝工作的張志忠，面對這場突發性的群眾運動，又是如何應對介入的呢？

本身不是地下黨員但與地下黨有密切聯繫的日據時期老左派楊達認為：

這段時間中國國民黨把社會搞得亂七八糟，引起二二八事變。當時群眾基礎極強，不是幾個領袖可以搞出來，而是自動自發的。台共當時剛剛開始向學生及工人發展左派組織，一點力量都沒有；到二二八發生，就把過去被日軍抓去當軍伕的返台人士，發展成武裝組織，跑入山上，但勢力極其薄弱。⑤9

在組織關係上曾經由張志忠單線聯繫的吳克泰，透過自身的經歷，從側面解釋了這個問題。根據

他的說法，事變期間，他是在三月一日下午才透過當時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第一次同黨組織取得了聯繫。

《吳克泰回憶錄》寫道：

廖瑞發來通知我說，根據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要求，我們已經組織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台北市的武裝鬥爭做如下分工：一部分黨員全力準備組織武裝鬥爭，另一部分黨員進行宣傳工作，聯絡地點在蓬萊閣前黃石岩家。從此，我就白天聯絡、組織群眾設法尋找武器；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消息。我自己刻蠟版、油印，讓學生們到市內各處去張貼。我從廣播中聽到台中、嘉義、高雄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台灣地下黨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指揮的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進行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頁二一二—二一三】

關於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領導的武裝鬥爭，包括當時跟隨在他身邊一起戰鬥的同志、家鄉父老或安全局機密檔案都留下了不同視角的證言、傳說與紀錄。

一般說來，寫文章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歷史的，一個是邏輯的。按時間順序推演就是歷史方法，根據理論的需要分條分段就是邏輯方法。

由於目前可見的史料的零碎與雜亂，這裡，我們也只能藉著全面整理這些說法不一的材料，按照

時間順序推演的歷史方法來寫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的戰鬥。

首先是在事件發生後就跟隨張志忠身邊，全力投入組織群眾武裝鬥爭工作的許分老先生的證言：

從收音機聽到台北暴動的消息後，我就帶領張志忠前往我的故鄉東石拘留所；我們身上只帶了五、六枝手槍就接收了拘留所，並放走所有關押在裡頭的犯人。

在前述的《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中，二二八事件後被抓去關了十三個月，白色恐怖時期又被抓去關了二十一年的朴子人蔡耀景，從旁觀者的視角敘述了東石現場的具體情況及其個人的看法：

三月初一晚上，東石區署的兵器庫被一群蒙面的人搶了，整群整群的人都圍到鎮公所去。我看見那些人把兵器搬光，向他們質疑說：「你們把兵器搬光，那地方治安如何維持？」他們說：「你不必煩惱這些，我們自會發落。」他們似乎是有組織的，都不讓人靠近。……

張榮宗是當日去搶區署的青年之一，他們當時都覆面，後來才傳說出來，當時約有三四十人。……

⁵⁰ 〈楊達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收錄於葉芸芸《證言二·二八》（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月初版），頁十四。

聽說他們這些人和新港張志忠同系統，自稱自治同盟，他們搶武器是為了自治同盟日後使用。

【頁三二六、三三五、三四〇、三二七】

張榮宗（一九〇八—一九四七），嘉義朴子人，出身東京日本大學，雖是地方望族富農家庭子弟，日據時期卻與左翼勞農運動人士頗有交情；光復後，他被派任為朴子鎮副鎮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朴子區隊區隊長兼《和平日報》東石分局長。⁶⁰

《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收錄了張榮宗的次女張秋梧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受訪時的證言：

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朴子的人很尊重他。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父親組了一支義勇隊，那時等於自治，沒有警察，義勇隊出來負責朴子治安。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門去的。

父親可能知道這回出去就不能回來，出門前交代我母親，如果他沒回來，某些書類資料要燒掉……。【頁三〇一、三〇三】

許分的證言進一步透露了張榮宗與張志忠的關係：

張榮宗和我可以說是二二八期間張志忠在嘉義地區的左右手。據我所知，事件當時，張志忠統

籌南部的武裝鬥爭。其中，台南地區由李媽兜負責，我只知道他是黑手出身的舊農組，也是個江湖人，計畫印鈔票，破壞台灣經濟秩序；但不知道他是如何牽到張志忠的。斗六由陳篡地負責；嘉義由我負責。我們彼此知道，但互相沒有橫的聯繫；一陽書局是聯絡中心。家住台中的謝富則是蔡孝乾與張志忠的聯絡人。後來，張志忠透過嘉義林務局課長張朝邦與我聯繫；張朝邦是南投竹山人，光復後從大陸回來，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人；我們之間從來沒有書面聯絡，每次會面都是通過聯絡人約好時間和地點。

雖然許分沒有具體談到斗六地區負責人陳篡地的背景，但是，陳篡地卻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三版刊載的一篇題為〈反省的結論〉的自首分子談話中詳細自述道：

我是雲林縣斗六鎮人，現年四十六歲，民國二十一年畢業於日本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除在日本大阪坐牢兩年，和抗戰末期當過日本海軍軍醫一年以外，一直在斗六鎮經營眼科醫院，約十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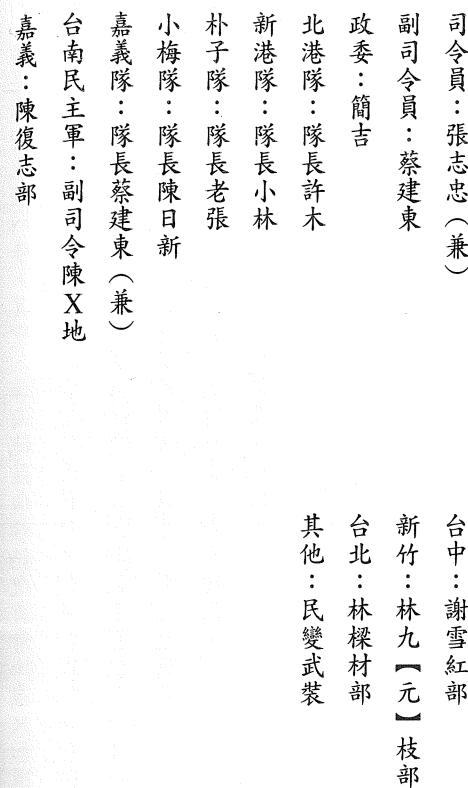
我祖父和父親是中農，而且是反日失敗者，所以我從少年時代就抱有反日觀念，民國二十年我二十五歲時，為了尋找反日的途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壓迫，而開始研究共產主義，而從外圍

⁶⁰ 李筱峯《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一九九一年元月，第一版五刷），頁二三四—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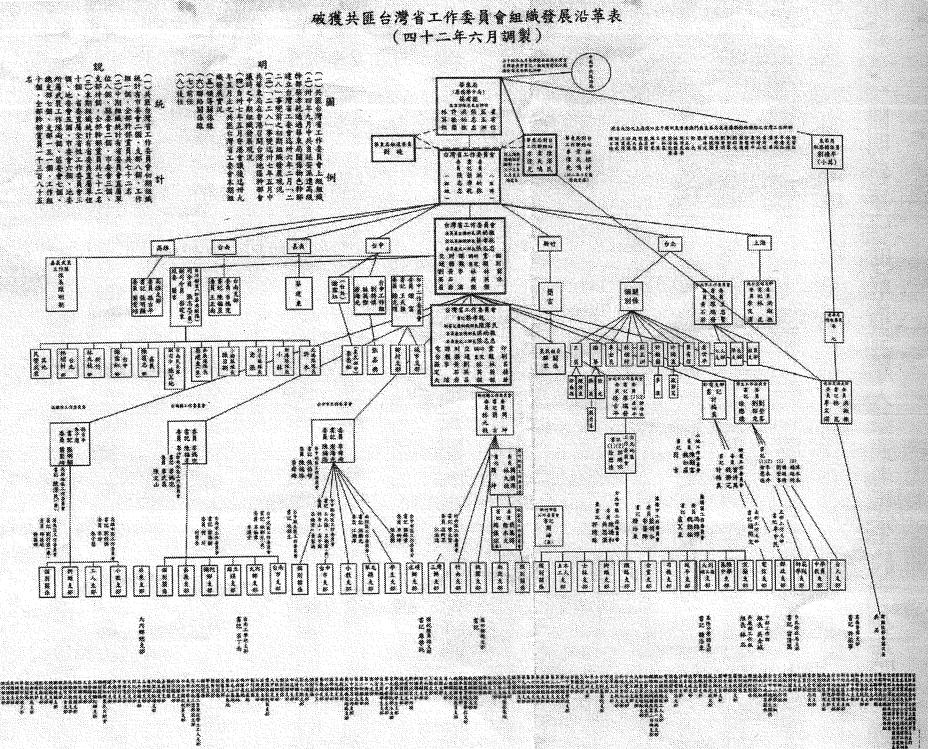
組織，進而加入日本共產黨，被日本軍閥察覺後，遂於民國二十二年被捕兩次，終於坐牢，至民國二十四年始被釋放。

民國三十六年不幸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為了感情衝動，並沒有考慮到不幸的後果及共匪的陰謀擾亂，起而參加。

一九五三年六月，調查局製作的「破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沿革表」，繪製了一幅以張志忠為首的「自治聯軍（即嘉南縱隊）」組織系統圖：



一九五三年六月，調查局編製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圖表。



這裡，我們有必要針對份「自治聯軍」的組織圖表做進一步的理解。
「當時，我和張志忠都用假名活動，『許分老先生』說。『所以，當時也沒多少人會知道許分和張志忠吧。』

那麼，可以想見，這份組織圖表的情資來源應該都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情治單位從被捕者有所保留的口供中逐漸拼湊出來的拼圖吧！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說明這份「自治聯軍」組織圖表的「副司令員」兼「嘉義隊隊長」蔡建東的身分背景。如果根據許分的證言內容來看，蔡建東就應該是許分，而「朴子隊隊長老張」就是張榮宗了。

至於「小梅隊隊長陳日新」，也沒有任何相關的資料提到這個人。但是，我們可以在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省工委會雲林地區組織陳明新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看到如下相關的記載：

陳匪明新又名陳鐵，於民國卅六年「二二八」事變時，參加張匪志忠（另案伏法）所組織之偽「自治聯軍」，負責領導嘉義支部實行暴動。【頁三〇三】

這樣，我們也可據此大膽判斷：「陳日新」應該就是陳明新吧！根據同一檔案所載，陳明新是雲林人，國民學校畢業，職業是小販。

關於陳明新，「陳明新案」的政治受難人蔡武考先生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告訴我說，據他所

知，陳明新的岳父吳丁炎是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外圍團體「北港民生社」的代表，光復以後，擔任北港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因為這樣的歷史因緣，張志忠常去找吳丁炎，從而認識了陳明新。

那麼，官方資料所載的「北港隊隊長許木」又會是誰呢？

蔡武考先生說，張志忠領導的自治聯軍的北港隊隊長是余阿木（一九二四—一九四七），副隊長是許壬辰（一九一九—一九四七）；余阿木是拳擊高手，在日本讀中學時曾經代表台灣隊拿到第二名；許壬辰則是柔道五段。

根據《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收錄的余阿木的叔伯堂兄余焜煌的證言所述，余阿木原名余炳金，因為自小就被叫「阿木仔」，「當時在北港幾乎每個人都認識阿木仔，『余炳金』就很少人認識。」

余焜煌說：

阿木仔北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不知道怎麼牽，和許壬辰等一起到日本留學，他和許壬辰交情很好。……在台灣，他們這一群留學生仍常在一起。……二二八事件發生，他曾來台北。他們那一群，……可能有組織，……他們在台北事件發生後，一路南下，經新竹、台中都有他們同黨的，南下到嘉義就回北港了。【頁一六六、一六七】

復後，他考上警官講習班第一屆；先後擔任嘉義縣警察局督察、嘉義地方法院書記官。林玉英女士追憶許壬辰在二二八期間的行蹤說：

他在法院任職期間遇到二二八事件。事件發生後，他出門就沒回家，去哪裡我也不知道。聽說他組織了一個民團，……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有一群人，可能看不慣政府的作為，平時就有在談論政治，事情一開始他就回北港去組織這些人，阿啟仔、阿木仔好像都是他的部下，跟隨著他。【頁一八〇、一八二、一八三】

綜合上述三人的證言，我們應該可以推測，調查局繪製的以張志忠為首的「自治聯軍（即嘉南縱隊）」組織系統圖中出現的「北港隊隊長許木」，其實是在情報掌握不足的情況下誤把許壬辰與外號阿木仔的余炳金當作同一個人的結果吧！

最後，我們再來探討有關「新港隊隊長小林」的情況。

關於事件當時新港地方的領頭人是誰？《嘉雲平野二二八》收錄的民眾證言也存在著不同的說法。首先，在新港公學校高張志忠一屆的新港鄉民陳天送認為是在地方上執業代書工作的李廷芳（一九一二—一九四七）；當時在新港執業當醫生的林玉鈞則說是後來「被槍殺於北港溪大橋旁」的林金城。【頁二三〇、二六二】

總之，二二八期間，雲嘉南地區的人民武裝鬥爭就在張志忠的統籌之下同時展開了。

從三月二日到十日的戰鬥

近年來出版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多如牛毛。其中，一九四九年三月，香港智源書局出版的「莊嘉農」所寫的《憤怒的台灣》，算是出版時間最早的民間的相關著作。莊嘉農，其實就是投入二二八的鬥爭而於事件後流亡的老台共蘇新的筆名。站在民眾史的立場，這裡，我們主要根據《憤怒的台灣》的記事，同時參考其他事件主要參與者的回憶證言及官方說法，以歷史的方法逐日敘述。

三月二日：

嘉義市發生暴動，人民編成數隊，分別攻擊官舍、市長公館與警察局，獲得不少武器。

晚上，斗六和虎尾兩地方的青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擊區署及警察派出所，奪取武器，武裝自己。斗六建安醫院院長陳篡地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斗六區隊長陳海永等連夜召集鎮民及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舉行民眾大會，號召由南洋返台的原日本兵、學生、青年等，共同組織「斗六治安維持會」，陳篡地擔任召集人。

台南方面，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一隊隊的青年學生忽然襲擊各處警察派出所，警察自動放下武器。

三月三日：

嘉義方面：上午，嘉義市舉行市民大會，組織「嘉義處理委員會」，接管電台，並藉由廣播向全市及全台各地募集志願軍；處委會下設「防衛（作戰）司令部」，司令部下面有：高山部隊、海軍部隊、陸軍部隊、學生總隊、海外歸來總隊、社會總隊等等。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陳復

志（出身保定軍校工兵科）擔任處委會主任委員兼作戰司令。下午，各部隊合攻第十九軍械庫，經一點多鐘的激戰之後，完全占領，接收一切武器及軍用品。晚上九時，市民已完全占領市政府，台籍警察大部分也攜槍參加起義。

「斗六治安維持會」成立「自衛隊」，維持地方的治安，保護外省同胞。虎尾武裝青年開始進攻虎尾機場的警備隊，三百多名警備隊軍人不堪一擊，退入機場內的堡壘，雙方相持不下。

臺南方面：早晨，舉行市民大會，決議支持台北市民，要求懲凶，同時要求改革台灣省政治，立即實施縣市長民選。晚上，工學院學生召開學生大會，決議參加鬥爭，立即編成一隊，趕到台中，協助台中守備第三飛機場。

三月四日：

嘉義方面：早上，人民軍各部隊開始大規模進攻國軍營房，營房裡面的軍人和憲兵隊支撐不住，退到山上嘉義中學。人民掌握了嘉義市的軍、黨、政各機關，以及水道、電力、電報、廣播電台、鐵路交通。退到嘉義中學的國軍、憲兵、官僚們未經喘息就再受人民軍的追擊，又慌慌亂亂地退到國軍在台灣最大的軍械庫——紅毛埠。人民軍得到竹山、斗六青年部隊的急援及台中的彈藥供應，擁至紅毛埠，開始猛攻。

「斗六治安維持會」派「自衛隊」到嘉義市，協助維持治安，並加入戰鬥，將國軍趕到紅毛埠。通過這次戰鬥，繳獲甚多槍械彈藥，武裝力量更加強大，於是重新整編隊伍為「斗六警備隊」，由陳篡地擔任總隊長。虎尾民軍則與國軍繼續在機場內外相持不下。北港自治聯軍成立，成員有數百人，先後馳援虎尾機場、紅毛埠及水上機場的戰鬥。

台南方面：上午，市民及各校學生聚集西門市場前，遊行示威，沿途高呼「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對內戰」、「打倒貪官污吏」、「要求台灣自治」等口號。下午，日據時期曾出征南洋歸來的青年分成數隊，分別襲擊各警察派出所、第三監獄及警察保安隊，繳獲許多槍械彈藥，並俘擄警察局長。天未黑，人民已經接管了臺南市大小機關。

三月五日：退據紅毛埠的國軍在危急之際假向人民求和，人民軍不知是計，接受求和，立即停戰。但是過午時分，由台北飛來一架飛機，向國軍陣地投擲相當數量的彈藥和糧食，國軍立即向人民軍開火。人民軍一時應付不及，犧牲了三百多人。在雙方混戰當中，市面忽然出現數量卡車，滿載著武裝青年，卡車兩旁大書特書著「台灣民主（自治）聯軍」，到處粉碎國軍，於是人民軍士氣大振。晚上，斗六、鬥南、台中、竹山各地民軍陸續抵達虎尾，與虎尾民軍合流，編成聯合部隊，圍攻退據機場的國軍，最終攻破機場，繳獲許多武器。

三月六日：「台灣民主（自治）聯軍」領導相對沒有組織的嘉義人民軍繼續圍攻紅毛埠的國軍；嘉義一切男女學生也都出動協助，男的參加戰鬥，女的編成救護隊，救護負傷者。午後，虎尾、斗六、林內的聯合部隊趕到林內附近的坪頂山山麓，包圍兵敗流竄的國軍，最終逼使國軍投降。於是，斗六、虎尾、林內地區的戰鬥告一段落。

三月七日：阿里山吳鳳鄉的高山部隊加入作戰，經前後三晝夜激戰之後，國軍終於把軍械庫炸毀，全部退到飛機場。「台灣民主（自治）聯軍」與人民軍一點也不放鬆，直追至飛機場。國軍得到從台北空運來的武器及地方仕紳送來的食米、蔬菜和豬肉。嘉義飛機場的攻防戰於是開始了。

三月八日：機場的國軍得到來自台北的第二次空運補給。嘉義市處理委員會與國軍達成和談協

議，既恢復機場的水電供應，又沒有繼續軍事行動，高山部隊於是決定撤回阿里山。

三月九日：機場的國軍得到來自台北的第三次空運補給。

三月十日：民軍展開最後一次的機場攻擊卻已無濟於事。嘉義地區的戰鬥也就這樣結束了。^①

民間的傳說與官方檔案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時年八十三歲，日據時期參加過農民組合並且坐過三年半的牢的李鹿老先生（一九二一一？）的口述證言，從另一個側面敘述了張志忠在二二八前後的武裝活動的腳蹤：

我一位親戚名叫李明珠，被日本人調去大陸當通譯，戰後約一年才回台灣。……【我】曾透過李明珠閱讀一些左翼刊物如《群眾》、《文萃》等，並經他介紹認識一些從中國回來的台灣人「半山」，……。

我到嘉義找朋友時，曾見過張志忠，張志忠問起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較講義氣，家裡兄弟較多，可以脫離家庭的青年，如果有的話招募幾個隨他到山裡練習槍擊。不久二二八就發生了。

……我莫名其妙，在想是什麼方面發動的，那時交通都中斷，李明珠向人家借了一輛摩托車，和我兩個人到嘉義探消息，時間大概是三月三、四日左右。有人說二二八的活動，並不是咱們發動的，是民眾自發性的運動，我們應該趁火加油。嘉義有張志忠在，我們去找他，之後，張志忠問我們要不要留在嘉義，李明珠說他要回糖廠，我留在嘉義，那晚就住在朴子的旅舍。張志忠帶

領的一隊武裝青年，看起來很神勇，那些青年是自己組織的，都很會用槍，自日本時代被調去南洋做兵、做軍俠，是經過訓練的，很會打仗。

隔天早上四、五點，由張志忠帶領四五輛卡車武裝青年，自嘉義出發，叫我帶路，到台南縣鹽水、學甲區署、佳里糖廠、麻豆庄役場、下營糖廠、南門區署，最後到新營縣政府去搶東西，主要是搶金庫及槍，警察局的保警都跑光了，有些被押到派出所取槍，聽說拿了幾十枝長槍。……

回到朴子時天色已經暗了，晚飯還來不及吃時，有人來通報國民黨的兵從後面追來了，朴子南邊溪邊有條二次大戰時開的壕溝，我們躲在壕溝後面，等國民黨的兵到時開槍射擊，沒有開幾槍，國民黨的軍隊就退走了。

我們回朴子後，又聽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調動軍隊，可能會回來包圍我們，張志忠已經準備向斗六山上撤退。我那時沒有和他們一起行動，張志忠叫我回台南探探動靜，順便看看臺南的電話線能不能破壞掉……。^②

^①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重印初版一刷），頁一三三—一三五。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初版一刷），頁一〇一—一一二。

^②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一刷），頁一〇一—一〇八。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諜李媽兜等叛亂案」的檔案載稱，李鹿是李媽兜的「直接聯絡員」。【頁一三六】另外，「匪諜李義成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又載，「李匪珠，經由李匪鹿之介紹，認識李匪媽兜而加入匪黨。負責李匪媽兜與李匪鹿間之交通。並在新營糖廠建立支部。」【頁一三九】

事隔四五十年之後，張志忠家鄉新港的鄉民依然流傳著各種各樣有關他在二二八期間的傳奇，人們採錄的口述證言至少就有以下幾種說法。

首先，警察出身的林玉鏡在《嘉雲平野二二八》的書中說：

在二二八事件中，新港當時有四十幾個青年，在收音機中聽到日文廣播，都到嘉義去參加那邊的事。……他們佔據了駐所（警察派出所），機關槍架在圍牆上。……新港這些青年，去過虎尾，參加攻虎尾機場的行動。也有去嘉義市的嘉義機場、紅毛埠等地。他們應該就是新港人張梗所領導的自治聯軍。……很可能他回來就是在組訓這些二二八的人吧。二二八最後一戰就是張梗領導的。【頁二六六、二六七、二七一】

鄭坤霖未刊的〈此生死而無悔的張志忠〉寫道，「率先參加張志忠領導的武裝行動」的新港青年就是那個與張志忠過從甚密的大興村的何石池。

《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也收錄了自稱「有看到過」蘇新所說的「台灣民主聯軍」的鄉民陳天送的口述證言：

新港這裡沒有組自治聯軍，那是別的地方組起來的。臂上繫著紅色臂章，就自稱起自治聯軍來，威風凜凜，幾個人配著短槍，並沒有穿軍服。【頁二三二】

許分透過親身的戰鬥經歷見證了陳天送有關「臂上繫著紅色臂章」的說法似乎有點接近事實，同時證實了張志忠親率隊伍攻打水上飛機場的行動：

張志忠把嘉義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組成自治聯軍。每個隊員都佩有臂章，我和嘉義人賴象各做一半。那時候，局勢很亂。我人面闊，身邊有一批人，大部分是從外地回來的原日本軍兵。張志忠看到局勢黑煞煞，就帶著農組領導人簡吉去我那裡，把這些人組織起來，五、六個人一路，去攻飛機場；張志忠和簡吉也親自去打戰。

根據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察廳所編的《警察沿革志》所載，賴象在日據時期是老台共所屬赤色救援會的成員。他和張榮宗顯然也有頗為密切的交情。

張榮宗的次女張秋梧在《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中說，她們姊妹叫賴象「阿興叔」；張榮宗出門前也曾交代妻女：「如果沒有錢買菜時，去『阿興叔』家拿」；後來，張秋梧也「曾去他家拿三千元」。【頁三〇三、三〇四】

安全局機密文件的檔案也證實了許分關於簡吉和張志忠的戰鬥關係的說法。《歷年辦理匪案彙

編》第二輯「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簡吉於日據時代，即已參加台共組織，且曾發動農民運動，任台共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被日本政府先後逮捕多次，禁錮十餘年。

台灣光復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等職，三十五年九月，由匪「台灣省工委會武工部長」張志忠，持匪書記蔡孝乾之介函往晤（蔡與簡係遠在「台共農民組合」時相識），於是簡吉之叛國思想復熾，遂與張匪開始聯絡，並協助其建立嘉義、台南等地區群眾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又幫同張匪組織「自治聯軍」……。【頁七二】

聯繫台中方面的武裝力量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欄，針對「匪方」在二二八的武裝行動的失敗評價道：

匪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領導之台中謝雪紅部，及嘉義之張志忠部，因無聯絡配合，又互存依賴心理，各自為戰，致遭全部覆沒。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頁十八】

關於張志忠與台中方面武裝力量的聯繫情況，安全局的官方說法是否屬實？我們似乎還應該先看看一些主要的歷史當事人在不同時候、不同地方所做的證言，才能做出判斷。

目前可見的這些證言最起碼包括：

一九七一年，楊克煌在北京所寫的《我的回憶》。
一九八一年，楊達應邀訪美兩個月期間向旅美學者何珣（倪慧如）口述的「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

一九八八年十月至九〇年七月間，自稱二二八期間跟隨在謝雪紅身邊的古瑞雲在紐約《亞美時報》以《和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為名連載的回憶錄；一九九〇年九月，此回憶錄再由台北人間出版社以《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為名出版。

九〇年代，所謂「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出版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

然而，或者因為事隔太久而致記憶有誤，或者因為立場、動機的差異，我們發現這些證言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同。

事情顯然相當複雜。

誰對？誰錯？

在沒有確切的史料證據之下，我們只能按照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把不同的人在不同時候、不同地方所做的證言同時陳列，從而試著從中看出比較接近事實的歷史圖像，也從中看出其間存在的矛盾。

1. 地下黨不與謝雪紅和楊克煌聯繫？

首先，我們要釐清的是楊克煌和古瑞雲所說的關於地下黨不與謝雪紅和楊克煌聯繫的問題？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追憶說，張志忠在事件爆發前的二月初改派黨人林英傑和他們聯繫，但是當他們從廣播中得知台北發生暴動的消息之後，卻無法及時與林英傑聯繫。楊克煌寫道：

二月初，張志忠【忠】來找謝雪紅，說我們以後要由林英杰【傑】（廣東揭陽縣人）來和我們聯繫。……林英杰和我們聯繫後，與張志忠一樣，他每一、兩個禮拜來找我們一次，但沒有規定日期；他也同張志忠一樣，沒有告訴我們他本人的住所及聯絡的地址。……

二月廿八日下午，謝雪紅叫我即刻到永豐商店問謝富是否能與林英杰取得聯繫。謝富說他也不知道林英杰住在那裡，但他答應代我找。……到深夜，……謝雪紅告訴我，她也去找過謝富，和他交換了意見，並打聽林英杰的消息，謝富答應代我們找林英杰。……【頁二七六—二七八】

古瑞雲依據「二二八事件後匿居大肚鄉時」謝雪紅「親自」對他說的話，在《台中的風雷》側寫了謝雪紅與人民協會骨幹在三月一日的對應之道：

三月一日台北電台廣播，號召全民起來戰鬥，是日楊達、鍾逸人印發傳單並倡議召開市民大會。

傳單未署名，所以謝雪紅也不知是楊、鍾二人所為。同日，謝雪紅、楊克煌召集人民協會的骨幹——林兌、謝富、李喬松（這三人都先後加入了中共）等人研究對策。會上意見不一，多數人認為黨的力量薄弱，不應介入，更不應公開露面；有的主張等待省工委下達指示再行動；謝雪紅、楊克煌則斷定事態必然發展成全民性的武裝鬥爭，並主張積極投入運動，帶領群眾鬥爭。最後大家為謝、楊所說服。【頁五一—五二】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又說，他們在三月一日當天仍然找不到林英傑，從而無法和「黨」聯繫：

三月一日上午（這一天是星期六啊！），謝雪紅叫我再去永豐問謝富找到林英杰【傑】了沒有？……

隨後，我去永豐找謝富，他還是找不到林英杰。——此時，黨的領導在那兒？黨的方針如何？黨的指示是什麼？？？……

謝雪紅叫我下午再去找謝富一次，告訴他在這個緊要的時候找不到林英杰，叫我們怎麼辦呢？……謝富還是說找不到林英杰。……

十六時許，【後來擔任二七部隊隊長的】鍾逸仁【人】來找我，給了我幾張小傳單——約二寸寬、三寸長——內容是：三月二日上午九時，在台中座舉行市民大會，但傳單上沒有註明主辦團體。

解放後，我們在上海時，始得知這些傳單是林英杰在楊貴【楊達的本名】家領導搞出來的。當時，林英杰藏在楊貴家，謝富也同他們有聯繫。這是地下黨做的事，不給我們知道是可以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林英杰不同我們聯繫，又不給我們指示，讓我們自己去亂撞，到後來武裝鬥爭時也不給我們協助，……等等這是為什麼？

當晚，謝雪紅和我均感到一場革命風暴終於來到了，她最後再叫我說：「你是不是再去永豐跑一趟。」我說：「我已和謝富講好了，他如找到林英杰，就會來告訴我們。」

革命前夜，謝雪紅告訴我：「我們和黨得不到聯繫，不瞭解黨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總是臨機應變吧！但要慎重一些，……。」【頁二七八—二八〇】

楊克煌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所寫的這段回憶，不但沒有提到古瑞雲所說的他和謝雪紅「召集人民協會的骨幹——林兌、謝富、李喬松（這三人都先後加入了中共）等人研究對策」的事情，反而又提出了一個需要我們詳加調查研究並加以分析的歷史問題：

地下黨的聯繫人林英傑不但不同他們聯繫，又不給他們指示，讓他們自己去亂撞，到後來武裝鬥爭時也不給他們協助；但是卻和並非黨員的楊達積極而密切的聯繫。

如果楊克煌所說的果真是事實的話，我們難免要問：

地下黨為什麼刻意不和謝雪紅、楊克煌聯繫，卻與不是黨人的楊達有那樣密切的合作關係呢？

2. 關於傳單的印製與密訪楊達的「神祕客」

就楊達當時在台灣文化界的身分、地位而言，可以想像，事變期間，崛起的群眾是不可能讓他聞著的。然而，一直到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初期赴美訪問之前，歷史都不允許楊達有詳述這段經歷的條件。楊達在一二八期間的活動，因此就一直隱逝在歷史的迷霧當中，不曾浮顯。

一九八二年，楊達應邀訪美。在美國訪問那兩個月，雖然旅途勞頓，可他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精神愉快，因為在那裡他可以說他想說的話，寫他想寫的東西，心裡不會有顧忌。⑩

就在那樣的情境下，楊達透過接受旅美學者何煦的採訪，比較詳細地談到他在一二八事件期間的經歷：

一九四七年一二八事變在台北剛發生時，我在台中發出明信片大小的傳單，抗議一二八暴行。當時也沒同「台中人民大會」「台中的人民協會」交涉，就把它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發出去，連議員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大家湧到台中戲院開會，也不用排節目，就

^⑩ 陳春美〈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達〉，《前進廣場》第十五期（台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頁四一五。

紛紛上台發揮。只消幾個鐘頭把台中的憲兵和軍隊武裝解除，這個情形維持了四、五天。……那段時間，台中組織「處理委員會」派我負責組織部，隨時印傳單，過去國民黨控制的農會、工會和學生會，很快地都自治了。⁶⁴

受到政治禁忌的限制，楊逵在美國訪問期間的訪談錄並沒有完全說明事情的真相，僅只透露了一點事情的表象而已。

關於傳單的印製過程，楊克煌提到的那個把傳單給他的鍾逸人在九〇年代出版的回憶錄詳細寫道：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星期六中午，……不意在民族路繼光街口遇見楊逵，他……告訴我，他們【張煥圭、莊遂性、何集璧、葉榮鐘、吳天賞、張深切等七八個人】已經在中央書局二樓成立輿論調查所，要調查一般人對昨天台北發生的不幸事件的反應和看法。……

楊逵一口氣將這一兩天在台北發生的事件經過說完了以後，接著又說，他正想去印「輿論調查卡」，身上帶的錢不夠。

我不待楊逵說完，便說錢我有，不過調查輿論要調查到什麼時候。不如利用明天星期日上午，巫永昌、張深鑄和台北蔣渭川、張晴川等人的「政治建設協會」，預定在台中戲院舉辦的「憲政演講會」，將之改為市民大會，直接訴諸民眾，……。

楊逵當即點頭表示首肯，……臨走時我告訴他，我現在就去白鳩堂印傳單通知召開市民大會。

到白鳩堂已是一點二刻，隨即交出稿件指示紙張大小，鉛字粗細，張數等，並要求即刻付印，我要在那裡等候。……大約二點半的時候，楊逵又拿一張短稿來，付印五千份。

我因內急，……跑到洗手間，出來時已印好四千，我即命先行裁剪，我要先拿出去分發。……回到白鳩堂又印好兩千，我隨請楊逵先帶回去分發。我則一直守候到一萬張統統印好，楊逵所交印的文件也印妥付帳後，便把傳單搬上自行車，朝往火車站，……。

已經快【深夜】三點了。……【我】改朝著「中商」校門斜對面小巷口進去。……楊逵不知道什麼時候，……遷到這小巷子盡頭右側那棟日式宿舍來。

房裡的燈光還亮著，……楊逵夫婦兩人還在那裡等什麼似的。不待楊逵問我，我便自動將離開白鳩堂以後的事情一一向他們報告，楊逵聽完了我的報告，又將他的計畫及今天一個晚上所做過的事情，詳細說給我聽。

……

忽然間，玻璃窗——「碰」！「碰」兩聲，有人在敲窗子，楊逵卻已衝到視窗，半打開著玻璃窗，跟外面的人開始討論問題……。從他們兩個人的討論內容和口氣聽來，外面的人一定跟楊逵很熟，而且楊逵的主張，彷彿處處都占上方。對方的很多計畫，很多案都給楊逵很不客氣地加以

否決，加以拒絕。

然而他是誰呢？更深夜靜，冷風刺骨，站在外面近一個小時，楊達始終未請他進來，他自己也未曾要求要進來。……他操著濃重的泉州腔調，必定是「阿山」，然而一個「阿山」卻一再強調應趁著大家不滿「阿山」的時候去進行，去做。到底要做什麼？要怎麼進行？

楊達的答覆卻很乾脆，始終一貫，「不行」、「不可以」、「你不懂」。……

「神祕客」走了以後，房裡又暫時回復平靜，……

我迫切地想知道剛才那位「神祕客」是什麼人？他自己是「阿山」，卻要求我們對「阿山」如何何。他到底是誰？可是楊達四十年來一直守口如瓶，始終未曾透露這位「神祕客」的真正身分和名字。⁶⁵

如果鍾逸人的這段證言都是耳聞眼見的事實的話，那麼這個「操著濃重的泉州腔調」的「神祕客」，應該就不會是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所說的廣東揭陽縣籍的林英傑了。這樣的話，楊克煌的「這些傳單是林英杰【傑】在楊貴家領導搞出來的」說法，也就不可能是事實。

雖然「楊達四十年來一直守口如瓶」，「始終未曾」向鍾逸人「透露這位『神祕客』的真正身分和名字」。可事實上，他卻早在《辛酸六十年》出版前的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向旅美學者何煦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時就已經透露了這位「神祕客」的真正身分和名字，以及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楊達說：

在處理委員會控制台中好幾天時，台共【省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來找我。他對局勢很有把握，要辦人民日報，並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一旦國民黨大軍開來，烏合之眾隨即會散去。因此我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組織的基礎可作通訊員和傳播；……⁶⁶

3. 謝雪紅願意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

由於海峽兩岸長期處於不正常的對峙狀態，歷史的情況顯然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得多。在無法明白釐清一些有爭議的說法的現實下，我們還是暫且把這些問題擱置，按照歷史的方法來看待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與台中方面的聯繫吧！

如果根據謝雪紅的愛人同志楊克煌「得到謝雪紅同志的很大幫忙」而於一九五六年由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所載，台中地區三月二日以後的事態發展是這樣的：

⁶⁵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新增訂版第一刷），頁四三一、四三二、四三四、四三五、四四五、四四六。

⁶⁶ 前引葉芸芸編寫《證言二·二二八》，頁十五。

三月二日上午，台中市人民舉行市民大會，向全市發出聲討蔣介石的號召，群眾隨即遊行示威，包圍警察局，押收武器，並下令專賣局台中分局移交人民管理；下午群眾逮捕台中縣長劉存忠，舉行萬人公審大會，然後把他關進台中監獄。當天晚上市民組織武裝隊伍，推舉謝雪紅同志為領導，隨即襲擊蔣家的軍警機關，並通過電台號召中部地方人民舉行起義，消滅蔣政權。

三日，台中市民的武裝隊伍，宣布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負責領導台中縣下的武裝鬥爭。……台中市第一次成為人民的城市。【頁二〇二】

二一·二八期間跟隨在謝雪紅身邊的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則說：

她【謝雪紅】參加第二天的市民大會，上台演講，隨後帶領群眾遊行。事態的發展果然如她所料，即刻演變成武裝衝突。

發展成武裝衝突後，市長黃克立派人四處造謠說：國軍即將進入台中市進行鎮壓，意圖以此嚇退群眾。結果適得其反，覺醒了的群眾，為了保衛自己家鄉，紛紛前來教化會館向市民大會主席謝雪紅請戰，於是成立了「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與此相反，剛剛成立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們聽了謠言，嚇破了膽，各自逃散。

三月三日，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各武裝隊伍在作戰本部統一指揮下攻克了所有台中市黨、政、軍、憲機關。【頁五二—五三】

從楊克煌與古瑞雲兩人的證言對照來看，我們發現：即便是「宗派」立場相同的人，對同一件事的記憶也是有所出入的。那麼，立場不同的人的回憶有意無意所造成的差異也就不是太奇怪的事了。這也是我們在張志忠自己沒有留下任何紀錄的情況下不得不就現有的證言、檔案加以比較分析的理由，而這自然形成我們的敘事無法順暢進行的障礙。因此，接下來的敘事我們僅就提到張志忠的材料加以引用，其他無關主題的材料就只能暫且不提了。

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說：

三月四日，一度鳥獸散的【台中】處委會委員們，重新集合，再次掛起牌子，他們企圖控制人民武裝，邀請謝【雪紅】加入處委會當委員，同時設作戰部（或「武裝部」？），任命吳振武為部長，謝為參謀。

謝雪紅雖曾在莫斯科勞工大學受過軍訓，但無實戰經驗，此時正苦於無力指揮迅速擴大的大部隊。此時，她所盼望的張志忠來了。儘管蔡孝乾不承認謝為中共黨員，謝卻自以為加入了黨，並願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張曾任新四軍團長【？】，對敵工作部副部長，有實戰的豐富經驗。他於一九四六年帶著中共使命回家鄉後，除積極準備建立游擊基地外，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在嘉義電台職員中建立一個以黃文輝（現在上海）為核心的外圍組織。所以他能夠在事件發生後迅速裡應外合占領電台，同時組成「嘉義自治聯軍」。謝渴望他來台中指揮戰鬥，但張已在嘉義扎根，無法脫身。對處委會，謝原想不理，可是張勸她與之合作。理由是處委會中有一些人有聲望，有影響力。可借助他們的社會地位籌糧籌款。她同意張的規勸，參加了處委會，但後來她埋

怨張志忠「對台灣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投機性估計不足」。【頁五三—五四】

《吳克泰回憶錄》透露的張志忠在三月四日的行蹤顯然否定了謝雪紅認為張志忠「無法脫身」的說法：

那一天【三月四日】深夜，張志忠已經從中南部趕到了桃園，聽說台北的起義計畫都已準備停當，只等一聲令下發動了，就在桃園過夜。【頁二四六】

吳克泰的證言也間接說明：調查局一九五三年六月繪製的那幅以張志忠為首，包括「台北：林櫟材部」的「自治聯軍（即嘉南縱隊）」組織系統圖，確是事實。如果根據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所述，三月五日，一大早，張志忠又從桃園趕往台中。楊克煌寫道：

三月五日，【上午】十點左右，張志中【忠】來【作戰本部】找我，因屋裡人多，我出去外面同他談話。首先，我以埋怨的口氣對他說：「你們要我們交出指揮權，看以後怎麼辦？」張說：「不要灰心，我們以後還要組織，……。」我說：「現成的東西都不要了，以後要怎麼組織？」張又叫我快把所有手頭上的武器盡量疏散到農村去，……。【頁三〇五】

4. 張志忠建議組織「二七部隊」

三月六日，謝雪紅、楊克煌與張志忠商量後決定成立二七部隊。

古瑞雲聽從謝雪紅指示，當天進入二七部隊。他在《台中的風雷》回憶說：

就在第二天【三月六日】，有人向謝傳話，說：「昨晚，吳振武擦洗手槍時，不慎走火打傷了自己的腿。」……從此不見吳的人影。……

事至於此，謝、楊與張志忠商量決定，挑選最精良隊伍集中起來編成基幹隊伍，並命名為「二七部隊」。他們還商定，一旦蔣軍反撲，就將二七部隊和自治聯軍分別撤入埔里和竹山。

他們的策略正與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對台廣播（後於三月二十日以〈台灣自治運動〉為題，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相符。該文說：「……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要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

他們還計畫在條件成熟時，召集全島各地武裝隊伍首領來二七部隊組成聯合指揮部。【頁五四】

關於二七部隊的成立，楊克煌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寫道：

勝利的中部地方人民，也因在四日下午被處理委員會奪去武裝領導權，無法繼續再對南部地方派出支援武裝，革命的勞動人民和學生不得不另組織「第二七部隊」，準備鬥爭到底……。【頁二〇七】

一九七一年，楊克煌又在《我的回憶》中進一步敘述了有關二七部隊的內容：

【張志忠離開作戰本部的】當天下午，鍾逸仁【人】來告訴我，他要把原來的獨立治安隊伍擴大組織「二七部隊」，繼續接受我們的領導，地址設在原日軍「八部隊」營舍。……

「二七部隊」於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舉鍾逸仁為隊長，黃勝卿為參謀。黃文輝率領的嘉義隊員也來參加。地下黨謝富介紹何集淮、蔡伯壠等都來參加了。【頁三〇五、三〇七】

關於二七部隊的成立時間，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的說法顯然與楊克煌和古瑞雲出入甚大。按照他的說法，二七部隊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時」成立的，與此同時，他也在原「民主保衛隊」全體隊員一而再的「雷掌之下」，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之職，然後邀請黃信卿（楊克煌說是黃勝卿）擔任參謀長，吳金燦任自動車隊長，中、分隊長則由參謀長視各人資歷、經驗選派。【頁四八〇】針對二七部隊的成立與命名，古瑞雲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出版的《台中的風雷》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說：

我們事變後流亡香港，檢討往事，楊克煌說，二七部隊是他命名，並請鍾逸人任隊長的。鍾逸

人在《辛酸六十年》中說，二七部隊是他命名，並被黃某推為隊長的。究竟是誰命名，他怎樣當起隊長的，我以為無關緊要。……

謝、楊的意圖（或許也是張志忠的意圖）是：建立全島性的人民軍，進而建立自治聯合政府，以既成事實逼迫蔣家王朝承認。

……

二七部隊……其中有個嘉義隊（隊長黃文輝是中共黨員，張志忠的親信）是信得過的，何集淮、蔡伯壠（二位也是中共黨員）也在那裡。

……二七部隊本是一支道地的「紅軍」，也可謂謝雪紅的「御林軍」，祇是鍾逸人自己蒙在鼓裡而已。……

後來知道（事變後）何集淮在鄉下躲，一個時期以後，和蔡伯壠兩人去嘉義接受張志忠直接領導。【頁五五—五七、一〇二】

這裡，因為何集淮已經病逝，我們也不妨聽聽楊克煌和古瑞雲都先後提到的「蔡伯壠」的說法。

根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〇~七〇年代文獻專輯》研究計畫之一《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收錄的〈蔡伯壠先生訪問紀錄〉所載，蔡伯壠，一九二七年生於台中縣大甲鎮，畢業於日據下五年制的台中商業學校，光復後曾任台中州終戰聯絡所義務翻譯官，後來與何集淮同任台中商業學校國語教師。

蔡伯壠說：

由於何集淮之兄長何集壁為日治時期台中一中學潮的主要人物；台灣光復後，……我有機會認識當年抗日人物楊達、葉陶、張文環、謝雪紅等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部分台中商職學生即是受到我們的影響而加入的。……當時，我與何集淮率同中商學生，參與鼓吹民主自治之工作。

三月五日，我進入二七部隊時，由鍾逸人管理部隊，部隊人數四百二十餘人，古瑞雲為隊長，何集淮任參謀，我則與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擔任文宣工作，為追求理想而努力，常漏夜刻鋼板，使用油印機印製傳單，於清晨時散發。三月十二日，陳儀的援軍廿一師登陸基隆，……二七部隊乃撤離台中，退入埔里繼續抗爭，……至十七日，陳儀軍隊逼進南投縣，……由於勢孤且無望，二七部隊乃化整為零而解散。

當時，我與何集淮同行，……步行至繼母的娘家東勢石岡，暫時躲避，待風聲漸鬆，再至豐原近郊。三月下旬，與何集淮二人前往嘉義之父親接收以生產咖啡豆為業之日產赤司農場（今嘉義蘭潭畔之咖啡農場）。何集淮於晚夏離去，我仍住在父親的宿舍，俟平靜後覓職謀生。【頁三一七】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蔡伯壠被捕入獄；一九五八年五月出獄。在接受訪談的一九九八年八月，反戒嚴令已經解除十一年了。雖然如此，從談話內容來看，事隔五十年後，曾經繫獄十年半的蔡伯壠先生顯然還是餘悸猶存的；他不但沒有交代他和地下黨的關係，更沒有提到他和張志忠的實際接觸情形。

我們能夠因此而否定楊克煌和古瑞雲的證言的真實性嗎？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上海外語學院接受葉芸芸女士採訪時，針對葉女士所問「二二八事件

當中台中地區的武裝部隊是怎麼組織起來的？」，到大陸後改名周明的古瑞雲回答說：

說實在的，【台中地區的】武裝力量完全是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的，大多是三五成群自己組織起來後來找謝雪紅的。有的是個人來找謝雪紅，就聽她指揮，當時她坐鎮在「作戰本部」。吳振武那兒也有一批人，大半是台中師範的學生，鍾逸人也有一批人。這些隊伍後來匯成「二七部隊」，隊名是楊克煌取的，因為事件是發生在廿七日晚上，為紀念這個日子取的部隊番號。

後來逃亡途中，謝雪紅告訴我，組織二七部隊是當時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的建議。張對謝說，群眾自動自發成立武裝力量很多，有必要建立自己能夠信任能夠控制的武裝力量，也就是基幹民兵部隊。張在抗戰中在新四軍擔任團長，有很豐富的游擊隊經驗。⑯

5. 鍾逸人關於張志忠的描述

鍾逸人在一九八八年脫稿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也提到了他和「張志忠」實際接觸的一段情節：

⑯ 葉芸芸〈二二八事變中的謝雪紅——訪周明談謝雪紅、「二七部隊」、吳振武和鍾逸人〉，前引葉芸芸《證言二·二八》，頁卅四。

【三月六日】大約八點前我被一陣「報數」的聲音驚醒。原來天一亮就有從各地來的五、六個隊伍前來報到，每隊人數不一，分子參差不等；……一支來自嘉義，一律著日本警察留下來，胸前釘有兩排金鈕黑色毛大衣，頭繫白頭巾自稱「台灣自治聯軍」的隊伍，隊長張志中，高一六〇公分，年約三十，膚色略黑，朴子人。他一見到我便自我介紹他曾經參加過「新四軍」。什麼「新四軍」？我從未聽過。因此對他的特殊來歷一直未加重視。他似乎是一位善體人意，老於世故，懂得如何鼓勵士氣，如何指揮部下的「將才」。他要求部下以立正不動姿勢恭聽我的訓話。

然而此時我已沙啞，……奈何張隊長（志中）熱心非常，令人感動，苦苦要求我無論如何，即使象徵性的鼓勵，也可以提高他們的士氣和戰鬥精神。……我開始講話。然而說些什麼連自己的耳朵都聽不見，張志中卻將自己的耳朵湊近我的嘴邊，我說一句，他就很規律地向後轉，將我的話大聲傳給他的部下。這樣反覆約二十分鐘，我便將他們交給參謀長，經參謀長調撥部分人員及裝備給他們以後，仍派他們回嘉義助戰。【頁四九三—四九四】

鍾逸人關於張志忠的描述，顯然包括名字、身高、年紀和家鄉等四個與事實不符的錯處。如果說名字和家鄉之錯，或因同音筆誤與張的偽稱，情有可原；但是，身高和年紀之說卻不能不讓人懷疑：鍾逸人筆下的「張志中」會是真正的張志忠嗎？

針對這點，鍾逸人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日寫的〈風雷魅影——給古瑞雲的一封信〉（收錄於《辛酸六十年》附錄一），關於張志忠的描述，也已改為「年約四十，中等身材，膚色黝黑，自我介紹是朴子人，『新四軍』出身的張志忠」了。【頁六六二】

另外，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又提到，他在「嘉義方面的起義發難」之後，就已經接到「『自治聯軍』的張志中及他的同伴」的「報告」。【頁五〇六】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在組織中，鍾逸人的地位就應該是相當於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之流的人物了。這點，相信鍾逸人自己也不會承認的！問題是，如若背後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的話，一個人能有什麼通天本領去組織、領導這樣一支人民武裝隊伍呢？因為這樣，對我們理解張志忠的生命史而言，鍾逸人關於「張志中」的這段「證言」，除了「僅供參考」之外，也就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了。

5. 楊達透露的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的祕辛

一九八二年，楊達在美國向旅美學者何煦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時也透露了一段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再次被捕以後獲悉的有關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的祕辛。楊達說：

……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張志忠）負責攻占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

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火車駕駛員遞信，是有其事，不過信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⑤6}

如果楊達上述關於張志忠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的證言確是事實的話，那麼它就充分說明瞭一個情況：

當時，地下黨（或者說張志忠）是充分信任楊達的。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能夠直接說明楊達曾與張志忠會面的史料。雖然如此，通過張志忠返台以後的工作情況及其周邊的人際關係，我們仍可瞭解上述證言的背景。

楊達身邊的朋友，同時也是張志忠在二二八期間左右手之一的許分說，「謝富是蔡孝乾與張志忠的聯絡人」。

謝富在台中市中山路、中華路交叉口開設永豐商行，與楊達是日據時期舊農組的同志。永豐商行原為獨資經營的雜貨店，謝富入黨後，擴充為地下黨背後支持的一家批發商店。據說，楊達被捕後，生活陷入困境的楊達家屬便是藉著向永豐商行賒取黃豆，製造豆腐出售，得以勉強維生。此事一直持續到謝富被捕（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槍決）為止。^{⑤7}

因此，如果楊達所透露的這段祕辛確是事實的話，那麼，當時，張志忠的意思就是要楊達通過謝富，把那封信轉交給蔡孝乾了。

嘉南縱隊與二七部隊的合流與失敗

根據有關〈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大溪檔案（一九五五年九月）記載，三月八日以後台灣的形勢發展大致如下：

三月八日，憲兵二營由福州運抵基隆，翌晨開入台北。九日，我福建台灣監察史楊亮功，奉監院命，來台調查二二八事件。……同（九）日晨，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台北市重行戒嚴。是日午後，第二十一師先遣之一個團到達基隆，十日進抵台北，基隆台北間之交通由政府恢復控制，於是軍憲警會同開始徹底搜索暴亂首要分子，長官公署並下令解散各地處理委員會，台北治安自是漸趨穩定，同時新竹花蓮屏東各縣市秩序已恢復，高雄市經要塞部戡定，業已確實控制，台南亦於十一日恢復秩序，惟台中嘉義台東等地，尚在動亂中。^{⑤8}

^{⑤6} 前引葉芸芸編寫《證言二·二八》，頁十九。

^{⑤7} 謝聰敏〈楊達和他的同志〉，收錄於陳芳明編《楊達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新增訂版第一刷），頁二四〇—二四一。

^{⑤8} 轉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九九二年五月），頁二〇—廿一。

蘇新的《憤怒的台灣》寫道：

十一日，蔣軍由南部開到台南，立即下了戒嚴令，實行逮捕和捕殺，……。

十二日下午，大批蔣軍空運到嘉，從此以後，便是蔣軍的大逮捕，大屠殺。

十二至十三兩日兩夜被捕被殺的青年學生及市民無法計算。

三月十四日，蔣軍由嘉義開始反攻，抵達斗六的時候，陳篡地與蔣軍發生小規模的遭遇戰，眾寡不敵，陳篡地將部隊帶上小梅方面山中。……打了一個時期的「游擊戰」，寫了「台灣游擊戰史」的頭一頁。【頁一三六、一三三一一三四】

陳篡地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刊載的「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中所述，他於一九四七年參加「二二八」暴動後，即加入「匪黨」，利用種種關係，從事建「黨」工作，並組織武裝力量。任「匪台灣自治同盟軍司令員」……。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張志忠在「寫了『台灣游擊戰史』的頭一頁」的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1. 誰決定二七部隊撤退埔里

楊克煌在《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寫道：

在台中的第二七部隊，當敵人援軍快要開到的時候，為取得與敵人作戰的有利條件，於三月十二日撤出台中市，開進埔里鎮。……

在嘉義地方的「台灣民主〔自治〕聯軍」和斗六的人民武裝，於十一日先後集結在小梅地方樟湖。……第二七部隊的部分戰士也趕到參加，這裡成了「二二八」起義最後抗擊敵人的基地。

【頁二〇八—二〇九】

關於二七部隊撤退埔里的決定，楊克煌等人與古瑞雲後來的說法也有所不同。

楊克煌在《我的回憶》轉引了謝雪紅的說法：

【三月八日，晚上】八時左右蔡【孝】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我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我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我們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著說：「我們決定最近要召開一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一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你們也要準備參加，……。」

謝又同蔡乾談起二七部隊的問題，蔡說：「局勢變化時，二七部隊就轉移到埔里山裡去。」

【頁三一〇】

根據《吳克泰回憶錄》轉引蔡孝乾於事件後回到台北的說法，謝雪紅也是聽了蔡孝乾的勸而轉移

到埔里去的。

吳克泰寫道：

【三月十三日之後，我和程浩夫婦在桃園南崁舅公家待了一星期。】回到家裡，老陳【蔡孝乾】就來看我們了，他說去了中南部一下，也剛回來。我問他台中的謝雪紅他們怎麼樣了。他說，謝聽到國民黨軍開進來了，就東藏西躲，他認為這樣很危險，就勸她到有群眾的地方，由群眾來保護最安全。近來看到的材料說，謝聽了老陳的勸，到了鍾逸人任隊長的「二七部隊」，請他們保護，一起到埔里。【頁二一六—二一七】

就在美國接受何晦的那次訪談中，楊達也第一次公開談到了他和蔡孝乾的關係。如果根據楊達的說法，那麼，蔡孝乾也是主張上山打游擊的。

楊達透露：

……我認為，大家集中在市中心雖熱鬧，卻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旦軍隊開來，大家就會散掉，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擴大控制面。……

〈從速……〉一文刊出後，孝乾並不贊同。他說，國民黨的軍隊已被民眾接收，改成「二七部隊」，為什麼不能辦日報。我認為大陸地闊有可能，台灣太小不可能。孝乾說，如果不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我說，台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沒兩天，國民黨軍隊

開來，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離開台灣，還想大家一起做些事。孝乾有一個小組織做通訊員，與我聯絡。……

楊達又說：

蔡孝乾與我是在日據時代文化協會上認識的。不久，他就去大陸，加入共產黨，參加了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派他來台做台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孝乾在台灣是做地下工作，我不是共產黨，是公開的，我們互相稍微知道一點點，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公開，隨時會被抓，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①

楊達的上述證言說明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在二二八之前，台灣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應該已經和楊達碰過頭，而且在事變後，仍然透過「一個小組織」，與逃亡中的楊達保持聯絡。

問題是，這「一個小組織」究竟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它和楊達的具體聯繫情況又是如何呢？釐清這點，對楊達的歷史面貌一定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

如果根據「三月底，在彰化二林與楊達和葉陶夫婦相遇」的鍾逸人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所

① 前引葉芸芸編寫《證言二·二二八》，頁十四、十五、十九。

述，楊逵最終還是服從地下黨「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的決議的。

鍾逸人寫道：

楊逵對我的突然出現，對我的離開埔里，當初似乎很不原諒。他責備我「身為部隊長怎麼可以隨便離開基地？」我被問得啞口無言。接著他又告訴我：現在台灣全島都看好二七部隊，南南北北受陳儀軍追殺，通緝的人，正苦無處藏身，都準備到埔里投靠二七部隊。他們夫妻倆也打算一兩天中到埔里跟我們會合，我卻反而跑出來。他又說：各地人馬，各種人材【才】齊聚在埔里基地，我們在那裡，將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以做……。【頁五九五】

然而，跟隨在謝雪紅身邊的古瑞雲的說法則與楊克煌、吳克泰和楊逵的回憶略有出入，他認為，二七部隊之所以轉移到埔里是因為謝雪紅採納了張志忠的建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他在上海接受葉芸芸採訪時是這樣說的：

她【謝雪紅】和蔡孝乾一直有矛盾，早從台共的時代就開始。蔡回來後，對戰後台灣情勢的估計，兩人又有分歧。謝雪紅認為台灣人民會起來進行武裝暴動，蔡卻認為不會。不過，謝雪紅似乎比較能接受張志忠的意見，張也是台省工委之一，嘉義朴子地方的人，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也是他的建議。據張領導下的黃文輝（現在上海）說，張早就做了打游擊的準備，二·二八之前他就常到阿里山、霧社等山地勘查地形。⑫

另外，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出版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古瑞雲又寫道：

據張志忠直接領導下的黃文輝（畢業於嘉義商工專修學校，抗戰時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職，勝利後偶然與張志忠同船返家鄉）說，張一到台灣便四處探勘地形，曾與謝商定，一旦發生武裝暴動，便將隊伍撤入埔里、阿里山、太平頂壽山地【帶】建立游擊基地。【頁三五】

總之，以上種種略有出入的證言都說明：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是地下黨的決議。而張志忠又是台灣地下黨的武工部長。

2. 解散二七部隊到小梅去

根據楊克煌《我的回憶》所記，二七部隊轉移埔里及其後的經過大致如下：

三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正，一百多名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經由

草屯，於黃昏時候抵達埔里，進駐埔里小學。

三月十三日早晨，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國軍整編第二十一師進入台中，設師部於大華酒家。

三月十四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這天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進霧社，聯繫泰雅族人。原隊長鍾逸人建議解散二七部隊，遭到楊克煌等人的反對，於是脫離部隊；古瑞雲被推選繼任二七部隊隊長。十時許，部隊接獲國軍已進占草屯，很快就要進攻埔里的情報。過午時候，謝雪紅由霧社回來。下午，謝富由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楊克煌，傳達台工委蔡孝乾的命令：情況急遽變化，黨爭取埔里鎮長協助的計畫失敗了；謝雪紅和楊克煌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必須立即隱藏起來；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要在適當的時候解散，並告訴隊員可以自願到小梅，參加台工委張志忠組織的「台灣民主聯軍」。

三月十五日，晚飯後，謝雪紅、楊克煌和工人陳一起離開埔里；出發前，謝雪紅又向古瑞雲說：「解散二七部隊，到小梅去。」

三月十六日，上午，國軍分路進攻在埔里的二七部隊。中午，古瑞雲宣布二七部隊解散。天黑的時候，謝雪紅、楊克煌和工人陳走到南投竹山鎮。

三月十七日，午後，謝雪紅、楊克煌和工人陳轉移到靠山處一個農民家裡住下來；謝雪紅和楊克煌就打發工人陳到小梅和張志忠聯繫。【頁三二三—三二】

古瑞雲的回憶錄透露：後來，他也來到竹山，和謝雪紅會合。當他知道謝雪紅還沒有與陳篡地取得

聯繫之後就忍不住主動要求進山聯絡。《台中的風雷》詳細地紀錄了他和謝雪紅、楊克煌之間的對話：

「您有什麼要我轉告陳篡地的嗎？」古瑞雲問謝雪紅。

「你千萬別讓他知道我在這裡。」謝雪紅交代說。

古瑞雲越發糊塗了。他想，本來是要和陳篡地聯絡的人，怎麼反而要躲避呢？

「你到了那裡，」楊克煌接著說：「記住打聽一下有沒有叫簡吉的在那裡。」

「這是最要緊的，」謝雪紅也叮囑道，「一定要查明白。」

「他是什麼人，這麼重要？」古瑞雲問。

「是以前農民運動的領袖。」

古瑞雲後來便在小梅與「四十來歲，身材魁梧，兩眼炯炯有神，而帶愁容」的陳篡地會了面。

「簡吉先生在不在這裡？」古瑞雲遵照楊克煌與謝雪紅的交代問陳篡地。

「簡先生不和我們在一起，」陳篡地回答說：「他是和張志忠先生在一起的，現在可能在……」

古瑞雲透露，陳篡地說出了地名，但他已不記得了。他同時強調，他「這才第一次聽到張志忠這名字。」【頁九四—九七】

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繼續寫道：後來，他和謝雪紅匿居台中大肚鄉甘蔗園的時候，她才在他的質疑下，向他披露二七部隊解散的真相。

「媽媽當初為何離開埔里，若你不走，我們一定能打得更漂亮。說要和陳篡地會師，可是到了竹山又為何不上山！……」古瑞雲質問謝雪紅。

「三月十四日那天晚上，謝富是來傳達省工委指令的。指令說，局勢突變，變得非常險惡，所有

共產黨員必須停止一切公開活動，隱藏起來以保組織力量。」謝雪紅解釋說，「……共黨有一條鐵的紀律，要絕對服從上級的命令，那怕錯誤的也得服從。……如果沒有鐵的紀律，就會使組織鬆散，甚至造成黨的分裂……」她還講了俄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爭的歷史，說鐵的紀律是列寧為布爾塞維克規定的組織原則。

「我還是不懂。」古瑞雲進一步質問謝雪紅。「既然有這個鐵的紀律，您們為何還要到竹山，想和陳篡地會師呢？」

「你要打破沙鍋問到底，我也只好實話告訴你。我和蔡前（即蔡孝乾）有過意見衝突……」她講了與蔡前爭論台灣形勢的經過，接著說：「你既然已經知道張志忠這名字了，我就告訴你，他是省工委常委，他和我觀點一致，我們事先約好，一旦國軍反撲，我們就把自己的隊伍分別撤入埔里和小梅。所以我以為陳篡地的隊伍是他領導的。」

「那麼，他是常委就可以不服從鐵的紀律？」古瑞雲不解地問道。

「謝富傳達的指令是省工委的集體決議還是蔡乾個人擅作決定，我們還吃不準。」謝雪紅解釋說，「中共還有一條組織原則，重要問題必須由常委集體決定，如果是他個人的決定，我們就可以不服從，所以要找到張志忠求證。」

「那你為何不叫我打聽張志忠，而要我打聽簡吉在不在小梅呢？」古瑞雲還是不懂。

「因為我不能隨便暴露張志忠的身份。但我知道簡吉是在張志忠領導下的，他們一定在一起，至少找到了簡吉就一定能找到張志忠。可是你【從】小梅回來後說簡吉不在那裡，所以我們斷定陳篡地不是張志忠直接領導的，而對陳篡地的政治面目我們不瞭解，所以不敢冒然進山。」【貞一一五】

一一七【

3. 小梅民主聯軍的潰敗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繼續憶寫了三月十七日在竹山「打發工人陳到小梅和張志中【忠】聯繫」以後的情況：

三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張志中【忠】由小梅來到竹山找謝雪紅和我，告訴我們古瑞雲已到小梅了。張說：民主聯軍有一批二十多人的骨幹分子，其中有幾個黨員，因在轉移中遇到匪軍，他們乘坐的卡車被敵人包圍時，他們即舉行抵抗，但當場盡被殺害了。因此，現在民主聯軍失去了這批骨幹分子，成分變為比較複雜、不太可靠，……。他叫我們暫時在此地待機而行，不要到小梅去。張志中這時又說民主聯軍最近可能要解散。

針對這段回憶，楊克煌的「注」同時寫道：

謝雪紅曾說當年張志中【忠】曾到竹山找過我們兩次，這點我記不清楚了。

楊克煌然後繼續寫道：

張志中【忠】回去一、兩天後，我們即聽到小梅方面的槍炮聲，是匪軍去圍攻民主聯軍的炮聲。又過了一、兩天，周明由小梅來找我們，他說：「民主聯軍已經解散了。」周在竹山住了一夜。謝雪紅叫他出去聯繫，物色一個以後我們可以躲避的地方。

大概是三月廿五日，謝富由台中來傳達台工委（張志中、蔡乾）的意見。他說平地很緊張，匪軍、警時常進行突擊檢查，許多黨員均無處躲避，又說：「你們下山的消息千萬不要洩漏出去，一旦走漏風聲，會引起更加厲害的戒嚴，……。」【頁三二二—三二三】

關於小梅「民主聯軍」的戰鬥與解散經過，官方的檔案也留下了幾則相關的記載。

首先，《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對台灣事變戡亂概要》載稱：

三月十八日，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四三六團第七連於小梅附近，將由北港竄來的「匪徒」七十餘，全部擊潰或殲滅，並俘「匪首」余阿木一名，獲卡車三輛、機槍七挺、步槍四十餘枝、彈藥甚夥；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四三六團第七連傷連長一員、士兵三人。⑭

關於「匪首」余阿木（余炳金）的被俘經過，前引《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收錄了余阿木的叔伯堂兄余焜煌「聽說」的口述歷史：

余阿木等「一共約一百多人」聽到國軍要來北港抓他們的消息後，為了不連累無辜，一大早就把地方有志供應的米裝滿整輛車，然後都穿卡其制服，分乘四輛車，經南港、灣仔內、板頭厝、後庄、埠仔頭、大林到小梅；結果在崁腳被埋伏在崎頂的國軍掃射，現場死了約八、九十人。余阿木僥倖脫逃。到了傍晚，槍聲停止了，他想查看戰友們死傷的情形，於是回到現場，因而被俘。

【頁一六七、一六九】

由於余焜煌的證言只是「聽說」的，而且他也沒有交代究竟是聽誰說的？真實的情況是不是如他所言，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月廿六日十四時三十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二處（情報處）處長林秀鑾收到情報員葉長青發來的電報，內稱：

據本組組員許日歸報稱：查嘯聚少梅竹崎一帶之南台區作戰指揮部總指揮陳篡地部因我軍圍剿甚急，於三月十九日起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悉數帶走，以謀長期盤踞，聞陳篡地於撤退前聲言決收集各地殘餘部隊，潛藏深山，實施一年計畫，再謀大舉。

⑭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集（一）》，頁二〇六。

又傳奸偽分子張信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主任）、簡吉（前農民組合委員長及赤色救援會中央事務擔當者，現任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現亦潛入該部活動云，等情謹聞。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隨即以「為陳篡地及張信義、簡吉等率殘部潛入深山企圖再舉由」發文陸軍整編第廿一師劉師長，要求他「切實圍剿」。內稱：

據報（一）嘯聚少梅、竹崎一帶之南台區總指揮陳篡地殘部，因我軍圍剿甚急，於三月十九日起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以謀長期盤踞。且聞陳篡地在撤退前聲言，決將集

各地殘部，潛藏深山，施行一年計畫，再謀大舉暴動。（二）奸偽分子張信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主任）、簡吉（前農民組合委員長及赤色救援會中央事務負責與現任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現亦潛入該部活動。^④

顯然，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得到的情報是把閩南語發音的「小梅」誤植為「少梅」了。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份情報透露：張志忠的身分並沒有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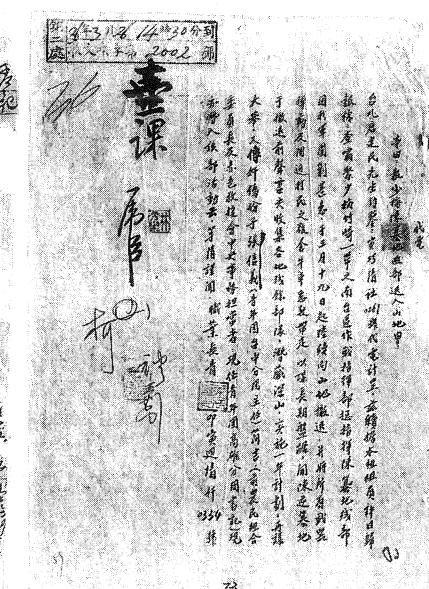
對此，《嘉雲平野二二八》一書收錄的那個「以前在警察機關」任職的新港鄉民林玉鏡的口述歷史說：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代電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希飾屬備力圍剿」陳篡地等殘部。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二處轉會該部第三處，有關陳篡地等意圖再起的簽呈。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六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收到情報員葉長青呈報有關「陳篡地匪部」退入小梅山地的代電。

^④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集（三）》，頁二九〇。

張梗，很清楚進也無路退也無路，所以經過大林後，他就說他肚痛而下車，他的軍師也下來扶他。後來這四輛車的人在古坑都被國軍打死了，其他那些人都死了，張梗和他的軍師卻沒死。這兩人一定是有情報知道國軍在前面埋伏，他們無法再負責這些人了，所以就溜走。【頁二六九】

林玉鏡當時並不在事件的現場，他的上述證言也是沒有根據的「道聽塗說」；僅供參考。
「在事件中，張志忠一直以化名活動，所以也沒多少人會知道『張志忠』，」許分回憶說，「因為這樣，他的身分並沒有暴露。」

三月二十九日，張志忠領導的這支嘉南縱隊與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的圍剿部隊展開最後一場戰鬥，並於四月八日晚遭到清剿。

〈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中部綏靖區司令部綏靖經過概要〉的總結報告寫道：

此次暴亂，中部地區最為激烈，本部到達後，奸暴大部雖被擊潰滅，而一部仍潛伏嘉義東北小梅與阿里山，暨埔里以東山地流竄，曾於三月二十九日與四三四團第二營戰鬥，將其擊潰，為徹底肅清，遂飭四三四團李團長移駐嘉義督剿，李團於奉命後遂積極準備，並施行偵查搜索諸手段，四月五日，李團長指揮該團主力及四三五團第一營，分由南、西、北三面，前往圍剿阿里山以西外湖、清水溪、十字關、草嶺、桶頭一帶殘匪，迄六日午，各部隊先後到達上述地區，取得聯絡，並續分區嚴密搜查，至八日晚實施完畢，共捕獲匪徒及嫌疑犯十餘名，除以第二營於小梅，四三五團第一營留置一個連，於竹崎繼續安撫清剿外，即率餘部返嘉義，協力行政機關清鄉工作。

之施行。⑯

張志忠領導的中南部地區的二·二八武裝鬥爭就這樣告一段落了。

「張志忠有作戰經驗，但當時亂七八糟的，自治聯軍的參加者都是一些烏合之眾，也談不上什麼組織；」多年以後，作為張志忠的左右手之一的許分老先生，在向我總結這場失敗的武裝鬥爭的因素時，感慨地說：「張志忠後來也將民軍帶入山去，與陳篡地會合。陳篡地的對立面是軍統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民軍被國軍包圍後，陸續有人叛變、出賣，堅持者所剩不多；因為這樣，後來就整隊被消滅了。」

看來，地下黨在二·二八期間武裝行動失敗的主要因素，誠如本節開頭所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欄的評價。

《吳克泰回憶錄》也透露了事件後回到台北的蔡孝乾告訴他的看法：

全省各地的武裝鬥爭，各自為陣，未能統一指揮和密切配合，國民黨大軍一開進，都歸於失敗了。但是，在這次鬥爭中，黨組織都沒有暴露，但有個別黨員在群眾鬥爭中犧牲了。【頁二二七】

⑯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集（三）》，頁一九〇。

張志忠的身分一直沒有暴露

就目前能見的各種官方文書或民間的口述資料所載，二二八的武裝行動失敗後，張志忠的行蹤依然是一「神龍見首不見尾」般地不可確知。因此，我們還是只能按照時間的順序，藉著各種直接間接與他有關的史料，從歷史的側面來尋找他當年的腳蹤。

首先，根據大溪檔案「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張鎮呈蔣主席三月廿九日報告〉所述，台灣警備總部於事件處理委員會檔案中，發現「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總機關」設在台北市永樂街三丁目五番地，經於三月廿五日下午按址破獲，在地下室搜出日造輕機槍七挺，擲彈筒十二支，及台省「奸匪」名冊與重要文件甚多，但因「搜捕技術欠佳」，而讓「重要奸匪林樑才等逃逸」。^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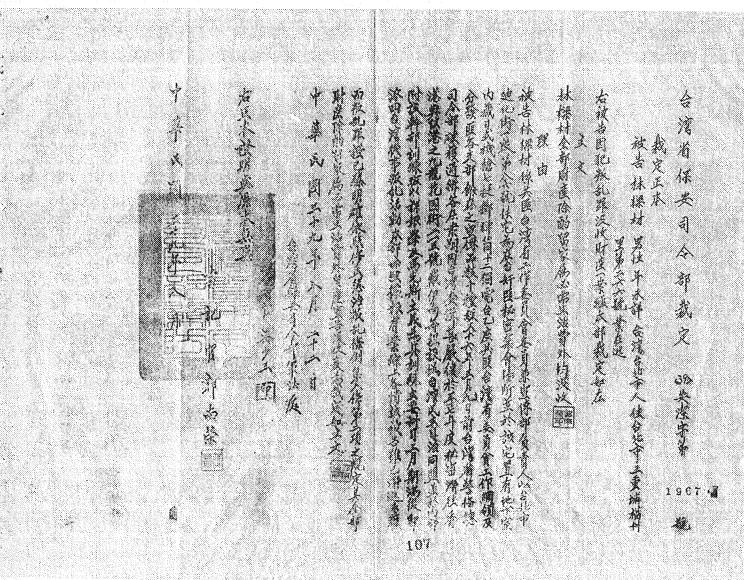
《吳克泰回憶錄》透露了地下黨在事變後的應變措施：

大約是在接近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的時候，「上海交通員」林昆「穿著筆挺的西裝」，帶著「上海局對『二二八』的評價和重要指示」的祕密通信，從上海搭飛機「急如星火地」來到台北。幾天後，吳克泰接獲所屬「新聞記者小組」小組長孫萬枝轉達的指示：現在國民黨在搞清鄉，查得很緊，為了避免損失，地下黨決定停止活動三個月……。

四月十三日早晨，林昆又帶著因為在《中外日報》寫了第一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導而遭到當局通緝的吳克泰和周青，搭乘台南輪，返回上海。〔頁二二八、二二九、二三二〕

就在林昆停留台灣期間的「四月七日晨」，季澐給南通的父母親寫了目前可見的第三封家書，內云：

鹹肉、香腸等物已由李先生轉來。連同大人寫與林君之便條也一併收到。謝謝。前日與水泉乘快車離嘉義。今暫居楊君之朋友家。約過四、五日。即可覓得一新住址。然後再寫信稟告。今後數月兒將居家修養一時期。上海書籍陸續自滬地友人寄來。內戰是方興未艾。台灣遠隔戰場萬里。仍可閉門讀書。所討厭者。夏季有半年之久。雖台北較南部氣候佳。但所差甚微。奈何



一九五〇年八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沒收林梁材財產的裁定書。

他不得。目今物價高漲。不知
通地可好。

可以想見，季澐家書裡頭所提到的「李先生」與「林君」，應該就是上海台灣同鄉會的李偉光醫師與林昆，而季澐這封家書應該也是委託林昆帶回上海轉達的吧！

季鑫泉先生在二〇〇四年二月的最後一次見面也向我證實說，事件後，在台灣住了兩三個月的哥哥永泉回到上海後曾經給他寫信說，

二二八期間，他跟姊姊季澐過的是今天搬這裡明天搬那裡的動盪生活。

四月十四日，許分因「共黨嫌疑」被捕，偵訊。但張志忠的組織身分並沒有因此而暴露。

從目前可見的官方檔案可以證明：許分關於「張志忠身分並沒有暴露」的說法也確是事實。例如：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有關「二二八事變」的「案犯處理」的檔案記載：

四月十八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除呈報國防部外，並下令憲四團加緊通緝歸案。主犯共三十名，其中包括與省工委有直接間接關聯的謝雪紅、林日高、林樸材、王萬得、潘欽信、蘇新、陳篡地等，但未見張志忠列名。^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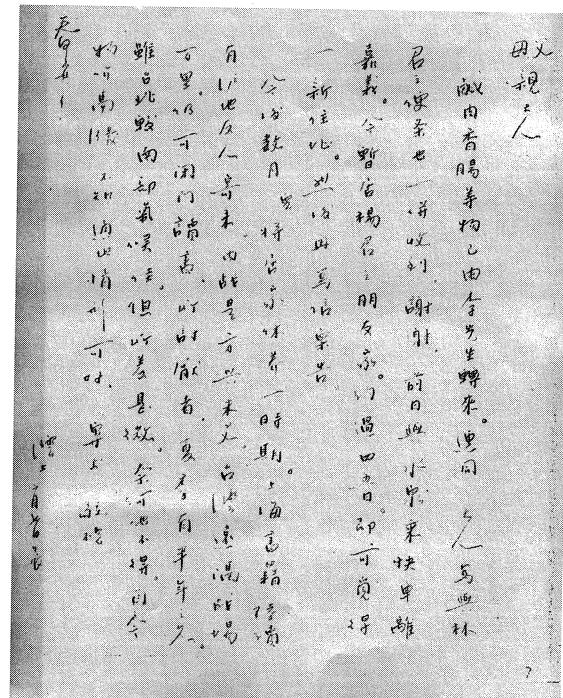
五月廿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致警務處「通緝顏德國等廿一名歸案法辦」的代電，簡吉、張榮宗及陳篡地都名列所附「人犯年貌表」之中，但張志忠卻不在其內。

六月七日，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代電所附的「台灣中部綏靖區通緝人犯名冊」，雖然包括謝雪紅、楊克煌、李喬松、陳篡地、黃信卿、簡吉、張榮宗等人，但張志忠依然是「漏網之魚」。

六月廿六日，臺南縣政府致警備司令彭孟緝代電所附「本縣各區二·二八事變在逃首謀主犯調查表」，裡頭包括了顏德國、李鹿、簡吉、陳篡地、張榮宗等人，但還是沒有張志忠。^⑧

史料顯示，這段時間，張志忠同時忙著布置那些身分暴露的同志的出走事宜。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指出：



一九四七年春，季澐寫給父母親的第三封家書。（張再添提供）

^⑦ 轉引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出版，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初版一刷），頁二八五。

^⑧ 轉引許進發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簡吉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文建會印行，二〇〇八年五月），頁三七一五五。

二二八起義後，由上海飛到台灣的第一架飛機，就把黨命我們撤離台灣的通知帶來了。

大概是四月十五日，謝富由台中到高雄醫院來找我，給我傳達黨的指示，他說：「黨中央命令謝雪紅、你和李喬松三人立刻離開台灣，……到解放區。」【頁三三八—三三九】

根據古瑞雲的回憶錄所述，楊克煌所說的「黨中央」，具體地說就是張志忠。他在《台中的風雷》寫道：

我剛從獅頭山回來第二天或第三天，柯太太（即楊克煌胞妹）來和我們聯絡，傳達省工委的指令——儘快設法離開台灣。我們在大肚期間，柯太太多次往返鳳山與楊克煌聯絡，楊克煌則透過聯絡胞弟楊克村與張志忠聯絡。所以，這個指令當然是出自張志忠。……

抵達上海是五月一日拂曉。……

按照張志忠的指示，我們先得找李偉光，再通過他與中共中央上海局取得聯繫。【頁一二二、一六八】

楊克煌的《我的回憶》又說，五月二十日早晨，謝雪紅、古瑞雲和他，在時任左營要塞司令部海軍大尉的蔡懋棠掩護下，登上一艘海軍的巡邏炮艇，然後於第二天從左營潛離台灣。【頁三四四—三四六】

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寫道：

上船之前，歐巴桑【謝雪紅】和蔡君在內室長時間低聲交談。交談前她使眼色叫我迴避。內室用木板隔成兩間，透過隔板仍能斷續聽到幾句話。話中有張志忠、楊克村、何集淮等名字。以後才知道她是在囑咐蔡透過楊克村與張志忠聯絡。……從此這條國民黨的巡邏航線成了共產黨的地下航線。【頁一六〇—一六二】

奪取西螺派出所的武裝

四月廿二日，行政院決議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訂「省政府組織法」，決定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

五月五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彭孟緝為司令。

五月十四日，季澐用台灣省立台北補習學校用箋，給家裡的父母親寫了第四封家書，信中透露了張志忠當時還在南部的訊息：

上星期接永泉來信。所託李先生帶台之衣物全部收到。樟柑器最好。兩件香港衫比台北的貴。汗衫亦是如此。母親大人欲買之物。等楊君從南部回北後去買。因兒去買價格貴且無上品買到。台北是講日本話買東西才不吃虧。近日因京滬物價波動。台灣也步後塵。魚米油鹽大跳特跳。布衫

親這人上皇賜種水泉茶話。所托李先生帶台之衣物全部收到。精神體魄最好。而件香港比台北的貴。洋衫就是如此。母親之意。欲置之物。等楊君。南歸回北。以去買。因。吾買此物。貴且無上品買到。故呈請日本請買。宋。汝不曉。近日同鄉財物皆反動。台灣也步後塵。並未由蘇北逃往。印制。等物。因購買力差。故不及上海。而昂。承。內。近日修理門窗糊米刷牆糊門。比半月前貴起一倍。身不知。政府如何。此易經。香港。署。敵視。

等物因購買力差。反不及上海價昂。家內近日修理門窗糊米刷牆糊門。比半月前貴起一倍。真不知政府如何收場經濟殘局。

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成立，並宣告清鄉工作已經完成。

五月十八日，警備司令部公布：全省解除戒嚴，暫停郵電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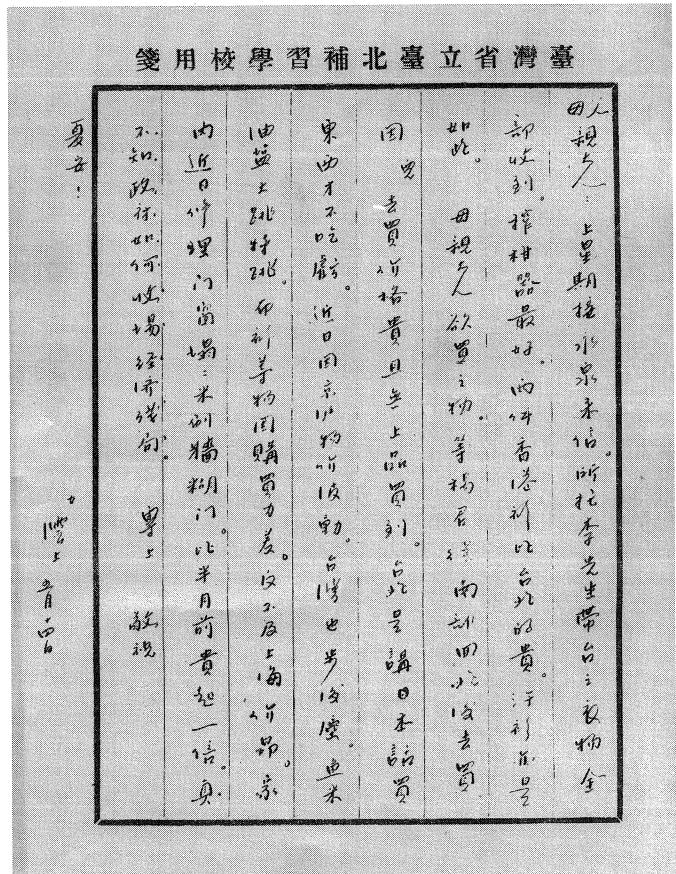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蘇杭等地學生六千多人，在南京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遭到殘酷鎮壓，造成史上有名的「五二〇血案」。

六月四日，凌遲一點鐘，張志忠的兒子小羊出生，戶口名楊揚。戶籍位址設在台北市城中區榮文里第一鄰第一戶生春藥行共同生活戶，戶長的名字是季澑。這些內容的出處根據是季澑被捕以後分別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及十月十六日寫給姐姐芬姊，以及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三日寫給小羊的信函。

這裡的問題是，對於自己的即將臨盆，季澑寫於五月十四日的家書為什麼並沒有預先告知父母親這麼重大的事情呢？當然，透過這封信，我們除了知道她的大弟季永泉已經從台灣平安回到上海之外，也知道上海台灣同鄉會（李先生）又有人來接頭，而張志忠的行蹤仍在南部。只是，她並沒有告訴我們，這段期間，張志忠究竟在南部忙些什麼呢？

這點，林樸材的妻子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致季澑二弟季鑫泉的信函從側面提供了一些線索：

我於四七年三月四日與周明【古瑞雲】同志一起【從台北】來到台中，參加謝雪紅領導的群眾鬥爭，並在台中人民政府作戰部裡當秘書，忙於接待來訪者、聯絡、抄寫文件、保管現款等內務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季澑寫給父母親的第四封家書。（張再添提供）

工作。不久，因形勢的急遽變化，不宜在台中久留，便暫回嘉義躲避。在這期間仍與組織保持聯繫，並承擔接頭、聯絡、轉移槍枝等工作。

六月，林樸材因私藏八麻袋武器遭國民黨通緝，轉移到嘉義郊區隱避。這期間仍透過我與組織保持聯繫。他們以明信片中的暗號進行聯絡。我在自己的家中收到給林樸材同志的明信片，然後交給四弟，再轉交林樸材同志。寄信人的落款姓氏，經常更動，署吳或署周不定。但我估計明信片是張志忠同志寄來的。這點，我是根據一些革命工作的往事聯想、分析的。

四七年那年，天氣還很熱的時候，我曾領張志忠同志到彰化農村我三叔公家的菜園子，挖取十枝手槍（原是我們埋藏的），他用麻袋裝好後，再由我領他出村。至於張志忠同志挖取這些手槍的用途何在，我就不清楚了。

柯秀英「不清楚」的地方，張志忠的左右手之一的許分是清楚的。

「我在台中軍法處被關了十四天。」許分老先生回憶說：「回來後，我知道張志忠因為台北的地下工作人員在走路，急需軍火。當時，我們的口號是：我們的火藥庫在敵人的手上！因此，當我聽說西螺地區的民眾對西螺分局警察貪汙、歪哥的作風普遍感到不滿與反感時，立即找張志忠商量並擬定搶奪西螺派出所武器的計畫。計畫進行前，我專程到台北接張志忠。八月廿一日晚上，張志忠就化名『長腳仔』，率領十八個武裝人民去包圍西螺分局。激戰結果，分局的警察都被縛，並繳出機槍數架。後來，警察的大批援軍趕來，發生了一場市街戰。在戰鬥中，一個原本是一家木屐店師傅，綽號『唐老闆』的同志，因為車胎被射破，來不及跑而被捕；後來因為熬不住嚴酷的刑求，就把參加者都

講了出來。由於他並不認識張志忠，只知道『長腳仔』，所以就說領導人是許分。其實我只負責行動前的動員，沒去參加實際行動。因為這樣，後來，過去與我同團體的人一旦被捕，為了保護張志忠，就把張志忠的事情統統推給我。張志忠和我得到這個情報後，立即安排其他人和自己都疏散。」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香港《華商報》台北航訊的一則報導揭露了這場民眾奪取西螺派出所武裝的新聞：

自魏道明主台以來，對台灣人民的敲詐壓迫較前更甚，施行慘無人道的徵兵徵糧徵捐，以致物價飛騰，人民呼苦連天。……從「二二八」到「八二二」，到處風傳台灣人民要武裝暴動的消息，魏道明急令全省「戒嚴」以防「意外」。就在「八二二」這天，新竹縣桃園鎮的警察局長，在白天被俘虜，並繳去步槍十餘枝。同日台南縣西螺鎮亦被包圍，槍枝彈藥盡遭收繳。^⑦

就在香港《華商報》的報導過了十二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國家安全局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省工委會雲林地區組織陳明新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也側面記載了張志忠與這次行動相關的局部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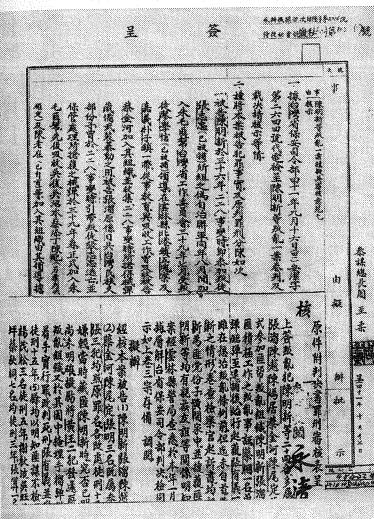
^⑦ 轉引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近代史資料》第三期（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三八。

同年【一九四七年】八月【陳明新】即正式參加匪黨，九月間復參與偽自治聯軍搶劫嘉義縣番路鄉菜公店合作社資金，及搶奪雲林縣西螺警察所武器，案發被捕，當時尚未發覺其與匪黨有關……。

張溜（雲林人，國校畢業，業小販）化名「老夫」，為日共台灣支部分子（老台共），於「二二八」事變時，與張志忠、陳明新等匪結識，當陳匪明新第一次被捕，即引導張匪志忠逃亡，並負責代為處理及保管搶獲之槍彈。……【頁三〇三】

「二二八之後，張志忠策動了襲擊西螺分局的計畫。」廖清纏先生從側面證實了這次的武裝行動。「當時我已是四十歲的人，不是年輕小夥子，所以他並沒有邀我參加。據我所知，西螺本地則有一個人參加。」

一九八四年一月，香港阿爾泰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五，中共特務對台工作》也從側面證實了此一武裝行動存在的事實：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參謀總長向總統府呈報有關「陳明新叛亂案」的簽呈中提到張志忠的相關檔案。

台灣有沒有共產黨？

在武裝活動方面，當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暴動期間，曾組織有偽「台灣自治聯軍」（其祕密名稱為「嘉南縱隊」）及三十六年八月組織之「嘉義武裝工作隊」，為光復後中央在台武裝叛亂之最早組織。【頁三三一】

可以這麼說，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有沒有共產黨」的問題已經正式登上了台灣的政治舞台。

國民政府監察院檔案：（八·13）所存，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當時所掌握的情資是這樣的：

就【台灣】非法團體言，大別之約分為四：一為台灣共產黨，首領為謝雪紅、林日高、楊克培、楊克煌、張道福、潘欽信、蘇新、王萬得、林兑等，分為ABC三集團，A集團在台中，B集團在台南嘉義，C集團在台北，外圍組織為「人民協會及民主同盟」等。⑩

針對這些「非法團體」，政府當局也制定了相應的防範措施。

七月廿五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公布社會秩序安寧維持辦法。十月七日，台灣省政府依據中央所頒「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令本省境內共產黨員於本月底前登記，逾期依法究辦。

針對這個問題，一九四九年三月，香港智源書局出版，「莊嘉農」（蘇新）所寫的《憤怒的台灣》，在第十三章〈二·二八〉以後的反蔣反美運動〉第三節「中共在台灣」批判地寫道：

台灣有沒有共產黨？現在台灣人民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疑問了。他們所懷疑的是共產黨在什麼時候會起來解放台灣。不過，前些時，美國通訊社卻很認真地宣傳台灣沒有共產黨，甚且說台灣人民不歡迎共產黨，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咬定台灣二二八民變是共產黨煽動的，甚且他們憑他們的主觀，捏造許多中共在台灣的機構，說有什麼什麼工作團，台中有A團、台北有B團、台南有C團（據勁雨《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等，這不過是反動派的推測而已，除了中共自己以外，誰都不知道中共在台灣的機構和活動情形。……自從國民黨反動派進入台灣至二二八民變這一年多的期間中，中共在台灣都沒有任何表現。二二八後，反動派極力誇張宣傳中共的「陰謀」，想把民變的責任推諉到中共身上去，但中共在台灣的機構也沒有任何反應。

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五日，台灣省第二屆運動會在台中舉行時，台中市內及運動會場，出現了沒有署名的宣傳品，介紹人民解放軍六十七條時局口號，並附有當時解放戰爭的形勢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人民都相信是共產黨散發的。^①

一九五九年，安全局出版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寫道：

共匪台灣省工委會之組織發展，甚為迅速，例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僅有黨員七十餘人。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六月「匪香港會議」時，已有黨員約四百人。……
【頁十八】

一九八四年，香港阿爾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五，中共特務對台工作》也載明：

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的「香港會議」期間，即便「二二八」的死傷逃亡者不算在內，「全省中共黨員共二百八十五名」。此一時期，中共在台北區組織包括：「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有九個支部，「台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有三個支部，「郵電職工總支部」有兩個支部，計有黨員一百六十三名，占全省黨員數的五分之三。【頁三三二】

誠如當年的地下黨員吳克泰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所言，這兩個官方的統計數字雖略有出入，但它

^① 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二二一一三二。

卻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那些曾經積極參加二二八鬥爭而倖存的台灣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也在鬥爭中，認識到日據以來台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無私的戰鬥和犧牲，因而很快就在失落一時的身分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與民族的認同。因此，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氣氛下，勇敢地加入了蔡孝乾和張志忠領導的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

張志忠與台大的醫師們

透過一些倖存者的歷史證言與零碎的官方檔案記載，我們也可看到張志忠在這段期間從事組織活動所留下的一些腳痕。例如，他與台大醫院幾個進步醫師們的關係就非常密切。

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致季澑二弟季鑫泉的信函指出，張志忠顯然和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原任台灣大學醫學院助教的郭琇琮醫師有過密切的直接聯繫。

柯秀英寫道：

林樸材同志每次叫我到台北，都是直接與郭琇琮同志聯繫的。每次碰頭，郭琇琮同志均要問我什麼時候離開，還要辦什麼事。我每次告訴他，我準備到某某地方，辦點私事後回去。而在每次返回時，卻是張志忠同志在我必經的地方等候我，他等候之處正是我告訴郭琇琮同志的地方。即台灣省銀行門口。當我到那裡時，他就靠近告訴我，要與我同行，到嘉義下火車後，他要我轉告林

樸材同志，於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進行碰頭。這情況說明張志忠同志與郭琇琮同志是有聯繫的。

關於郭琇琮醫師（一九一八—一九五〇），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第十四頁的「案情摘要」欄載稱，郭琇琮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間參加「叛亂組織」；第十七頁的「綜合檢討」欄另載，「匪台北市工委會」於一九四七年秋季正式成立。郭琇琮乃於十月間充任「台北市工委會委員」。

張志忠和當時在台大醫學院法醫研究室服務的蕭道應醫師也有直接而密切的組織聯繫。蕭道應醫師是屏東佳冬客家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台大醫學院講師。

關於蕭道應醫師的「案情摘要」，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蕭道應於抗戰時期在廣東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東區服務隊任隊員時，曾接受左傾思想之教育，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夏匪黨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聯繫，至抗戰勝利後失卻聯繫；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復與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匪志忠，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冬由張匪志忠介紹參加匪黨，接受張匪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調查研究工作，至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頁二〇八】

透過也是張志忠通過吳克泰收入黨的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一九一五—一九五〇）遺孀蔣碧玉女士

(一九二二—一九九五)的引介，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在台北嘉興街蕭家認識了蕭道應醫師及其妻子黃怡珍女士(一九一七—二〇〇五)。他們四人是抗戰時期同在丘念台(一八九四—一九六七)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參加抗戰的老同志。一九五二年四月，蕭道應醫師在苗栗三義山區被捕後被迫「自新」而被留在調查局法醫研究室充當法醫。因為這樣，蕭道應醫師從來不向任何人談到自己過去的革命經歷……。

「台灣光復後，我透過當時的高雄電台台長莊孟倫認識了張志忠。」也許是相處多年之後的「信任感」吧？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他家作客的我終於聽到酒後的蕭老醫師透露了他和張志忠之間的關係。

莊孟倫是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大姨媽最小的兒子，他的大哥就是長期從事反日帝運動，在二二八事變後被判無期徒刑而於一九四九年保外就醫時不幸病逝的台灣菁英莊孟侯醫師。林書揚先生在〈曾文溪畔的鬥魂——莊孟侯與莊孟倫〉寫道，莊孟倫出身「擁田一百多甲的中上地主」家庭，是莊家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位，自幼便表現出擅長作畫的稟賦；一九三六年，渡海大陸對岸；一年後，隨著蘆溝橋事變爆發的中日戰爭，音訊也斷絕了。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莊孟倫竟然和陳儀的先遣指揮部同日抵台。林書揚「只覺得十年的分隔，孟倫似乎從一個愛畫畫的大孩子變成十足像他大哥孟侯那般的『搞運動型』人物了。」林書揚又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莊孟倫「移居高雄，先是高雄廣播電台的籌備主任和首任台長，後來轉任幾家黨營劇院的總經理，但他的真正職務，卻是保密局南部地區的幹員之一，……另外，他還是多年潛伏的共產黨員」。

「你是怎麼認識莊孟倫的？」我把握難得的機會進一步問蕭老醫師。

「抗戰時期，」蕭老醫師回答我說：「我和丘念台去漳州，調查翁俊明被殺的事件，那時就認識

莊孟倫了。」

翁俊明(一八九三—一九四三)，台南人，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期間加入中國同盟會，曾經前往北京，試圖毒殺袁世凱，未果。一九一四年畢業後，前往廈門行醫。一九三八年廈門淪陷後轉赴香港與重慶。一九四〇年初，他在重慶與劉啟光居間協調台灣人團體共同抗日，最終於一九四一年一月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一九四三年，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在福建漳州設立，翁俊明被任命為主任委員；十一月十八日，突然過逝。

「二二八期間，我又見到了莊孟倫；」蕭道應老醫師繼續回憶第一次見到張志忠的情景。「他告訴我，他住在什麼地方，要我找個時間到他家走走。二二八後，有一天，我去找他，結果，在那裡第一次見到張志忠。張志忠和我談很多，但是並沒有提到『省工委』這個名稱。」蕭老醫師喝了一口酒，然後又沉默了。

「然後呢？」我急切地追問道。

「後來，」蕭老醫師定定地看著我。我坦然而期待地面對他的注視。他於是又繼續說道：「他就叫我和我老婆寫自傳。那時候，我在台大法醫研究室服務。因為工作忙，寫了一個月就要寫好的時候，他來跟我說：不要再寫了，就這樣拿給我吧！過兩天，他告訴我說：你通過了，但是你太太沒通過！可他並沒叫我宣誓就交代說：你的工作主要是：一、情報工作，政策反應；二、策反。過去，民主同盟有幾個人找過我，他於是又叮囑我，叫我不再跟民主同盟的人聯繫；同時要盡量避免被照相。」

綜合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與蕭道應醫師的口述，那麼，介紹蕭醫師與張志忠認識的「薛某」應該

就是莊孟倫了。

一九四九年年底，莊孟倫最終因為身分暴露而遇難了。他的身分，以及他和張志忠的關係，也說明張志忠的歷史應該還存在著太多太多後人無法探知的地下鬥爭的情節吧。

「有一天，老蕭帶季漢來給我認識。」就在蕭老醫師向我透露他和張志忠之間的組織關係的同一天晚上，黃怡珍女士也在蕭道應醫師回房休息後，向我憶述了她和張志忠夫人季漢來往的經過。「光復後，我在基隆中學教了大約一年時間的書。一九四七年九月，我轉到北一女，任庶務主任。後來，我也介紹季漢到北一女教書。當時，她住在學校宿舍。北一女很安全。校長王超筠也是因丘念台的關係任職的，她還要我們本省籍同事多多幫忙季漢。我認為，學校裡頭有不少教職員都是地下黨人，只是我們不清楚彼此的組織關係。不久，我又到大同中學任教。因為學校校長是我過去認識的朋友，季漢隨後也進了大同中學。那時候，我和老蕭住在東門的大學宿舍。她帶著出生不久的兒子和張志忠，就一起住在我父親位於中山北路的房子。我還要我阿姨幫她煮飯。……我一開始就知道季漢是共產黨員。印象中，季漢是一個相當耿直的人，她做事有條有理，毫不紊亂，還能寫一手好字，孩子也教育得很好。不過，就是太忙了。我因為也忙於小孩、家務，還有學校的工作，所以每回要討論規定看的書時，就累得打瞌睡。因為這樣，也沒機會和她深談。那時候，《光明報》已經出現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它是在基隆中學與中山北路我父親的房子油印的。後來，張志忠與季漢夫婦搬到新公園前面的藥房，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

「雖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黨員，可我沒有介紹過任何一個人入黨。」在同一天的談話中，蕭道應老醫師也針對安全局機密檔案指稱他於一九四八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的說法作

了回答。「有一天，張志忠叫我去主持一個小組會議；他說，有一個支部，你什麼時候去主持開會。我於是在他所說的時間，前往南昌街謝桂林醫師家。到了那裡，我進去一看，在座的都是些醫生，包括：許強、郭琇琮、謝桂林、翁廷俊在內。……其實，我們一直沒有講什麼名義，更不用說什麼『支部書記』或其他什麼，只是在工作上分工。現在看來，它可能是『台北市委』下面所屬的醫師組織，但不是台大醫學院方面的支部。那時候，調來調去的，有危險就馬上調離。開完會後，我又被調走；它就由張志忠直接領導。後來，張志忠就把我和其他隔開來了。……」

蕭道應老先生所提到的幾名醫師，除了前述所提的郭琇琮之外，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的「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也記載了許強和謝桂林的基本資料：

許強，台北（南）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台大醫學院副教授兼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醫師，一九四八年二月由郭琇琮親自吸收，參加「匪黨」，後來擔任「台大醫院支部負責人」。

謝桂林，高雄人，日本千葉醫科大學畢業，自設醫院，一九四七年七月，參加「匪黨」。〔頁

十四、十八、十九〕

至於翁廷俊，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刊載的「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的自述如下：

我是桃園人，曾在前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得到醫學博士的學位。民國三十六年，我任台大副教授。卅八年，才由同事許強介紹，參加匪黨組織。

這裡，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是否有或沒有所謂「台大醫院支部」這個組織？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張志忠和台大醫院的醫師們——蕭道應、郭琇琮、許強、翁廷俊，以及自設醫院的謝桂林，肯定是有一定的聯繫的。

「許強被捕的時候，是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當年在臺中豐原的鄉村擔任小學老師時被捕而曾經與許強醫師同房的江漢津先生（一九一四—一九九三），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接受我的採訪時也提出了同樣的猜測說。「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下午，我在課堂上被帶走，二十五年又三個月後才回到家。在保密局北所，我和台北案的許強醫師，前後同房有一個月之久。我聽說，許強除了在台大醫院上班之外，也在新公園附近開了一個私人診所。我還聽說，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化名楊春霖）也住在附近。兩人住得這麼近，我不知道許強是否認識他？與他又有什麼組織上的關係？但依常識判斷，我想，他們之間是不可能沒有什麼關係的！」

二二八週年祭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憤怒的台灣》揭露了一段當時的報紙密而不宣的史實：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全島各地又出現了「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有「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的署名，內容是：喚起台灣人民回憶起去年二二八民變時的台灣人民的英勇鬥爭和蔣軍的屠殺情形，而加緊團結，加強對反動派的鬥爭意志，籌備對反動派的鬥爭，並廣泛的介紹中共的政策，最後警告反動派放下屠刀，不可再屠殺良善。

是日，台灣北部、中部、南部也同時發現了二二八部隊北部支隊、南部支隊的「告同胞書」，是用日文寫的，內容大體上與中共的相同。二二八部隊是從二二八民變時的人民武裝整編起來的，這說明了人民武裝還仍然存在著，而且已在統一的領導之下。大家都相信：這些人民武裝將會發展到解放台灣的「人民解放軍」。^{②2}

根據一九五一年十月前國防部保密局印的「機密參考文件——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祕密文件」所載，這份名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的文件呼籲：

正當這個偉大而悲壯的二二八週年紀念日，我們全省同胞，應該繼續二二八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下列的任務：

- (一) 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 (二) 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 (三) 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②2} 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二二二。

(四) 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 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 反對官僚壟斷資本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 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 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保密局在附錄的文件「說明」中寫道：

一、此一文件係共匪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所作，為匪黨於卅七年【一九四八年】春散發全省之公開宣傳煽動檔案。

二、此件公開以匪台灣省工委會名義發表的文告，匪黨中央曾嚴厲指責為絕大的錯誤，因文中顯然暴露匪黨曾參與「二二八」事件，並洩漏匪黨對台灣之陰謀策略，誠恐因此刺激吾人提高警覺，及引起同胞疑慮反感也。^⑬

這裡，我們有必要先來瞭解「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的基本背景。

根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刊載的「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所載，洪幼樵，當時年卅七歲，廣東揭陽白塔鎮人。曾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後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高幹班。一九三三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從事地下工作。曾任共產黨區委、縣書記、特委。並公開做青年運動，曾任廣東省嶺東十縣市青年抗敵同志總會組織部長，及該會主辦之青報和抗敵導報編輯。一九四一年任中共蘇北漣東縣委組織部長。次年兼任中共蘇北軍分區漣東總隊政治主任。一九四五年任中共濱海縣委書記，軍分區獨立團政委。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

我們無從知道，保密局所說「此件公開以匪台灣省工委會名義發表的文告，匪黨中央曾嚴厲指責為絕大的錯誤」的情報是否屬實？但是，我們知道的是，作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之一的張志忠認真地執行了黨的決策。

「就在二二八一週年前夕，張志忠向我指派了第一個任務——在鶯歌、山仔腳間鐵路沿線寫標語，紀念二二八週年。」蕭道應老醫師說：「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黃培奕的家，就在縱貫鐵路桃園到鶯歌下坡路段前二公里處的山邊崁下，非常隱密。因為地利之便，張志忠指派了我這個任務。我接到指令後隨即組織石聰金和黃培奕進行。」

石聰金，苗栗苑裡人，日據時期被徵調到華南一帶做日本兵；抗戰勝利後，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的身份認識了中校政訓主任蕭道應和少校教官兼女子大隊副大隊長黃怡珍。

^⑬ 國安局檔案·228-E·3-(7)·頁11-111-1。

「一九四七年底，通過蕭道應的介紹，我在《公論報》同事黃培奕的鶯歌家裡，同時認識了張志忠。黃培奕先前也是集訓總隊的隊員。」一九八八年十月廿六日，石聰金先生在苗栗縣苑裡家裡第一次接受我的採訪時回憶說：「我和黃培奕接到蕭道應的指令後，於是在三二八週年紀念日的前二天，趁著暗夜，在桃園鶯歌間鐵路下坡路段沿途的駁坎上，用紅漆塗寫：毋忘一二八！血債血還！記住一二八！台灣青年起來！……等等大字標語。後來，蕭道應告訴我們，張志忠看了這標語，非常滿意；並誇獎我們做了重要的工作。」

關於黃培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相關檔案記載：

黃培奕，台北縣鶯歌人，台北第二商業學校畢業，當時為《公論報》會計室課員，一九四七年間，經蕭道應思想影響教育；一九四八年二月間，由陳福星介紹入黨，負責建立台北縣鶯歌鎮支部。
【頁三九二、四〇五】

關於陳福星，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檔案另載：

陳福星，化名老洪，臺南人，日本大學畢業；一九四六年，在臺南任鳳梨公司第三廠代廠長時，因目擊陳儀主台政治腐敗及接收人員貪汙舞弊情形，因而對政府不滿，乃思以政治改革為己任，常與（南二中）同學李義成討論政治時事，嗣由李義成介紹，認識李媽兜，再由李媽兜介紹，認識蔡孝乾，至一九四六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黨。同年十一月，奉蔡孝乾之命，與李媽兜、陳文山等成立「臺南市工委會」，嗣轉任臺南新豐農校校長，乃由蔡孝乾介紹林英傑等多人到該校任教，「冀圖以該農

校作溫床，為發展組織及卵翼匪謀之淵藪，並密藏武器在校，以為暴亂之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林英傑身分暴露，被警察圍捕，陳福星乃潛逃至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密藏三天，乃轉遷桃園中壢義民中學姚錦（黎明華）處，嗣即奉「匪黨上級」之命至台北南崁林元枝處，協助林元枝教育「匪黨分子」，工作約三月，又奉命至北部鐵路沿線擔任教育工作，……。
【頁三三四、二〇四】

前面，根據楊克煌的《我的回憶》提過，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之後，張志忠曾經向謝雪紅和楊克煌「介紹臺南新豐區區長李義成就是黨員」；而李媽兜在三二八期間已經是張志忠在臺南地區的主要幹部了。

「陳福星出問題後，」石聰金說，「張志忠就把他帶到黃培奕家，長期隱蔽，並以此為基地。其後，張志忠就以黃培奕為細胞，發展出鶯歌一帶的組織，交由陳福星領導。」

這樣看來，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說的陳福星的「匪黨上級」，就應該是張志忠了。

繼續開展武裝工作

從各種官方檔案資料與歷史證言看來，作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工部長」的張志忠一直持續開展著建立武裝基地的工作。

首先，一九五四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3）審三字第1332號判決書載稱：

（一九四七年）五至七月，王忠賢、溫萬金、許希寬、陳焰樹等組成台北市工人工作委員會，溫

萬金負責發展電器工人工作，先後隨王忠賢至台北縣觀音山，討論組織游擊隊事宜；及至嘉義，與張志忠所領導之自治聯軍聯絡。

《吳克泰回憶錄》也留下了一段相關的證言：

二二八後，吳克泰因為被通緝而離開台灣，在上海台灣同鄉會任總幹事，大約在八月下旬又被台灣地下黨調回台灣，然後到中部，在「台中縣工委書記」王天強的領導下，協助農民進行「三七五減租」的合法鬥爭。張志忠奪取西螺派出所的武裝行動失敗之後，透過王天強向他轉達轉移的指令；他於是輾轉回到台北，並且見到了久違的張志忠。張志忠給他講了兩個月來形勢的發展，並給他看〈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這次叫你回來，是要你帶路，去你家鄉蘭陽地區看一看；」張志忠說，「因為有人建議在那裡開闢一個解放區。」

「宜蘭平原是蘭陽溪沖積而成的三角洲，南邊和北邊都是大山，易守，但是東邊是南北向約四十公里長的濱海淺灘，不易防守。」吳克泰把當地的情況和心中的疑竇向張志忠說了一下。「這裡糧食自給有餘，也可以製糖、種菸草，漁獲量不小，鹽可以從海水提取，木材可從太平山上源源不斷地運下來，自給有餘，也有全省最大的新聞紙造紙廠，亦是強力的後盾。但這裡不產棉花，也沒有紡織廠，如果被封鎖了，穿衣問題不能解決。再說多餘的糧食、木材、紙張、水產品如何外銷，以換取各種日用工業用品？」

「去看看以後再研究。」張志忠說。

他們於是在一個下午，坐上宜蘭線火車，並在晚上九點鐘左右到達羅東，借宿吳克泰的小學同學家。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坐上火車，到了終點站蘇澳。下車後，吳克泰便帶領張志忠，沿著蘇花公路，走了一段上坡路。

老張此時已有四十開外，《吳克泰回憶錄》在此讚嘆地寫道，走路時身子有些向前傾斜，步子矯健，我怎麼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來等我。我想，他這雙鐵腳板一定是經過多年游擊戰爭鍛鍊出來的。

他們拾階而上，走到過去日本人修建的航海守護神「金毘羅」的祠堂。那裡是南方澳漁港的最高點，在上面，整個蘇澳港一覽無遺。港灣的北端是北方澳，南端是南方澳，看得清清楚楚。

「這真是良港，」張志忠忍不住讚嘆說，「將來一定有前途。」

他們然後一路聊著走回到蘇澳站，坐上回台北的火車。一路上，張志忠「看著蘭陽的山山水水，沒有說什麼。」【頁三三九、二四七—二五九】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省工委會中部武裝委員會李漢堂叛亂案」，也有一段關於張志忠在中部山區開闢武裝基地的記載：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志忠化名老周，前往竹山，與幹部李漢堂、施部生、呂煥章、洪麟兒、李漢堂等分任「中部武裝委員會」委員，由是「匪黨武裝工作隊」於焉成立。……另由張志忠供給李漢堂「手槍五枝、手榴彈廿餘枚、卡賓槍一枝、軍用地圖一份」。李漢堂「遂以台中縣屬霧峰鄉之火炎山為大本營，及埔里、草屯、南投、竹山、東勢等山地為外圍據點，積極從事武裝叛亂活動……。」【頁三三四—三四二】

由於施部生、呂煥章、洪麟兒都已在一九五〇年代先後遭到槍決，李漢堂也在「自新」後過世多實；但它總不至於空穴來風、無中生有吧！因此，它還是可以作為我們尋找張志忠革命腳蹤時的參考線索之一吧！

新竹地區的組織工作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又載：

一九四八年春，「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為了落實「強調提拔台級幹部」的政策，於是命陳福星接替張志忠，領導新竹以北所有組織，先後領導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黃培奕等，積極展開活動。【頁二〇四】

這份機密檔的內容如果屬實的話，那就是說，在「一九四八年春」之前，張志忠同時肩負著領導「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新竹以北所有組織的重任。

香港阿爾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五，中共特務對台工作》指出：

一九四七年十月前，「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新竹地區並無組織；十月以後，建立了「南崁」和「竹圍」兩個支部及外圍的「農運」組織；一九四八年春，新建三個支部，並成立「桃園區工作委員會」，共計有五個支部，三十名黨員。【頁三三一】

這份「原始資料彙編」具體說明了張志忠在把工作轉交給陳福星時在新竹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的組織。問題是，在新竹地區沒有地緣關係的張志忠又是如何在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這一地帶開展工作的呢？從各種材料看來，一二八期間與他共同領導「嘉南縱隊」的日據時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應該是主要的關鍵人物。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一九四七年十月，簡吉轉往新竹地區活動，一九四八年二月，經張志忠介紹，正式入黨，充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受張志忠指揮。【頁七二】

根據檔案管理局所藏《非法顛覆案》的檔案，一九五一年，國防部保密局在一份題為〈桃園縣地方概況及匪諜案件較多原因〉（未標頁碼）的調查報告指出：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認為，新竹以北（台北縣轄的淡水及桃園縣）及以南（包括苗栗縣）的濱海地帶與大陸的海上距離最近，而且多沙灘及平曠地帶，利於大軍的登陸及展開，其中尤以新竹縣及桃園縣濱海地帶最為適宜；此外，新竹以北的鐵路都是單線且沿海岸，機場也近海。人民解放軍一旦登陸，可以立即切斷鐵路，控制機場，而且其後方地形複雜，山嶺起伏，適合建立游擊基地。因此，「基於渡海登陸的軍事作戰觀點」而對此一地區相當重視，並由負責武裝工作的張志忠專責領導新竹地區（包括今桃園、新竹、苗栗三縣及台北縣的鶯歌、三峽地區）的組織工作。

簡吉既是日據時期農民運動領袖，光復後又曾在劉啟光主政的新竹縣擔任「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兼總幹事【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至十二月】，自然對當地農民群眾具有一定的號

召力。他前往桃園地區後，隨即通過老農組的同志詹木枝【一九〇八—一九五二】介紹，先行會見蘆竹鄉長林元枝等人，並通過舊農組的關係，發展組織關係，陸續建立中壢、鶯歌、竹南三個支部，隨後在一九四八年春組成「桃園地區工作委員會」，同時沿著鐵公路交通要地組織「青年讀書會」等外圍團體。^{④4}

林元枝（一九一〇—一九八二），日據時期台北第二中學畢業，光復後的桃園蘆竹鄉鄉長，地下活動時化名老陳或老卓。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刊載的「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就自述說：他是在二二八後結識簡吉而入黨，並且拿共產黨的土地法和利用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辦法，爭取群眾，發展組織，收容逃亡分子，建立武裝工作隊及宣傳等工作。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另載：

張志忠領導的黎明華，曾先後吸收張旺、姚錦、宋增勳、范新戊、周耀旋等參加「匪黨組織」，建立中壢、楊梅兩個支部，與海岸地區湖口、紅毛（今新豐）沿海一帶群眾據點……。【頁二〇七】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原籍廣東梅縣的黎明華先生在台北市天母自宅向我追憶當年的革命經歷以及他和張志忠建立組織關係的過程：「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因為參加丘念台領導的抗戰組織東區服務隊，認識了隊中的台灣青年鍾浩東、蔣碧玉和蕭道應夫婦等人。一九四四年初，我離開東區服務隊，轉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因東江縱隊主力北撤而歸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來台謀職，先後在台北商校、基隆中學任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後的五月二十日，我經由蕭道應夫婦的介紹，辭掉基隆中學的工作，前往廣東籍的姚錦擔任教導主任的中壢義民中學任教。這段期間，我在台北就已經認識的當地朋友——張旺、范新戊和周耀旋等人，也常來找我討論時局。透過他們，我對台灣的農村情況，也開始有了比較初步的認識。當時，我們聽說日據時期農民組合的領導簡吉和國大代表張吉甫等人，已經在新竹縣沿海地帶的農村，祕密推動三七五減租運動，於是就利用假日下鄉，自發地從事附近農村的調查研究。但是，我發覺，他們幾個也跟我一樣，有種找不到組織的苦悶。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期間，原台南新豐農校校長陳福星，以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人洪幼樵（化名『郭先生』），先後到義民中學找我。後來，我便恢復一度失聯的組織關係。同時，在洪幼樵指導下，義民中學的黨小組成立了。不久，洪幼樵又把義民中學小組交給另一省委張志忠領導。此後，張志忠就每週同我聯繫一次。義民中學小組於是就在張志忠領導下，一起搞校園工作，很快就把整個校園染紅了。」

香港會議

目前可見的各種相關史料都清楚地指出，一九四八年五月，張志忠前往香港，參加祕密舉行的所謂「台灣工作幹部會議」。

^{④4} 許進發〈簡吉——一位在大地流離的社會鬥士〉，前引許進發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簡吉案史料彙編》，頁十六。

「張志忠擔心此行可能會出事，」蕭道應老醫師回憶說：「臨行前，他特別交代我，季澐有需要錢的時候，盡量幫忙她。我於是跟季澐說，我在台灣有社會人際關係，妳要是有任何困難，盡量跟我說，不用客氣。……」

關於「香港會議」，目前可見的官方檔案或回憶錄有種種不同的略有出入的說法。

首先，香港阿爾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載稱：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在香港祕密舉行所謂「台灣工作幹部會議」，參加此次會議者，台灣共幹有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許【計】梅真、郭【琇】琮、孫古平、唐海光、陳福添、李媽兜、李武昌、朱子慧等十一人，滬港共幹有章天鳴、陳澤民、李偉光、謝雪紅、楊克煌等五人，廣東及海南島代表各一人，由劉曉主持。【頁三三二】

其次，國安局檔案「228-E，3-(14)」記載：

「香港會議」由匪中央召集，並指派著匪劉曉章天鳴到港主持，會期一個月，匪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率帶各省委及所屬縣市工委重要幹部十四名由台灣往參加，在滬港二地之台共首要謝雪紅、李偉光等曾列席，並有海南島匪要前往講述在海南工作經驗。【頁一】

在「宗派」上屬於謝雪紅系統的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寫道：

會議期間，張志忠曾到【謝、楊和古三人暫居的】筲箕灣寓所來。他帶來了一些訊息：蔡懋棠已加入了中共；何集淮即將脫離左營海軍基地，進入大別山；黃文輝、柯秀英即將來港。【頁二一五】

古瑞雲在《台中的風雷》指稱，會後，謝雪紅、楊克煌向蘇新和他「如實的傳達」了會議經過；他據此批露了這次會議的六項議程：

第一項：有關省工委的組織發展問題。

第二項：外省籍幹部與本省級幹部的協調問題（糾正外省籍幹部輕視本省級幹部的偏向）。

第三項：統一對託管派的認識。決定對託管派進行有力的鬥爭；……。

第四項：決定謝雪紅作為台盟代表出席新政協會議。

第五項：討論舊台共問題。

第六項：討論「二二八」的若干問題。

古瑞雲又說，在討論第一項和第二項的議程時，謝雪紅和楊克煌並沒有出席。李偉光醫師則是在

討論「舊台共問題」時，從上海趕來參加。【頁二二四】

蔡子民整理的〈李偉光自述——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應該是目前可見的，實際「列

席」會議者的唯一的現身說法。然而，關於「香港會議」，李偉光醫師只是簡要地提到：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據張執一的指示，我到香港和蔡乾、謝雪紅等人見面，討論了台灣問題。大家認為不存在台灣民族，台灣對祖國不是民族問題；台灣有兩個前途，一是和大陸同時解放，二是國民黨反動派繼續盤據台灣。要我在上海鞏固偉光醫院和同鄉會，以此為據點堅持工作。【頁四六】

存在於謝雪紅和蔡孝乾之間的日據時期老台共成立以來就存在的「宗派」的矛盾，李偉光的自述顯然並沒有透露任何蛛絲馬跡。這點，不在現場的古瑞雲與吳克泰兩人的回憶錄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轉述了會議上的分歧與爭吵。

首先，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前往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會後在中南海的中央統戰部等待分配工作的吳克泰，在二〇〇二年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吳克泰回憶錄》轉引原屬謝雪紅人民協會系統的林樸材的說法和會議文件寫道：

這時蘇新、林樸方【材】也在那裡。林樸方給我們談了一些香港會議的情況，並給看了會議文件。他說，謝雪紅在會議上鬧得很兇，一是追究蔡孝乾在老台共時身為中央委員擅離職守，逃回大陸，被她開除過黨籍；二是要求她的黨齡應從一九四六年一月算起；三是「二二八」當中她是主張武裝鬥爭的，而蔡孝乾，他們是反對武裝鬥爭的，糾纏個沒完沒了。【頁二九七】

關於吳克泰所說的三個爭論，古瑞雲在更早以前的一九九〇年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則根據謝雪紅和楊克煌轉述的說法，有著相對主觀而更為詳盡的細節描寫。

首先是有關「舊台共問題」的爭論：

會上蔡孝乾與謝雪紅發生爭論。蔡對謝開除他黨籍極為不滿，謝堅持說，他身為中央委員，擅離職守逃往大陸，應該開除；蔡指責謝不積極發展黨員，不支持霧社的武裝鬥爭，是右傾機會主義。謝拒不承認有錯誤，並指責「改革同盟」派，另立中央是違反組織原則，路線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對路線問題，上海局幹部說：誰是誰非，要等到台灣解放，掌握了充分的資料後方能做出判斷；「改革同盟」分裂組織是錯誤的，這一錯誤招致了舊台共組織被破壞，但路線上即使犯了左傾錯誤，也是受了李立三路線的影響，不必過於追究。【頁二一四】

其次是有關謝雪紅中共黨齡問題的爭論：

關於謝的中共黨籍問題，蔡主張：一九四六年初【藍按：時間有問題已如前述】申請入黨時，謝拒絕交登記表和自傳不符合手續，謝辯解說：在祕密環境下硬性規定要填表是危險而又幼稚的做法。張執一對此表示：謝不填表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她於四七年五月間到上海後交代了入黨經過，並補辦了手續，填寫為一九四六年一月入黨，可以承認。【頁二一四】

最後是有關二二八鬥爭的路線爭論問題：

蔡孝乾事先對形勢估計錯誤，事後放棄對武裝鬥爭的領導是錯誤的。蔡承認自己失策。謝還質問，是誰主張要她把軍權交給處委會吳振武的。蔡承認是他下了指令，並承認錯誤。張志忠批評謝不該不殺罪大惡極，有民憤的劉存忠。對此謝說明了她當時不殺的用意。【頁二一四—二一五】

會議的真實情況是否真如古瑞雲所描寫的那樣？這裡已經無從查證了。

重點是，國府情治機構留下來的幾份祕密文件，倒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香港會議的重要決議。

一九五一年十月，前國防部保密局印的「機密參考文件——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祕密文件」，包括了對「二二八事件」的工作檢討、總結，與今後對台工作的策略總則。

首先，〈關於「二二八」的經驗教訓〉分別就「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成就與鬥爭中的弱點，做了總結：

(一) 二二八事變性質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台灣人民的獨立運動。

(二) 二二八事變的成就：

1. 台灣在日本統治後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民變，二二八首先在國民黨統治後最嚴的台北爆發，充分證明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無能，使人民覺悟到推翻蔣政權不是不可能的，在事

變中，國民黨對人民大屠殺，使人民更加仇恨，這對今後台灣人民反蔣鬥爭是有幫助的。

2. 事變中，使蔣介石從國內戰場抽調二個師來台灣，對於解放軍有幫助。

3. 人民對國民黨有新的認識，瞭解和平合法鬥爭的不可能，祇有武裝鬥爭，才能爭取民主

政治。

4. 發現了大批積極分子，擴大了黨的力量。

(三) 二二八鬥爭中弱點：

1. 事先準備工作不夠。

a. 沒有迅速處理老台共關係，以便在事變中能很好取得聯繫。

b. 沒有抓住光復後陳儀統治未深入時，迅速擴大黨的力量。

c. 沒有利用矛盾，來進行統戰工作。

d. 對外通訊沒有建立。

2. 事變發生後，不及時解除敵人武裝，來武裝自己。

3. 學生孤軍作戰，沒有與農工結合起來。祇有在工農群眾發動起來之後，學生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

4. 沒有及時分散物資，以繼續動員群眾，對反動分子沒有施以鎮壓。

5. 沒有教育人民，及時揭發陳儀欺騙。

6. 統戰工作中，我立場站不穩，沒有與動搖分子做堅決鬥爭。

8. 沒有以我黨名義，公開提出明確方針，指出到達勝利必須走的道路，來教育群眾。

其次是〈關於台灣工作〉。

由於目前國家檔案局開放借閱的原始檔案只有其中第一頁，因此在不能詳閱文件全文的現實限制下，我們只能藉由保密局的「說明」來理解文件的主要內容。

保密局認為，「此一檔係匪黨中央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六月在香港召開之台灣工作幹部會議之決議，由匪華東局代表章匪天鳴綜合撰稿，並由匪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親筆抄錄。」它不但是「匪黨在台灣工作的策略總則」，也是保密局特務「最重要的研究資料」。

〈關於台灣工作〉提出的問題包括：「台灣工作環境的特點」、「台灣的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台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台灣工作總方針」、「目前具體工作」與「如何建黨」等。

一、「台灣工作環境的特點」，強調台灣人民雖有和國內人民不同特性，但還沒有形成一個台灣民族，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有類似弱小民族的特性，肥沃土地集中於統治者手中，城鄉關係密切不可分，人民團結性強而反政府情緒普遍。

二、「台灣的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強調目前在台灣的革命性質，應表現於民主自治運動；其打擊對象不同於大陸，應該對地主資產階級採取戰略的聯合，孤立託管派、傾向政府士紳；革命的動力寄託於工農、革命中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革命知識分子等。

三、「台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指出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崩潰後台灣會再發生新「一二一八事

件」，同時也預計到美國會援助國民黨固守台灣的可能。

四、根據上述的形勢判斷而提出「準備武裝起義」是「台灣工作總方針」。

五、在「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總方針」之下，指出「目前具體工作」的項目：

1. 加強群眾工作：重點置於職工工作和農民工作，唯應先做好學生教員的工作以為媒介。
2. 開展統戰運動：以擴大黨的基礎，幫助群眾工作的開展，而以青年學生為此項工作的骨幹。
3. 加強交通要道及戰略據點工作：打入交通部門及軍事機關職場，建立短小精幹組織。鄉村工作做得好，即可以控制交通要道。但強調城鄉工作的一致性，放棄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略。
4. 瓦解敵軍敵警工作：士兵與軍官工作並進。
5. 布置情報及破壞工作：指出每個黨員都有做情報工作的責任，主要為蒐集政治軍事情報，埋伏內線，保衛內部，並企圖建立電台。破壞工作著重於爆炸工作及在軍火工業中策動怠工。
6. 教育與培養幹部：深感幹部數質量均不夠，著重增強與教育有群眾的幹部，提拔本地幹部，吸收有鬥爭經驗的外省幹部，蒐羅特殊幹部與各種技術人員。
7. 發展與鞏固黨的組織：質量並重的審慎發展，吸收群眾領袖及外省籍進步分子、失聯分子，嚴格審查與整頓內部，健全支部工作。

在這七個「目前具體工作」的項目當中，又強調要以群眾工作為中心，統戰工作為橋樑。

1. 必須加強團結：強調新老幹部的團結，及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團結。

2. 必須走群眾路線：指出過去有嚴重脫離群眾現象。

3. 必須有民主作風及重視紀律。

4. 必須加強祕密工作與階級教育：組織與教育。

保密局認為：強調「新老幹部的團結」是「暗中指責老台共如謝雪紅等人」，而強調「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團結」則是「省籍觀念作祟」，這兩項要求都反映了中共在台地下黨存在著「內部嚴重矛盾」；至於「走群眾路線」的要求則指出了台灣地下黨「在一二八事件中領導武裝暴動失敗的癥結」；而「民主作風」的強調則是對蔡孝乾於一二八事件中「獨斷專行」作風的「批評」。^⑯

就古瑞雲的回憶內容來看，在香港會議上，謝雪紅顯然沒有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志忠。

《吳克泰回憶錄》則轉引林樸材的話感慨地寫道：

謝雪紅在會議上鬧得很兇，……糾纏個沒完沒了。蔡孝乾、張志忠覺得這樣下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還是回台灣鬥爭要緊，在聽了會議總結以後就回去了。【頁二九七】

一九四九年第一朵浪花

一九四九年初，歷經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形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局面。

一月廿一日，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蔣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戰場明顯的敗退，台灣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了；相對地，它的政治形勢也更加嚴峻了。

與此同時，經過香港會議的總結之後，在蔡孝乾與張志忠等領導幹部的領導之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也在新形勢的推動下有了迅速的發展。

香港阿爾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載稱：

自「香港會議」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底，中共之活動甚為廣泛，其組織遍及全省各階層各城鎮，總計有十七個「市（區）工委」及二百零五個支部，近十個武裝基地，另有三個全省性的「工委」專做學運、工運及高山族工作。【頁三三二】

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調查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保防參考叢書之一」郭乾輝的《台共叛亂史》也寫道：

自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形勢逆轉，中共在配合軍事準備積極攻台的時候，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的口號，要求台共預先響應，做保管接收迎接解放的準備。於

^⑯ 國安局檔案·228-E·3-(14)，頁一一一。

是，這股潰散汙濁的逆流，又開始氾濫。

首先，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以台大學生與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員，因誤會而引起的所謂「四六事件」的學潮，即是這股逆流重新氾濫為災的第一朵浪花……。【頁五四】

所謂「四六事件」或「四六慘案」，是當時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為了壓制台北日漸蓬勃的學運，而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晚上發出一份以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為首的，包括台大與師院兩校學生領袖十餘人的通緝令，但因兩校學生拒不交出「黑名單」上的同學，大批的軍警於是在四月六日凌晨，衝進學生宿舍硬行逮捕了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

七月一日，台灣省主席陳誠又向各縣市政府發出「參捌午東府紀三字第五六七號」代電，要求嚴緝包括周慎源在內的、二十名漏網的「潛伏本省之奸嫌分子」。

關於學運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叛亂案」的「綜合檢討」欄指稱：

匪黨「學生工作委員會」以台灣大學及師範學院，為培養幹部之溫床，並利用該校（院）各屆畢業生為主幹，藉彼等畢業後分發或返回各縣市鄉鎮服務之便，將叛亂組織毒苗散播各地城市農村，使「學運」、「工運」、「農運」結為一體，以展開統合戰力。其陰謀策略及組織發展，頗具成效。

匪黨之活動方式，將「公開活動」與「祕密發展」，分別領導。並採「合法」與「非法」之鬥

爭，相互配合運用。故其從事祕密活動，頗有績效。【頁一〇〇】

「四六事件後，陳水木向我匯報了周慎源的情況；」上個世紀的九〇年代初，當年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書記李潔（徐懋德）老先生在天津告訴我說。「我就把他的關係轉移給張志忠，安排到桃園地區隱敝。」

李潔所提到的陳水木，在安全局機密文件同一份檔案的「案情摘要」欄的記載是：高雄市人，就讀師範學院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入黨。【頁九四】

關於張志忠與學運分子的關係，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另載：

一九四九年七月，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師範學院「匪黨支部支委」林希鵬，因「領導策動學潮」，「身分暴露逃亡」，乃由張志忠移交陳福星領導，開展桃園至新竹鐵路以西海岸地帶工作。【頁二〇七】

綜合上述的證言與檔案可以想見，張志忠當時在輸送學生幹部的工作上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從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

歷史的洪流繼續洶湧前進著。

四月二十日，解放軍渡江，南京解放。

五月一日，台灣全省實施戶口總檢查。

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告自二十日起全省戒嚴，基隆、高雄兩港宵禁。

五月廿一日，台灣與上海的交通暫告中斷。

五月廿四日，立法院通過針對「匪諜」的《懲治叛亂條例》。

五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發佈戒嚴時期法令，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同一天，大陸的內戰戰場又有重大發展——上海解放。

五月廿八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頒佈「出境登記辦法」。

「上海解放以後，」季鑫泉說，「我們就再也沒有收到姊姊季澐的任何音訊。」

與此同時，張志忠在和義民中學小組的負責人黎明華定期會面的時候，向他傳達了省工委的初步決定。

「張志忠告訴我，依據戰局的發展情勢判斷，解放軍可能在一年內或稍遲些進軍台灣；因此，務必把迎接解放的政治口號轉為配合解放的實際行動；其中，農村幹部尤其要熟悉周圍地形、道路交量、海岸線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況，並要透過各種關係做好一般的群眾工作……。」黎明華老先生回憶說：「張志忠又跟我談到搞武裝鬥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問題，要我在暑假期間騰出時間，寫一份有關武裝鬥爭的小冊子，充作教育幹部的教材。」

「依靠人民，搞人民游擊戰爭，現在，台灣大概只有老郭（洪幼稚）我和我等幾個人有經驗；可我和老郭都很忙。……」張志忠向黎明華解釋說：「你可以依據東江縱隊的經驗，結合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和其他軍事著作，先擬一個提綱，經過上面研究後，再著手撰寫。」

「我和張志忠會面後，隨即把上述要旨轉達給姚錦、張旺、宋增勳等人，要他們及手下成員盡量下去沿海的大園、觀音和新屋等鄉，透過做學生家庭訪問，調查研究地理、交通等狀況……。」黎明華老先生繼續說道：「除了自己前往龍潭、關西、芎林、北埔、新埔等鄉遊山玩水、拜訪學生家長及幾位以前的同事還特意去爬獅頭山。回到中壢後幾天，張志忠按事先約定來義民中學宿舍找我。我把題為《怎樣開展台灣人民游擊戰爭》的提綱交給張志忠。」

「近期間，黨要向國民黨展開政治宣傳公勢，以瓦解『蔣管區』的民心士氣，鼓勵台灣人民起來抗爭，配合人民解放軍登陸作戰。」張志忠告訴黎明華，然後把一包宣傳品給他並交代說：「七月十一日晚上，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後，在中壢、楊梅、湖口等地，把這些東西散發出去。切記！注意安全，不要出紕漏。」

「那包宣傳品包括：〈人民解放軍布告〉，省工委、台盟、解放軍駐台代表聯名的〈告台灣同胞書〉，以及一些寫著明確口號的小張傳單。」黎明華老先生記憶猶新地說。「張志忠離開之後，我隨

即找了張旺和宋增勳商量，決定由張旺負責湖口地區，宋增勳負責楊梅地區，中壢方面則由我自己負責。當天傍晚，我向學生借了一台腳踏車，然後在半夜十一點左右，騎著腳踏車前往中壢，先後在新街、廟口、中壢初中校門口和運動場、中壢小學操場和教室走廊，以及義民中學校門口，神不知鬼不覺地散發和張貼那些宣傳品。」

同樣的行動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著。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的「綜合檢討」欄載稱：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一夜之間，共匪在台灣全島各重要地區，普遍散發反動傳單，張貼反動標語。甚至於翌日白晝，仍有在鬧市當眾散發反動文件之情事；匪黨此一反動宣傳攻勢發展之迅速，地區之廣泛，以及匪徒甘冒危險，不惜犧牲之「革命熱情」的高度發揮，表面上似乎在在證明共匪在台不僅設有龐大完整之組織，擁有廣大群眾，且已贏得群眾之愛戴及堅定之信仰。【頁四】

「隔一星期，張志忠在和我定期會報時才告訴我，」黎明華老先生見證了這份機密文件所載內容的真實性。「這次行動是全省同步的行動，但是，基於安全考量，事先並沒有讓執行任務的人知道。」

「藉由這次行動，我們向台灣人民展示了我們的力量。」張志忠向黎明華分析說，「但是，它也

具有兩層意義，一方面，它可以鼓舞民心，瓦解動搖敵方士氣；另一方面，它也會引起敵人的嚴密注意，這點，我們一定要有清楚的認識。」然後，他又把那份《怎樣開展台灣人民游擊戰爭》的提綱還給黎明華說：「上面研究過了，你就按照這份提綱，開始動筆寫吧！」

《光明報》事件及其應變

時序進入一九四九年夏季之後，張志忠的組織活動也進入更加緊張而活躍的時期。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夏匪省工委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曾面示北部匪黨負責人陳福星：「將台北縣海山區【鶯歌、樹林、三峽三個鎮】，桃園縣大溪、龍潭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區，苗栗縣大湖區，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整頓，進行深入隱蔽之群眾運動，挑選積極分子，策動進入山區，設法購買槍枝彈藥，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壯大，擴展成為游擊根據地，然後始能做到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之攻台」等語。【頁三九三】

與此同時，國防部前保密局也根據各種情報，積極布置著破壞「台灣省工委會」的準備。

首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的

「偵破經過」欄載稱：

一、國防部前保密局，根據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偵破之匪外圍組織「愛國青年會」【新民主同志會】陳炳基一案，所獲得之線索，運用關係深入偵查。經五個月之長期培養，獲悉共匪在台除以「愛國青年會」名義，祕密吸收匪徒外，並散發「光明報」，及其他反動文件。

二、據報有【台大法學院畢業】王明德者，曾屢次郵寄「光明報」與他人；另據報台大法學院學生林榮勛等，亦有散發反動傳單，為匪張目等情事。當經選派幹員，嚴密調查及監視各匪嫌分子之言行動態。

三、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上旬，共匪藉紀念「七七」抗戰十二週年之名義，發動大規模之宣傳攻勢。散發反動傳單，張貼反動標語，一夜之間，遍及全島，聲勢之浩大，可謂空前；為打擊奸匪之猖狂行為，乃決定進行破案；適於此時，據內線報稱，該案有關匪犯王明德，於八月十八日，被警方於檢查戶口時扣押等情。為恐警方不悉內情予以釋放，且為免洩漏消息起見，遂乘此機會，於八月廿三日向警方將王明德提局。依據對本案所獲得資料，對王犯詳加審訊，王犯以事證俱在，無法抵賴，始供出匪成功中學支部王子英等同黨數人。八月廿四日晨，保密局即會同刑警總隊，根據前所蒐獲之資料，與王犯供詞，將【成功中學畢業的】姚清澤、郭文川、餘滄州等匪犯逮捕。復於同月廿七日夜，將【台大法學院學生】詹照光、孫居清、吳振祥、戴傳李、林榮勛等捕獲。並循供深入偵查，於【一九五〇年】元月

間，再將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等匪逮捕，擴大破案。總計本案先後捕獲匪謀及涉嫌分子四十四人。【頁二—三】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我和林榮勛等人的被捕時間，跟我的記憶有些出入。」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涉案人戴傳李先生在台北市住家向我口述這段親身經歷時感慨地說，「我記得，我們是在八月十三日晚上，在避居高雄的同學孫居清家裡被捕，然後移送台北保密局。當時，我是台大法學院大三的學生。早在一九四六年，我就透過台北二中同學吳克泰的介紹，參加了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我想，我是因為王明德被捕並供出我的名字而成了主犯的。」然後戴傳李又對他的二姊夫鍾浩東被捕的時間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被捕兩個星期後，就看到鍾浩東也被抓進來了。所以，鍾浩東絕對不是一九五〇年元月間才被捕的。」

前面說過，鍾浩東是吳克泰發展吸收並由張志忠批准的第一個黨員。事實上，在吳克泰已經轉移大陸的情況下，張志忠仍然能夠通過黎明華的通報，很快得知基隆方面的組織被破壞的消息。

「八月二十六日，為了商量我的小組成員徐新傑的去處，我專程北上基隆八堵，到基隆中學找鍾浩東校長。」黎明華老先生回憶說：「我到那裡已是黃昏時分。鍾校長恰好不在學校。那天晚上，我就在學校宿舍過夜。睡到半夜，我一陣急躁的敲門聲驚醒，一位年輕的配槍特務進來，向我索身分證看，然後問我：從哪裡來？找誰？我據實回答說，我從中壢來，找梅縣同鄉……。對方沒有多說什麼就出去了。不久，他們就把校長太太蔣碧玉和她妹妹戴正芳抓走了。第二天，我立即離開基隆中學，搭早班火車，趕回中壢義民中學，準備撤退事宜。」

八月二十八日，剛好是黎明華和張志忠定期會面的日子。

「我向張志忠報告了基隆中學的情況。」黎明華老先生說：「張志忠當機立斷，指示我在九月一日晚間離開義民中學。我於是抓緊時間把中壢和楊梅支部的相關事情安排妥當，並將姚錦交由張志忠領導。」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潛台匪幹殷啟輝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十月，張志忠又將姚錦及「中壢支部」交由殷啟輝領導，並介紹老洪【陳福星】與他聯絡。
殷啟輝，江蘇人，上海暨南大學畢業；一九四七年春就讀暨南大學時入黨，積極參加學運工作；後來因為身分暴露遭到通緝，而於同年十月間潛逃來台，經過同學何氣介紹，在竹東林場工作。當他要離開上海時，他的上級領導人余學達指示他說：「到台後，如有人持金一民函來聯繫時，即為組織之介紹信，可接受領導」。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果然有自稱老黃者，持金一民函前來聯繫，經多次晤談後，殷啟輝才瞭解這個老黃就是「台共省委」張志忠。〔頁二五一、二五三、二五四〕

「鍾浩東被捕的風聲我也聽到了。」日據末期曾與鍾浩東一同參加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的蕭道應醫師回憶張志忠在基隆方面出事以後的應變措施說。「此時，郭琇琮跟張志忠的弟弟張冉添還在我的法醫研究室掛名研究員；他們每天都從前門進，後門出，積極活動著。基隆中學那邊出事後，張志忠就要我叫我岳父趕快賣掉中山北路的房子，就是便宜賣也好！……」

「九月一日晚上九點，」黎明華老先生繼續說道：「我按照張志忠的安排，搭火車南下湖口，在范新戊家過夜；第二天一早，又在湖口車站與兩年前在我宿舍住過的老洪（陳福星）和曾永賢會面；然後，再由老洪和曾永賢帶領，化名『阿春哥』，轉移到苗栗三灣鄉內灣村孫阿泉的家。從此以後，我和老洪及曾永賢自然形成當地的領導小組，繼續在竹南地區進行地下的農民運動。」

苗栗客家山村的黨人們

張志忠不是客家人，那麼，他在主要是客家人聚落的苗栗地區的組織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這裡，我們先來看看黎明華老先生提到的曾永賢和孫阿泉的背景。

關於曾永賢，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曾永賢（一九二四—），苗栗銅鑼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的一九四五年參加日共外圍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六年五月回台後與謝雪紅發生聯繫；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與張（羅）坤春在苗栗組織「（治安）維持會」；同年六月由李喬松之子（李韶東）介紹，在洪幼樵監視下宣示入黨，先後在桃園、銅鑼建立二個支部，展開組織發展工作；一九四八年三月接受陳福星領導，乃將桃園支部及其所屬工作交給黃培奕，轉而領導竹南、苗栗地區工作。〔頁二〇六—二〇七〕

在國史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印行的「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也自述入黨經過說：

我在台中先認識省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大約在一九四七年六月間，我正式宣誓加入中國

共產黨，地點在台中的復興小學。……由洪幼樵監誓。我是由洪幼樵直接領導的，我的上級就是他。過了一段時間，我在桃園找到工作【新竹縣參議會議事組主任】，我的黨內工作和組織關係就交給張志忠。……改由張志忠單線領導。……但是【張志忠當時比較忙】，大約兩、三個月後張志忠又交給陳福星，仍然是單線領導。……那時我正在桃園及苗栗發展組織，新竹則由別人負責。以後竹南也交給我，所以我兼管桃園、竹南、苗栗。【頁六七、七六、七七】

至於孫阿泉（一九一八—一九五九），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的檔案所載，原是三灣鄉公所職員，擔任「台灣省工委會新竹地委會竹南支部」的「組織幹事」。【頁四四、四五】

經由多年的田野查訪之後，我得知孫阿泉已於白色恐怖的風暴平息之後的一九五九年九月，不幸意外溺水喪生，從而無法再向我們訴說當年那段風火雷電般的革命歲月了。他的遺孀張金妹女士則從另一個側面見證了她所理解的歷史片段。

「那時候，阿泉在三灣鄉公所上班。」張金妹女士說：「他時常帶朋友來內灣家裡。他們關在房裡講話，我一個婦道人家也不去多問什麼。這些來來去去的朋友，我只認識頭份流水平潭的劉雲輝、張南輝和大河底的宋松財。後來，有一個叫作阿春哥的大陸人，常常自己一個人來。」

在安全局機密文件的檔案記載裡，「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竹南、頭份地區的組織主要是通過劉雲輝而發展起來的。

首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共、苗栗殘匪武裝組織劉雲輝等案」的「案情摘要」

欄載稱：

劉雲輝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四月間由陳福星介紹參加匪黨組織，初由陳福星領導，後移曾永賢領導，擔任竹南區委書記。【頁三八六】

另外，《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又載：

劉匪雲輝所領導之組織，遍及南庄、三灣、大河底等山村，當時正在積極進行建立武裝基地中……。【頁四一】

自從看到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有關劉雲輝的檔案之後，我一直想要知道，究竟劉雲輝是怎樣的人？他又為什麼會認識陳福星並由他介紹而參加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等等。

透過黎明華先生的親自引見，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下午，我終於在苗栗頭份流水平潭劉家，見到了年過七十、頭髮蒼白的劉雲輝老先生，並且在往後幾年，針對他那段年輕時候的紅色歲月，前前後後跟他做了幾次正式或非正式的採訪。

「我是透過日據時期一起當日本兵的桃園大園鄉人林器聰而認識陳福星的。」劉雲輝回憶他和張志忠認識的經過說。「三二八後，有一天，林器聰帶了一個叫作陳聰敏的朋友到我家玩。後來，我才

知道，他的本名叫陳福星。那天，陳福星也沒說什麼，只是拿了一本薄薄的叫作《青年修養》的小冊子給我看。他們走了以後，我就拿那本書來看。因為自己也是窮人，看了以後覺得很新鮮；過去，我從來不曾聽人這樣講過話，也不會看過這種書。我的階級意識於是被喚醒了。這之後，陳福星就自己一個人定期來找我，每一次，他都會帶一些學習文件來，先讓我看，然後與我對話。一段時間之後，他就要吸收我加入組織，推動地方的農民運動。當時，他並沒有向我明說是什麼組織？只暗示說是大陸的革命組織。我毫不猶豫就寫了自傳，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和過去的經歷，交給他。他一直也沒有告訴我，究竟我有沒有通過？只是告訴我，自傳交給上級看過後馬上銷燬，絕對不會留下線索，要我放心。他又告訴我，我們的運動是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當下的工作就是促進陳誠的三七五減租的落實；他說，三七五減租是符合窮苦農民要求的政策，儘管，我們的運動在效果上是幫助陳誠推行他的政策；但是只要是對佃農有利，我們就應該去做。我於是就在地方上開始發展組織，後來就和張南輝、孫阿泉成立一個小組。陳福星仍然每隔一段時間就來與我會面，先聽我的工作報告，然後做一些工作指示。有一次，陳福星帶一個叫作老鍾的人一起來。老鍾跟我說，你這個小組是領導機關。後來，陳福星才告訴我，老鍾就是張志忠。」

根據安全部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的「陰謀活動」欄的檔案記載，劉雲輝所提到的小組成員之一的張南輝是一九四八年間建立的「台灣省工委會新竹地委會竹南支部」（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之名展開活動）的「聯絡匪幹」，直接連絡指導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等地的「小組」。〔頁四四〕

同樣是透過黎明華先生的電話引介，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七日，我終於在苗栗頭份流水潭張家，聆

聽到張南輝先生追憶當年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

「一九二七年，我生於苗栗頭份流水潭一個貧窮的佃農家庭。」張南輝先生的回憶證實了劉雲輝的說法。「台灣光復後，現實的政治與社會使得我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一九四九年間，通過同村青年劉雲輝的引介，我認識了地下黨人陳福星（老洪），並且寫了自傳，加入了黨。」

從劉雲輝先生的談話看來，他顯然是透過林器聰的引介而和地下黨及張志忠發展了組織關係的。為了搞清楚林器聰的組織關係，我後來也透過劉雲輝先生的介紹，跟林器聰先生電話聯繫上了。在取得他的採訪同意之下，我特地驅車前往桃園大園鄉，在濱海的一座老宅見到了林器聰老先生。但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白色恐怖的餘悸猶存，這次訪談終因老先生的妻子近乎歇斯底里的反應而未能順利完成。因此，關於林器聰的組織關係，我們只能根據其他相關資料來理解。

林器聰應該是透過林元枝而和簡吉認識的。

原是桃園鄉村教師的吳敦仁在國家檔案局解密資料〈吳敦仁自白書〉寫道：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八月，簡吉叫我和李萬福、林器聰三人組織一組，……林器聰負責竹圍地區。……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受日本教育，所以對國文是可以說沒有素養的，因此，起初是讀觀察、世界知識，作識字的橋樑，後來才進入反動文件《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新民主主義論》、《論農村工作》等。在支部預先學習（張志忠、簡吉、陳福星指導，主要領導者是簡吉），以後各人才去指導小組，約十天內外開會一次，開會後，才學習讀文件、討論文件，主要在於識字。

這樣，綜合上述的材料，我們大體也可以拉出一條這樣的組織線路：

張志忠—簡吉—林器聰；

簡吉後來把林器聰交給陳福星領導；

林器聰再把劉雲輝介紹給陳福星吸收入黨；

劉雲輝先後介紹張南輝和孫阿泉給陳福星吸收入黨；

張志忠把黎明華交給陳福星和曾永賢，並撤退到孫阿泉處隱蔽。

在山區開辦幹部學習班

隨著形勢的發展，張志忠的革命旅程也逐漸走到最後的一站了。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張志忠、陳福星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進入海山區鶯歌鎮之烏塗窟山區，召集上述各地區【台北縣海山區（鶯歌、樹林、三峽三個鎮），桃園縣大溪、龍潭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區，苗栗縣大湖區】匪幹，開辦集體訓練班，並以五千元交與海山桃園地區負責人黃培奕向地方駐軍不肖官兵購買槍彈，計購得步槍一枝，短槍十五枝，另由林匪元枝將日軍投降時所遺下之

擲彈筒一挺，復交黃培奕，全部武器除一部分短槍由陳福星先後分交新竹、苗栗兩縣山區各逃亡幹部配用外，所贖武器則交由黃培奕負責組成武工隊，建立烏塗窟基地，形成游擊根據地之雛形。【頁三九三—三九四】

「十月中旬，老洪和曾永賢又帶領張志忠來到苗栗三灣地區視察。」黎明華老先生繼續追憶當年和張志忠會報工作的情況時從另一個側面再現了張志忠曾經走過的行蹤。「我向張志忠報告三灣地區的工作情況後，他便問我：竹南、苗栗地區的山區地形、交通設施，以及進行武裝活動的可能性；最後，張志忠表示，他計畫在十二月中、下旬，把竹南地區的幹部集中起來，舉辦為期一週的幹部訓練學習班，進行思想上的學習、整訓。離開三灣之前，他又當著老洪和曾永賢的面叮嚀我：抓緊時間，爭取在學習會之前，完成《怎樣開展台灣人民游擊戰爭》小冊子的撰寫工作。此後，除了定期跟地方幹部會報之外，我就靜下心來寫《怎樣開展台灣人民游擊戰爭》。十二月初，小冊子的撰寫工作完成了；這時，張志忠也通過老洪向我指示：學習班在十二月下旬舉行。」

1. 神桌山集體訓練班

綜合黎明華、劉雲輝、張南輝和宋松財等幾個實際參加學習班的人的說法，竹南地區的幹部學習班從十二月十六日起，在三灣鄉大河底神桌山開辦；場所是一位大約七十歲左右的積極群眾劉鼎昌完全無條件提供的一個山寮。學習班由張志忠親自主持，一共有十六個人參加。除了陳福星（老洪）、

徐新傑、鍾蔚璋和黎明華等外地人以及銅鑼籍的曾永賢之外，其他都是頭份、三灣一帶的當地農民、小商人和中小學教員；他們是頭份的劉雲輝和張南輝，三灣地區的宋松財、孫阿泉、江添進與曾興成，大河底的彭南華、廖天珠和黃逢開，南庄的李旺秀。

「學習班由陳福星主持，準備了王稼祥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毛澤東的《把革命進行到底》、《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學習文件，分給大家。」黎明華憶述神桌山學習班的具體情況。「張志忠以《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為重點，其他文件為輔助教材，扎扎实實地講述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聯繫群眾、領導群眾……的道理。」

通過這次學習會，張志忠顯然給劉雲輝、張南輝和宋松財等當地的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張志忠是陳福星派我去接他上山的。」張南輝滿懷思念之情回憶說。「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也沒有多問他什麼。可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見了我，第一句話就說：餓了吧！走，先去吃點心，再趕路。可我卻拒絕他的好意，說：我們的經費不多，不好這樣浪費，等到了阿泉家（我們的聯絡站），再自己煮來吃。他聽我這樣說，不但沒生氣，還誇獎我說：小張，沒想到，你那麼年輕，觀念就這麼正確！」

「我記得，第三天早上，江添進從山下帶來一個名叫老吳的陌生人，加入我們的讀書會。老吳這個人話不多，卻總是在一邊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思考。」宋松財追憶了他對張志忠的印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經提過一個問題，引起我們熱烈的討論。他說，我們中國曾經有過光榮的歷史，可是這一、二百年來，為什麼卻跟不上人家？一直要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老吳就是地下黨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

「張志忠這個人，我只見過幾次面而已！不過，我對他的印象卻很深刻——高高大的，沉著，謙虛，不講空話。」平常話不多的劉雲輝老先生難得地一氣說出他對張志忠的敬佩之心。「在神桌山的學習會上，他也很少發言，盡量聽我們講，不會表現出一副上級指導員的權威姿態。他不會吹噓一些大道理，而是看具體的對象，講一些對方聽得懂的話。好比講，對待像我這樣沒讀什麼書的貧農分子，他就講能讓我瞭解的話給我聽；而對曾永賢那樣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他就講更深一點的理論。曾永賢曾經跟我提到，他最佩服張志忠這個人了。他說，這個人知識淵博，無量無底！曾永賢更欽佩的則是張志忠堅決的革命性。我聽說，他從少年時候就參加革命，光復後從大陸回來台灣，盡管回到家鄉，卻也沒有踏進家門一步。他是搞地下工作的，由此可見他革命的徹底性！」

綜合上述證言，可以這樣說，經過整整一個星期有系統的學習、討論後，這些地方幹部都感到在認識上、思想上已經比學習以前充實了很多，並且分頭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2.十三份集體訓練班

神桌山的學習班結束後，張志忠就離開了苗栗地區。

從官方資料看來，張志忠在神桌山學習班結束之後，還在三峽山區的十三份搞了一個學習班。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同年【一九四九年】冬張志忠陳福星二人在烏塗窟附近之十三分【份】山區開辦第二次幹部集體學習會，參加者有黃培奕、林元枝、簡國賢等二十人，著重研究台灣山鄉地形及游擊戰術。【頁三九四】

「我也參加了十三份的集體學習。」蕭道應醫師證實了安全局機密文件所提到的學習班的存在。

「我記得，海山一帶有十幾個人參加，很多人我不認識，但他們知道我，聽過我。」

前面說過，一九四七年底，蕭道應醫師介紹了在《公論報》任職的黃培奕和石聰金給張志忠認識；其後，黃培奕於一九四八年二月間經陳福星介紹入黨，並負責建立台北縣鶯歌鎮支部。至於石聰金，據他自己所說，他因為與陳福星不和而沒有被吸收入黨；儘管如此，不是黨員的他還是在張志忠的指導下，前往在地理上離三峽、台北不遠的十三份山村，開發了專門收留流亡黨人的基地。

「二二八以後，黃培奕跟化名老洪的陳福星來苑裡，叫我找一些青年來座談；我於是找了一些年輕人，黃培奕和我父親做陪，一起座談。老洪跟大家講台灣當前的局勢，也講到國內召開的國民大會和國共談判的時事，並且呼籲說：要革命了，大家要有覺悟！台灣青年要站起來！……」石聰金老先生向我解釋了他認為陳福星當年之所以不吸收他入黨的原委。「將近凌晨一點時，我們回到家。

我母親已經煮了鹹稀飯和點心，等著讓大家吃。吃東西是件很快樂的事，尤其是在大家都肚子餓了的半夜。大家於是邊吃邊就剛剛的座談會開起玩笑，說誰說得如何如何？誰又如何如何？耶！我脫口而出一句開玩笑的話說：老洪，沒想到，你還挺會煽動革命啊！我父親接著我的話說：革命哪裡是能夠煽動的！可能是感到很受刺激還是怎麼了？沒想到，正要端起鹹稀飯來吃的老洪竟突然變臉，把碗放

了下來，不吃了。嘿！嘿！嘿！我試著緩和尷尬的局面而對老洪說：我是在開玩笑的呀！你可別生氣喔！然而，我沒有想到，老洪竟把我那句玩笑話撿起來，放在心上。」石聰金老先生接著敘述了他如何在陳福星的嘲諷下而拒絕申請入黨的經過以及張志忠對這件事的態度。「有一次，張志忠、老洪、黃培奕和我都在黃培奕家。那時，黃培奕大概和老洪已經發展了組織關係，所以就跟我說：石仔，那麼久了，你也該把自傳交出來了呀！我們都拿出去了。我興奮地回他說：要交嗎？好啊！我寫！這時，老洪走過來跟我說：石仔！共產黨可不是那麼容易投機的喔！我愣了一下，隨即非常不服氣地跟他說：中國的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可是參加中國的革命，不一定非要共產黨才行。這時，一直靜靜地坐在床邊的張志忠立即肯定我說：對！對！你說得很有道理。就這樣，我當場把準備寫自傳的紙撕掉，不寫了。以後，沒有人叫我寫，也沒有機會寫了。」

與此同時，隨著大陸國共內戰的局勢演變，許多台灣地下黨人也因為參與實際鬥爭而遭到特務的監視或通緝；於是是如何從火線上撤退這些黨人便成了張志忠必須處理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時候，我與黃培奕預估到即將來臨的時代變局，就同時辭掉《公論報》的工作。黃培奕回到故鄉鶯歌。我則返回故鄉苑裡，推動減租減息的農民運動。」石聰金老先生接著詳細敘說了開闢十三份基地的經過。「後來，張志忠要我開闢一個專為收留台北、桃園地區流亡的地下黨人的基地。我想到，我在廣東花地集訓總隊認識的戰友廖成福的家鄉十三份，地理位置適當，又是一個以種茶為主的山村，除了一家三井製茶廠外，沒有其他的產業；除了茶之外，主要農產是地瓜，以及少量的稻米，其他就是以薑和桂竹筍為主的山產。因為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傾向上也就比較可靠。因為我不是黨員，所以我就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進去十三份。通過廖成福的封建

關係，我們很快就把十三份搞成張志忠指示建立的基地。我記得，二二八前曾經轟動一時的《壁》的劇作者簡國賢就是第一個流亡到十三份的地下黨員。後來，當時的蘆竹鄉長林元枝也帶領鄉村教師吳敦仁、蘆竹鄉公所職員呂喬木、彭坤德等桃園地區的流亡者投奔十三份。到了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戶口總普查之前，因為『四六事件』而被通緝的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蕭道應夫婦及其大兒子、郭維芳……等一大批幹部，也都陸續來到十三份。我們這群流亡者於是就在張志忠和簡國賢的領導下，一面從事勞動生產，一面展開集體學習的組織生活。」

張志忠的皮箱

可以推測，張志忠應該是在十三份山區開辦的第二次幹部集體學習會結束之後在台北市區被捕的。

情治機構隨即假藉張志忠的一口皮箱，佈下誘捕計畫，企圖一網打盡苗栗地區的殘餘黨人。

黎明華老先生得意地追述了當年識破詭計的經過：

一九五〇年二月，舊曆過年（十七日）前，某晚，有個陌生人來到三灣孫阿泉家，把一只皮箱交給黎明華。

「老吳叫我把這個皮箱交給你們；」那個陌生人一邊把皮箱交給黎明華一邊說。「老吳要我告訴你們，台北的形勢很緊張，希望你們趕快把竹南、苗栗地區的重要幹部集中起來，二月十五日，他會下來，跟你們討論重要的事情。」然後，他就走了。

黎明華尋思：老吳，其實就是張志忠在竹南地區活動時的化名；除了組織內部的核心成員，一般人是不會知道的。但是，按照組織原則，張志忠應該透過老洪和曾永賢跟他們聯絡才對。因此，他對那人的身分感到懷疑。他於是就把那只皮箱打開來檢查。他看到，皮箱裡頭有張志忠經常穿的西裝上衣、一條領帶、一只收音機、一把白朗寧手槍和三十多顆子彈。

沒錯，黎明華確認，這些都是張志忠隨身的重要東西。可他還是無法就這樣輕信。他於是又仔細檢查那支白朗寧手槍。他把手槍分解，詳細檢查內部的零件，這才發現它的撞針已被鋸掉了。當下，他就判斷：「張志忠可能已經被捕了，那個人一定是偽裝的特務，目的是要把我們一網打盡。」

黎明華隨即在跟老洪和曾永賢定期會面的時候，把情況向他們報告，並分析各種疑點。經過緊急研商以後，他們三人認為：參加神桌山學習會的十幾個重要幹部，有可能都已經暴露了身分，於是決定把他們全部撤離原有的地方，分頭疏散到桃園或苗栗地區。

「我想，張志忠一定是在被捕後不得不供出一些情報的情況下，利用對方想將我們一網打盡的心理，將計就計，試著向我們提出警訊吧。」多年以後，黎明華老先生在受訪時向我分析說，「多年以來，我一直想要把當年的情況搞清楚；綜合官方的各種檔案資料和個別當事人的講法，我認為，張志忠離開神桌山以後，應該是北上十三分山區，主持另一個學習班，然後在回到台北時被捕。」

張志忠與季湧先後被捕

關於張志忠與季湧夫婦的被捕經過，同樣是官方的檔案卻有著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於互相矛盾

的說法；而民間也一直流傳著這樣那樣的傳說。

1. 新港鄉親的傳聞

先來看看前國史館館長所採錄的那個從警界退休的新港鄉親林玉鏡的「歷史證言」是怎麼看待這則傳奇的。為了理解的方便，「證言」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筆者特別以黑體字標示。

在《嘉雲平野二二八》中，林玉鏡說：

張梗二二八沒死，跑到台北在一家漢藥店，政府就一直想抓他，但一直找不到證據。他太太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在台大那裡出個《光明報》，向學生宣傳共產思想。因為這《光明報》才抓到他大舅子，再抓到他太太，然後再抓到他。一九五五年警察學校那本限閱的《反共抗俄基本方法》，書裡有說到張梗的事，名字寫成張忠信，嘉義人，我知道就是新港的張梗，他後來改名的。【頁二七一】

這段說詞，雖然說是歷史的「證言」，但完全是道聽途說、胡編亂造的小說情節，與實際的史實出入極大。不過，這也恰恰反映了張志忠歷史面貌所具有的一定傳奇性。

2. 楊克煌的弟弟楊克村的說法

接著，來看看跟張志忠有一定聯繫的楊克煌的弟弟楊克村的說法。但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他的說法在細節上也略有出入。

第一個說法是根據吳克泰先生一九九三年五月廿八日在北京接受我的採訪時的轉述：

關於張志忠的被捕，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在美國洛杉磯的農組前輩簡娥家裡見到楊克村時，他是這樣跟我說的：張志忠比蔡孝乾先被捕，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被捕前，他已被特務跟蹤一個多月。他騎自行車到萬華老松國小附近時，特務開吉普車撞了他，然後下車同張志忠握手，說對不起，隨即把他拉進吉普車帶走。

第二個說法是根據楊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在楊克煌的《我的回憶》的「編注」的轉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卅一日，在台北民生西路我二叔楊克村家，二叔告訴我一些他所知道有關張志中【忠】的事情……當年張一家人住在新公園圓口李進【振】芳的房子（二樓），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掩護。

不久，在張住處樓下，來了一個保密局的人，他在騎樓擺攤子，假裝是賣香菸的。每天張出門

時，這保密局的人就打信號給對街窗口那邊的人，再由他們聯繫叫人用吉普車跟蹤張。約經過三個月餘的時間，他們掌控張的行蹤後，才找機會把張抓起來。【頁二五二】

吳克泰和楊翠華分別轉述的楊克村的說法都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楊克村並沒有清楚交代為何他會知道這些事情？也就是說，他沒有說明出處。因此，這裡也就只能當作「僅供參考」的說法之一。

3. 《中央日報》的報導

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出版時間的先後，來看看不同的情治單位與個別的特務的說法究竟如何？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刊載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第四版，題為「中共台灣省工委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的說法：

自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光明報」被破獲起，全省組織相因相循，始終暴露在國防部保密局的嚴密控制之下。……陳澤民既於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被捕，繼而張志忠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台北被捕，接著蔡孝乾於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泉州街自宅被捕，最後洪幼樵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在基隆碼頭上被捕。至是，省工委全部機構被摧毀。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有關「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被破獲的報導。

4. 調查局《台共叛亂史》的寫法

一九五四年四月，調查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的「保防參考叢書之一」《台共叛亂史》，署名「郭乾輝」的作者在該書寫道：

我治安情報機關，於破獲「光明報」全案同時，乃加緊向省工委之祕密組織向上發展，深入窮追。

當基隆市工委破獲的同一時期，其中有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之妻蔣某【蔣碧玉】尚未獲案。因為運用已獲匪犯蔣某的妹妹【基隆中學圖書館管理員】，予以政治說服，又供出了台北市前大同中學女教員季濬與老鄭建立有組織上的關係（按老鄭即蔡孝乾之化名）。

於是，根據此一線索，再著手追查，始悉季濬已離開大同中學，賦閒暫住在台北市衡陽街八號生春藥號內，乃派工作同志祕密監視季的動靜，結果，發現季有丈夫叫楊春霖，但查核戶籍，戶長仍是季濬，楊反為家屬，楊本身又交遊廣闊，情形非常可疑，經不斷的跟蹤守候，確認嫌疑重大，乃決定於卅八年【一九四九年】的除夕開始行動，將楊某加以逮捕，楊雖供出本身曾受老鄭（蔡孝乾）直接指揮，但矢口否認他的妻子為黨員，隨即將他的妻子季濬亦加以逮捕，在雙方對供質詢以後，無法狡賴，始承認彼此均為黨員，係奉黨的命令而結為夫婦。……「楊春霖」原非真名，初本名張梗，日據時代化名為鹿某，後在中共匪區改名為張志忠……。【頁五六】

5. 安全局的機密檔案所載

一九五九年，國家安全局為了「教育幹部，策進工作」，而從卷帙浩繁的檔案中整理出版了原名《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的機密文件。

首先，在第一輯所謂「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欄第二部分「我

方」的第一點中寫道：

主辦單位【保密局】破獲匪「基隆市工委會支部」，及「光明報」之同時，即加緊向匪省工委會之祕密組織，深入窮追；自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至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止，先後將匪台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及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等重要匪首捕獲……。【頁十八】

另外，在第二輯所謂「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的「綜合檢討」欄第二點中也寫道：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國防部前保密局】由於本案之偵破，而獲得匪「台灣省工委會」祕密組織之線索，經綜合研判後，隨即展開嚴密偵查，旋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先將匪「台灣省工委會副祕書長」陳澤民逮捕，又於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將匪首（台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捕獲，復根據供詞逮捕洪幼樵、張志忠等要犯歸案……。【頁五】

6. 老特務谷正文的說法

一九九五年九月，自稱逮捕張志忠的前保密局特務谷正文在台北獨家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祕密檔案》口述道：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間，我綜合了陳澤民、朱謙之、吳石等人的口供，研判得知共諜組織武裝部長藏在台北新公園附近的中西大藥房二樓。二月七日深夜，我們在監視多日之後採取逮捕行動。那一日天氣特別壞，很濕冷，或許正是由於天氣的關係，張志忠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喪的，完全不像一個從事武裝鬥爭者那麼精神奕奕。

「知道你們會來，我等很久了。」這是見面時，他所說的第一句話……。【頁一二二】

7. 哪種說法才是正確的？

綜合上述六種不同說法的內容來看，張志忠被捕的時間大體有下面幾種可能：

- 一、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楊克村）
- 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
- 三、一九四九年除夕（調查局）

四、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間（安全局）

五、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谷正文）

按照這五個不同說法，總的來講，張志忠被捕的時間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間或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

就官方機構和情治人員的說法而言，如果按照調查局系統的郭乾輝與所謂「中共台灣省工委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的說法，那麼，張志忠就應該是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

調查局的《台共叛亂史》說，「治安情報機關」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志忠被捕後，「基於張志忠所提供的線索」而輾轉查獲蔡孝乾的身分、住址，並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台北市泉州街將蔡孝乾逮捕。但是，如果按照國家安全局機密文件的說法，國防部前保密局卻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將蔡孝乾捕獲後，「復根據供詞」而逮捕張志忠的。

事實只能有一種。那麼，這樣的矛盾說法要怎麼對待呢？

如果張志忠的確是由谷正文這個老特務親手逮捕的，而他的回憶又沒有有意或無意的偏差的話，那麼，他的說法就應該是最符合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載的了。如果安全局檔案與保密局老特務的敘述都是事實的話，那麼，張志忠就應該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間被捕的；這樣，老特務谷正文所說「二月七日深夜」，就有可能是事實了。

問題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谷正文的話能信嗎？能信多少？

「我在保密局關押期間，大概每隔兩天便被提訊一次。當時，裡頭有個叫作谷正文的特務，對我

們的態度真是壞透了；幾乎所有的刑求都是他下令執行的。」多年以後，戴傳李這樣評價谷正文這個老特務。「我覺得，他已經根本不是人了。他自己也曾經對我們說，他因為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所以早上起床從來不洗臉，也不刷牙。」

姑且不論一個「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的特務說的話是否就一定不可信，但我們又如何能夠理解：張志忠這樣一個久經考驗的革命者竟會因為「天氣的關係」而表現得「非常沮喪」，乃至於面對逮捕時竟然毫不抵抗地束手就擒呢？老特務谷正文這樣的敘述手法，即便就虛構的小說的書寫而言，也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吧！

不管如何，就張志忠被捕的時間而言，事實只能有一種：不是「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就是「一九四九年的除夕」；或者兩者都不是。

那麼，哪一種說法才是事實呢？我們顯然無法就此做出判斷。因為這樣，我們就有必要繼續看看當事人之一的季澐的說法了。

8. 季澐的說法

季澐生前並沒有就自己被捕的實況留下任何文字的敘述，可她卻透露了被捕的時間。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她從軍法處看守所寫給妯娌蔡芬的第一封信提到：「我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離家」的。

如果季澐給蔡芬信中所提的時間確是事實的話（為什麼不是事實呢？），那麼，張志忠也應該是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被捕，也就是調查局所說的「一九四九年的除夕」，或者楊克村所說的「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

「據我所知，季澐很喜歡坐三輪車，她認為要搭乘很方便。」關於季澐的被捕，蕭道應醫師的妻子黃怡珍女士在生前向我轉述了她個人聽到的說法。「後來聽說，特務就是偽裝成三輪車伕，載上她後，就把她逮捕了……。」

張志忠轉向了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在國共內戰中全面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由廣州播遷台北。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三月十二日，陳誠內閣就任；台北國府的時代正式展開。三月廿二日，為了政治安全的重建，在國防部設立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把大陸時期不同系統的特務機構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強，準備以恐怖手段來推行其在台的軍法統治。五月十三日，蔣經國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在政府發言人（沈昌煥）中外記者會上宣布「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祕密組織」破獲經過：

國防部保密局自去年九月破獲共匪《光明報》及基隆市工委一案後，於去年十一月又在高雄破獲

共匪台灣南部工委一案，至本年一月起，開始破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整個祕密組織。

(一) 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隸屬共匪華東局指揮，為共匪在台灣全省之基本組織，其所負工

作任務，主要者為下列五點：

1. 發展台灣全省各地區之黨的組織；
2. 對台灣同胞作祕密之政治宣傳；
3. 蔑集台灣境內軍事及政治之情報；
4. 利用關係策反思想上動搖之軍政人員；
5. 準備建立台灣之地下武裝。

(二) 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於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迄今已屆四年，省工委兼書記蔡孝乾，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省工委兼宣傳部長洪幼樵，省工委兼武裝工作部長張志忠等四人，均已先後捕獲，並經說服轉變。現蔡孝乾等四人已聯名發表：「告台灣全省中共黨員書」，勸告共匪尚未就捕之黨員及幹部從速依照政府規定之自首報到辦法，向政府坦白自首，並交出一切組織關係，停止一切組織及工作之活動。

(三) 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灣之地方黨的組織，計分北部、中部、南部等三大地區，由蔡孝乾領導北部工作，洪幼樵領導中部工作，陳澤民領導南部工作，張志忠則專管新竹地圖工作。……

(四) 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企圖在台灣境內建立武裝工作，但因台灣社會經濟穩定，組織嚴密，極感困難。但匪方仍設法逐步準備建立，現已破獲其臺中地區武裝工作基地白毛山及竹子坑兩處，共捕獲武裝共匪人員十九人，搜獲長短槍八枝，各式子彈五百餘粒，手榴彈七枚，……。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四日，《中央日報》除了刊登蔣經國的談話之外，並且登出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與陳澤民等四名「匪首」的照片與「親筆簽名」的《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全省中共黨員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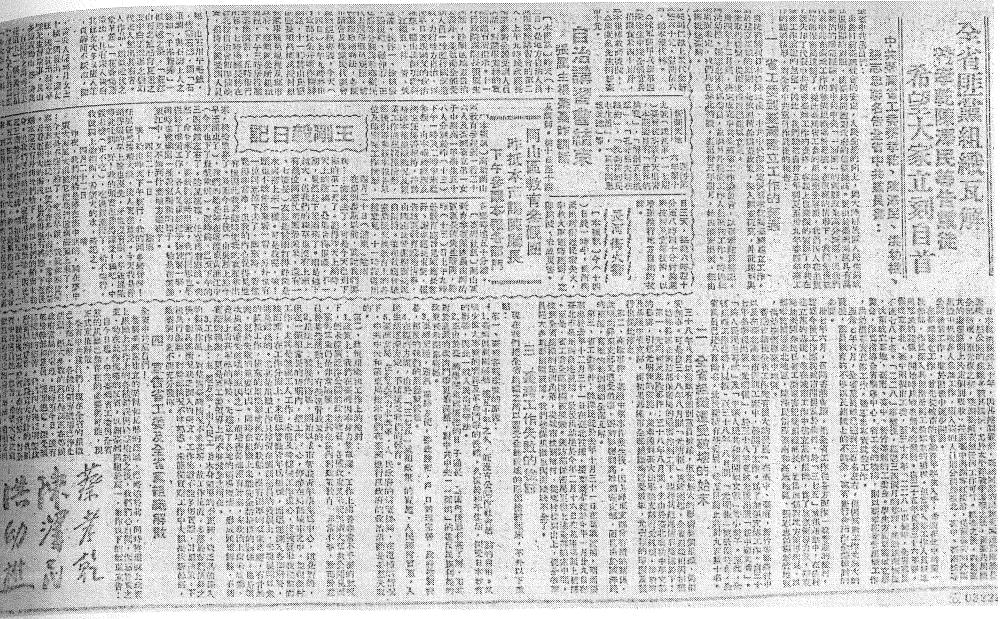
全省中共黨員們！現在全省的組織已全部瓦解，各級的領導機構已停止活動，絕大多數的黨員幹部正在等候政府當局的處理。但時至今日，還有部分幹部和黨員，畏罪逃亡，深受顛沛流離的痛苦。我們……願最後以台灣省工委的資格，對全省中共黨員進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規定的自首辦法，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係，以迅速終結整個案件，而澄清台灣的社會局面。……

我們四人在主觀上已經失卻了代表中共領導台灣工作的資格。

那張照片是一張五人合照的相片，中間一個女性是所謂「華東特派來台聯絡員」朱謙之，周圍四名男性則是「四匪首」：張志忠、洪幼樵、陳澤民及蔡孝乾。從略顯模糊的照片看來，張志忠穿著粗布襯衫，頭髮中分，是一個年紀比蔡孝乾年輕的壯年男子，四方臉上流露著一股堅毅的神情，甚至還面對鏡頭露出一種不服氣的微笑……。

四人的簡歷分別寫著：

蔡考乾，台中縣彰化人，四十六歲，於民國十四年在滬加入共產黨，任「台灣省工委書記」。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報》所列張志忠的簽名（不知真假？）與聯名「告全省中央黨員書」。

在保密局南所的季澐與小羊

從各種材料看來，張志忠、季澐夫婦與小羊被捕後先是送到保密局南所。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晚上在宜蘭羅東同時被捕的馮守娥與蕭素梅，曾經在保密局南所和北所押房，分別與季澐和小羊這對母子，共同度過一段被關押的艱辛日子。

馮守娥與蕭素梅被捕時正當二十出頭的花樣年華，後來，馮守娥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蕭素梅刑五年。關於馮守娥與蕭素梅的涉案情形，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所謂「匪蘭陽地區工委會盧盛泉等叛亂案」的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如果張志忠的確在這份「轉向」的聯名文告上頭簽了字的話，那麼，他就和蔡孝乾等三人一樣，成為一個為同志所不齒的叛變的共產黨人了！問題是，為什麼後來蔡孝乾等三人能夠苟活下來，獨獨張志忠卻仍難免一死呢？這個事實也具體地告訴我們：關於張志忠歷史的探究不能因此而「蓋棺論定」。

這裡，我們只能把這個問題暫時擱下，先來看看季澐被捕以後的情況。

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民國廿八年加入十八集團軍，任「台灣省工委，兼武裝工作部部長」。

陳澤民，福建東山人……。

洪幼樵，廣東揭陽人……。

馮守娥就讀蘭陽女中時由學校老師劉登峯吸收，加入歌詠隊，其後又與同學蕭素梅等人參加該校美術、音樂老師俞仁溥（江蘇人）召集的「祕密集會」。一九四八年七月間，馮守娥與在國校任教的哥哥馮錦輝分別「參加匪黨」，並與羅東商民盧盛泉密設「宜蘭地區工委」，由盧盛泉任「書記」，馮錦輝任「工委」，馮守娥任「婦女支部書記」，「祕密吸收黨員，發展組織。」一九五〇年三月，馮守娥介紹羅東區署辦事員蕭素梅「加入匪黨」。……【頁六四—六七】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馮守娥與蕭素梅女士在校園分別向筆者口述了她們的涉案經過。除此之外，蕭素梅女士也親筆寫下題為〈我與季湧女士〉的未刊手稿，紀錄了她的這段人生經歷。

「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從羅東被載到台北，然後被蒙著頭押下吉普車，進入一所小小的廳內。後來，我才知道那裡是保密局南所。」蕭素梅回憶了她初見季湧與小羊的經過。「我們身上的東西，像是髮夾、腰帶、錢包等等，統統被取下來，交付保管，然後就身穿便服（一分錢也沒帶），腳跛一雙拖鞋，通過一道鐵欄杆及小門，進入兩排一間間小牢房之間的甬道，被推進最裡面的一間。押房裡頭的空氣又悶又臭。我在心裡數了數，當時，那間一個半榻榻米大的押房連我就有十一人，再加一個大約三歲多的小男孩。睡覺時，我們只能像排沙丁魚似地側著睡；每個人只有五、六吋寬、不到一個人長的空間可躺，腳無處伸，身子也動彈不得。白天，大家都靠牆壁，面對面，分兩排坐。因為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而且國語很差，所以我剛進去時很少開口。幾天後，與其他難友較熟了，我才跟她們互相介紹自己名字、什麼地方人、什麼時候關進來的。因為大家都是難友，所以也都互相照顧。這樣，我也才知道，帶孩子的那位母親叫季湧，是張志忠的太太，孩子叫小羊。」

「小羊很可愛，也很可憐！」蕭素梅女士接著敘述了小羊和季湧在押房的生活情況，以及她個人對季湧的看法。「小小年紀的他應該生活在自由社會裡，無拘無束、活潑瀟灑、快快樂樂地成長才對；但是，無辜的他卻跟著跟著母親被禁錮在監牢裡頭，受這種人間地獄的罪；他不但沒有活動的空間，兩條大腿還被蚊子、臭蟲、蟲子叮咬得像紅豆冰棒一樣，花花的。我心想，真是苦了做母親的，奈何在牢房裡，又能怎麼樣？季湧女士原來是一位教師，很少講話。我注意到，她罵孩子有點情緒化，有時候孩子鬧得厲害，甚至會用腳踢，有那麼一點點的神經質。我想，在那種精神戰場上，她每天要面對隨時被叫出去拷打訊問的恐懼，太多的壓力使她有點情緒不太穩定。後來，我睡到她身旁，也較有機會跟她說話。她偶爾會向我透露：今天放封（盥洗、如廁）時與先生打了暗號。我想，她在這短短幾分鐘之內，既要照料好孩子小羊，又要辦自己的事，還能伺機跟張志忠聯絡，都要靠機智、能幹又敏捷的能力。」

「小羊長得很可愛，活潑又聰明；他在監房裡待不住，白天，季湧就要求讓他到監房外頭去玩。」馮守娥女士也從她的視角追憶了季湧為了小孩而勇敢地與看守鬥爭的情景。「那些看守大都是從大陸來的阿兵哥。大概是看到牢裡的小孩而有所感觸吧！有時候，有些看守也會向我們提及他們在大陸也有妻子和兒女；這樣的看守對小孩的態度就比較好。但是，有些心理不正常的看守卻經常把小孩當玩具玩。有次，小羊哭著從外頭回押房，他告訴他媽媽說，某個看守用曬衣服的夾子夾他的『小雞雞』，夾得好痛！季湧聽了很生氣，卻也無法出去找那名看守理論，只能在押房裡罵。那名看守大概知道自己理虧，雖然聽到她罵，卻假裝沒聽見，讓她一直罵。可是，兩天後，情況就不一樣了。當季湧看到那名看守經過房欄外時就大聲喊說：班長，馬桶滿了，再不倒就要開花了！當時，看守所規

定我們稱呼看守要叫班長；押房裡的馬桶通常只在放封時才能抬出去倒。那名看守聽到了就走過來罵季湧：妳大聲嚷嚷什麼，等一下不處罰妳才怪！說完，他立刻去拿了一副腳鐐，給季湧戴上。我們看了雖然很憤慨，卻也無可奈何。過了好幾天以後，他又把季湧的腳鐐拿掉。」

在南所一段時日後，季湧、小羊，以及蕭素梅和馮守娥等女性難友又先後被移到保密局北所。「北所是一處鐵工廠改造的（一定是沒收來的），所以房間較大、較寬。雖然人數增加了很多，但總算可以較舒適地躺平睡覺了。」蕭素梅苦笑著說：「在這裡，小羊也比較有玩耍的空間了；雖然我們沒人教他，他卻經常唱中華民國國歌給我們聽，可他唱的歌詞卻是『三民主義，你黨所宗，……』。後來，我被移送軍法處，就與季湧女士和小羊分開了。在沒有律師辯護之下，我被判有罪又被移至台北監獄服刑。後來，我聽說，季湧女士犧牲了，小羊被小叔抱回家了。」

季湧寄自軍法處看守所第四十五號的信

根據季湧從軍法處看守所寄給妯娌蔡芬的信所透露的訊息，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季湧與剛滿三歲的兒子小羊被移送到軍法處看守所第四十五號押房。這時，她才獲准和張志忠的家人通信和會面。

九月五日，法官答應讓小羊回嘉義，季湧於是寫了報告，請求批准。

九月十四日，張志忠託人帶口信給季湧，表示他「人很健康」。

九月十五日，季湧連續寫了兩封家信給張再添的妻子蔡芬。在第一封信，季湧除了告訴蔡芬「這裡可以和家中通信」，「來信寄台北市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第四十五號季湧收」之外，也提到

「每逢星期四可以和家屬面會三分鐘，每天可以送東西來。」

芬姐：

很久不見面了，你生了男孩子沒有？我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離家，本月二日才和小孩來到這裡，他爸爸不在這兒，昨天還託人帶口信給我，人很健康。九月以來，我也沒有生過病，小羊已長大，會唱許多歌，只是不大胖，腸胃不十分好。本月五日，法官已答應，允許小羊回嘉義，我也寫了張報告請求批准，等批准這事時，請再添來台北，領孩子及箱子兩只、包袱兩個。

我心中常常難過，我們從來沒有拿錢給家中人吃飯，如今兩個小孩都要你們負擔，真是對不起。我在等判決，還不知道是如何結果。這裡可以和家中通信，每逢星期四可以和家屬面會三分鐘，每天可以送東西來。你接信後，請你把我箱子打開，拿一件長袖藍布衫，一件灰色短袖長衫，一條你做的紅短褲，再買一雙木屐，包了準備好，等我的信，通知你們何時好來台北領孩子。

和我同房間住的，大部分是台北人，他們每天家中送吃的東西來，花很多的錢，你們沒有錢，不要買東西來，我不會怪你們不送東西給我吃，只有再添來台北時，新港家中如有土豆，多炒點帶來，炒點米糠（和白糖要炒好再加糖），煮點滷蛋，給我請請房間裡的人，不好常指他們的油。

新港的爸爸媽媽年紀大了，不知道現在可健康？你們可以勸勸二位老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要太難過。

芬姐：很久不見面了。你生了男孩子沒有？我是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回
離家，本月二日才和小孩來到這裏，他爹不在這裏，昨天還在
人帶口信給我，人很健康。九月以來，我也沒有生過病，小羊已長
大，會唱許多歌，只是不太胖，腸胃不好。本月五日法官已
答應允許小羊回家，我也寫了張紙，請示批準，等批准這
事時，請再添奉上此信，孩子及箱子而已，已托兩個。
我心中常難過，我們從來沒有拿錢給家中人吃飯，如今有了小孩
節慶你們負擔真是對不起，我在等判決，還不知道是何結果。
這裏可以和家中通信，每逢星期四可以和家屬面會三十分鐘，每
天可以送東西來，你接信後，請你把紙箱子打開，拿一件長袖
藍布衫，一件灰色短袖長衫，一條你做的紅短褲，再買一雙木屐
已準備好，等到時候，通知你們何時好奉上此信。孩子。
知我同室同住的，大部分是福建人，他們每天家中送吃的東西來，
很多的錢，你沒有錢，不要買東西來，我不會怪你，但不送東西，你
吃，只有再添奉上此時新港家中如有土豆，多炒點帶來，炒
點米糠（和白糖炒好再加糖）並煎個蛋，給我請客，同室裏的人
不好常吃他們的。

法官允許小羊回家了

哥哥嫂嫂面前，也請你安慰他們，實在對不起，小羊又要他們負擔。

謝謝你把阿梅養大，倘是在台北，又要關在籠子內，現在還是在嘉義？還是在新港？

……

大概就在第一封信交出去之後，季澆又突然接到「法官允許小羊回家」的通知吧，於是趕緊給芬姊寫了第二封信，希望小叔張再添能夠在接到信後趕緊上台北，把小羊接回新港。最後並再次提醒：「來信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45號季澆」。

芬姐：

前信大概看到了罷？今天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法官允許小羊回家了。接此信後，再添就來台北，到軍法處看守所45號領孩子。小羊今年是三足歲又三個月，是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上午一點鐘出生，到明年秋天，可送往幼稚園讀書，台北戶口名楊揚，小羊有兩種病常發，一是皮膚病，一是腸胃病，今年從二月起至五月底，整整四個月，都是生皮膚病，用了很多九一四，消治龍藥膏！每天用消毒水洗才洗好；多吃東西就生腸炎，所以小羊回家後，請你們！看顧時特別注意兩點：（一）天天要洗澡換衫睡覺，（二）不要多給東西給他吃。我們來到這裡才一天吃兩頓，從前八個月，小羊每天早上吃兩小碗粥，中午一碗飯，吃好飯就睡午覺，睡一兩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季澆給芬姊的第一封獄中書信（首頁）。
(張再添提供)

季澐寫於九月十五日的連續兩封信之後，於十八日給季澐寫了第一封回信，信中告訴她自己生了個男

張志忠被捕以後的情況

九月二十五日，季澐給蔡芬寫了第三封家書。透過這封信的內容，我們可以得知，蔡芬在收到給錢給你們，如今反來麻煩你們。請你多多安慰爸爸媽媽年老人，哥哥嫂嫂前問好，你生了男孩沒有？招財老伯伯母前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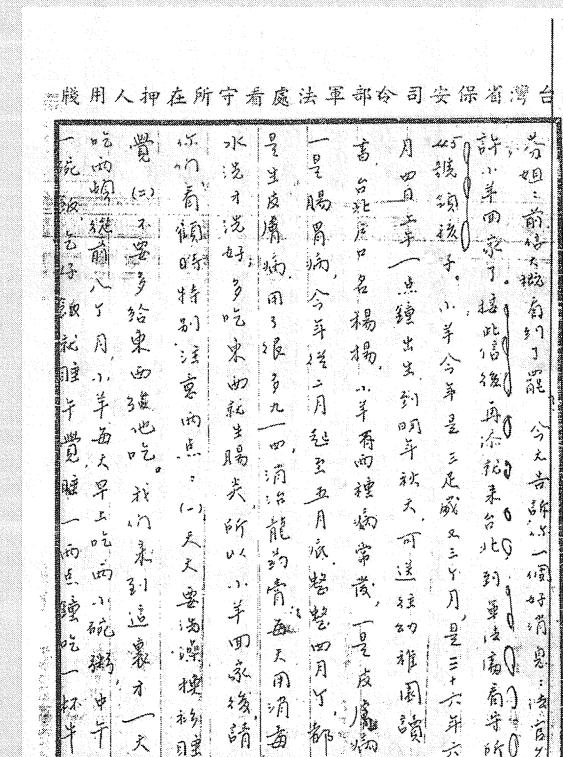
我和小羊在這裡天天揩油吃別人的東西，請再添來時炒點土豆、米糠（炒好加白糖）、滷蛋，

請他們吃。來信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45號季澐。

點鐘，吃一杯牛乳、兩塊餅乾，晚飯也是一碗。八點多鐘睡，夜晚要小便一次，睡覺前都叫他小便好才睡覺。回家後沒有錢吃牛乳，不要買給他吃，睡到半眠，他常要吃開水。這裡房間小、人多，我要他剃成和尚頭，回家後替他留頭髮。他現在已不會說台灣話，請你們教他，會唱十幾個歌，十分調皮，回到新港後，不許小羊在灶下玩火，他是什麼東西都愛玩，家中人眼睛要多看這孩子，他不大聽大人講話。一千個對不起你們，阿羊、阿梅都要你們照顧，我在這裡快判決了，不知道是什麼結果。生春藥行李太太處我有幾個大頭，一套沙發，一包米，請再添去把大頭、沙發和米賣掉，我在這裡要點錢零用。還有許多鍋子、碗盤零碎東西，請再添自己處理。我要的箱子中的藍布長衫、灰色短袖長衫、紅短褲，再買一雙木屐，一把木梳，一定要帶來給我用。

接信後，請寄回信來，說明何時能來台北。一切真對不起家中許多人，我和他爸爸兩人從來未

沒有？招財老伯伯母前問好。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季澐給芬姊的第二封獄中書信（首頁）。
(張再添提供)

孩。此外，季澆這封寫於九月二十五日的給蔡芬的第三封信，也稍稍透露了一點張志忠被捕以後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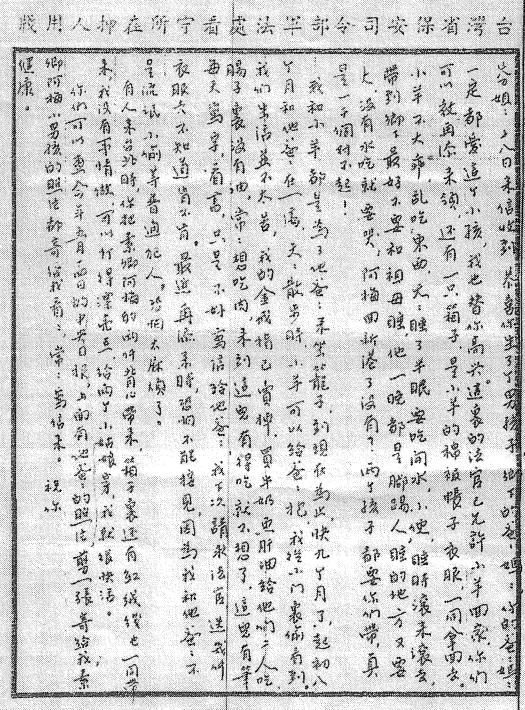
芬姐：

十八日來信收到，恭喜你生了個男孩子，鄉下的爸爸媽媽，你的爸爸媽媽，一定都愛這個小孩，我也替你高興。這裡的法官已允許小羊回家，你們可以叫再添來領，還有一只箱子，是小羊的棉被、帳子、衣服，一同拿回去。小羊不大乖，亂吃東西，天天睡了半眠要吃開水，小便，睡時滾來滾去，帶到鄉下最好不要和祖母睡，他一晚都是腳踢人，睡的地方又要大，沒有水吃就要哭，阿梅回新港了沒有？兩個孩子都要你們帶，真是一千個對不起！

我和小羊都是為了他爸爸來坐籠子，到現在為止，快九個月了，起初八個月和他爸爸在一處，天天散步時，小羊可以給他爸爸抱，我從小門裡偷看到。我們生活並不太苦，我的金戒指已賣掉，買牛奶、魚肝油給他們二人吃，腸子裡沒有油，常常想吃肉，來到這兒有得吃就不想了。這兒有筆，每天寫字，看書，只是不好寫信給他爸爸，我下次請求法官，送幾件衣服去，不知道肯不肯。最近再添來時，恐怕不能接見，因為我和他爸爸不是流氓小偷等普通犯人，恐怕太麻煩了。

有人來台北時，你把素卿阿梅的兩件背心帶來，箱子裡還有紅絨線也一同帶來，我沒有事情做，可以打得漂亮點，給兩個小姑娘穿，我就很快活。

你們可以查今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上面有他爸爸的照片，剪一張寄給我，素卿、阿



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五日，季澆給芬姊的第三封獄中書信。（張再添提供）

只是因為事情沒有清楚

應該是在季澐就要交出這封信的時候，她又收到了蔡芬寫的第二封回信。因為來不及回信，她只能在信末附筆：「你第二信我又收到了」。

蔡芬的第二封回信顯然提到：張再添將於九月廿六日坐夜車北上，並於廿七日到台北軍法處看守所，把小羊接回新港。因為這樣，那天，季澐一早便「把小羊的衣服整理好」，等著張再添來接小羊；但是，她「從太陽出來等到太陽落山」，卻始終不見張再添來接。

十月三日，季澐給蔡芬寫了第四封信。

通過這封信，我們知道，張再添是在九月廿七日之後才把小羊接回新港的。但是，因為季澐「還沒有判決」的關係，所以張再添也不能與她會面。

「事隔多年以後，我已經記不得把小羊接回家的確切時間了；」張再添在接受採訪時說，「可我永遠記得，小羊要走時那種天真熱情的表現，他還特地透過押房送飯的洞，跟一間間的阿姨們說再見呢！」

季澐在這封信中也刻意提到了張志忠。她強調：「認識他的人都說他人好」，並透露說他「只是因為事情沒有清楚，沒有到軍法處來……」。

最後，季澐也提醒蔡芬：「我們這裡寄信是規定每星期二二次，來信可不限制日期」；與此同

時，她也表明：「只要檢查通過，我會每星期寄一信至嘉義。」

芬姐：

你第二封來信說，再添坐二十六日晚車，二十七日到台北。那天我把小羊的衣服整理好，從太陽出來等到太陽落山，想不出什麼緣故。

星期四是接見的日子，我大概一定不會批准，因為我還沒有判決，和我同案子的是李太太，他的先生在外面也請求過，都沒有准面會，你們不要心裡難過，我和她兩個人都沒有什麼事，說不定李先生能保太太出去，我就更無事了。

你們看見小羊回家，祖父祖母會時常念他爸爸，請你多多安慰他們年老的雙親。是真的，他爸爸很好，認識的人都說他人好，只是因為事情沒有清楚，沒有到軍法處來，等他來到軍法處，他就會寫信回家的。

希望再添在家不要亂交朋友，不要多說話，天天上班，回家幫助你抱小孩，吃飯睡覺，閒事不要管。

還有箱子行李在這裡，都是些無用的東西，只有箱子裡放的是小羊爸爸和我的冬衣，我要等機會送給他爸爸過冬。放在藥店裡的東西賣了沒有？因為我想買點牛奶、肥皂、粗紙送給他爸爸，而我沒有錢，結果，等了兩天，又沒有送來，你們來台北一次是不容易的，我不敢向你們有多少要求。

箱子中有條大毛巾，你們洗洗乾淨，冬天給小羊包肚皮睡覺，箱子已給老鼠咬破，東西都要拿

梅、小男孩的照片都寄給我看，常常寫信來。

同案的李太太

季澐信裡提到的和她同案的「李太太」，應該是指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女士。

嚴秀峰，一九一一年生於杭州，一九三九年夏天在金華戰地認識了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一九四一年結為夫妻。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李友邦叛亂案」的「案情摘要」記載了季澐與嚴秀峰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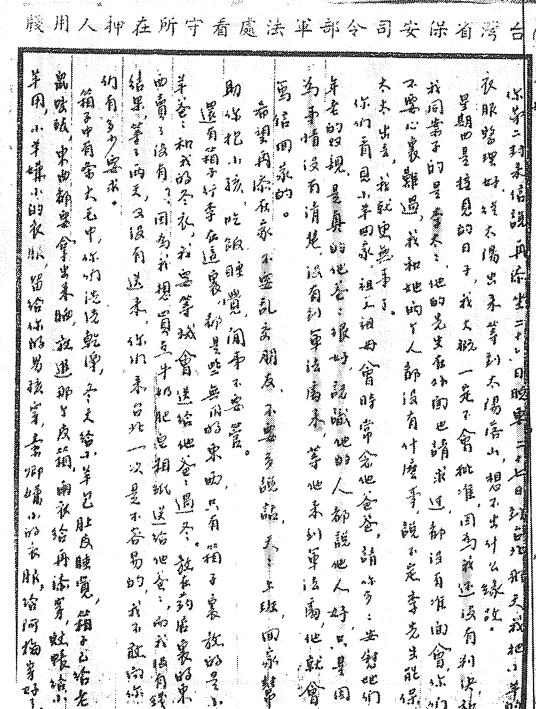
李匪友邦於民國十八年在浙江金華由叛徒劉某介紹參加匪青年團，……於二十一年被浙江當局逮

出來曬，放進那個皮箱，雨衣給再添穿，蚊帳給小羊用，小羊嫌小的衣服，留給你的男孩穿，素卿嫌小的衣服，給阿梅穿好了。你要對家中人說，不要因為我們坐籠子，而溺愛小孩，不願打他管他，最要緊是不要給他亂吃東西。

這是我第四封信，希望你們寄四個小孩的照片和五月十四日報紙上他爸爸的照片來給我。

我家的地址是江蘇省南通縣西門通家巷二號，我父親名季厚菴，將來你們寫個信給他，千萬不要說我坐籠子。

謝謝你們送來的東西，我請房間內的人吃，大家都說鄉下土豆好吃，也謝謝你們。常常寫信給我。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季澐給芬姊的第四封獄中書信（首頁）。
(張再添提供)

捕繫獄兩年，其在獄中，認識同押匪幹即現充匪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祕書長之駱耕模，二十七年李匪以台灣獨立革命黨名義向前軍委會呈准在金華成立台灣義勇隊，……以義勇隊名義為匪掩護。……三十年聘匪幹潘華充義勇隊祕書。至三十四年潘因匪嫌為福建當局逮捕，李匪竟修函為之保釋。李於三十五年來台後仍以潘匪充任青年團台灣區團祕書。李妻嚴秀峰即由潘匪吸收參加匪幫組織。嗣潘匪離台赴滬，另介匪幹季澐與之聯絡。嚴秀峰由李匪處得來軍政重要情報，均交季匪灑轉報，……。【頁一二六】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欄另載兩點正反意見：

一、「匪方」部分：

共匪通過本黨高級幹部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及其祕書潘華（均為匪黨員），進行蒐集情報，掩護工作，其滲透方式，極為正確。

二、「我方」部分：

本黨高級幹部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及其祕書潘華，均為匪黨員，利用李之關係，掩護身分，蒐集情報……我有關部門事前竟毫無察覺，實屬疏於考核防範，與缺乏警惕。

「被捕之前，我前後一共只見過季澐兩次。」一九九七年七月廿三日下午，嚴秀峰女士在蘆洲李家古宅接受我的採訪時強調說：「當時，我是台灣省婦女會理事長；經常有人登門拜訪。頭一次，

有人帶她到我家裡來進行禮貌性的拜會，說她剛從上海來台灣教書，人地生疏，希望我多加關照。第二次，她拿了一本婦女雜誌給我看，也聊了一些對婦女問題的看法。大約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有一天下午六點多，我突然接到她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事要拜託我，請我出去一趟。我聽她語氣急促，好像真的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忙；剛好我女兒要買文具，我於是就帶著女兒依約前往衡陽路博愛路口與她碰面。到了那裡，我注意到她後頭站了一個矮矮瘦瘦的男人，看起來鬼鬼祟祟的。那天晚上，十點多，保密局第二處處長葉翔之（一九二二—二〇〇一）就親自來我家；他問我：妳認識季澐嗎？我老實說：認識。他就要隨從把我帶走。……」

嚴秀峰女士因此認為，她是受季澐連累而被捕的。

對此，曾經與季澐同房共處的蕭素梅女士堅決強調：「以我對季澐的瞭解，我認為她不是那種會出賣人的人。」

事情暫且打住，讓我們繼續往下看看情節究竟是怎麼發展的。

我的爸爸媽媽遠在千里外

十月十日，雙十節。

小羊離開「已快兩星期」了。因為一直沒有收到回信，不知他是否平安回到新港老家，季澐於是寫了第五封給蔡芬的信。

芬姐：

自小羊離開這裡後，已快兩星期，我時時都念著他有沒有回到新港，又看不到你們的信，心中很不安。

本來預備把行李都帶回去，但一想到，他爸爸冬天移到軍法處時，多給他點衣服換洗，再給他雙皮鞋，書本，因此，還有一只鐵箱沒有給再添拿走。我這裡有一只手錶，一只九成金的小戒指，想帶回家給阿梅作紀念，小羊回去時我忘記了，你家中有人來台北或再添朋友來台北時，可以來這裡順便帶去，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我何時能回嘉義，錶放長久不走會壞的。不如帶回家，比放在這裡好。

今天是雙十節，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的現在，我正在嘉義，再也沒有想到有現在的情形，只是我的爸爸媽媽遠在千里外，不知道我的境況，我也不希望他們知道我的遭遇，請你將來交通方便時通知他們一聲，我家地址是江蘇省南通縣西門通家巷二號，我父親的名字是季厚庵，最好是不告訴他我坐籠子。新港的地址我不知道，請你告訴我。小孩們都好嗎？

與此同時，季澐另外並附了一封給江蘇南通父母的家書，請蔡芬日後有機會時寄出。在案情不能對外透露的情況下，季澐顯然已經對自己的未來有所覺悟了，而這封未能寄出的家書應該也是她向父母親訣別的遺書吧！

芬姐：

自小羊離開這裏後，已快兩星期，我時時都念著他，有沒有回到新港，看不到你們的信，心中很不安。

本來預備把行李都帶回去，但一想到，他爸爸冬天移到軍法處時，多給他點衣服換洗，再給他雙皮鞋，書本，因此，這有一只鐵箱沒有給再添拿走。我這裏有一只手錶，一只九成金的小戒指，想帶回家給阿梅作紀念，小羊回去時我忘記了，你家中有人來台北或再添朋友來台北時，可以來這裡順便帶去，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我何時能回嘉義，錶放長久不走會壞的。不如帶回家，比放在這裡好。

今年是雙十節，三十五年的現在，我已經歸義，再也沒有想到有現在的情形，只是我的爸爸冬天移到軍法處時，多給他點衣服換洗，再給他雙皮鞋，書本，因此，這有一只鐵箱沒有給再添拿走。我這裏有一只手錶，一只九成金的小戒指，想帶回家給阿梅作紀念，小羊回去時我忘記了，你家中有人來台北或再添朋友來台北時，可以來這裡順便帶去，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我何時能回嘉義，錶放長久不走會壞的。不如帶回家，比放在這裡好。

海
鴻
印
寫。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季澐給芬姊的第五封獄中書信。（張再添提供）

父母親大人：

你們身體都健康嗎？自從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兒在家度暑假，至今已有好幾年不見面了，來到台灣後，時常想回故鄉一行，但總未如願，深深覺得遺憾。

回憶兒時，天天讀書上學，跳繩，踢毽子，時光荏苒，兒時不再，兒現已是中年人，目前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名叫小羊，女孩阿梅，都已會走路，呀呀唱歌，終日為兒女忙碌，正如二、三十年前，母親大人為我們兄弟姊妹忙碌相似，自己覺得做母親辛苦，因而時時記起遠在千里外的雙親。

這裡是小羊叔母的家，環境很好，四周是山，中是自來水的發源地，倘交通方便時，永泉可來台灣嘉義市山仔頂淨水場蔡芬家，可以看到兩個小孩。蔡芬的爸爸蔡招財先生已在淨水場服務三十年，一找就可以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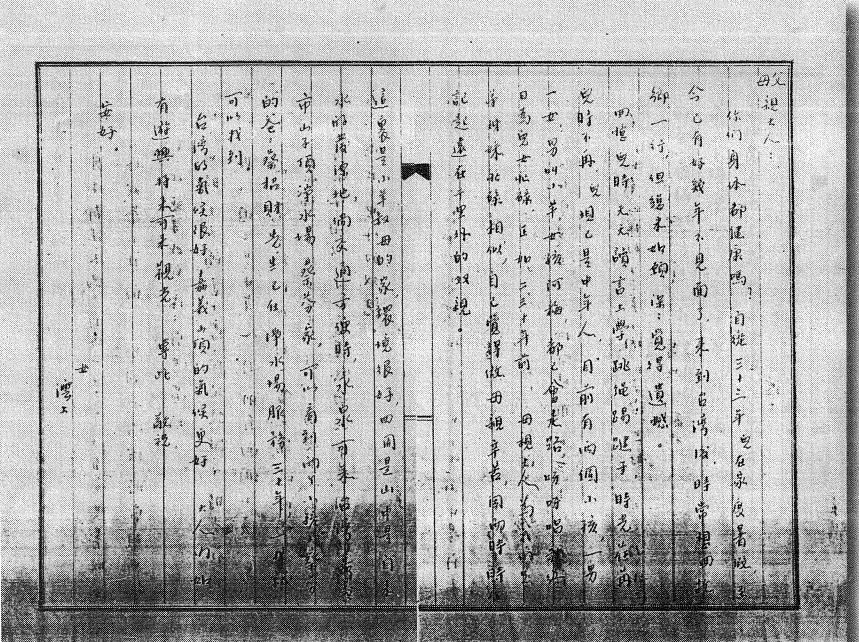
台灣的氣候很好，嘉義山仔頂的氣候更好，大人們如有遊性，將來可來觀光。

專上 敬祝
安好。

女 澤上

給三歲大的小羊寫了第一封信

在對未來有所覺悟的情況下，季澐寫完給蔡芬的第五封信及給父母的訣別書之後，又在那個「星期日」給才三歲大的小羊寫了第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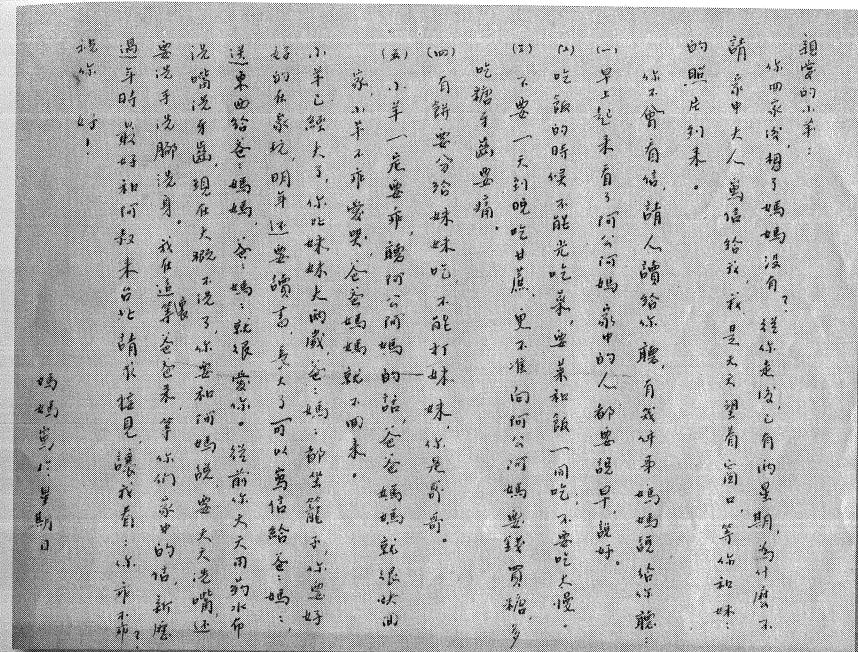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季澐在獄中寫給父母親的訣別家書。（張再添提供）

吧！

從最後一句話的期盼看來，季澐此時應該沒有預期到：自己並不一定能夠活到明年的農曆過年

- 親愛的小羊：
- 你回家後想過媽媽沒有？從你走後，已有兩星期，為什麼不請家中大人寫信給我？我是天天望著窗口，等你和妹妹的照片到來。
- 你不會看信，請人讀給你聽。有幾件事，媽媽說給你聽：
- (一) 早上起來，看到阿公、阿媽、家中的人，都要說早說好。
 - (二) 吃飯的時候，不能光吃菜，要菜和飯一同吃，不要吃太慢。
 - (三) 不要一天到晚吃甘蔗，更不准向阿公阿媽要錢買糖，多吃糖牙齒要痛。
 - (四) 有餅要分給妹妹吃，不能打妹妹，你是哥哥。
 - (五) 小羊一走要乖，聽阿公阿媽的話，爸爸媽媽就很快回來。小羊已經大了，你比妹妹大兩歲，爸爸媽媽希望你好的在家玩，明年還要讀高，要大了可以寫信給爸爸媽媽；送東西給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就很愛你。從前你天天用藥水布洗嘴，現在大碗不壞了，你還和阿媽說要洗嘴，夏天洗嘴，還要洗手洗腳洗身。我在這裡等爸爸來過年時，你和阿叔來台北，請你回家見我；你家不來，我也不去。
- 媽媽
農曆 星期日



季澐給小羊的信之一。（張再添提供）

如何替小羊申辦戶口

十月十二日，蔡芬終於給焦急地等待著的季澐寄出一封告知「小羊平安地回家了」的回信。十四日，季澐收到來信。十六日，她於是寫了第六封信給蔡芬，告訴她如何替小羊申辦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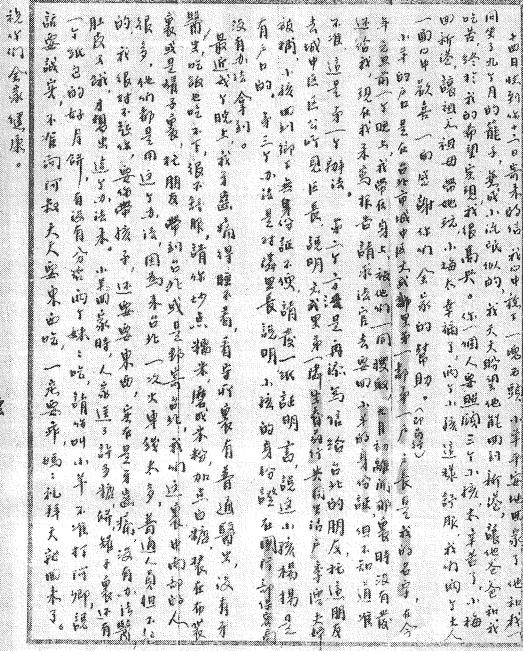
芬姐：

十四日收到你十二日寄來的信，我心中放下一塊石頭，小羊平安地回家了，他和我一同坐了九個月的籠子，變成小流氓似的，我天天盼望他能回到新港，讓他爸爸和我吃苦，終於我的希望實現，我很高興。你一個人要照顧三個小孩，太辛苦了，小梅回新港，讓祖父祖母帶她玩，小梅太幸福了，兩個小孩這樣舒服，我們兩個大人一面心中歡喜一面感謝你們全家的幫助。

小羊的戶口是在台北市城中區文武里第一鄰第一戶（即藥行），戶長是我的名字，在今年元旦前一個晚上，我帶在身上，被他們【保密局】一同搜取，九月初離開那裡時沒有發還給我，現在我來寫報告請求法官去要回小羊的身分證，但不知道准不准，這是第一個辦法。第二個方法是再添寫信給台北的朋友，託這朋友去城中區公所見區長，說明文武里第一鄰生春藥行共同生活戶季澐夫婦被捕，小孩回到鄉下無身分證不便，請發一紙證明書，說這小孩楊揚是有戶口的。第三個辦法是對鄰里長說明，小孩的身分證在國防部保密局，沒有辦法拿到。

最近幾個晚上，我牙齒痛得睡不著，看守所裡有普通醫生，沒有牙醫生，吃飯也吃不下，很不舒服，請你炒點糯米，磨成米粉，加點白糖，裝在布袋裡或是罐子裡，託朋友帶到台北或是郵寄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在人神用刑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季澐給芬姊的第六封獄中書信。（張再添提供）

台北，我們這裡中南部的人很多，他們都是用這個辦法，因為來台北一次火車錢太多，普通人員擔不起的。我很對不起你，要你帶孩子，還要帶東西，實在是牙齒痛，沒有辦法醫，肚皮又餓，才想出這個辦法來。小羊回家時，人家送了許多糖、餅，罐子裡還有一個紙包好的月餅，有沒有分給兩個妹妹吃。請你叫小羊不准打阿卿，說話要誠實，不准向阿叔天天要東西吃，一定要乖，媽媽禮拜天就回來了。

祝你們全家健康。

臨死前計阿姨還問小羊好嗎

就在季澐給蔡芬寫完第六封信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與她同房的江蘇籍難友計梅真（卅五歲）與另一同案錢靜芝（三十歲）被執行槍決。

「我記得，那天早晨四、五點的時候，我們都還在睡夢中，就有看守來叫醒計梅真；」馮守娥清楚記得同房的計梅真從容赴死的情景。「我看到，計老師跳起來後，從容地穿上衣服和梳好頭，然後走到門口；當她看見從隔壁房走出來的錢靜芝老師時就跟她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鎮定地走出房間。」

關於計梅真與錢靜芝，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欄載稱：

計梅真、錢靜芝於民國廿七年秋季，及廿八年春季，先後加入匪黨，曾在上海活動多年；至卅五年九月，計錢兩匪奉匪華東局之命，聯袂來台，投充台灣郵務公【工】會國語補習班教員，同年十月與上海共匪派來之章天鳴聯絡；卅六年夏，即由匪台灣省工委會負責人蔡孝乾領導。曾分別建立台灣郵政管理局、台北郵局、台灣省電訊管理局及婦女等四個支部。……【頁二六】

季澐與計梅真、錢靜芝都是江蘇同鄉，她們都是因為抗日而走上革命之路，並且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從上海來到台灣。一直到现在，我們都看不到有任何的官方檔案或倖存者的證言指出，張志忠或季澐與計梅真和錢靜芝有直接或間接的組織活動。

我們無從理解季澐在面對年紀大自己六歲的同房難友計梅真的死亡時的內心波動！在不能對外透露獄中情況的限制下，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她在十月廿三日藉著寫給兒子小羊的第二封信的最後附筆，為了躲過信件檢查而有技巧地迂迴提到了計梅真的死，及其臨死前對小羊的關心。

親愛的小羊：媽媽又和你說話了，你在鄉下沒有身分證，媽媽已寫一張報告給法官，請法官去爸爸那裡討，一有就寄給你好嗎？你的戶口是在台北市城中區榮文里第一鄰第一戶，戶長是媽媽，倘是阿叔有朋友來台北可以請他去城中區區長那裡說明你沒有身分證的原因，補發一證明書或是阿叔寫信給區長，上次我寫錯文武里，現在我想起上一封信我寫錯了，是榮文里。

天氣涼了，你早上起來請叔母替你多穿點衣服，我想今年冬天你還沒有冬衣，這裡有一只小鐵箱，帶回去給你做冬衣，小羊就不冷了。寄上領物單一紙，阿叔不必親自來，火車錢太貴，看有

朋友來台北，託人一下就好了。

媽媽牙齒太痛了，要吃糕仔脯，做好由郵局寄或是託人送來，這裡中南部的人很多，為了省火車費，都是布袋裡裝東西，外面打包裏寄來，不然託來台北的朋友送。我很想看我和兩個妹妹的照片。牙齒痛了一星期，沒有睡覺，就想你和兩個妹妹。祝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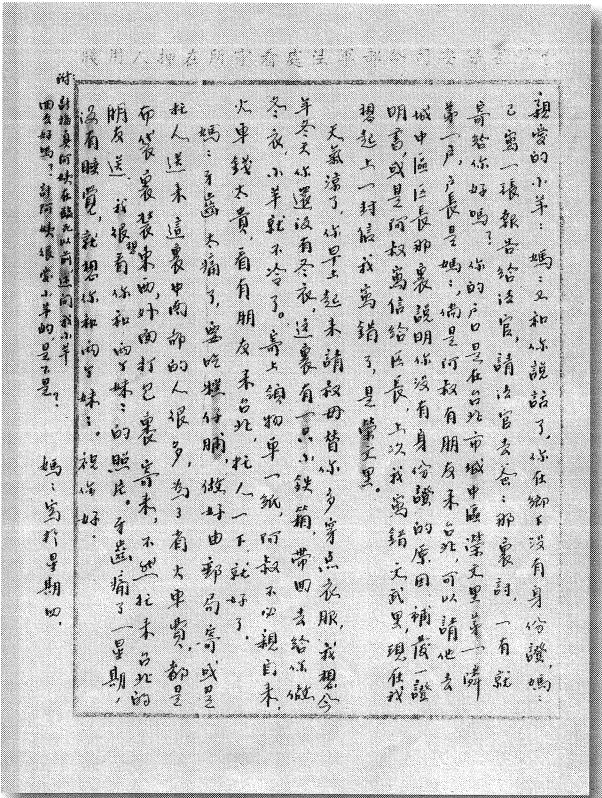
媽媽寫於星期四

附：計梅真阿姨在臨死以前，還問我小羊回去好嗎？計阿姨很愛小羊的，是不是？

藥店的老闆娘

十月三十日，星期一。

這天早上，季澐收到蔡芬用包裹寄來的「糕仔脯」。她同時也趕在一星期一次的收信前，給小叔張再添寫了封信。她在信中特別交代張再添，要他「好言安慰」年事已高的公公婆婆，試著讓他們知道：她和張志忠之所以坐牢，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見不得人的「流氓小偷」，「不過是思想成問題的政治犯」，沒什麼要緊；而張志忠「是個比較有地位的省委」，所以，在牢裡，不但「大家對他很客氣」，而且每天可以「吃三頓白米飯」；不但「吃得很飽」，還可以「散步、洗澡」，之前「還每天抱小羊散步呢！」她並暗示張再添：只要他不去找「藥店的老闆娘」，就不會被牽連進去。



季澐給小羊的信之二。（張再添提供）

再添：

家中爸爸媽媽年紀太大了，現在知道小羊爸爸和我坐籠子，一定日夜不安，心中難受，請你
好言安慰兩位老人，說我們不是流氓小偷犯，不過是思想成問題的政治犯，不要什麼緊，小羊爸
爸是個比較有地位的省委，大家對他很客氣，在那裡吃三頓，每頓都是白米飯，吃得很飽，還有
散步、洗澡，從前還每天抱小羊散步呢！我這裡比他那邊更好，可以看書，寫信，同房間的台北
小姐，家中每天送菜來，中南部的小姐們，家中寄包裹來，每天吃的東西，比從前好得多了；到
今天為止，我已整整來了十個月，在這裡兩個月，我從來沒有病過，只是常常牙齒痛，這也不要
緊的。你的薪水少，要負擔三個小孩、兩個大人，真有點對不起，希望你下班回家後，幫助抱小
孩，不要亂交朋友，像藥店的老闆娘之流，不要去找她，那種人是不夠朋友的；更不要隨便說
話，安分守己，不會坐籠子的；寄上小羊身分證，收到後，望來信，祝快樂。

季澑信中所說的「藥店的老闆娘」，應該是指生春藥房的李振芳的妻子吧！

「有一次，季澑女士對我說，她是被出賣、被害的，這個仇一定要報！但是，被誰害？她沒交代
清楚。」蕭素梅回憶說：「後來，我所瞭解，他們夫婦是在李振芳家二樓被捕的。李振芳在台北市衡
陽路新公園附近開一家生春藥房。我想，她指的是李振芳嗎？當我出獄時，李振芳也已死亡，所以也
就無法查證了。」

這樣看來，難道季澑信中所說的「那種人是不夠朋友的」，是暗指她和張志忠是被「藥店的老闆

娘」出賣的嗎？如果以李振芳後來被處刑十五年的結果來看，作為妻子的「藥店的老闆娘」怎麼也沒
有理由去密報（「出賣」）張志忠夫婦而連累自己的丈夫吧！也許應該把季澑對「藥店的老闆娘」的
批評，看作是為了保護張志忠不被牽連而刻意傳遞的情報吧！

等待判決

季澑寫完給張再添的信之後，接著又趕在收信之前給蔡芬寫了第七封信，要她向蔡芬的爸爸媽
媽、哥哥嫂嫂，以及新港夫家的哥哥嫂嫂問好！同時強調如果「小羊不聽說話，要好好教訓他，打手
心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她刻意安慰蔡芬說，她只是因為張志忠的「事情大」，而「陪他坐籠
子，等判決」，不會「有什麼事的」。

芬姐：

我和小孩都好嗎？奶水多不多，小孩夠吃嗎？我很對不起你，小梅吃你的奶，小羊又要你照
顧，真是一千個對不起你！今天上午收到你的小包裹，有糕仔脯和肉脯，我收了又高興又難過，
心中說不出的滋味。

我是沒有什麼事的，不過因為小孩的爸爸事情大，陪他坐籠子，等判決，看是個什麼結果。
外面來收信了，我不寫了。祝你好！

……

季澑於是把給張再添和蔡芬的信，連同前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九日，就已經寫好的給小羊的第三封信，以及小羊的國民身分證，一起交給收信人。她在給小羊的信中也同樣透露了她還在「等待判決」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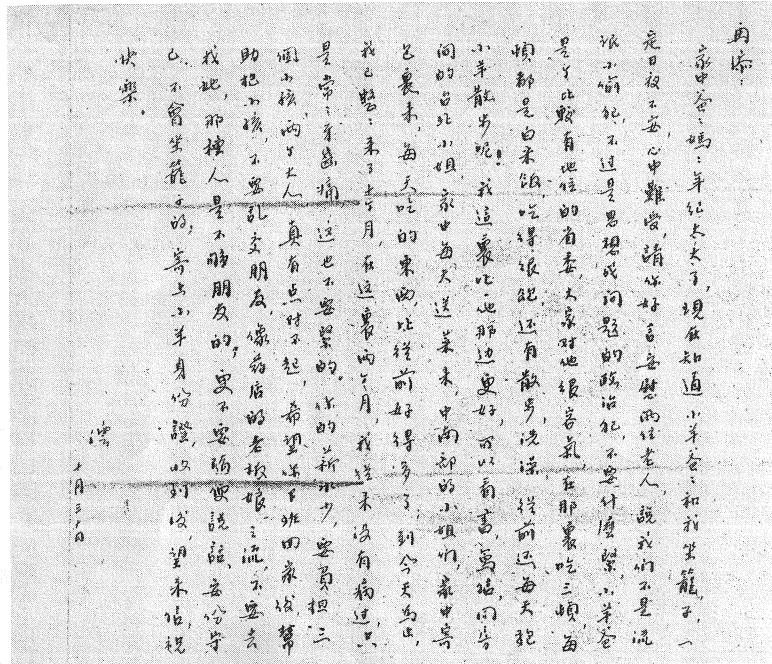
親愛的小羊：

你們幾個小孩的照片為什麼一直不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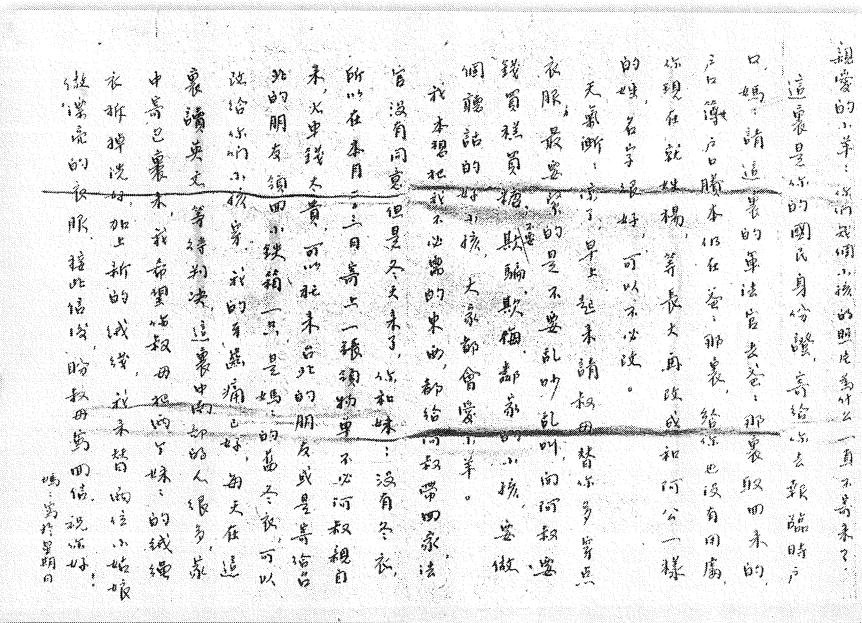
這裡是你的國民身分證，寄給你去報臨時戶口，媽媽請這裡的軍法官去爸爸那裡取回來的，戶口簿戶口謄本仍在爸爸那裡，給你也沒有用處，你現在就姓楊，等長大再改成和阿公一樣的姓，名字很好，可以不必改。

天氣漸漸涼了，早上起來請叔母替你多穿點衣服；最要緊的是不要亂吵亂叫，向阿叔要錢買糕買糖；不要欺騙、欺侮鄰家的小孩，要做個聽話的好小孩，大家都會愛小羊。

我本想把我不必需的東西，都給阿叔帶回家，法官沒有同意。但是冬天來了，你和妹妹沒有冬衣，所以在本月二十三日寄上一張領物單，不必阿叔親自來，火車錢太貴，可以託來台北的朋友或是寄給台北的朋友領回小鐵箱一只，是媽媽的舊冬衣，可以改給你們小孩穿。我的牙齒痛已好，每天在這裡讀英文，等待判決，這裡中南部的人很多，家中寄包裹來，我希望你叔母把兩個妹妹的絨線衣拆掉洗好，加上新的絨線，我來替兩位小姑娘做漂亮的衣服。接此信後，盼叔母寫回信。祝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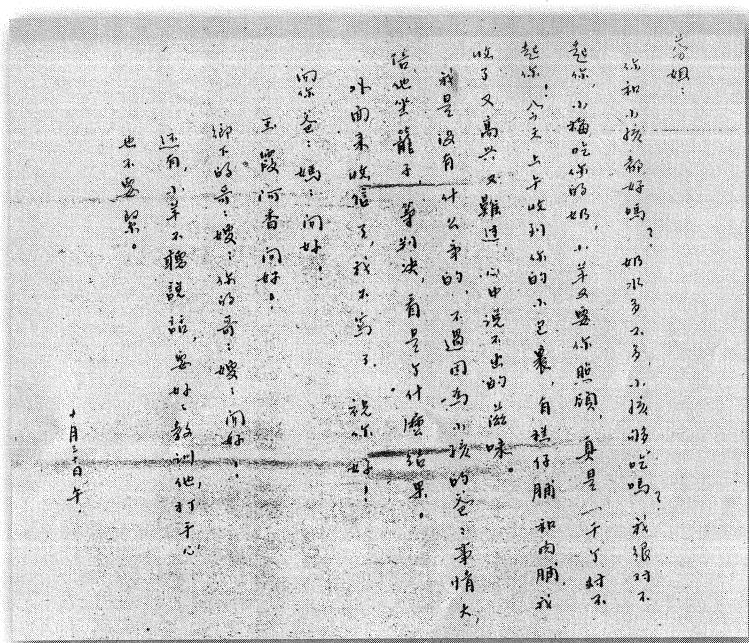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季澑寫給張再添的訣別信。（張再添提供）



寫於星期日

季澐給小羊的信之三。（張再添提供）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季澐給芬姊的最後一封信。（張再添提供）

小孩都要種牛痘了

十一月二日，季澑終於收到蔡芬寄來的一直盼望著的四個小孩的照片。

十一月四日，季澑藉著給小羊寫的第四封信回報，同時詢問張再添夫婦，小羊的戶口問題是否解決了？由於自己小時候得過天花，她更在信末附筆提醒說：「小孩都要種牛痘了」。

親愛的小羊：

二日上午看到你們四個小孩的兩張照片，我心中說不出的快樂，同房間的十幾個朋友也都看了，覺得小弟弟胖得可愛，眼睛、嘴，很像蔡家外婆（叔母的媽媽），你比在這裡時長胖長高，阿卿最漂亮，和你站在一起，像是一個媽媽所生的哥哥和妹妹，只有阿梅，又瘦又小，脾氣很大的樣子，一點也不漂亮，不知道她現在會說話，會走路，會自己吃飯嗎？

上月一共有五個星期一，媽媽寄了五次信，二十三日信中附一領物單，望阿叔託人來領回一只小箱，三十日信內附一張小羊身分證，那天早上，還收到叔母寄來的包裹，糕粉很好吃。因為我們這裡檢查信件的先生有病，可能你們收信比較遲幾天，其他沒有什麼事。

你到明年夏天六月，實足年齡四歲，暑假後和阿卿一同去讀幼稚園，現在還是住在山（仔）頂好，讓阿梅回新港，不然，叔母太忙了，你們四個人，一、二、三、四歲，單是早上替你們洗衣服，也要洗一兩點鐘，一個人太辛苦了。你們小孩天天要吃東西，請祖母在鄉下做米香，可以省

阿叔的錢，阿叔養你們四位小將，負擔太重，還要請鄉下阿伯幫忙；我在這裡住在樓上，每天望著天上的雲，就想起山（仔）頂生活的愉快；望你在家聽叔父叔母的話，來領箱子的時候，送點東西到樓上來，我這裡有郵局案件現已調走的周淑貞阿姨送給你的牛乳，要帶回去給你吃，她們這幾位阿姨，你記得嗎？高小姐【郵局案的高秀玉】替你洗澡，洗衣服，可惜調走，沒有看到你和妹妹的照片。

關於你的戶口問題，還有什麼困難，請叔母寫信來，我這裡可以寫報告請求法官解決。你的皮鞋嫌小嗎？過年時，請阿伯買雙運動鞋給你，平時穿木屐，等到明年秋天做小學生時，再穿鞋好了。

我預備把你們小孩的照片，寄給你爸爸去看，爸爸太寂寞了，還不知道小羊已回家，媽媽在看守所裡每星期一寄信給小羊呢？又要麻煩法官，寫給爸爸的信要法官批准才可以轉去呢！你現在早上還說：「爸爸早，媽媽早嗎？」

祝你 快樂。

附：你們小孩都要種牛痘了。

媽媽寫於星期六

最後一封信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季澐再給小羊寫了一封信。這也是她生前從軍法處寄出的最後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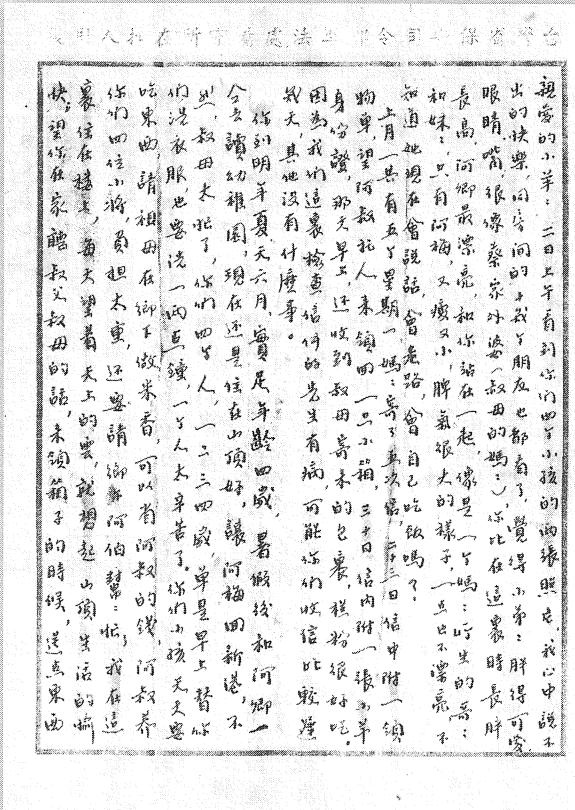
親愛的小羊：

上月三十日，把你的國民身分證寄給你，本月六日又是星期一，寫信問你收到上月二十三日寄出的領物單和身分證沒有？至今仍未看到來信，有點掛念。

給你一張畫像，一張聖誕老人，你猜猜看，是誰替小羊畫的？還是台中張【金杏】阿姨，看著你寄來的照片，一個晚上畫好，大部分都像，只有畫片上的嘴比你的真面目漂亮些，不要弄壞，請阿叔找張玻璃紙罩在上面，貼在牆上，小羊對小羊說話：「爸爸媽媽都不在家，小羊不要哭，和阿卿一同好好的玩，禮拜天，爸爸媽媽就坐火車回家了！」



同房難友張（金杏）阿姨畫的小揚以及給小揚的賀年卡。（張再添提供）



季澐給小羊的信之四。（張再添提供）

那裡的天氣太好了，我們這裡，一碰到雨天，早上就不放出外洗臉，四五個人在一個臉盆裡洗半盆水，第一次不習慣，連下兩三天雨也就習慣為常，這使我想到山（仔）頂生活的快活，去年現在，我就預備住下去，你爸爸堅持要住台中，意想不到我們都住進籠子，我也沒有理由去埋怨誰，只有在這裡安心看外國小說。

妹妹有沒有送回祖母那裡？很奇怪，媽媽從去年到現在，總覺得阿卿比阿梅乖，比阿梅可愛，每天拿你們的照片看，不願多看阿梅那副愛哭瘦小的樣子，我還是和去年一樣，不高興這個小妹妹。阿姨送給你的牛乳，等阿叔託人來台北時領東西，就可以帶回給你吃！這裡的阿姨常常也想到小羊，願你在家健康，她們都不會像計阿姨、錢阿姨會死掉，她們將來會出去，你會看到她們的。

如果季澐不是故意放煙霧的話，那麼，從信中內容來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期間，張志忠和季澐曾經在台中住過一段日子吧！事實上，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楊達被捕之前，季澐也曾經在台中擔任過跟楊達祕密聯絡的地下工作。

「我聽我先生說，在楊達被捕前一段時期，季澐曾經負責按期送《光明報》到台中楊達家；」出獄後嫁給楊達的長子楊資崩的蕭素梅轉述說。「那時，楊達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義巷十二號，是很不好找的巷弄。除了第一次去是由洪幼樵先生帶路之外，她後來都是自己一個人去。我以為，季澐女士既然能自己按時送報紙到楊家，就可以看出她的聰明了。」

媽媽寫於星期五

親愛的小羊：
上月三十日把你時間的月份份證書寄給你，本月六日又是星期一萬福洞
你收到嗎？三月二日寄出的鋼精草和身分證沒有，請你再寄來
這有急辦金。
給你一張畫像，一張聖誕老人，你猜看是誰替小羊畫的，這是
台中藝何炳，看前半輩來的照相，一早晚上無好，太部分都像只
有馬虎的嘴，比你的真面目還亮些，不要弄壞，請阿叔我
張玻璃紙罩住上面，貼在牆上，小羊對小羊說：「媽，媽，
都不在家，小羊不要哭，和阿卿一合好的，培，祝你太爺，
媽，就坐火車回家了！」
今次快到天氣也真差，台北常：寒千雨，叔母那裏的
天氣不好了，我們這裏一碰到雨天，早上就不該出門洗臉，
四五天才洗一次臉，夏天更是這樣，早上一以至習慣，連至三
天而止，才習慣夠，這樣才想到山場生活的情況，臺灣場合，
我就想清楚了，你要堅持要住台中，夢想不到我的都往進
籠子，我也没有理由責怪你誰，只有在這裏生活有時間的說。
妹，有沒有送回祖母那裏？繼奇玲，媽，送去年到現在，總
覺得阿卿比阿梅乖，比阿梅可愛，這裏的阿姨常常也想到
你，你家健康，她們都不會像計阿姨、錢阿姨會死掉，她們將來會
出差，她會有她們的。

媽，萬福星期五。

季澐給小羊的最後一封信。（張再添提供）

季澑的死訊

季澑在十月三日寫給蔡芬的第四封信對自己的未來還抱著一絲希望，她認為自己和同案的嚴秀峰女士「都沒有什麼事」，而且「說不定」當時身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的李友邦將軍「能保太太出去」，這樣，她「就更無事了」。但是，李友邦不但不能保太太出去，更於後來被檢舉為「匪嫌」而被憲兵司令部逮捕，解送保安司令部，並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廿二日槍決。

因此，季澑終究難逃一死之厄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台灣新生報》刊載了一則題為〈刺探情報建立電台／六匪謀處決〉的通訊：

省保安司令部昨（十八）日清晨六時在本市馬場町刑場槍決男匪謀四名，女匪謀二名。

女匪謀季澑，廿九歲，江蘇南通人，無業。……專門負責刺探政府高級人員行動情報，……經省保安司令部捕獲審訊明確，以季……等六犯共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依法各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經報奉國防部核准，於昨（十八）日清晨六時發交憲兵第X團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則報導。

「看到報紙後，我們這才知道，她已經被槍決了。」張再添感傷地回憶著，一陣沉默之後，他又繼續追憶說：「季澑犧牲以後，我們夫婦並沒有接到任何有關的通知。因此，一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她的屍骨流落何方？」

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七日，苗栗銅鑼籍的五〇年代政治受難人曾梅蘭（一九三〇）為了尋找當年被槍決而屍骨無蹤的二哥徐慶

蘭（一九三四—一九五二）的下落，歷經數十年的輾轉尋找

後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的

亂草堆下找到了二哥的墓

塚，同時因此而挖掘到二百

零一個當年被槍決而無人收屍者的墓塚；其中一方很小的碑石上頭刻寫著犧牲者

「李雲」的名字，據估計，

這應該就是「季澑」的誤植吧！

六匪謀處決

刺探情報建立電臺

令部昨（十八）日清晨六時在本市馬場町刑場槍決

男匪謀四名，女匪謀二名

女匪謀季澑，廿九歲，江蘇南通人，無業。賴瓊烟，廿六歲，臺中市人

男匪謀羅定天，廿九歲，雲南昆明人。王達火，廿五歲，臺中市人。黃

石岩，四十九歲，臺北市人。商人。徐潤深，廿九歲，臺北市人，任合作社經理。季澑，賴瓊烟，羅定天，王達火，黃石岩，徐潤深等六人，均會參加米毛匪幫，分別在臺北事活動。季澑專門負責刺探政府高級人員行動情報，羅

定天專事收錄新社廣播，保管匪幫在臺城機內之文件，並負責建立地下電臺，與王達火、黃石岩進行購買零件，自行裝配收報機。黃石岩會二任匪幫臺北

市工作委員會委員，領導頭頭部，並兼任該支部書記，與徐潤深分別開設

廢行，培護匪徒，並供給匪徒經濟。賴瓊烟貪財抄寫及傳送匪幫文件暨毛匪

文告，以供傳遞，以上各犯經省保安司令部捕獲審訊明確，以季、羅、王、賴等六犯共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依法各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經報奉國防部核准，於昨（十八）日清晨六時發交憲兵第X團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 國第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破壞

安全局機密文件記載，張志忠被捕後，原本屬於他領導的黨人們，仍在現今的桃竹苗一帶山區流亡，堅持最後的鬥爭。

綜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與「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檔案記載，一九五〇年以來的情況大致如下：

一九五〇年一月，以陳福星為首的北部黨組織，開始重整省委組織，由陳福星、黃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組織臨時領導機構於烏塗窟。三月，各地黨組織繼續被破，烏塗窟十三份山區基地成為收容各地逃亡幹部的避難所。四月，中共中央對「台共」發出指示，密定「採取『合法性』、『社會性』、『地方性』之鬥爭方式，將主力轉入鄉村山區，並選擇有利地形建立武裝基地，俟機結成游擊武力，擴大成為游擊根據地，以配合匪軍進攻……」。【頁三九四】

五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頁二〇五】

此後，陳福星領導的「重整後省委會」所屬各地黨組織的一切活動，均係根據「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進行，陳等並指出台灣西部平原以東丘陵（陵）地帶，無數溪川沼澤與綿密之森林所組成之縱深地形，極有利於建立游擊武裝……。【頁三九四—三九五】

到了年底，全省各地黨組織已再具規模，賡即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

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頁二〇五】

為了逮捕這些「武裝的殘匪」，國民黨情治機構於是以種種嚴厲的酷刑，逼迫張志忠供出一些線索。據一些曾經在不同時期與張志忠同房監禁過的政治受難人所述，張志忠不但始終堅持到底，絕不出賣同志和組織，而且總是向剛入獄的難友大聲喊道：「早講早死，晚講晚死，不講不死。」也許，這就是張志忠遲遲沒有被槍決的理由吧！

另一方面，安全局機密文件的同樣檔案也詳載了前內政部調查局從一九五一年起，針對「重整後省委會」所屬各地黨組織展開的密集進攻：

二月間，將「北部海山區匪黨組織」全部摧毀。【頁三九二】

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期間，陸續破獲「重整後省委會新竹地委」所屬的「竹北區委赤柯山工人支部」、「竹東區委及水泥廠、油礦、林場三個支部」、「新竹鐵路支部」、「新竹紡織公司支部」以及「新竹街頭支部」……等地方組織。【頁二〇九—二一〇】

五月二十五日，該局「為擴大事功」，「決心將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全部予以撲滅」，於是「將全案偵查詳情函請台灣省情報委員會統籌辦理，嗣決定由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三單位組成『特種聯合小組』，專門偵破本案」。

六月一日，「特種聯合小組」正式辦公，由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三單位調派精幹人員，集中辦公，統一指揮各縣市地方單位工作，以期集中力量，擴大偵破。【頁二二】

經治安情報機關配合行動後，到八月止，「重整後省委」組織的「地下主力被迫從桃園、新竹，

轉移至苗栗地區」。「特種聯合小組」根據各方面既有的線索加以分析後判斷：「老洪及其領導幹部曾永賢、蕭道應等，均潛竄於這一地區，企圖生存和發展。」因此，苗栗地區便成為「特種聯合小組」向「重整後省委領導組織」做深入滲透，以利偵破的重要據點。

七月二十三日，「特種聯合小組」祕密逮捕了「新竹地委」所屬幹部范新戊。經過一星期的說服之後，曾與老洪見過面，既是客家人，又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勞動者，同時在苗栗方面也有良好的社會關係的「老范」決定「轉向」，並作為「特種聯合小組」的內線，滲透到「重整後省委領導組織」。

九月初，老范於是以「逃亡匪幹」的身份，前往苗栗山區，利用農村社會關係展開勞動，並通過勞動設法接近「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頁二一四—二五】

就在「特種聯合小組」布置內線，企圖向「重整後省委領導組織」做深入滲透、破壞的同時，相關情治單位也運用被捕後「自新」的黨人，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心理喊話。

九月十七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張彝鼎召開中外記者會，發布〈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和〈檢舉匪諜獎勵辦法〉。

九月廿一日，〈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開始實施，限「潛匪」於十一月二十日前辦理自首。十一月十日，《中央日報》等各大媒體發表「省委」劉興炎號召「過去同路人」自首的「告同胞書」。十五日，又發表郭維芳題為《光明在等待著你們》的公開信，呼籲「匪共分子」自首。十七日，保安司令部公布首批匿名不自首「潛台匪諜」名單。十九和二十日，又再繼續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匿名不自首的「潛台匪諜」名單。二十四日，《全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新生或毀滅——給潛匪最後的忠告》。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等各大媒體續刊黎明華、劉興炎、郭維芳、王子英、廖學

信等九名等「自新」者，聯名發表致老洪的公開信，「敦促其立即省悟速率從匪來歸」。二十八日，王子英以「自首青年」名義，在各大報發表《我們的出路並沒有被杜塞》的「告潛匪」書。三十日，保安司令部宣布，〈匪諜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截止，一共五百七十六人自首。

然而，面對這一波波的勸降文告，以老洪為首，潛逃於三義魚藤坪山區的地下黨人，顯然並沒有因此動搖；他們仍然堅持著最後的鬥爭。

前述的安全局機密檔案載稱，一九五一年冬天，「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正式派曾永賢與老范恢復聯繫，一面繼續考察，一面採取慎重的單線領導方式。曾永賢鼓勵老范：「獨立作戰，跳出舊據點，開闢新據點。」老范於是在「特種聯合小組」的祕密協助下，在山線鐵路三義東南方面山區，開闢了一個偽裝的群眾據點。老范向「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上級」報告新據點建立的情形後，進一步獲得「上級」的信任。【頁二二五—二六】

時序進入一九五一年。

一月七日，國防部總政治部的報告再次宣布，去年底自首「匪諜」共六百廿九人。同一天，黎明華、劉興炎、郭維芳、王子英、廖學信等九名「自新」者，再度聯名宣布「解散各級組織」，並號召其他黨人「停止一切活動」。

安全局機密文件的檔案續載了內線老范的工作進展。

一月底，老洪在一次會議中突然出現，接見老范，並暗示將在適當時機直接領導老范，切斷一切橫的聯繫。

三月中旬，老范提出一年工作總結的書面報告，並替「組織」抄寫了大量文件，一面把偽裝勞動

中得來的工資交給老洪，補助「組織」經濟上的困難；這些表現都大大提高老洪對他的信任。

「特種聯合小組」認為，老范的內線深入工作至此已到達完全成熟的地步，於是在海線鐵路的苑裡、日南兩站，與山線鐵路苗栗、大安間的四角地形內，突擊幾個可疑的對象；一面推動憲警的武裝力量在苗栗以東的大湖山區展開行動，充分造成東西兩線的緊張狀態。相對之下，老范活動的地區卻顯得十分平靜。這樣，「特種聯合小組」便有條件利用黨人們對老范活動地區的安全感，迅速佈置一個「請君入甕」的口袋。

四月二日，老洪將從南部撤退至苗栗地區的蕭道應夫婦交給老范，安頓在偽裝據點內。

四月十日，老洪將一個祕密山洞交給老范和蕭道應使用，同時決定二十六日在該山洞舉行會報，總結一年來的工作。老洪與曾永賢臨行時囑咐：廿五日晚，蕭道應至大安溪，接曾永賢北上；廿六日，老范至鯉魚潭山上，接老洪北上。

老洪等「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黨人們，終於跌進「特種聯合小組」口袋戰略的袋底來了。

四月十二日，老范將上述情報向「特種聯合小組」做了會報。「特種聯合小組」認為，這正是一個對共黨有利而對緝捕行動絕對不利的地形，如果冒險採取行動，成功的把握是非常稀少的，於是建議「老范」開掘一個較有利緝捕行動的新山洞。

四月廿二日晚，老范再度下山，向「特種聯合小組」報告：已推動蕭道應在離老山洞約半小時山路的另一個山頭，挖建了一個新山洞；蕭道應已帶兩個群眾移住新洞。蕭道應隨身佩有二號駁殼槍乙枝，子彈二十發及日本軍刀與童子軍刀各乙把。……聽完老范的報告後，「特種聯合小組」的領導幹部決定展開緝捕行動，隨即召集所有參加緝捕行動的工作人員，與老范一起討論研究「行動的技術」，最後決定分三次行動的計畫。

四月廿三日，「特種聯合小組」動員二十個「體力充沛、能臨機應變、射擊準確、能跑山路、能挨餓耐凍、能連續匍匐行進一小時以上」的精幹的行動人員，分配其中十一人去附近平地接應，另外九人分為三個小組，並事先安排撲山洞的順序，誰放哨，誰打電筒，誰綑人，誰搜查洞內等基本任務，然後帶著三天乾糧，沒有帶水，輕裝出發。

四月廿四日，晚上九時，大雨傾盆，「特種聯合小組」把這二十個都「化裝成農民」的行動人員送到公路邊，在「風雨交加」中分頭執行任務。

四月廿五日，午夜二時，他們終於到達山洞附近二十公尺之處，並迅速完成埋伏。老范於是首先「摸洞爬入」，與蕭道應交談，然後趁他外出小便時，將他所帶的駁殼槍偷出。到了三時左右，老范托詞小便，外出與「特種聯合小組」負責人聯絡，並將駁殼槍交給負責人，轉身返洞。三時卅分，「特種聯合小組」第一、二、三號行動員根據預定的計畫，循序摸到洞口，魚貫入洞。蕭道應發現後卻尋槍不著，於是拚命向第一號行動員猛撲，開始肉搏。這時，第二號行動員也已進洞，將兩個群眾予以制服上銬。接著，第三、四號行動員陸續進洞，幫助第一號與蕭道應搏鬥，因洞小且狹，不能起立，跪著碰撞跌打，簡直無進退迴旋的空隙；足足肉搏咬打了四十分鐘，始將蕭道應制服，綑於洞內。這時，天已微明，「特種聯合小組」仍按照預定計畫，分派三位行動員輪流放哨及看管蕭道應與兩個群眾，其餘在洞內休息。老范則趁破曉，附近農民尚未起身以前，出發至大安溪，候接曾永賢的到來。晚上九時，老范準時將曾永賢接到洞口，預先埋伏的「特種聯合小組」於是輕鬆地將他活捉。

四月廿六日，午夜十二時，老范再往接老洪，「特種聯合小組」仍以同樣的手法，活捉老洪。

郭乾輝的《台共叛亂史》這樣總結地寫道：

我們勞苦功高的內線老范，這時仰望著滿天的繁星，回頭向浸沉在夜色包圍中的山麓揮一揮手，重整後台共的叛亂集團，就如同老范向山麓的告別一般，它已陷入黑暗的死亡中了。【頁八四】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在調查局的安排下，蔡孝乾、洪幼樵、陳福星（老洪）、曾永賢、林元枝和蕭道應夫婦等十五名「自首自新前共產黨員」，召開自新記者會。調查局給他們每人一份寫好的文稿，要他們在會上面對四十個中外記者，按稿照念。記者會後，這十五名「自首自新分子」又分別發表「書面談話」，答覆因時間關係未能回答的記者提問，並從十二月十六日起陸續刊載於《中央日報》。

調查局「肅清殘匪」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策反台共苗栗殘匪武裝組織劉雲輝等案」的檔案記載：

前內政部調查局會同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匪台灣省重整後省委組織」全部摧毀後，隨即於一九五三年元月上旬釐訂「肅清殘匪計畫」，「動員新生小組及自首人員示範小組優秀自首自新分子，陳福星、劉興炎等二十人，配合專任工作同志，組成肅殘工作隊」，並於同年春天佈署「運用政治方式，爭取逃匪家屬與地方人士之真誠合作，斷絕逃匪之經濟供應，摧毀其群眾據點，迫使其生活陷於絕境，而以達到策動該等逃匪投案自首為目的」的「肅清殘匪工作」。【頁三八七】

郭乾輝的《台共叛亂史》認為，「重整後台共的叛亂集團陷入黑暗的死亡」之後，「重整後省委組織中唯一漏網的重要匪幹」就是黃培奔了。它語帶嘲諷地寫道：

黃原為海山與桃園地區的負責幹部，曾接受林元枝從日軍投降所遺留下來的一批武器，在烏塗窟基地，組成武工隊，具備了游擊根據地的雛型。卅九年【一九五〇年】初，張匪志忠被捕，老洪（重整後台共負責人）與林元枝曾率領了南崁一帶由流氓罪犯烏合的一支武工隊，進入該烏塗窟基地，由黃匪培奔收容他們一個短暫的時期。不久，彼此又出演了一幕『火拚王倫』的趣劇，黃不容於該地，於是就率領了原屬的武工隊由鶯歌鎮屬的山區，移轉到三峽鎮屬的山區地帶。四十一年【一九五一年】起，黃匪鑑於殘餘力量的撲滅復危如累卵，乃冒險深入牛角山，另行開闢一個新的基地，在類乎半催眠的狀態中，度其幻夢的生活。【頁八五—八六】

然後，它又得意地寫道：

安情報機關運用高度的智慧機謀與工作道德的感召，終於使黃匪培奔祕密的自動投案。〔頁八九〕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北縣三峽牛角山地區匪黨武裝基地案」的檔案詳細記載了黃培奔投案及其殘餘組織全面破壞的經過：

一九五二年八月，前內政部調查局為了「專力偵破」在台北縣鶯歌鎮山區烏塗窟建立武工隊的海山桃園地區負責人黃培奔，成立了「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後來又「綜合陳福星等所提供的資料及各縣市調查站情報」研判：黃培奔為轉移目標，極有可能前往南投縣竹山的「密友」家，並「透過家屬與所屬匪武裝組織保持聯繫」，於是在台北縣的鶯歌、三峽及南投縣的竹山分別建立「偵查小組」，負責跟蹤監視或密查與黃培奔有關的可疑人士。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竹山偵查小組據報於鎮郊下坪里展開圍捕行動，經「搏鬥」後，黃培奔等三人「趁隙脫逃」，黃妻及兩人被捕。竹山行動失敗後，「專案小組」一面會同南投警察局在竹山地區進行搜捕，一面監視「趁隙脫逃」的黃培奔等三人的家屬及其群眾關係，並以自新的陳福星等人組成「策反小組」，對黃培奔家屬反覆進行勸告。到了二月六日，黃培奔的妹妹被「說服」了，表示「願協助爭取黃培奔出面自首」。二月十日，黃培奔終於在彰化二水，被「以陳福星為主之策反小組」說服而決定「自首」。黃培奔投案後，又於三月四日夜間，於三峽橫溪村山區，策反牛角山基地所有幹部出來自首。〔頁三九五—三九七〕

調查局系統的郭乾輝在《台共叛亂史》同樣描寫了黃培奔投案以後「策反」所謂牛角山基地殘餘組織的經過，並且在最後志得意滿地總結寫道：

此一接近台北而活動已達三年的匪武裝基地，與三峽、鶯歌一帶匪黨殘餘組織，至此方告全部摧毀。〔頁八九—九〇〕

調查局針對張志忠組織系統的「肅殘行動」繼續在張志忠走過的地區進行著。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策反台共苗栗殘匪武裝組織劉雲輝等案」的檔案另載：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旬，苗栗地區「三灣總支部書記、竹南區委」孫阿泉，首先與另一「竹南區委」鐘二郎出來「自首」，並供出與「竹南區委書記」劉雲輝會面時地。其後，孫阿泉、鐘二郎與陳福星說服劉雲輝出來自首；陳福星又偕同劉雲輝，說服「石油公司苗栗探勘處支部書記及竹南區委」謝裕發與原「台大工學院支部小組長」羅吉月，相率「自首」。〔頁三八六—三八八〕

其後，在苗栗一帶山區流亡的、屬於張志忠領導系統下的地下黨人，終於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陸陸續續地出來「自首」！

這樣，與張志忠有關的地下黨人大體已經被「肅清」了；此時，對國民黨來說，始終拒絕投降的張志忠的生命，也已經沒有存活的必要了。

判決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六日，張志忠「因叛亂案件經軍事檢察官嚴同暉提起公訴」，並在台灣省保安

被告 張志忠 男年四十四歲台灣嘉義縣人住台北市衡陽路第八號業商在押

主文

張志忠（即張梗）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用外沒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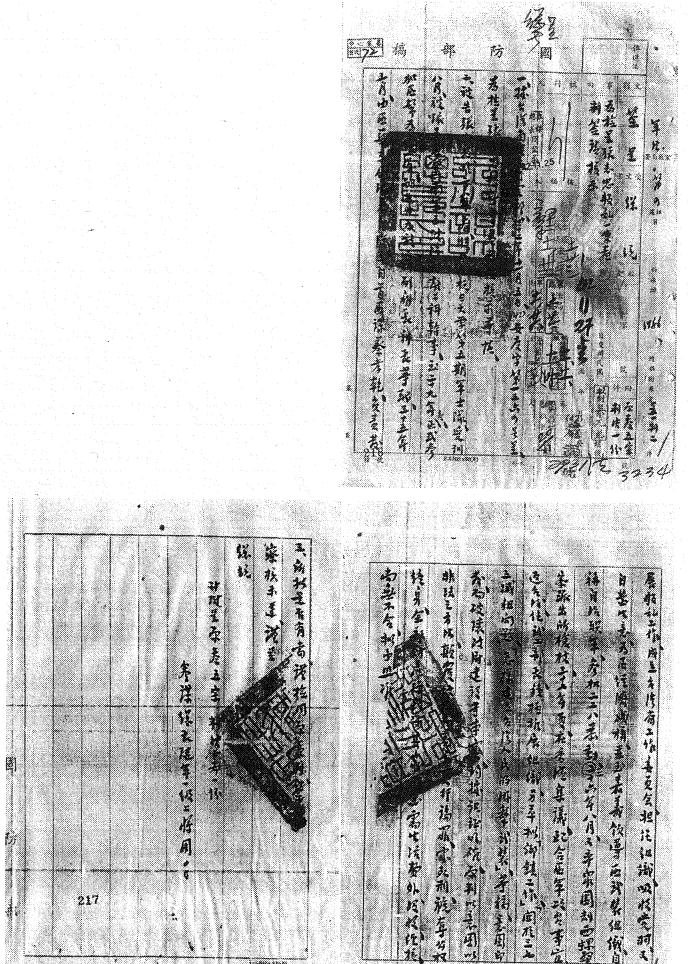
事實

張志忠本名張梗於民國廿四年日據台灣時期即改名為張志忠投入大陸其時思想已傾向匪幫廿八年春投入匪抗日大學第五期軍士隊受訓八月結訓後被派為匪冀南軍區政治部敵工科幹事至廿九年冬正式參加匪幫為黨員嗣後該軍區改編為冀魯豫軍區冀南縱隊張志忠迭升為副科長科長等職卅五年三月間與自首匪謀分子蔡孝乾由匪華東局城工部派來台灣負責開拓叛亂工作化名老吳老鍾楊春霖等從事祕密活動當由蔡孝乾主持組成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張志忠擔任組織吸收廖瑞發楊克煌林樸材及已處決匪徒李媽兜簡吉賴象等為匪工作又自營生意為匪之經濟機構並至嘉義領導匪蔡建東擴張匪武裝組織轄有北港新港朴子小梅嘉義等隊合共人槍百餘於卅六年二二八暴動之際自稱自治聯軍圖一舉而顛覆政府幸被敉平同年八月該張志忠又率武裝匪徒十餘人包圍西螺警察派出所切斷電話聯絡劫取步槍二枝後竄散卅七年夏又密往香港與台灣重要匪幹蔡孝乾李媽兜等十餘人集議討論配合匪軍攻台事宜並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武工部長返台後積極活動並自行領導新竹地區（包括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及台北縣一部分）之組織工作吸收匪徒達二百八十餘名另草擬「鄉鎮工作」「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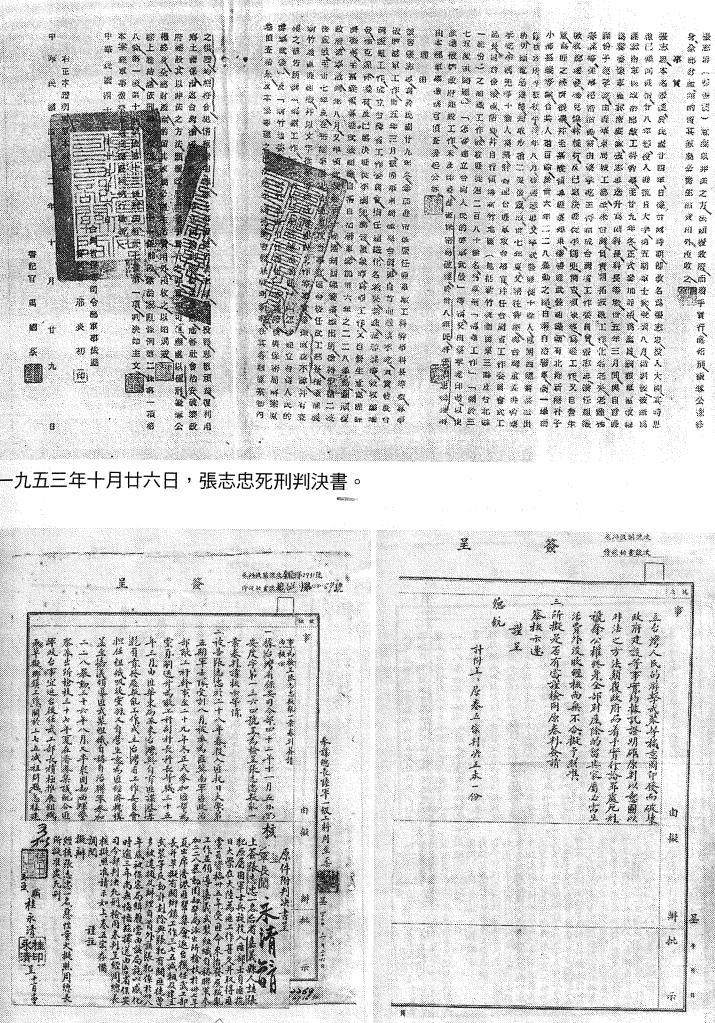
三七五減租問題」「怎樣建立台灣人民的游擊武裝」等稿交由蔡孝乾印發以便推進破壞政府建設工作未及印發即被保密局破獲於卅八年底將張志忠緝獲解由本部軍事檢察官偵察提起公訴
理由

被告張志忠對於廿九年冬參加匪幫後歷任匪軍敵工科幹事科長等職專事破壞國軍工作卅五年三月被匪華東局派來台灣與自首匪謀蔡孝乾負責發展台灣叛亂工作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擔任組織化名老吳老鍾楊春霖等吸收廖瑞發楊克煌林樸材及已處決匪徒李媽兜簡吉賴象等為匪工作又自營生意為匪經濟機構至嘉義領導匪武裝組織自稱自治聯軍參加卅六年之二二八暴動圖顛覆政府被擊散同年八月又率領武裝匪徒十餘圍劫西螺警察派出所搶得步槍二枝後竄散至卅七年夏在香港集議配合匪軍攻台事宜返台後任武工部長積極推展新竹地區匪組織並以文字從事破壞政府建設工作等事實業據直認不諱並有查獲之被告所撰「鄉鎮工作」「關於三七五減租問題」「怎樣建立台灣人民的游擊武裝」及「新竹地委會之新竹地區工作報告」等為證核與保密局解案原卷偵查結果及本部審理之已決犯李媽兜簡吉賴象陳明新等在其各該原案卷內之供證均□符合犯情極臻明確綜上事證被告張志忠早年投匪思想頑固復利用鄉土關係潛返台灣擴張叛亂工作建立武裝組織製造暴亂危害社會治安破壞政府建設其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罪實無可逭應處以極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用外沒收之以昭炯戒

綜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前段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十條後段第十三條刑法第卅七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參謀總長呈請總統核示張志忠的判決。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參謀總長呈報總統有關「張志忠叛亂案」的簽呈。

三月十二日，經桂永清「代」的總統批示，以總統府（四三）興宏字第三〇〇代電發文，國防部周總長。

三月十二日，國防部參謀總長陸軍一級上將周志柔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四三）清澈字第751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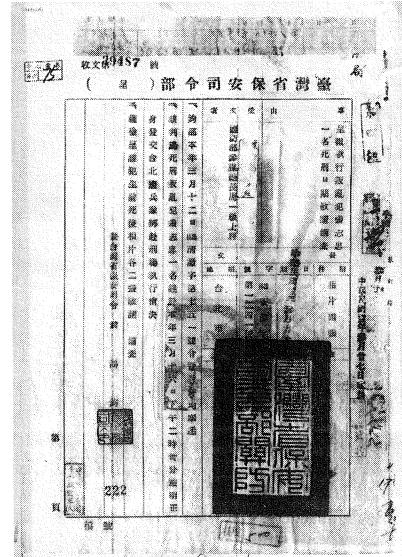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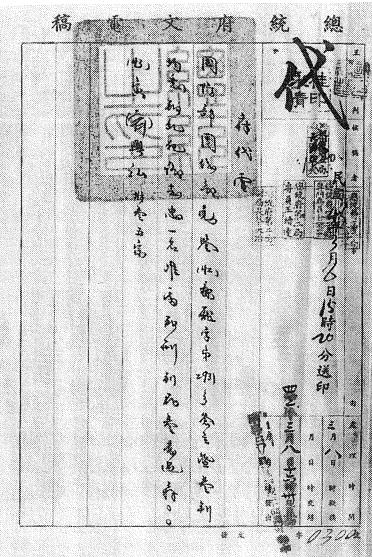
三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卅分，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是將「判處死刑叛亂

十一月五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四二）安度字第1364號簽呈，「為檢呈張志忠叛亂一案卷判」附（四二）審二字第九十八號判決書，簽請國防部核示。

十一月十四日，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以「該張犯係於卅八年底被保密局組獲當由該局施以感化時逾三年尚無悔悟」、「惡性重大」的理由，批示如擬。

當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台北市衛生院核發的張志忠火葬許可證。



左：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總統府發送有關張志忠案的代電。

右：一九五四年三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呈報參謀總長有關張志忠執行死刑的簽呈。

就在總統府核准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對張志忠死刑的判決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經由蕭道應醫師介紹而與張志忠發生組織關係的石聰金，終於也在大安溪出海口附近的農村被捕，然後經由苗栗、台中，於十二月廿八日輾轉押送到台北軍法處看守所，並且與張志忠有過同房談話的機會。

「那天，大概是黃昏五點多吧，我一被押進牢房，就赫然看見張志忠也在裡頭。」石聰金回憶了他在軍法處看守所與張志忠短暫會面的情況。「張志忠看到我，立刻走過來，把我緊緊抱住，在我耳

坦然赴死

三月廿七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以（四三）安津字第三四一號（呈）發文國防部參謀總長陸軍一級上將周志柔，呈報執行「叛亂犯」張志忠一名死刑日期，並檢呈該犯生前死後相片各二張，敬請備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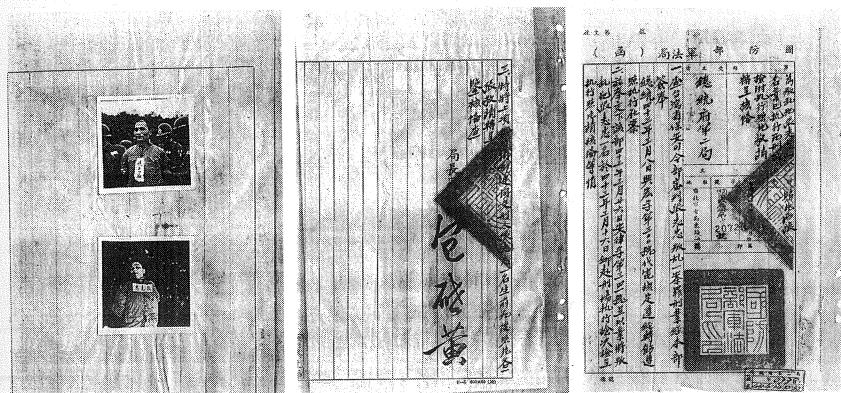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卅分，總統府第二局收到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包啟黃中將呈報的「為叛亂犯張志忠一名業已執行死刑茲檢附執行照片敬請轉呈核備」的（四三）清澈局字第二〇七二號（函）。

四月十五日，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陸軍中將傅亞夫以〇四六二號局代電發文給國防部軍法局，告知來函已轉呈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核批：准予備查。

這樣，在台北國府眼裡「惡性重大」的「叛亂犯」張志忠的命運的公文旅行，也劃下了最後的句點。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總統府代電軍法局，有關張志忠執行死刑案「准予備查」。



一九五四年四月，軍法局向總統府呈報張志忠「業已執行死刑」並檢附執行照片兩張。

邊輕聲又很誠懇且隆重地說：『我對不起你們！……』然後，我向張志忠報告說：『十三份被破後，

陳福星拍拍屁股就自己跑到苗栗地區，同時還封鎖苗栗的基地，不讓其他人來；到最後，陳福星領導的鶯歌組織黃培奕等所有黨員全都自首了啊！……』張志忠聽到陳福星這些人叛變，搖頭說：『唉！我錯了！』我接著又向他報告我的情況說：『我被捕後，跟蕭道應有組織關係的同志，就只剩賴阿煥一人還在逃了。敵人要派我出去抓賴阿煥，我拒絕了，可敵人一定要我去。』他聽了後隨即勸我說：

『如果敵人要你出去，你就答應吧！只要堅持立場，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還可以保護賴阿煥逃亡。出去吧！……』他看我還在考慮，於是又勸我說：『二萬五千里長征，失掉聯絡的黨員，二十年、三十年以後再聯絡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我於是答應出來找賴阿煥。他於是又交代我說：『這些人裡頭，唯一有流血的就是蕭道應。你出去後要和蕭道應多聯絡、聯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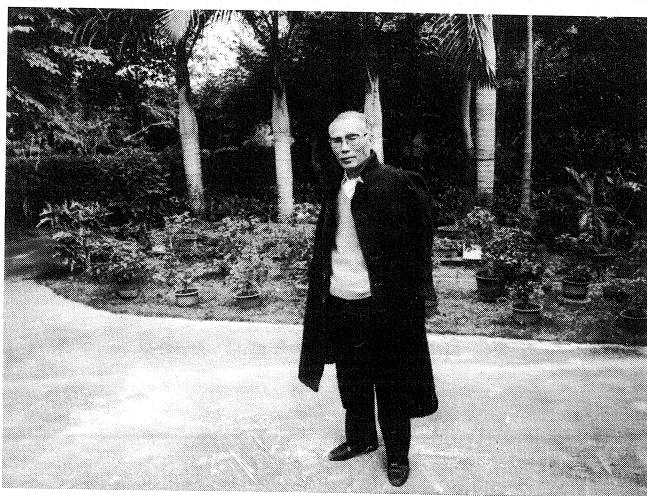
「後來，在緝捕賴阿煥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張志忠之信任蕭道應是有他的道理的。」石聰金老先生分析說，「張志忠信任蕭道應的最大原因，以我的推測是，張志忠是單線領導蕭道應的，而蕭道應被捕後與張志忠有關的人全部保留，毫無暴露；不像陳福星，全盤托出。張志忠與蕭道應之工作關係的朋友大家都平安，這是張志忠對蕭信任有加的重大原因。」

「我想，你被送來這裡，一定是要你為陳其昌和曾得志、黃添樑三人做證，」張志忠最後又跟石聰金說，「如果是的話，你一定要堅決否認跟他們的關係；他們三人的罪名是『資匪』，又是『經濟小組』，一旦組織罪名成立，必死無疑。」

張志忠所說的陳其昌（一九〇五—一九〇〇），日據時期曾任台灣民眾黨祕書長，是蔣渭水的得力助手。台灣光復後，一度跟隨李萬居先後擔任《台灣新生報》業務主任、《公論報》總經理，一九四九年五月離職後，在台北市先後開了鴻運樓與延平樓兩家餐廳。

根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2）審三字第124號判決書所載，曾得志是台北市議員兼台北市建成區公用事業建設服務會理事長；黃添樑則是台灣省商會聯合會理事長兼台北市商會理事長。後來，他們因為陳其昌借了三千元舊台幣給《公論報》的老同事黃培奕，而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黃培奕投案自首後以「資匪」之名被捕。

「我原來被關在軍法處東所的樓下押房，後來移到樓上，恰好與張志忠同房。」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陳其昌先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一條僻巷中的自宅接受採訪時，向我細說了他和張志忠同房關押的情形。「張志忠看到我就安慰我說：『石聰金來這沒幾個鐘頭就調走了！你的事情我很清楚。我也告訴石聰金，你的事情不要談！』後來，張志忠又和我談到家裡的情形，並且提到要寫信給親戚，交代如何安排孩子？當時，我看到，張志忠每天一早



張再添身穿張志忠僅存的遺物——抗戰期間身穿的大衣。（藍博洲攝）

起來，總是如常地唱著《赤旗歌》或《國際歌》來鼓舞其他難友；並且仍然安靜地閱讀獄中只能看到的共產主義批判之類的書。因為張志忠曾經告訴我說：『我每天等著他們來槍斃我！』所以我想，這個人，說不定明天就要槍斃了，怎麼今天還看得下書啊！幾天後，我調往西所。在西所的視窗可以清楚看到法庭的情形。我算了算，一個月不到，就有五十個被判死刑的難友叫出去槍決，我就沒有勇氣再算下去了！慶幸的是，我還沒看到張志忠！但是，最後，張志忠還是以坦然赴死，向歷史證明他的清白與堅持！我聽說，張志忠臨死之前的表現不但讓其他難友感到敬佩，而且也贏得了劊子手難得的尊敬。』

「二哥最終還是被槍決了，得年四十五歲。」張再添先生談到張志忠最後的下場時沙啞著嗓音沉痛地說。「我得到通知後隨即北上，處理他的後事。兩天後，他的屍體於台北市公設火葬場火化。然後，我就把他的骨灰帶回新港家鄉安葬。」

〔第四章〕

小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許金玉在屏東家裡向筆者敘述了她所理解的小羊的悲劇：「我和小羊及其母親李湧曾經在軍法處看守所關過同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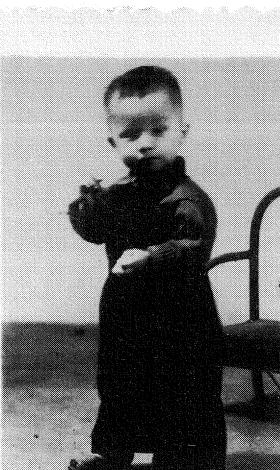
鄉人傳說

季漢與張志忠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卻一直有著這樣那樣不符實際的傳說。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民進黨當權時的國史館館長先前所採集的《嘉雲平野二三八》中，那位自稱「以前在警察機關做事」的新港鄉民林玉鏡的「口述歷史」是怎麼說的：

他【張梗】被抓到後，要槍斃，兩個孩子在大陸。他要求見孩子一面，後來共產黨才把孩子送到香港，又送回台灣來，交給張梗的弟弟，帶去給他們父母看。

張梗的兒子五歲時從大陸送過來的，後來就跟著阿叔過活。當時是政府沒注意才讓他們進來的。來了後住在新港，戶口不知道怎樣去報的，變成說是他阿叔從海口分來的，我想那時大概有共產黨在幫他們的。他們夫婦被槍斃後，孩子變成附匪家屬，從小學起就很反抗。



上海
Xingwang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楊揚。（張再添提供）

無父無母，住在叔父家，就很不願讀書。他兒子的老師蘇某就說：「你不讀書是要像你父親做共產黨嗎？」給他買簿子、鉛筆等，鼓勵他讀書。該上學時他不去上學，去養鴨，他不上課，但考試都會，所以還是讓他畢業。畢業後去學做布袋戲，沒時間讀書，但他還是考上新港中學初中部。初中畢業後不知他去哪裡。後來他去當兵，長官一天到晚找他麻煩，晚上十二點、兩三點，叫他起來讀三民主義，一直到他受不了，有一次放假出來，就在一間旅社自殺了。【頁二七二】

從常識來判斷，鄉人林玉鏡所說的上述內容，凡是筆者刻意用黑體字標示的部分，都應該是道聽途說的傳說，不是事實。其他部分，雖然離事實不遠，但基本上也還只是傳說而已。

老特務的說法

關於小羊，自稱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在台北新公園附近的中西大藥房二樓逮捕張志忠的「白色恐怖」執行者——保密局老特務谷正文，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的《白色恐怖祕密檔案》一書中，也有幾則自認為是「歷史證言」的說法。

首先，關於小羊的隨母入獄，谷正文說：

張志忠【被捕時】很明白【自己】難逃一死，因此特別向看守所提出一項申請，希望所方基於人道精神，允許他們把十歲大的楊楊【揚】接到所內共同生活。當時並無兒童福利法，而我個人也

認為這種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後果，因此，很快就答應了。【頁一二二】

谷正文自稱，他到台灣後所抓的第一批「匪諜」是「台大的政治系學生許遠東、戴傳李等四人」。前面提過，谷正文曾經對戴傳李先生說：「我因為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所以早上起床從來不洗臉，也不刷牙。」此外，李敖在為谷正文《白色恐怖祕密檔案》一書作序時也指稱：「谷老告訴我，毛人鳳（國民黨保密局、情報局頭子）對他說過：『你比我還狠！』可見此公狠毒，故無待我們歷史家論定也。」然而，恰恰是這個自稱「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的「狠毒」的老特務，竟而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大言不慚地提到了「合乎情理」之詞。

歷史的諷刺與荒謬，恐怕莫過於此吧！

那麼，即便我們願意相信「此公」存有「合乎情理」之心，上述證言基本上還是可疑的！

畢竟，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日上午一點鐘出生」的楊揚，在張志忠被捕的當時，再怎麼算也不可能是「十歲大」吧！

按照邏輯，如果一個命題所描述的事態存在，那麼，這個命題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再者，「邏輯的東西必須符合歷史的東西」。

事實，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出發點。
老特務谷正文自稱的「歷史證言」既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按理，我們大可將其「掃入歷史垃圾堆中」，不予理會。

但是，我們也別忘了：「謬誤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轉化成真理。因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人們對謬誤進行科學的分析，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就可能達到對事物的正確認識，使轉化成真理。」同樣地，為了能夠把握事實，我們的研究首先必須充分地占有資料，然後從大量的相關說法中，通過一定的分析，整理出準確可靠的史料；儘管它是一項繁瑣艱難的工作。

因為這樣，老特務自稱的「歷史證言」就值得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老特務說：

楊楊【揚】進入看守所之後，由於他的天真之中，往往帶有一點惹人愛憐的慧黠，很快便和所方管理人員打成一片，而張志忠和季雲【雲】，也連帶受到了較好的待遇【按：先後槍決】。

我曾多次前往探視楊揚，並有兩度從所內將他領出，帶往淡水河口垂釣。在第二次垂釣返回台北的路上，我輕輕撫摸楊揚的短髮，看著他微笑眼裡淡淡的戾氣。

「楊揚，你恨谷叔叔嗎？」

他用力撥開我撫慰他的手，怨恨地說：「你知道了，還問幹嘛？」【頁一二三】

這裡，這個自稱「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的「狠毒」老特務，竟而搖身一變為慈祥的「谷叔叔」了。

問題是，這段「歷史證言」果真是歷史的事實嗎？如果是的話，我們要問問「此公」，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突然「良心」發現了呢？如果不是的話，我們更要問，為什麼事隔近半個世紀之後你還要

虛構的歷史彷彿小說一般，按照它自己編造的情節繼續發展著。

老特務又說：

楊楊【揚】陪伴父母親在看守所內度過了大約一年的光陰，直到張志忠、季雲【湧】被由李元簇手擬的懲治叛亂條例的第二條第一項（所謂的二條一）執行槍決才離開看守所，經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養監護（在那時的政治鬥爭中，製造了許多類似楊楊這種處境的孤兒，這些孩童，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養，我自己也曾收養了陳澤民的兩個小孩，……）。【頁一二三】

故事發展到這裡，這個自稱「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的「狠毒」老特務所敘述的情節，已經更加令人感到不可理解了。

首先，人們無法理解的是：作為人所共知的「狠毒」的白色恐怖加害者的保密局特務們，怎麼會突然大發善心地收養那些受害者的孤兒呢？

再者，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檔案所載，所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後來辦了「自新」，並未被槍決。那麼，「狠毒」的老特務為何又要收養他的兩個小孩呢？

最後，如果老特務所敘述的這些情節果真都是事實的話，我們還是要再追問：究竟是什麼讓他們良心發現的呢？

問題還是那句話，「邏輯的東西必須符合歷史的東西」。

那麼，「此公」所說的上述事情果真都是符合歷史的事實嗎？

根據季湧從軍法處看守所寄出的獄中家書所述，事實應該是這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日晚上，楊揚與母親季湧同時被捕入獄；「起初八個月」，她們母子和張志忠一同被關押在保密局南所。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季湧與剛滿三歲的楊揚同被移送軍法處看守所第四十五號押房。九月廿七日，張志忠的弟弟張再添把楊揚接回新港老家。十一月十八日，季湧被槍決。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張志忠再被槍決。

所以，事實顯然並不是老特務所說的那樣。除非季湧所言不是事實，否則，老特務所言就完全是虛構的情節了。

虛構的情節在虛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著。

老特務繼續編造了楊揚的成長過程與最後結局：

楊楊【揚】在同事家中，是一個不愛讀書、很不聽話的小孩，這樣的結果使得收養他的同事大失所望，他曾不只一次向我抱怨楊楊偷竊、逃學和頂嘴，……。

小學畢業後，楊楊沒有升學，有一天，他偷了錢蹺家。大約兩個月後，……在台中火車站前面……心不甘情不願地被領回保密局。楊楊表示不願再回監護人那裡，因此，我替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車保養單位擔任修車學徒，我認為不久的將來必是汽車的時代，楊楊既不肯讀書，學得一手

修車技術，也足夠使他安身立命。可惜，事情的演變並沒有如此樂觀，修車技術尚未學到，楊楊已經從單位裡的士兵那裡學得了一身惡習，抽菸、喝酒、賭博……。

十六歲那年【一九六三年】，楊楊學會了嫖妓，賭膽也變大了，這使得他欠下了一筆債務，汽車保養廠裡的阿兵哥要不到錢的時候，每以拳腳相向。

艱難的處境逼使他不得不祭出最後一件法寶——一封密函——那是張志忠夫婦臨刑前不久，替他縫在衣領內的，他們交代他：「我們沒能好好照顧你，可憐的兒子，以後一切都要靠自己，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只要肯用功，一定能好好活著，可是，你的聰明實在也叫人擔心；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來，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麼很大的困難再把它打開，拿去找劉啟光伯伯。」

劉啟光在華南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室納悶地等待著求見的少年。這些年，劉啟光的生活還算安定，已經不再像當初風聲緊時常於午夜時分由共謀案的夢魘裡驚醒。他並沒有把求見的少年與昔日的共謀案件聯想在一起。

「劉伯伯，您好，我是張志忠的兒子，人家都叫我楊楊。」少年很有禮貌地向劉啟光做了一番簡單的介紹。

劉啟光聽到張志忠這三個字，臉上隨即閃過一絲恐懼，然後他以還算鎮定的語氣否認說：「不，我不認識張志忠。」

「劉伯伯，您說這話未免太絕，真不明白爸爸、媽媽怎麼會把您當作好同志，我看這封信他們也是白寫了。」說著，楊楊故意從衣袋裡掏出一封信，在劉啟光眼前晃了一下。

劉啟光緊張了，連忙改變語氣問：「信裡說些什麼？」

楊楊知道對方已經就範，狡猾地冷笑了一下，然後淡然地把信讀了一遍（【《白色恐怖祕密檔案》】編者按，信的內容，在兩位主人翁相繼死亡後，再沒人能夠加以揭曉）。

「是，是，說吧，你有什麼困難？」劉啟光無奈地搖搖頭，準備任由楊楊宰割。

楊楊畢竟是個少年，胃口並不大，他只向劉啟光要了五百元償還所欠的債務。但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不到一個月的光景。楊楊又欠下了兩千多元的債務，他再度找上劉啟光，並開口要三千元。劉啟光勉強又幫了楊楊一回，不過，楊楊第三度上門的時間只隔了一個禮拜，這一次他要五千元。

「不成，這一次我不會給。」劉啟光鐵了心。

「給不給由不得你，我已經問好了要把它送給誰最管用！」楊楊不甘示弱，再度拿出密函，放下狠話。

「好吧，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賭了。」

楊楊興奮地數著鈔票，這時，劉啟光忽然偷襲過來，搶走密函，並立即將它撕得粉碎。楊楊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法寶轉眼成空，急得滿口粗言穢語，咒罵不停。

「還不走，我叫人把五千塊搶回來。」

「你會後悔的，你會後悔的。」楊楊帶著五千元現款離開華南銀行，嘴裡還不停地詛咒著。

那天夜裡，劉啟光心臟病發送醫，隨即轉送日本進行心臟導管手術，總算保住一條命。

楊楊失去法寶之後，曾經戒賭數月，最後卻仍舊經不起誘惑，一夜豪賭，又欠下了一筆鉅款。

沒了密函，他再也變不出把戲。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他逐漸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有一回，他寫信給自己最景仰的作家柏楊，希望獲得一些啟發，尋得一條坦途。不過，柏楊除了在回信裡勸他安分向上之外，對於他燃眉的困境也是愛莫能助，於是選擇了在修車廠裡上吊自殺。第二天早上，當人們發現的時候，他已氣絕多時。他沒有留下遺書，但警方卻在他衣袋裡找到一封柏楊的回信。

不久之後，柏楊將楊揚的故事，寫成一則感人的報導，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大部分讀者都深受感動，認為它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可是，對劉啟光而言，它無疑是一則要命的報導，多年來，他極力避諱的共謀嫌疑，卻意外地被人在報紙上披露出來，因此，當他看到這則報導，心臟舊疾再度發作，在日本安裝的導管破裂了。他死時，手裡還緊緊握著當天的報紙。【頁一二三至一二七】

老特務谷正文是個善於說故事的人，他敘述的故事情節確實是複雜的，複雜到非當事者也說不清它究竟是真是假？但是，如果根據他所提到的柏楊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有關楊揚的故事內容來看的話，引文當中的黑體字部分的內容卻與柏楊所寫是不同的。再者，根據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七輯》的「劉啟光」詞條所載，劉啟光的生平年代是：一九〇五年五月七日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這樣的話，劉啟光就不可能是看到柏楊所寫報導發表的當天（一九六八年元月廿六日）「慘遭嚇死」的。

那麼，這個老特務的回憶錄的內容還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叔叔與母親難友的說法

最後，我們還是來看看小羊的親友們的說法吧！

「新港國校畢業後，小羊還繼續讀初中。」楊揚的叔叔張再添先生說：「初中畢業後，他就不願繼續升學，出去做事。他一直認為，我對他的管教是一種束縛，所以總是反抗。後來，他不知怎麼又跟那些坐牢出來的阿姨們聯絡上？我覺得那是最大的錯誤！因為這些阿姨們太疼惜他，對他太寵了，不敢管教他，也就讓他養成依賴的心理。」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因為投入郵電工會的工人運動被捕，處刑十五年的許金玉女士，就是張再添所說的讓楊揚「養成依賴的心理」的「那些坐牢出來的阿姨們」之一。

「我和小羊及其母親季湧曾經在軍法處看守所關過同房。」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許金玉在屏東家裡向我敘述了她所理解的小羊的悲劇。「小羊在龍泉當兵的時候，透過難友劉玲玲的介紹，找到我們。老畢以前就跟張志忠有關係，所以我們對他就特別的照顧。放假的時候，他也常常來屏東找我們，吃飯、洗衣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志忠的父親張禮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就在小揚自殺前不久，他阿公去世了。」張再添追憶著刻意遺忘多年的痛苦往事。「因為他的收信地址不清楚，我也就沒法通知他回新港奔喪。後來，收到他的賀年片，我才寫了信給他。」

張再添給楊揚的信寫道：

小揚：

賀年片謝謝。雖然迎接新年是一件可喜的佳節，可是你祖父的去世在悲傷中就無法與人共樂迎新年。你祖父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早上六時二十分終於不治，別離了在世八十七年的社會，已安息於一堆墳墓中。雖有漫長的八十七年未曾受到子女們的孝順而撒手西歸，與心而論有大不孝之罪。在哭細雨綿綿中十四日辦理出葬並料理後事，擇有尚可滿意的墓地安葬，已算一段落。於安在天之靈，彌補過去的不孝之罪，總算心安矣。在匆忙中想通知你趕回來送終，但你的收信地址不詳，沒法投擲。還好素梅有趕回來，總算彌補了一點孝敬之意。

軍中生活習慣了沒有，應好好學習，磨練自己的品格，因你還年青，有無可限量的前途在等待你們。可是必須要充實自己，才能期待著未來，不要過一天算一天的心理去磨掉寶貴的時光，才好。春節也快到了，你們諒有春節假期，可回來看看。再見。祝安好。

十二月廿三日 再添寄

然而，小羊並沒有像叔叔張再添所期待的那樣利用春節假期回家看看。當張再添收到小羊的回信時，他顯然透露了自己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的心情。

叔叔：

我不知應向您說些什麼，事已至此，不必為我惋【惋】惜，多我一個，於事何補呢？是不是應高興我這樣的決【抉】擇，自此以後，您又可少掉一宗煩腦【惱】了。很多事要說，但都說不出，如您要留下回憶的話，附上軟片一張，不要的話敬請毀掉罷！祝我完成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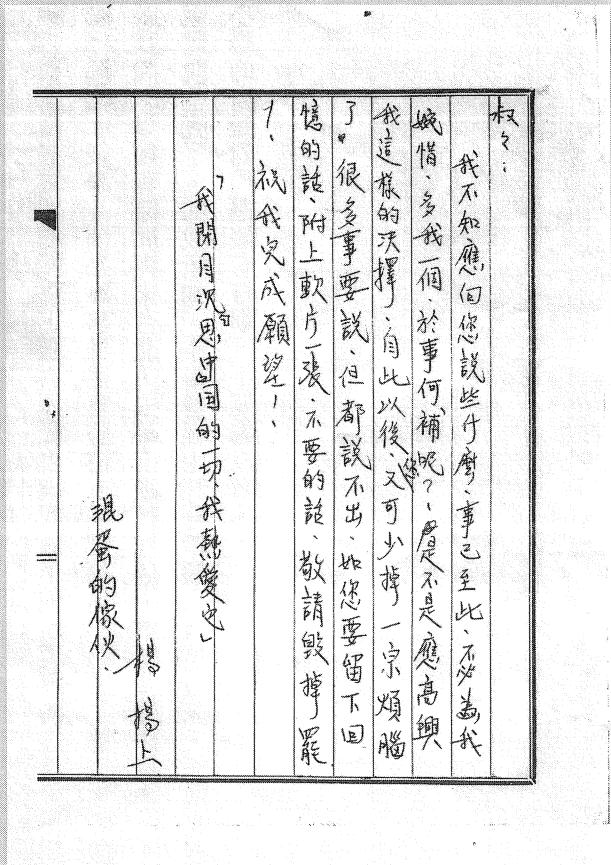
「我閉目沉『思中』國的一切，我熱愛它」

混蛋的傢伙 楊揚上

「小羊很聰明，做事也乾淨俐落。」許金玉猜測小羊決定自殺的緣由。「後來他想躲開辛苦的操作，去做文書工作，就漸漸掉入圈套。有一次，他向我們透露，他蓋了印，寫了什麼切結書，要被派去大陸做情報工作。我和老辜及劉玲玲就和他商談，勸他絕對不可以去！老辜邊說邊哭！他知道問題嚴重了，可不知怎麼用開問題，很痛苦。後來，他就沒再來找我們。不知多久以後，人家告訴我，柏楊在一篇雜文裡頭有談到小羊的事，說他在艋舺一家旅社自殺了；自殺前留了遺書給柏楊。」

一九六八年元旦，張再添透過部隊的通知而得知楊揚自殺的消息後，隨即於元月二日上午趕到台北殯儀館，處理善後。

「小揚是在台北長沙街一間旅館自殺的，聽說是柏楊去收屍的！」張再添先生回憶說：「我去台北時，屍體已經送到殯儀館了。」



楊揚給叔叔回信。（張再添提供）

小楊 諸君推謝：雖然迎接新年是一件可喜的佳節，可是像
祖父的小哥在賀信中說的這幾人共度迎新年，像祖父於年
12月12日早上6時20分終於不治辭世了，在我們家裡，這家裏唯一的一堆墳墓中，雖有漫長的童年和管束子女們的音容而難忘的
一些心事卻作天不存之蹤。至從生日過後，家中一切理小景，並未改變得
甚麼，只有滿室的書籍，此家業也算一段落，於家至天，重讀補遺是
的不外之罪，總算心安矣。至像之中想通知你想起回來送終，但你所
忙得地忙得沒法，你像，還好，我聽，應該自己的品性，因
此也不可過早的前來，等着你的好，可是必須在空閒才能

期待着你來，不過這一次第一次的心緒去度掉寂寞的時候，
食飯也忙到你，你的詳細食節候期，可盼着你，而且，況
空忙。

12月23日

再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叔叔張再添寫給小揚的信。（張再添提供）

元月三日，楊揚在殯儀館火化。張再添又像當年二哥張志忠被槍決之後一樣，抱著楊揚的骨灰罇，回到新港老家，然後把它附葬在父親張志忠與母親季漢（衣冠塚）的墓穴裡頭。

「在台北殯儀館，軍事檢察官要我一同去找找劉啟光，問清楚；我不太願意。」針對谷正文口述回憶所寫的楊揚與劉啟光之間的關係，張再添先生向我做了他所理解的追憶。「我當時心想，人死了，有什麼好問的。後來，因為軍事檢察官堅持，我們還是一起去了劉家。劉啟光也沒說什麼！只是私下偷偷跟我說，以後有時間再來台北，去華南銀行找他，要跟我好好談……。可我也從來沒去找過他。不久就聽說他死了。據我所知，小揚曾經由許分帶領去找劉啟光，劉啟光很客氣地叫他：張少爺！我想，小揚的自殺對他應該有打擊，不能說沒有。」

〔尾聲〕

為了忘卻的 紀念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筆者在張再添的帶領之下驅車前往那處荒涼的墓地，尋找那座寂寞的墳塚，向張志忠、季漢與楊揚祭拜致意。

在嘉義新港通往雲林北港的縣道公路旁有一處雜亂無章、蔓草叢生的墓地。墓地裡頭安靜地座落著一個矮小而不起眼的紅磚砌成的墳墓。這座立於一九六八年（丁未）的墳塚，墓碑上頭的刻字顯示：死者祖先的原鄉來自福建詔安；內葬逝者張公梗、季氏湧夫婦附男楊揚。

幾十年來，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家三口的簡陋墳墓；更沒有人想到，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的歷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吧。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歷經多年的探聽尋訪之後，我終於在許金玉與辜金良夫婦的陪同下，找到了蟄居嘉義市區的張再添先生，並且在他的帶領之下驅車前往那處荒涼的墓地，尋找那座寂寞的墳塚，向張志忠、季湧與楊揚祭拜致意。

午後四點鐘左右的冬陽暖暖地照著荒涼的墳地，風吹過來，這裡那裡的雜樹與恣意生長著的茂密的雜草於是隨風搖擺。

我們終於在張再添先生的引領下找到了那座被雜草覆蓋著的荒塚。

「我知道，小揚十二萬分不願意去當國民黨的兵；而他在部隊也常常受到欺負。我認為，這應該是他自殺的原因吧！」張再添先生在清理乾淨的墳前告訴我們。然後，他似乎是在向兄長的同志交代而感傷地繼續說道。「小揚的妹妹素梅是在馬偕醫院出生的，大約差三歲。我們夫婦一共養六、七個小孩，她算是衛生習慣最好的，可她卻在高雄工專畢業之後，不幸得了大腸癌，前後動了三次手術，還是於廿六歲那年過世。」

嘉南平原的野風繼續吹著。

我看到許金玉與辜金良夫婦不約而同地掏出的手巾，擦拭著眼睛。

火紅的落日已經掛在遙遠的西邊田野的地平線上了。

「時候不早了，該走了吧！」張再添先生提醒兩位老人家。他又回頭瞭望映照著夕陽餘暉的墓碑，然後感慨萬千地說：「一個一生為台灣人民謀求幸福的民族民主運動的鬥士，就這樣長埋地下，永遠被人們所忽視竟至遺忘了。」

尊敬的讀者朋友們，關於張志忠的傳奇及其妻兒季湧與小羊的悲劇故事，我只能講到這裡。當你們耐心地讀到這裡，我相信你們一定對這一家三口的命運有一定看法。

然而，不管你們是同情、尊敬或是敵視，我知道，在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架構下所造成的海峽分裂、民族分裂的不正常歷史條理長期形塑的莫名的「反共意識」播弄下下，張志忠與季湧的歷史仍然要長久被湮滅。儘管如此，我卻更加相信，就像魯迅在紀念左聯



左圖：立於一九六八年（丁未）的墳塚，內葬逝者張公梗、季氏湧夫婦附男楊揚。



右圖：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出生的張素梅不幸於二十六歲病逝。（張再添提供）

五烈士犧牲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所說，只要我把它紀錄下來，「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吧！

歷史的是非就留給後人評說，我們就這樣結束這個故事吧！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六日二稿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三稿
二〇一〇年六月〇六日四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〇一日五稿
二〇一一年一月廿五日定稿

大事年表（一九一〇—一九八六）

年代	張志忠、季澐與楊揚相關記事	時代大事
一九一〇	十一月廿六日，張志忠生於日據下嘉義新巷庄新巷二六七番地（今新港鄉福德村）赤貧農家，本名張梗。	
一九一一	父親張禮，在溪邊種菜維生；母親張林氏廳，育有三男三女。上有大姊、大哥張棟，下有兩個妹妹及幼弟張再添。	
一九一二	江蘇南通縣議會撥款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該校亦改稱爲縣立通州女子師範附屬小學。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
一九一三	陳嘉庚在故鄉集美創辦集美小學。	中華民國成立。
一九一四	六月，江蘇南通縣立通州女子師範附屬小學開辦幼稚園。	苗栗羅福星事件。
一九一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九一七		西來庵事件，台灣人民武裝抗日運動結束。
一九一八	三月十日，陳嘉庚創辦集美師範部與中學部。	十一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一九一九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月四日，台灣教育令公布。
		五四運動。
		十一月十一日，首任文官總督田健上任。

年代	事件
一九二〇	一月十一日，東京新民會成立。
	七月十六日，《台灣青年》創刊。
一九二一	二月，季澐生於江蘇南通；父親季厚庵是交通銀行南通支行的中級職員。
一九二二	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二三	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成立。
	一月三十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向北警察署提出組織申請，預定二月四日在台北江山樓成立。
	二月二日，田健總督禁止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二月廿一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東京重建。
	四月十五日，《台灣民報》創刊。
	七月十六日，文化講演團回台。
	七月，台灣人留學廈門的人數達一百九十五名。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七月廿八日、九月二十日與十一月十四日，新巷（港）舉辦第一、二、三回文化講演。		一月四日起，一連四天，台北無產青年在港町文化講座重開打破陋習講演會，翁澤生等五人遭日警逮捕，起訴求刑；禁錮三個月。
	十二月，台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主要成員包括後來成為台共領導幹部的王萬得、蔡孝乾等人，隨即展開全島演講旅行。五日晚到嘉義地區；六日，在北港集合文化協會系統的青年演講；八日晚，在朴子進行戶外演講；九日，在東石演講。基於地緣關係，張志忠應該參與了上述這幾場活動。		五月廿八日，二林農組成立。 六月廿二日，二林事件。 六月廿八日，治安維持法實施。 五月十二日，中共黨員。
			九月二十日，中國濟難會於上海成立。 十月廿二日，中共黨員。
			十二月十八日，俄共改為聯共，通過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
			六月廿八日，台灣農民組合決定成立。 十二月十九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立。

		一九二四	
			張志忠新巷公學校第廿回第一名畢業，到合隆商號工作，然後到廈門集美中學就讀。
			四月廿五廿六日，以集美中學翁澤生等為主的廈門台灣學生召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五月，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共鳴社創立，張志忠與莊泗川共同主持《共鳴》雜誌。
			十一月廿八日，台灣學生血淚團宣傳部寄《共鳴》雜誌「台灣通信」。
			夏，翁澤生集美中學畢業，考進廈門大學。
			十二月廿二日，台灣總督檢舉廿九名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幹部。
			十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聯俄容共。
			七月三十日，廈門集美學校留學生翁澤生等十數人在台北市與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王敏川等會商，預定八月十二日舉行台北青年會創會式；殖民當局認為該會「顯然是以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宣傳為目的」而拘留翁澤生等人；八月十一日，以「恐有誤導青年前途之虞」禁止該會成立。翁澤生等主要會員在蔣渭水、王敏川等指導下，另組台北青年體育會，在文化協會讀報社內設置事務所，進行活動。九月廿五日，組織台北青年讀書會。

<p>一九二七</p> <p>一月二日，王萬得、蔡孝乾等人在彰化倡組台灣無產青年會，張志忠被推舉為嘉義地方負責人。</p> <p>二月一日，日警全面檢舉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張志忠與另外四十三名有關人員被捕。</p>
<p>一九二八</p> <p>十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豫審終結，張志忠與另外十六人判決豫審免訴。</p>
<p>一九二九</p> <p>年底，具有中共與台共黨員身分的上海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派幹部侯朝宗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詹以昌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閩南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再度集結，開展反帝運動。</p>
<p>一九三〇</p> <p>六月九日，以「團結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為目的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在廈門中學祕密成立。張志忠在此時回到閩南。</p> <p>九月，張志忠參加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侯朝宗（劉啓光）主持的共產主義理論學習班，讀楊明山（蔡孝乾）著《新興經濟學》，以及《進化論》。</p>
<p>二月十二日，農組被檢舉。</p> <p>四月十六日，日共第三次檢舉。</p> <p>六月十一日，中共通過李立三的都市暴動路線。</p> <p>十月廿七日，台共松山會議，成立台灣赤色總工會。霧社事件爆發。</p> <p>十二月，瞿秋白會見翁澤生，轉達第三國際東方局對謝雪紅領導的台共「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指責，並任命翁澤生、潘欽信（化名黃長川）與蔡孝乾（化名楊明山）三人，作為國際代表小組，成立對台指導部。</p> <p>十二月二十日，謝雪紅拒絕第三國際東方局指令。</p> <p>十二月廿七日，國府第一次剿共。</p>
<p>一九三一</p> <p>一月，中共閩南部委在漳州成立，書記為羅明，台胞翁澤生、謝志堅和農工三人擔任部委委員；漳州的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正式在省立二師建立，翁澤生任書記。</p> <p>二月三日，文協左右分裂，左派取得領導權。</p> <p>三月：日本金融大恐慌。</p> <p>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閩南部委決定翁澤生和謝志堅離開漳州，轉至上海工作。</p> <p>五月，新文協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創刊。</p> <p>六月二日，謝雪紅回台灣。</p> <p>六月三日，台灣總工會改組為台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p> <p>十月六日，日共渡邊政之輔在基隆殉難。</p> <p>十二月廿六日，謝雪紅在台北開國際書局。</p>

一九三六	六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瓦窯堡改名為中國抗 日紅軍大學。	一九三五	八月九日，新巷公學校第廿回卒業生同窗會。 十二月十二日，上海學生界率先響應「一二九運 動」，熱烈展開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運動。	一九三四	張志忠經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 再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入 黨，參加廈門市委黨的訓練班後，回台重建黨 組。七月八日為止，六十三名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 檢舉的牽連而被捕。	一九三三	六月廿九日，張志忠移送檢察局，沒暴露黨員身 分，後來關在台南監獄，裝瘋而獲假釋，然後趁 機逃往大陸。	一九三二	張志忠經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 再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入 黨，參加廈門市委黨的訓練班後，回台重建黨 組。一月廿八日深夜，淞滬抗戰爆發。
------	---------------------------------	------	--	------	---	------	--	------	---

一九三一	四月，在台共領導幹部翁澤生、林木順等人提 議、指導下，上海台灣團改稱為旅滬台灣反帝青 年同盟，通稱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五月	翁澤生從上海到廈門，指派具有青年團與 中國革命互濟會身分的集美中學學生王燈財負責 訓練在廈的台灣青年，準備回台再建台共黨組， 同時建立共青團組織。張志忠從集美轉學漳州八 中，準備回台參加實際工作，並與王燈財同住。	六月十七日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展開台灣施政紀 念日鬥爭。	六月廿三日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展開沙市慘案紀 念鬥爭。	七月廿二日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盟員陳炳譽與董 文霖（廈門共青團負責人）在示威運動中被租界 工部局警察檢舉，引渡日本領事館警察署。
								九月十四日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檢舉與上海台灣 反帝同盟有關的王溪森等十二人。
								季溪就讀南通女子師範附小。九一八事變後，如 飢似渴地閱讀主張抗日救亡的書報雜誌，投身抗 日救亡、抵制日貨的宣傳活動。	
								十一月廿七日	瑞金中華蘇維埃成立。建立培養 營團級以上幹部的中央紅軍學校。
								十一月十四日	劉讚周被捕，台共重建計劃流 產。
								九月一日	潘欽信、簡娥被捕。
								九月十三日	蘇新被捕。
								九月十八日	九一八事變。全國各地愛國學生展 開抗日救亡運動。
								九月二十六日	謝雪紅被捕。
								七月十七日	王萬得被捕。

一月廿七日，王萬得與蘇新等台共成員遵奉東方局指令，成立台共改革同盟。

三月二十日，翁澤生又命李清奇帶東方局《致台共黨員展開全面檢舉》函返台。

五月卅一日，台共根據東方局《致台灣共產主義者》函召開臨時二大，開除謝雪紅、楊克煌與楊克培等人黨籍。

三月廿四日，台共黨員趙港被捕；日本當局針對《台灣共產主義者》函召開臨時二大，開除謝雪紅、楊克煌與楊克培等人黨籍。

一九三七

一月二十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在延安；林彪任校長兼政委，副校長劉伯承。

季澐就讀南通中學初中部，平時勤讀三〇年代左翼作家作品及進步報刊雜誌。抗戰爆發後，積極參加由多數中學生組織的戰時青年救護宣傳團，從事寫標語、出牆報、走上大街向市民作演講等宣傳工作，並參加和組織遊行示威活動。

七月，中共中央派劉曉到上海重建上海地下黨。八月，中共上海地下黨成立工人運動委員會和群眾工作委員會（下設職員、文化、學生和婦女等工作委員會）。

八月十三日，凌晨二時，日軍進攻上海，挑起淞滬戰爭。上海學生投入保衛大上海運動。

八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七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中國國民黨。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表明中國已到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八月廿二日，南京政府公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

九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按照抗戰的戰鬥序列，改稱八路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九月六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

八月十四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八月十七日，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發動全面的軍事進攻。

八月廿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十一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設立兩個學生工作機構：學生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學校學生運動委員會。

十一月四日，日軍登陸金山嘴，形成對上海包圍的形勢。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租界地區淪為「孤島」。

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十一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慘案。

十一月廿三日，濟南淪陷。

*蔡孝乾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

一九三八

一月十五日，八路軍一二九師東進縱隊進軍冀南。

南。

三月，日軍占領南通。季家避難上海租界。季澑考入上海務本女中。不久，轉學原南通中學部分遷滬教師在租界組建的通州中學，並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

五月，八路軍一二九師主力建立冀南抗日根據地，控制範圍在河北省石德路以南地區。

八月一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楊秀峰和宋任窮分任正副主任。

十月廿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政府發表第二次聲明，改變不以蔣介石政權為對手的方針。日本御前會議決定〈處理中國事變綱要〉，要求加緊與蔣政權和平談判，並對蔣繼續採取以政略為主、戰略為輔的方針；同時以其主要力量圍攻和掃蕩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加緊對占領區的統治，以作為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和南亞進軍的戰略後方。

十一月廿二日，日本近衛政府發表第三次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放棄抗日；進一步向國民黨誘降。

十二月廿九日，汪精衛發表「艷電」，公開叛國。

一九三九

一月十六日，冀南軍區成立。宋任窮任司令員，轄五個軍分區。管轄範圍，北為德州至石家莊，東為德州至黃河，西至津浦路，司令部在南宮威縣一帶；是一個鞏固的根據地，也是新四軍與延安之間必經之地，劉少奇從蘇北回延安時經過此地。

張志忠在抗大受訓後，加入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派赴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任日軍工作科幹事，化名張光熙，從事對敵宣傳工作。

八月，日軍士兵秋山良照在山東省堂邑縣大李莊與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新編七旅二〇團作戰中成為八路軍俘虜；被俘期間跟張光熙等會日語的人學習列寧的國家論、唯物史觀（史的唯物論）、社會發展史、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共產黨宣言等理論。

十一月十七日，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第一個日本人反戰組織——覺醒聯盟，在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總部成立。

十二月廿三日，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在桂林領導建立日本士兵反戰同盟西南支部。

十二月，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和華北抗日根據地。

一月六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

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衛政府發表第一次聲明：今後不以蔣介石政權為對手，「而期待真正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

三月廿九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并公布〈抗戰建國綱領〉。

三月，以梁鴻志為首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一九四〇

二月十一日，冀南反頑戰役開始。經六天激烈戰鬥，國民黨反共軍全部被趕出冀南。

三月廿九日，重慶反戰同盟總部成立。

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通州中學全校大罷課，展開反汪偽登台的鬥爭。季漢在鬥爭中表現積極，該校中共黨組織決定吸收她入黨。

六月七日，八路軍一二九師整編，並成立太行、太岳軍區。

六月廿三日，覺醒聯盟第一支部（太行支部）在八路軍一二九師成立。

八月至十二月，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部署下，一二九師參加百團大戰。

夏，季漢高中畢業，根據組織安排，考入暨南大學教育系，成為鄭振鐸與周予同先生的高足。

秋，季漢父親因病帶領全家返回南通。季漢單獨留滬，住處成為暨大地下黨中共學生支部開會、學習、研究工作的祕密基地。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於瓦解敵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從日軍俘虜中，選擇少數進步分子，予以訓練。

七月二十日，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總部在重慶舉行成立大會。

一九四一

一月六日，皖南事變爆發。
六月廿二日，德國發動對蘇聯的進攻。

八月七日，覺醒聯明冀南支部在冀南軍區敵工科幫助下，在冀南平原成立。支部書記為秋山良照。張志忠曾經帶秋山良照到敵人碉堡下喊話。

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季漢接任暨南大學中共地下黨學生支部委員，十二月九日暨大封校，內遷福建建陽，支部隨之撤銷，改由中共大學區委領導，轉入上海大同大學，就讀半年。

十二月九日，中國政府發表對日、德、意宣戰公告。

冬，晉冀魯豫邊區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包括太行、太岳、冀魯豫、冀南四區。

一九四二

四月廿九日，日軍對冀南軍區部隊大掃蕩。

五月一日，中、英、美、蘇、荷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署共同作戰宣言。

八月，蔣介石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

九月，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學委派季漢插班考進蘇州汪偽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文史地專修科二年級，任該校地下黨學生支部書記，仍由學委直接領導。

九月，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學委派季漢插班考進蘇州汪偽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文史地專修科二年級，任該校地下黨學生支部書記，仍由學委直接領導。

		一九四三
		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張茂林離開冀南到太行山，從此沒再見過張志忠。
		一月，中共江蘇省委撤銷，季濤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共蘇州市工委，直接由工委負責人王中一領導。
		八月，季濤在教育學院畢業；分發蘇州中學一院男生部，任歷史教員；然後，又到女生部（蘇州女子中學）、省三中等校，擔任歷史和語文教員。
		十二月一日，中、英、美三國首腦會議，發表〈開羅宣言〉，宣告「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一九四四		
		四月九日，日本人反戰同盟正式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
		九月，蘇州市工委負責人王中一他調。季濤改由另一工委領導人孔令宗領導，並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直接領導蘇州綱廠及針織廠的幾個工人黨員。
一九四五		
		二月四日，蘇、英、美三國首腦及其外長在雅爾達舉行會議，討論戰後世界問題的處理。
		五月八日，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歐洲戰火停止。
		七月廿六日，波次坦會議發表〈波次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
		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宣布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八月九日：零時一過，蘇聯紅軍分四路進入在中國東北的中蘇邊界，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全線總攻擊。美國向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八月十日，延安總部向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發布大反攻的命令。
		八月十一日，蔣介石發布命令，要八路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原地駐防待命。
		八月十四日：蘇聯政府與國民政府正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日本軍政要員舉行御前會議，決定無條件投降，並照會盟國。
		八月十五日：蘇聯政府與國民政府正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日本軍政要員舉行御前會議，決定無條件投降，並照會盟國。
		八月十六日：蘇聯政府與國民政府正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日本軍政要員舉行御前會議，決定無條件投降，並照會盟國。

<p>一九四六</p> <p>省委員會籌備會」。</p> <p>元月五日，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樸材、謝富、王天強等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p>	<p>抗戰勝利後，汪偽江蘇省政府改成國民黨江蘇省政府，蘇州仍為省府所在地。原汪偽省保安司令部被改編為南京先遣軍駐蘇州團部，並按國民黨軍隊建制增設政訓室。季澀與黨組織研究後決定讓葉正國打入該部隊，以政訓室上尉指導員的名義，瞭解與搜集有關部隊的情報。之後，季澀奉組織之命，由蘇州回到上海。</p>	<p>十月十日，台灣人民協會機關刊物《人民公報》開始發行。</p> <p>十一月下旬，張志忠帶著蔡孝乾的介紹信，從新四軍出來，到上海找李偉光醫師。年底，蔡孝乾到了上海。李偉光醫師安排他與張志忠住在他的療養院。</p>	<p>十月十九日，台灣人民協會舉行以原台灣農民組合為中心的抗日烈士追悼會。</p> <p>十月二十日，「繼承農民組合革命傳統」的台灣農民協會在台灣人民協會會址舉行成立大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成立。</p> <p>十月二十五日上午，駐台日軍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p> <p>十一月初，李純青在大華酒家見到謝雪紅和楊克煌。</p>	<p>十一月十七日：台灣人民協會台北市支部成立。</p> <p>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頒佈「台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命令全省人民團體即日起「停止活動」並按照規定辦法「重新登記」。</p> <p>十一月十九日，台灣人民協會決定重新登記，同時成立善後委員會，繼續進行活動。《人民公報》停刊。</p>	<p>年初，劉曉奉中共中央之命從延安出發，經華中解放區回到上海，負責上海地下黨的工作。</p> <p>一月十日，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同日下達停戰令，規定雙方軍隊應在一月十三日夜就各自位置停止軍事行動。</p>
--	--	--	---	---	---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發表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共中央華中局連夜召集高級幹部會議，決定派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八月十八日，謝雪紅和楊克煌離開頭汴坑山區，出來台中。

八月二十日，中共成立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根據地。

八月廿一日，中共中央電令上海起義停止舉行。

八月廿八日，毛澤東由延安飛往重慶談判。

九月二十日，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在台中宣布成立。

十月五日：以謝雪紅為首的台灣人民協會在台中成立。重慶《大公報》記者李純青與到台灣接收的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及重慶各報紙派出的首批記者，搭乘美國運輸機，從重慶飛抵台北，訪問台灣各界人士。

二月，蔡孝乾與張志忠等幹部在滬學習一個月。

三月間，王思翔、周夢江等來台中籌辦《和平日報》。

四月，張志忠率領抗戰時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職的黃文輝等首批幹部入台，首先去員林永靖找集美同學王天強（上海反帝大同盟事件被捕處刑二年）；王天強領他去找謝雪紅。他約一星期找謝雪紅一次，兩三次後表明身分；楊克煌開始參加談話，謝也介紹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樸材、楊克村及台南的陳錦雲等給張志忠。此後即以台北楊克村的住所及台南鬧區一家大酒店附近的陳家作為聯絡站，開展地下黨的組建工作。下旬，在台北陸續見了吳克泰、蔣時欽與老台共外圍組織赤色救援會的李振芳。這段期間，張志忠向謝雪紅介紹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主委李友邦的情況，安排由滬來台的中共黨員謝爽秋（《掃蕩報》、上海《新聞報》）、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蔡汝鑑等人與謝見面。

五月初，張志忠要謝雪紅派人去上海，證實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本人的身分；謝和楊克煌商量後決定派楊來傳去。張即赴台北安排楊出發。同月，批准吳克泰吸收的鍾浩東入党。

六月初，張志忠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化名楊春霖，經介紹認識季澐，結為夫婦。大約過了半個月後回台。

季澐在離滬赴台前曾專程回了南通一趟，與家人話別。來台後任教嘉義商業職業學校。

六月，蔣介石公開撕毀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六月十七日下午，張志忠和籌備會代表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樸材四人，在台北廖瑞發家舉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聯席會議，決定：1. 「籌備會」即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台工委」的領導；2. 「籌備會」成員今後不再發生組織上的聯繫，但在移交期間，為了移交工作暫可以聯繫；3. 「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台工委」分別接受之。

聯席會議後，謝雪紅介紹謝富、林XX、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壠等人，由張志忠張直接聯繫。不久，吸收謝富和蔡伯壠為黨員。張又交代：謝等的主要任務是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要他們和做祕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又說：有可能安插黨員進去中下層政權機關，介紹台南新豐區區長李義成和另一區長就是黨員。

七月，蔡孝乾回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

九月，張志忠持蔡孝乾之介紹函往晤簡吉；簡吉開始與張志忠聯繫並協助建立嘉義、台南等地區群眾工作。又介紹後來負責所謂「鹿窟武裝基地」的陳本江到台中找謝雪紅。

夏秋之交，中共上海局成立；劉曉任書記，主持全面工作；下設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乾（又名蔡前）。

<p>十一月十一日，季澐寄航空掛號信回南通，告知父親季厚庵：「所有物件，請送上海霞飛路呂班路口四明里偉光醫院李偉光先生，轉交台北榮町一丁目二十七番地生春行趙尚定先生轉」。</p>	<p>十一月，台南市工委會成立，李媽兜（由崔志信介紹與張志忠而入黨）自任書記，陳福星、陳文山分任市委。張志忠並介紹李媽兜與蔡孝乾相識。</p>	<p>冬，台大醫學院法醫室主任蕭道應與「廣東東江縱隊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志忠。</p>	<p>一月，張志忠吸收辜金良入黨，並給辜舊台幣十萬元，充作資本，往來台滬經商，以贏利交其運用。</p>	<p>一月十日，張志忠口頭表揚吳克泰在昨日學運的表現，然後交代兩項重要任務：一是接待來自延安的長征幹部程浩夫婦及同來的上海交通員林昆；二是成立台北市學委會，由吳任書記。他隨即帶吳到新公園西面一家旅館，介紹三人給吳。</p>	<p>二月初，張志忠到台中找謝雪紅，告知以後由林英傑（廣東揭陽縣人）和他們聯繫。</p>	<p>二月二十七日，辜金良介紹給張志忠的嘉義一陽書局老闆許分把寫好的自傳交給張志忠。聽到台北暴動的廣播後，許分就帶張志忠前往故鄉東石，接收拘留所，放走所有被關押者。</p>
<p>十二月五日，台南新豐大地震。</p>	<p>十二月廿四日，北京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 *李純青從台灣回到上海以後於一九四六年入黨，在張執一擔任書記的上海局文化委員會領導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對上海新聞界和台灣上層人士開展工作。</p>	<p>一月二日：行政院禁止大陸各大學學生針對美軍強姦北大女生事件，展開反美運動。</p>	<p>一月九日，台北學生團體反美示威遊行，抗議北京女學生強姦事件。</p>	<p>二月廿七日，晚上七點左右，台北市專賣分局緝私隊查緝員六人，在延平北路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菸，與女菸販林江邁發生爭執，並以槍筒毆擊林江邁頭部，流血倒地，引起圍觀民眾公憤而反擊；民眾陳文溪遭查緝員誤射死亡。</p>	<p>二月廿八日，不滿香菸緝私案的台北市民集結行動，聚集長官公署廣場時遭機關槍掃射，當場六人死亡，多人受傷。警備司令部發布台北市區臨時戒嚴令。</p>	

九月十二日，李偉光返台。張志忠通知吳克泰和專門為《自由報》寫稿的蔣時欽一起去探訪李偉光，同時告訴謝雪紅：李偉光是黨員，要謝在台中辦歡迎會，提高他的威望；並要楊克煌在《和平日報》盡量宣傳。九月底，張志忠批准吳克泰吸收的李登輝入黨，並指定吳同李單線聯繫。

九、十月間，張志忠同意楊克煌加入國民黨，以便做中、上層的統戰工作。

十月：八日，張志忠接父親病重電報，立即從台北趕回嘉義。九日，到嘉義商業職業學校，向季澐說明改日訂婚（原訂十月十日）原故。十一日，又到嘉義商業職業學校找季澐，決定十二日赴台南舉行儀式。十二日，與季澐在台南文化街美寶大酒店辦四桌訂婚酒席，儀式簡單。十三日晚，在陪季澐回校的火車上提議十月廿五日台省光復紀念日結婚。但季澐基於三點原因，不同意這個日子，兩人辯論很久，沒有結論。待季澐弟弟季永泉來台後再決定。

十月中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黨要她到台北參選國大代表。指示吳克泰與孫萬枝和徐淵琛成立省工委直屬的新聞記者小組；小組長徐淵琛。十月三十日，張志忠到台中，向楊克煌宣布：黨已批准他入黨，沒有預備期。

秋冬之交到一九四九年底，張執一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灣檢查與布置工作。

二月廿八日，辜金良奉組織之命，帶了一份文件到上海，交給同鄉會會長李偉光。

三月一日晚上，大約三四十名自稱自治同盟的青年有組織地搶搬東石區署的兵器庫；後來傳說這些人和新港張志忠同系統，張榮宗是其中之一；搶武器是為自治同盟日後使用。

三月二日，嘉義市也發生暴動，人民編成數隊，分別攻擊官舍、市長公館與警察局，獲得不少武器。張志忠通過以黃文輝為核心在嘉義電台職員中建立的外圍組織，立即把嘉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統籌指揮。嘉義民眾全數繳下警察武裝，占領市政府。

三月三日，上午，嘉義舉行市民大會，組織嘉義處理委員會及防衛司令部，司令部下面有高山部隊、海軍部隊、陸軍部隊、學生總隊、海外歸來總隊、社會總隊等等；下午，各部隊合攻第十九軍械庫，激戰後完全占領，接收一切武器及軍用品；晚上九時，市民完全占領市政府，台籍警察大部分攜槍參加起義。

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台中處理委員會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任命吳振武為部長，謝雪紅為參謀。陳篡地領導斗六民眾舉行大會，號召所有退伍軍人、學生、青年組織斗六警備隊，維持該地方的治安。滬台間的海

上交通斷絕。三月四日，台北市的暴動發展為全省性的抗爭。嘉義民軍各部隊開始大規模進攻國軍營房，國軍和憲兵隊先退到嘉義中學，再退紅毛埠。嘉義市的軍、黨、政各機關，以及水道、電力、電報、廣播電台、鐵路交通，均掌握在人民手中。民軍得到竹山、斗六青年部隊的急援及台中的彈藥供應，擁至紅毛埠，開始猛攻。

三月四日：張志忠到台中聯繫謝雪紅。無實戰經驗，正苦於無力指揮迅速擴大的大部隊的謝雪紅願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盼望有實戰的豐富經驗的張志忠來台中指揮戰鬥。深夜，張志忠趕到桃園，聽說台北的起義計劃都已準備停當，只等一聲令下發動，就在桃園過夜。（事後，在台北市工委會議上，廖瑞發很感慨地說，如果那時張志忠在台北，情況就會不一樣。）

三月五日：上午十點左右，張志忠到台中作戰本部，叫楊克煌趕快把武器盡量疏散到農村去。張志忠（簡吉幫同）將起義民眾組成「台灣民主聯軍」，台南地區由李媽兜負責；斗六地區由「台灣游擊戰」創始人之一的眼科醫師陳篡地領導的斗六警備隊，攻擊虎尾機場。嘉義地區由許分負責。各地民軍之間互相沒有橫的聯繫。張志忠通過謝富與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絡。

三月六日：張志忠與舊農組領導人簡吉親率許分、謝雪紅第一次見面；蔡決定最近召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局勢變化基隆。中共中央對台廣播呼籲「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晚上八點，蔡孝乾在台中大華酒家與謝雪紅第一次見面；蔡決定最近召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局勢變化基隆。中共中央對台廣播呼籲「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晚上八點，蔡孝乾在台中大華酒家與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行政長官陳篡地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三月八日：行政長官陳篡地拒絕接受二二八事件處空投相當數量的彈藥和糧食，立即突圍。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行政長官陳篡地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三月九日：晨，憲兵二營由福州運抵基隆。中共中央對台廣播呼籲「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晚上八點，蔡孝乾在台中大華酒家與

三月九日：晨，憲兵二營開入台北。警備總司令部再度宣布台北市戒嚴。福建台灣監察史楊亮功奉監院命，來台調查二二八事件。午後，國軍第二十一師先遣之一個團到達基隆。

三月十日：國軍第二十一師先遣團進抵台北，恢復控制基隆台北間之交通。軍憲警會同開始徹底搜索暴亂首要分子。長官公署下令解散各地處理委員會。台北治安漸趨穩定。新竹花蓮屏東各縣市秩序恢復。高雄市經要塞部戡定，業已確實控

處粉碎國軍，民軍士氣大振。台中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部長吳振武不見人影，謝雪紅、楊克煌遵照張志忠的意見，挑選最精良隊伍，集中起來，編成基幹隊伍二七部隊。

三月十一日：台南恢復秩序。

三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正，二七部隊一百多名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進駐埔里小學。

六月四日，上午一點，張志忠兒子出生；戶口名 楊揚，戶籍地址：台北市城中區榮文里第一鄰第 一戶，戶長李濱。	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成立，並宣告清鄉工作 已經完成。
六月，台北工委林樑材因私藏八麻袋武器遭通緝 而轉移嘉義郊區隱避，並通過愛人柯秀英及郭琇 琮與張志忠祕密聯繫。柯曾領張志忠到彰化農村 三叔公家的菜園子挖取埋藏的十支手槍。	五月十八日，警備司令部公布：全省解除戒嚴， 暫停郵電檢查。
五至七月，王忠賢、溫萬金、許希寬、陳焰樹等 組成台北市工人工作委員會；溫萬金負責發展電 器人工作，先後隨王忠賢至台北縣觀音山討論 組織游擊隊事宜及至嘉義與張志忠所領導之自治 聯軍聯絡。	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蘇杭等地學生六千多 人，在南京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 遊行，遭到殘酷鎮壓，造成「五一〇血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七七宣言」，成立民 主聯合政府、實施土地改革。	五月廿一日，謝雪紅、楊克煌和古瑞雲從左營潛 離台灣。
九月，「自治聯軍搶劫嘉義縣番路鄉菜公店合作 社資金，及搶奪雲林縣西螺警察所武器」案發， 陳明新被捕，張志忠在老台共張溜（化名老夫） 引導下逃亡，張溜並代為處理及保管搶獲之槍 彈。	六月初，謝雪紅、楊克煌和古瑞雲從上海抵達香 港。

三月十七日，謝雪紅、楊克煌和工人陳到竹山鎮 郊，並打發工人陳到小梅和張志忠聯絡。	三月十三日，早晨，二七部隊移駐埔里武德殿。 三月十四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全省至三 月十三日止已告平定，「肅奸」工作即日開始進 入綏靖階段。
三月十九（或二十）日，張志忠由小梅到竹山找 謝雪紅和楊克煌，告知他們暫時在竹山待機而 行，不要前往小梅。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暫時撤出延安。
五月十四日，季濱以台灣省立台北補習學校用箋 給父母親寫了第四封信。	三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台灣自治 運動〉為題的社論。
五月廿二日，行政院決議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改訂「省政府組織法」；決定任命魏道明為 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	三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代電陸軍整編 第廿一師劉師長：「嘯聚小梅、竹崎一帶之南台 區總指揮陳纂地殘部，因我軍圍剿甚急，於三月 十九日起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 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以謀長 期盤踞，且聞陳纂地在撤退前聲言：決收集各 地殘部，潛藏深山，施行一年計劃，再謀大舉暴 動。張信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主任）簡吉（現任 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現已潛入該部活動。」
五月廿五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 部，彭孟緝為司令。	四月廿二日，行政院決議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改訂「省政府組織法」；決定任命魏道明為 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

				十月七日，省政府依據中央所頒「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令本省境內共產黨員於本月底前登記，逾期依法究辦。
				十月廿五日，台灣省第二屆運動會在台中舉行，台中市內及運動會場突然出現大量未署名的宣傳品，內容除介紹人民解放軍六十七條時局口號之外，並附解放戰爭形勢圖。
				十一月十二日，謝雪紅與蘇新等等二、二八流亡者於香港組成「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十月，簡吉轉往新竹地區活動。
				十二月左右，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人之一，主要負責宣傳工作的洪幼樵（廣東揭揚白塔鎮人），指導中壢義民中學老師黎明華與徐新傑、鍾履霜成立小組後交給張志忠領導。此後，張志忠就每週同黎明華聯繫一次。
				冬，蕭道應由張志忠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接受張志忠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調查研究工作。蕭將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黃培奕和石聰金介紹給張志忠。
				一九四八年二月，簡吉經張志忠介紹，正式入黨，充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受張指揮。二二八紀念日前兩天，黃培奕和石聰金在縱貫鐵路桃園到鶯歌下坡路段的駁坎寫標語：「毋忘二二八，：血債血還；記住二二八，台灣青年起來……」。張志忠看了這標語，非常滿意。其後，張志忠把身分暴露的陳福星帶到黃家，長期隱蔽，並以此為基地，領導新竹以北所有組織。
				春，張志忠介紹張滔與廖學信發生關係。
				二月，全島各地出現《紀念一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正式署名。台灣北部、中部、南部也同時發現了二二八部隊北部支隊、南部支隊用日文寫的、內容大體相同的「告同胞書」。
				四月廿三日，身分證總檢查實施辦法公布。
一九四九年				二月，李漢堂經李喬松吸收入黨後受命前往竹山，與張志忠、施部生、呂燃章等洽商籌組地下武裝組織。眾人分任「中部武裝委員會」委員，成立「武裝工作隊」。張志忠並供給手槍五枝、手榴彈廿餘枚、卡賓槍一支、軍用地圖一份。張志忠赴港，參加中共華東局秘密舉行的「台灣工作幹部會議」。
				十月，張志忠化名老黃，前往竹東林場，與殷啓輝（江蘇人，上海暨南大學畢業，因積極參加學運工作，身分暴露，轉移竹東林場）聯繫。
				年底，蕭道應夫婦遷居東門的大學宿舍，並把中山北路國賓後面的房子讓張志忠夫婦住。
				元月，張志忠指示同辭《公論報》工作的石聰金和黃培奕分別前往桃園十三份山區和鶯歌，開闢專為日後收留政治流亡者的基地。
				春，簡吉轉移台北，改由蔡孝乾直接領導。
				四月，張志忠夫婦借住台北市衡陽路八號李振芳開設的生春藥房。
				二月十二日，警備司令部公布〈軍公人員及旅客台灣省入境暫行辦法〉（三月一日實施）。
				二月四日，省主席陳誠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
				二月十二日，警備司令部公布〈軍公人員及旅客台灣省入境暫行辦法〉（三月一日實施）。

五月，張志忠指示黎明華務必把「迎接解放」的政治口號轉為「配合解放」的實際行動；其中，農村幹部尤其要熟悉周圍地形、道路交通、海岸線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況，並要通過各種關係做好一般的群眾工作。

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季潔與家裡失去聯絡。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軍渡江，南京解放。

四月廿五日，國民政府遷往廣州。

名學生。一般稱作「四六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台灣當局為鎮壓三月下旬以來風起雲湧的台北學運，派出大批武裝軍警，強行闖入師範學院與台大的男生宿舍，集體逮捕兩三百

人，希望隔江而治。南京各大專院校近萬名學生齊集總統府門前，舉行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而被鎮壓，造成「四一血案」。

七月十日，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展開政治宣傳攻势：在全省同步散發《人民解放軍佈告》，〈告台灣同胞書〉（省工委、台盟、解放軍駐台代表聯名），以及一些寫著明確口號的小張傳單。

七月，張志忠將身分暴露的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林希鵬移交陳福星領導，開展桃園至新竹鐵路以西海岸地帶工作。

六月十五日，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舊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壹元，舊幣如同廢紙。

六月廿一日，針對「匪諜」的《懲治叛亂條例》公布實施。

六月廿四日，近萬名台灣軍人派赴大陸，打內戰。

七月九日，省級公務員推行聯保制。

八月五日，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聲明不再介入中國內戰，停止援蔣。

八月十八日起，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破獲所謂「匪成功中學支部」，並「循供」逮捕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在內的所謂「匪諜及涉嫌分子四十四人」。

九月一日，晚上九點，張志忠安排黎明華離開義民中學；再由陳福星和曾永賢帶領，轉移苗栗三溪、龍潭（地）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地）區，苗栗縣大湖（地）區等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整頓，進行深入隱蔽之群眾運動，挑選積極分子，策動進入山區，設法購買槍彈藥，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壯大，擴展成爲游擊根據地，然後始能做到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之攻台」。

九月一日，晚上九點，張志忠安排黎明華離開義民中學；再由陳福星和曾永賢帶領，轉移苗栗三溪、龍潭（地）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地）區，苗栗縣大湖（地）區等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整頓，進行深入隱蔽之群眾運動，挑選積極分子，策動進入山區，設法購買槍彈藥，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壯大，擴展成爲游擊根據地，然後始能做到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之攻台」。

九月一日，晚上九點，張志忠安排黎明華離開義民中學；再由陳福星和曾永賢帶領，轉移苗栗三溪、龍潭（地）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地）區，苗栗縣大湖（地）區等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整頓，進行深入隱蔽之群眾運動，挑選積極分子，策動進入山區，設法購買槍彈藥，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壯大，擴展成爲游擊根據地，然後始能做到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之攻台」。

九月廿一日，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等五人作爲台盟正式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

十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辦公。

十月卅一日，「台灣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被捕。

十月：「山地工作委員會」建立，任簡吉爲書記。台盟總部成立理事會，謝雪紅爲主席，楊克煌爲秘書長，王天強爲四名理事之一。

<p>十二月下旬，張志忠在苗栗縣神桌山，親自主持爲期一週的竹南地區幹部學習班；學習班一共十五個人參加，除了陳福星、曾永賢、徐新傑、鍾蔚璋和黎明華之外，其他包括劉雲輝、張南輝等當地的農民、小商人和中小學教員。</p> <p>冬，張志忠、陳福星二人在烏塗窟附近之十三份山區，開辦第二次幹部集體學習會；參加者有蕭道應、黃培奕、林元枝、簡國賢等二十人參加，著重研究台灣山鄉地形及游擊戰術。</p> <p>十二月卅一日晚，張志忠、季漾與楊揚在生春藥房被捕。</p>	<p>十一月四日，防衛司令部公布：通匪或隱匿匪謀不報、造謠惑眾、煽動軍心、破壞交通與電訊者皆處死刑。</p> <p>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遷都台北。</p> <p>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遷移台北。</p> <p>十二月十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言人公開宣布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匪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任職基隆中學的「匪諜」四名。</p>
<p>一九五〇</p> <p>一月，張志忠領導的陳福星、黃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組織臨時領導機構於烏塗窟，開始重整北部省委組織。</p> <p>農曆年（二月十七日）前，某陌生人帶張志忠的皮箱到三灣鄉內灣村孫阿泉家，向黎明華傳達張志忠將於二月十五日與竹南、苗栗地區重要幹部學習會的重要幹部全部撤離，分頭疏散到桃園或苗栗地區。</p> <p>會面，討論重要事情。黎明華分析情況和各種疑點後，判斷張志忠可能已經被捕，那人一定是偽裝的特務，目的是把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在跟陳福星和曾永賢定期會面報告後，安排參加神桌山學習會的重要幹部全部撤離，分頭疏散到桃園或苗栗地區。</p>	<p>一月廿九日，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被捕；保密局又根據他的「供詞」，逮捕「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等十三人。其後，在陪伴保密局特務追捕其他黨員時「乘隙脫逃」，不久再度被捕。</p>
<p>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p> <p>三月八日，爲防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潛伏山區，實施爲期一週的山地統一檢查。</p> <p>三月十日，台灣省政府通過本省戶口總檢計劃。</p> <p>四月廿五日，簡吉在台北市被捕。</p> <p>四月廿六日，「徵治叛亂條例」修正案公布。</p> <p>四月三十日，全省戶口總檢查。</p> <p>五月十三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在政府歷。</p> <p>五月，以陳福星爲首的北部重整省委接到所謂「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密定「採取『合法性』、『社會性』、『地方性』之鬥爭方式，將主力轉入鄉村山區」。</p>	<p>五月十六日，國府撤退舟山群島，蔣介石提出發言人（沈昌煥）中外記者會上宣布「共匪台灣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p> <p>五月卅一日晚上，正聲、臺灣、空軍、軍中、民本、民聲等廣播電台，同時聯播蔡孝乾對本省同胞發表的「懺悔」演說。</p> <p>六月一日，《中央日報》全文刊載蔡孝乾的廣播內容。</p> <p>六月四日，《勘亂時期教育實施綱要》公布，規定中小學起實施三民主義及反共抗俄教育。</p> <p>六月十三日，《勘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公布。</p> <p>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p>
<p>國內政。</p> <p>六月廿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台灣中立化」方針，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p>	<p>十一月四日，防衛司令部公布：通匪或隱匿匪謀不報、造謠惑眾、煽動軍心、破壞交通與電訊者皆處死刑。</p> <p>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遷都台北。</p> <p>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遷移台北。</p> <p>十二月十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言人公開宣布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匪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任職基隆中學的「匪諜」四名。</p>

九月二日，季澑與楊揚到軍法處看守所第四十五號。

九月五日，法官答應讓楊揚回嘉義，季澑也寫報告，請求批准。

九月十四日，張志忠托人帶口信給季澑，「人很健康」。

九月十五日，季澑寫第一、二封家信給芬姊（弟媳）。

九月廿七日，張再添坐夜車來接楊揚。

十月三日，季澑給芬姊的信：「是真的，他爸爸很好，認識他的人都說他人好，只是因為事情沒有清楚，沒有到軍法處來」。

十月十二日，芬姊寄信給季澑，告知「小羊平安地回家了」。

十月三十日，季澑給芬姊的信提到：「我是沒有什麼事的，不過因為小孩的爸爸事情大，陪他坐籠子，等判決，看是個什麼結果。」又，給張再添的信提到：「請你好言安慰兩位老人，說我們不是流氓小偷犯，不過是思想成問題的政治犯，不要什麼緊，小羊爸爸是個比較有地位的省委，大家對他很客氣，……到今天為止，我已整整來了十個月，……希望你……不要亂交朋友，像藥店的老板娘之流，不要去找她，那種人是不夠朋友的；更不要隨便說話，安分守己，不會坐籠子的」。

九月廿九日，台北國府行政院制定「勘亂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連坐辦法」。

十月十四日，鍾浩東槍決。

十一月八日，中共發布：中國人民義勇軍已於十一月廿五日越過鴨綠江，開赴韓國戰場。

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六點，季澑鄉赴馬場町刑場槍決。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日報》載稱：季澑，廿九歲，「專門負責刺探政府高級人員行動情報」。

十二月廿九日，楊克村因家中被搜到季澑和楊揚的身分證（張託他辦理戶籍遷入用）而被保密局逮捕入獄。

年底，「重整後台共省委組織」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並決定依客觀環境的變化，調整組織策略和鬥爭方式。

一九五一

二月間：北部海山區黨組織全部被摧毀，黃培奕、陳福星、曾永賢與林元枝等四人，召集全省地區幹部會議，商討重整省委組織，由陳福星、曾永賢和黎明華三人重建領導機構，陳福星任書記，曾永賢負責組織和統戰，黎明華則負責軍事、文教和群眾運動。黎明華同時寫《向偏向作鬥爭》，展開內部整風。

八月底前，「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殘餘幹部以及省委機構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到苗栗地區。

六月一日，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三單位組成特種聯合小組，專門偵辦「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

七月十二日，特種聯合小組根據內線情報逮捕「匪重整後省委」劉興炎。

七月十七日，黎明華在龍潭被捕。

七月二十日，殷啓輝在龍潭被捕。

十一月三十日，保安司令部宣布：〈匪諜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截止，一共五七六人自首。九月廿一日，△匪諜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開始實施三個月，限十一月三十日前辦理自首。

一月七日：總政治部報告：去年底自首「匪諜」共六二九人。三月一日，李漢掌自首。
八月，調查局針對台北縣山區成立「肅奸工作專案小組」。

四月廿五日，凌晨三時卅分，蕭道應在三義魚籬坪基地被捕；晚上九時，曾永賢被捕；十二時，陳福星被捕。「重整後省委」組織被破壞。其後，劉雲輝繼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會負責人」，整理苗栗地區殘餘組織，編為三個「互助組」，堅持在造橋、頭屋、三灣等鄉及頭份鎮之丘陵山區、峽谷崖坑內，進行「地下活動」。

十二月十三日，調查局安排蔡孝乾、洪幼樵、陳福星、曾永賢等十五名「自首自新前共產黨員」，召開自新記者會。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三版刊載陳纂地自首談話：〈反省的結論〉。

一九五三

十月廿六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張志忠死刑。

十一月五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張志忠叛亂一案卷判」簽請國防部核示。

十一月廿六日，國防部參謀總長陸軍一級上將周志柔對原判「擬予照準」，並於第二天轉呈總統，簽請核示。

十二月十四日，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以張志忠「施以感化時逾三年尚無悔悟」、「惡性重大」為由，批示「如擬」。同日，石聰金在台中大安鄉被捕。十二月廿八日，石聰金輾轉押送台北軍法處看守所，與張志忠短暫同房；張志忠告訴石聰金，他很清楚《公論報》總經理陳其昌的情況，要石不要談。其後，陳其昌與張志忠同房；張志忠要他放心，同時告訴他家裡的情形。陳其昌看到：張志忠每天早上起來，唱《義勇軍進行曲》，安靜地看書，等待死亡。幾天後，陳其昌調房，從窗口清楚看到：一個月不到就有五十個難友被叫出去槍決，但一直沒看到張志忠。他想，那表示張志忠還有利用的價值。

六月，調查局製作「破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沿革表」，張志忠兼任「自治聯軍（即嘉南縱隊）」司令員。

八月十三日，〈勘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公布。

元月上旬，調查局會同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佈署「肅清殘匪」工作計劃，動員「新生小組及自首人員示範小組優秀自首自新分子」，配合專任政治人員，組成「肅殘工作隊」，運用政治方式，爭取「逃匪」家屬及地方人士之真誠合作，斷絕「逃匪」之經濟供應，摧毀其群眾據點，迫使其生活陷於絕境，策動「逃匪」投案。

二月十日，以陳福星為主之策反小組，在二水，說服黃培奕自首。

三月中旬，苗栗地區的孫阿泉、鐘二郎自首。

三月十四日，黃培奕策反牛角山基地所有幹部自首。

三月十七日，劉雲輝自首。

五月十七日，國防部核准黃培奕及劉雲輝等五人之自首。

一九五四

三月八日，總統府第二局局長傅亞夫核定桂永清「代」的總統批示，發文國防部周總長。

三月十二日，參謀總長周志柔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命令。

三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卅分，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張志忠「驗明正身」後發交臺北憲兵隊，綁赴

刑場執行槍決。得年四十五歲。

三月十八日，下午五點，張志忠於台北市公設火葬場火葬。

三月廿七日，周志柔「呈報執行叛亂犯張志忠一名死刑日期」，並「檢呈該犯生前死後相片各二張」，「敬請備查」。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卅分，總統府第二局收到

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包啓黃中將呈報的「為叛亂犯

張志忠一名業已執行死刑茲檢附執行照片敬請轉

呈核備」函。

四月十五日，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陸軍中將傅亞夫

發文國防部軍法局，告知來函已轉呈總統府參軍

長桂永清核批：「准予備查」。

四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的調查局內

部「機密」資料郭乾輝《台共叛亂史》載稱：

「張梗，日據時代化名為鹿某，後在中共匪區改

名為張志忠，曾在抗大受訓，並在劉伯承部工作

過。」

一九六八	一九六七
元旦，楊揚在台北市長沙街二段星光旅社自殺。 元月廿六、廿七、廿八日，柏楊在《自立晚報》 「挑燈雜記」專欄，連續發表〈楊揚之死〉、 〈心情沉重〉和〈一時想不開〉三篇文章，詳述 楊揚自殺事件的處理經過。	十二月十二日，張志忠的父親張禮逝世，享年 八十七歲。
三月二日，劉啓光卒。	

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與楊揚

作 者 藍博洲
總 編 輯 初安民
責 任 編 輯 洪玉盈
美 術 編 輯 林麗華 黃祖憲
校 對 吳美滿 洪玉盈 藍博洲

發 行 人 張書銘
出 版 台灣人民出版社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 址 舒讀網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 代 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 話 (852) 2798 2220
傳 真 (852) 2796 5471
網 址 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 初版
ISBN 978-986-86339-1-9
定 價 399元

Copyright © 2012 by Po-chou Lan
Published by Taiw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與楊揚／藍博洲著。
--初版。--新北市中和區：台灣人民，
2012.07 頁； 公分。--(百姓叢書；2)
ISBN 978-986-86339-1-9 (平裝)

857.85

101009137